



【英】温斯顿·S·丘吉尔著

康文溪 蒋倩译 赵文书审核

# 丘吉尔文集 我的早年生活

100243

[英]温斯顿·S·丘吉尔著

康文凯 蒋倩译 赵文书审核

江苏人民出版社

# 丘吉尔文集 我的早年生活

My Early Life

Copyright © by Winston · S · Churchill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1998 by Jiangsu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with Curtis Brown U. K.

**书 名** 我的早年生活  
**编 著 者** 〔英〕温斯顿·S·丘吉尔  
**译 者** 康文凯 蒋 倩  
**译 校** 赵文书  
**责任编辑** 汪意云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南京中央路 165 号  
**邮政编码** 210009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 刷 者** 徐州新华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9.875 插页 2  
**印 数** 1—6130 册  
**字 数** 217 千字  
**版 次** 1998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214—02257—5/I·99  
**定 价** (软精)14.00 元  
(江苏人民版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 前 言

有关我早年生活的故事很多,30年前我自己也发表过我所亲身经历过的几次大战役的故事,后来又陆续写了一些对具体事件的回忆。现在我觉得应该把这些文字串在一起,敷衍成篇,姑且旧话重提,再谱新曲。我不仅依靠自己的记忆,而且根据我手中的记录仔细核对了事实真相。本书横跨四分之一个世纪,其间我从婴儿、学童、军校学员成长为一名少尉军官、战地记者和年轻政治家,我在书中尽我所能再现了与我的各年龄阶段相应的观点和看法。如果这些观点与现在广为众人所接受的观点相冲突的话,那么这些观点只应被看作是代表了我早年生活中的某一特定阶段,因此,除非有明确的上下文,请读者千万不要认为这些观点是我现在的观点。

概观全书,我发现自己所描绘的是一个已逝去的年代。社会性质、政治基础、战争、年轻人的世界观以及价值体系等一切都变了,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而且国内并未发生暴力革命,但变化之大简直令人难以置信。但我并不认为一切都在向好的方向转变。在维多利亚时期我还是个儿童,当时的英国社会结构稳定,在海上贸易方面独占鳌头,英国国民对伟大的大英帝国的自豪感以及保卫帝国的使命感与日俱增。当时大不列颠的中坚力量对自己的势力和信念十分自信,他们认为自己有资格向全世界传授治国之理和富国之道。他们坚信,英国的海上势力首

DK34/01

屈一指,因此英国很安全,于是他们便定下心来。与之不同的是,当今世道充满了焦虑和疑虑。请诸位允许我把这一变化过程慢慢道来。

我想,年轻的一代也许对年轻人的奋斗故事感兴趣。在本书里我将尽可能简明地把我的个人经历坦白地写下来。

在本书的美国版里,我觉得有必要对我的美国先祖作进一步说明。我母亲是杰罗姆家族的一员。1717年,蒂莫西·杰罗姆漂洋过海,从英国来到美国,在距离纽约殖民地的锡拉丘兹镇不远的庞贝村安顿下来。在独立战争中,他的儿子塞缪尔和他的4个孙子参加了华盛顿的部队。杰罗姆家族在庞贝生活了四五代。19世纪初,我的外祖父伦纳德·杰罗姆从普林斯顿学院毕业后,家道兴旺,于是他和弟弟拉里一起搬到罗切斯特,兄弟俩娶了霍尔家族的两姊妹。他们在城中最好的地段建了两座小洋房,两家隔河相望,中间有一座桥相连。外祖父有4个女儿,他的弟弟有4个儿子。母亲于1854年出生在罗切斯特,是伦纳德·杰罗姆的二女儿。当年,美国社会蒸蒸日上,杰罗姆家族也发了财。1856年他们迁往纽约。外祖父在纽约的麦迪逊广场边建了两栋房子,其中一栋是曼哈顿俱乐部所在地,另一栋是他的住所,他在世时一直住在这栋房子里。他在罗切斯特创办过一份报纸,该报是当时所谓的“无知党”的喉舌,这份报纸是现在的《罗切斯特民主纪年报》的前身。

他在纽约涉足报业和房地产业,生意做得很大。到内战爆发前夕,他已是一位富翁,成了社会名流。他没有过多地卷入政治,但他在工会斗争中一直是工会的热情支持者。除了做生意,他的兴趣主要在运动和音乐上。他长得很帅,明亮的眼睛,鹰钩鼻子,长须飘拂,这些我仍然记得。他善于驾车,每遇重要场合,

他总是驾着 6 匹马拉的马车穿行在纽约街道。可以说他是美国赛马场的创始人,建在老赛马场上的杰罗姆公园就是以他命名的。他创立了赛马骑士俱乐部,并出任副总裁多年。他有一匹著名的赛马,名叫肯塔基,这匹马从未在比赛中失蹄。他是纽约音乐研究院的创始人之一,他推动了歌剧的发展,结交了詹妮·林德和帕蒂,还培养了卡门的扮演者明尼·豪克小姐。

在法德战争爆发前夕,外祖母带着女儿来到巴黎。德国军队步步逼近,迫使她们离开了法国首都,她们在英国住了一段时间,认识了不少朋友。1873 年夏,詹妮·杰罗姆来到考斯,遇到了我的父亲伦道夫·丘吉尔勋爵。当时,她是纽约、巴黎和伦敦社交界有名的美女。伦道夫·丘吉尔勋爵与她一见钟情,几个月后他们结为夫妻。

——温斯顿·S·丘吉尔

## 目 录

童年.....	1
哈罗公学 .....	14
考试 .....	22
桑赫斯特军校 .....	37
第四轻骑兵团 .....	53
古巴 .....	64
豪恩斯洛 .....	76
印度 .....	87
在班加罗尔勤学苦读 .....	94
马拉坎德野战军.....	106
马蒙德山谷.....	117
远征蒂拉赫.....	128
与基钦纳之间的麻烦.....	139
恩图曼之战前夜.....	148
冲锋的感受.....	156
离开部队.....	167
奥尔德姆.....	184
随布勒去开普.....	195
装甲列车.....	203
监禁的日子.....	218

## 2 我的早年生活

---

越狱(一).....	225
越狱(二).....	239
返回军营.....	249
斯皮扬山之役.....	258
解救莱迪史密斯.....	266
在奥兰治自由邦.....	273
约翰内斯堡与比勒陀利亚.....	287
卡叽大选.....	294
进入下院.....	302

## 童 年

人最初是在什么时候开始记事的呢？儿童的头脑中什么时候会隐约留下最初意识呢？我能记起的最早事情是在爱尔兰度过的时光，我能清楚记起当时爱尔兰的景色和事件，甚至还能隐约记起那儿的人。我生于1874年11月30日，1879年初，我离开了爱尔兰。1876年，迪斯累里首相任命我的祖父马尔伯勒公爵为爱尔兰总督，我父亲作为总督秘书随行。我们住的房子被称为“小屋”，毗邻总督府，我在此度过了3年童年时光，现在对当时的一些事依然记忆犹新。我记得我的祖父于1878年为高夫勋爵雕像揭幕的情景：黑压压的一大群人，骑马的红衣骑兵，盖在雕像上的褐色绒布拴着许多线。我那令人钦佩的祖父，一位老公爵，大声地对着人群讲话。我甚至还记得他当时说过的一句话：“他（指高夫勋爵）指挥步兵对敌人进行一次毁灭性的排枪齐射，终于击溃了敌人的防线。”我很清楚他是在谈论打仗，也知道“排枪齐射”就跟黑衣战士（步枪兵）在凤凰公园打枪时的剧烈枪声一样。我常常在早晨去凤凰公园散步，听到过这些枪声。我想这是我第一个比较完整的记忆。

其他一些事情我记得更加清晰。有一次我们准备去看童话剧，这是十分令人激动的。期待已久的那个下午终于到了，我们从总督府出发，乘车去都柏林城堡，在那儿一定还有许多其他孩子。城堡内有一块很大的空地，地上铺着长条石。那天下着雨，

那儿经常下雨，现在仍然如此。人们从城堡的门里走出，显得乱糟糟的。后来得知我们不能去看童话剧了，因为剧院已被烧毁。从废墟中所能找到的只有剧院经理口袋里的一串钥匙。我们未能看到童话剧，作为补偿，我们可以在第二天去看剧院的废墟。我很想去看看那串钥匙，但是这种要求似乎不可能得到满足。

在这几年中，有一次我们曾去艾姆公园，到波塔林顿勋爵的府上拜访。家人告诉我，我可以称他为伯伯。虽然我在四岁半以后再也没去过那儿，但我能很清楚地描述这个地方。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一个高高的白石塔，我们走了很久才到达那儿。有人告诉我这个塔曾被奥利弗·克伦威尔炸毁。我知道克伦威尔炸毁过各种各样的东西，因此，他是一位非常伟大的人物。

我的保姆埃弗雷斯特太太十分害怕芬尼亚组织<sup>①</sup>成员。我猜想他们是一帮坏人，只要他们想随心所欲，他们就会没完没了地干坏事。有一次，我骑驴外出游玩，看到黑压压的一排人朝我们走来，我们认为那是芬尼亚组织的人。现在我敢肯定那一定是步兵旅在例行拉练。但我们当时十分惊慌，尤其是那头驴，紧张得乱踢乱蹬，最后我被掀了下来，得了脑震荡。这是我第一次与爱尔兰政治打交道。

凤凰公园内有很大的一圈树丛，中间有一幢房子。这幢房子里住着一位要人，他是首席大臣还是次官我就不清楚了。这幢房子里住着一位叫伯克先生的人，他给过我一只小鼓。我现在记不起他的模样，但却记得那只鼓。两年后我们回到英格兰时，有人告诉我他被芬尼亚组织成员在凤凰公园杀害了，这个公园是我们过去每天都去散步的地方。看上去我周围的每个人对

---

<sup>①</sup> 指 1858 年前后成立于纽约的爱尔兰争取民族独立的反英秘密组织。

此都很沮丧,而我却庆幸我从驴背上摔下来时芬尼亚组织成员没有抓住我。

就是在这“小屋”里我开始接受教育的磨练。家人宣布女家庭教师(一个可恶的人物)即将到来。为了准备迎接她的到来,埃弗雷斯特太太拿出一本名叫《无泪的阅读》的书。在我看来,这本书根本就是文不对题。家人告诫我,在女家庭教师到来之前,我必须能够做到不流泪地读书。我们每天辛苦地准备着。保姆用笔指着不同的字母教我,我觉得十分乏味。女家庭教师就要到了,而我们还没有准备好。在这种情况下,我和许多无奈的人一样,躲进了树林。我躲进了“小屋”周围的茂密的灌木丛中——它们看起来似乎像森林。过了几个小时家人才找到我,然后把我交给那位“女家庭教师”。我们整天苦学,不仅要认字母还要认单词,更糟的是我还得认数字。字母是该认的,当字母以一定的方式排在一起时,我能认出它们,也能知道它代表某个固定的发音,迫不得已时我也能读出来。但是数字堆在一起就乱成了一团,我实在搞不清它们之间的关系。把它们放在一起时,你不得不说出它们到底等于多少,况且我的老师显然十分重视答案的准确性。如果答案不对,便是错了,“差不多对”根本没有用。有时,做加减法就像借债一样:你得先借一个或拿一个,然后再把你借的还回去。这些错综复杂的难题给我的日常生活带来了越来越重的阴影,让我无法享受托儿所和幼儿园里的趣事。它们不断挤占我的闲暇时间,使我根本没有时间去做我想做的事。它们几乎成了沉重的包袱,当我们学“算术”时,情况更是如此,我好像走进了沉闷忧郁的深渊。学起算术来好像没有一个尽头,做完一道算术题,总是还有另一道等着你,一旦我设法解决某种类型的题目,又有更复杂类型的题目向我压过来。

我的母亲没有直接参与这种强制性教育,但我感觉到她赞

成这种做法,而且她总是站在老师的一边。在我的印象中,她在爱尔兰有骑马的习惯,喜欢穿紧身衣,身上常常泥迹斑斑。她和父亲常常骑着大马出去打猎。有时,由于他们当中有一个会在该回来的时间后数个小时内还不回家,家中会十分恐慌。

在我看来,母亲是位美丽的仙女,她光彩照人,具有无穷的魅力。母亲在爱尔兰时,达贝隆勋爵是这样描写她的:

第一次看到她时的情景至今还历历在目。那是在都柏林的总督官邸,她站在门的左侧,当时总督站在房间另一端的高台上,周围簇拥着一群精干的幕僚,但他们的目光既不注视总督也不注视总督夫人,而是集中在站在一旁的一个与众不同的身穿黑色衣服的光彩照人的窈窕身影上。她的头上戴着她最心爱的钻石星,但其光泽与她的水灵晶亮的眼睛相比要逊色得多。她像敏捷的猎豹,而且富有涵养和智慧,其勇气不让须眉,不愧为伟大公爵的母亲。她聪慧过人,与人为善,为人达观,到处受欢迎。她善于享受生活,真诚希望别人都能与她共享对生活的信心,希望人人快乐,这一切使她拥有一群知己。

达贝隆如此描写我母亲,我至今仍感激不尽。

母亲给小时候的我留下的印象正是如此光彩照人。在我看来,她是夜空中的一颗明星,我很爱她,但和她并不是十分亲热;我的保姆才是我最知心的朋友,精心照料我的是埃弗雷斯特太太,从上学时起一直到现在,我也只向她一个人吐露我的烦恼。在她到我们家之前的12年中,她一直照料着一位叫埃拉的小女孩,那是一位住在坎伯兰郡的牧师的女儿。虽然我从未见过她,

但“小埃拉”是我孩提时代的一个主要人物。从埃弗雷斯特太太那儿我知道了她的一切，知道她喜欢吃什么、如何祈祷，也知道她如何调皮、如何听话；我甚至能想象出她家的模样。在埃弗雷斯特太太的感染下，我十分喜欢肯特郡，她说肯特郡是“英格兰的花园”。她出生在查塔姆，特别为肯特郡而感到自豪。没有一个郡能与肯特郡媲美，正如没有一个国家能比得上英格兰。比如，爱尔兰根本无法与之相比。埃弗雷斯特太太曾经用婴儿车推我到法国的一个小地方玩，她根本看不起法国。她认为肯特郡是最好的地方，它的首府是梅德斯通市，周围到处是草莓、樱桃、树莓和李子，实在是诱人极了！我总想住到肯特郡去。

1990年冬，我在都柏林做关于“布尔战争”的报告，重访了“小屋”。在我的印象中，它是一幢白色矮楼，有绿色的百叶窗和绿色的走廊，周围是一块跟特拉法尔加广场<sup>①</sup>一样大的草坪，草坪的周围是一片大森林。我以为从总督府到森林至少有一英里。当我旧地重游时，惊诧地发现这块草坪只有60码宽，那森林变得跟灌木丛差不多了，看起来，从总督府到那片森林骑马只需1分钟。

我能记得的另一个地方是文特诺，我爱文特诺。埃弗雷斯特太太有一个妹妹住在那儿，其丈夫在那里做了近三十年的牢头。当年他常带我到丘陵草原或山坡上散步。他跟我讲了许多狱中暴动的故事，说犯人几次袭击他，使他受了伤。我第一次到文特诺时，英国正在与祖鲁族人打仗。报纸上登了许多祖鲁人的照片，他们皮肤黝黑，全身赤裸，手持长矛，他们扔长矛十分敏捷。他们打死了许多我们的士兵，但从照片上看，他们被我们士兵打死的人更多。我对祖鲁人十分生气，听到他们被打死的消

---

<sup>①</sup> 西班牙一广场。

息十分开心，老牢头与我也同感。不久，祖鲁人似乎全被打死了，因为战争结束了，报纸上再也没有出现他们的照片，也没有人再害怕他们了。

一天，我们走在文特诺附近的一个山崖上，看到了一艘扬帆的大船在离岸只有一两英里的地方航行。有人说：“那是一艘军舰，是载战士回国的。”但它也许是刚从印度回来，我记不清了<sup>①</sup>。忽然，顷刻之间乌云密布，大风四起，风暴来了，我们跌跌撞撞地跑回家，这才没有被淋透。后来我再去山崖上时，再也没有看到扬帆的大船，只看到3根黑船桅僵硬地露出水面。“欧律狄斯”号船在暴风雨中不幸翻船，带着船上300名士兵一起沉到了海底。打捞人员潜入海底打捞尸体，有人告诉我，有些打捞人员看到海鱼撕咬那些可怜的溺水士兵的尸体时吓得晕过去了。这件事在我的心中留下了一个可怕的伤疤。事实上，这些士兵千辛万苦与野蛮人作战，战争结束后正准备回家，就这样可怜地淹死了。天晴后，我好像看到一些小船慢慢地把一些尸体拖走了，许多人站在山崖上观望，大家都脱帽致哀。

就在这段时间，又发生了“泰桥之灾”。一列火车在大暴风雨中正飞快地行驶在桥上，忽然间，整桥倒塌，所有乘客都溺水身亡。我想是因为窗子很难打开，他们无法及时跳窗逃命，而全部淹死了。尤其使我感到愤慨的是，政府竟然让这样的桥倒塌。在我看来，他们太不负责任，因此当人们说要投票反对政府时我并不感到奇怪，因为政府如此懒惰，玩忽职守，竟让这种令人震惊的事发生。

1880年，自由党人格莱斯顿上台执政，罢免了我们全家。格莱斯顿是位危险人物，他到处煽风点火，激起人们的狂怒，使

---

<sup>①</sup> 事实上，这是一艘实习船。——作者原注

他们投票反对保守党，使祖父失去了爱尔兰总督的职位。以前祖父曾在比肯斯菲尔德·迪斯累里首相的政府里担任过枢密院大臣，与之相比，祖父不大喜欢爱尔兰总督这个职位。在爱尔兰任职期间，他不得不花费其所有钱财来款待都柏林的爱尔兰人；我的祖母还组织过一次大型的捐赠活动，筹集“饥荒基金”。但是爱尔兰人对祖父的盛情款待和祖母筹集的基金连“谢谢”都没有说过，他们是一帮忘恩负义之徒。祖父宁愿留在英格兰，住在位于布莱尼姆的家里，定期参加内阁会议。比肯斯菲尔德勋爵是格莱斯顿的大敌，大家称他为“眩目”，不过，这次“眩目”被格莱斯顿彻底打败了，因此我们被迫下野，整个国家很快就走向没落。大家都说它“正在衰亡”。此时，比肯斯菲尔德勋爵病得很重，他年事已高，积年陈疾很快夺去了他的生命。我每天都关注他的病情，因为大家都认为他一旦走了，那将是英国的一大损失，再没有人能够阻止格莱斯顿对我们实施可恶政策了。我知道比肯斯菲尔德勋爵就要去世了，那一天真的来了，我看到所有的人都很悲痛，他们说有一位在俄国面前毫无惧色的伟大的爱国政治家由于受到忘恩负义的激进派的刺激，在伤心中辞世了。

我在前面已经记述过，我的家庭教师是我生活中一个可怕的幽灵，现在我要上学了，这更可怕。我当时7岁，正值大人们所说的“讨人嫌”的年龄。我似乎就要离家上学了，必须连续几个星期跟着老师学功课。学校早就开学了，尽管如此，我还得在学校呆上7个星期才能回家过圣诞。我听说过许多关于学校的事，给我留下了很不好的印象，后来的切身体会也确实如此。这是我生活中的一大转折，让我激动，也让我不安。我想，功课虽然无味，但许多男孩子生活在一起还是十分有趣的，我能交到好多朋友，还能一起玩耍。也有人对我说，“学生时代是人生中最

快乐的时光。”好几个大人告诉我，他们年轻时，学校生活非常艰苦：学校里有人恃强凌弱，饭吃不饱，每天早晨还得“砸水壶里的冰”才能喝到水（这种事我从来没见过）。但现在变了，现在的学校生活非常愉快，男孩都喜欢。大人还说我那几个比我大一点的堂兄放假后都十分不愿回家。我问他们是否有这种事，他们不答，只是笑；反正，我是没办法了，大人们要我去上学，我根本没有退路。他们不征求我的意见就把我带到人世，现在他们又不分青红皂白要我离家上学。

不过，购买上学用品倒是十分有趣，购物清单上写着至少要买 14 双短袜，埃弗雷斯特太太认为买这么多袜子太奢侈了，她说要是多注意一点，10 双就足够了。不过，有几双备用的也好，因为这样就能避免穿着湿袜子的窘境了。

这一天终于到来了，母亲带我坐着一辆双轮马车去火车站，她给了我 3 块银币，我不小心把这 3 块银币丢在马车上，我们只好趴在车厢里在乱草中到处找。后来我们刚巧赶上火车。如果我们没赶上的话，那就完了；好在我们赶上了，地球还在转。

父母为我挑选的学校是英国最高级且最昂贵的学校之一。它的办学宗旨效法伊顿公学，目标就是培养学生，使之能够进入这所公学。学校里每班只有 10 名男生；学校有电灯（这在当时还是新玩意儿），有游泳池；足球场和板球场都很大；每学期学校组织两三次远足活动，他们称之为“远征”；所有教师都是硕士，穿着长袍，戴着方顶帽；学校还有一个附属教堂，学生不许带任何东西，一切由校方提供。我们到校报到的那一天是 11 月份的一个阴沉沉的下午，我们和校长在一起喝茶，母亲跟他谈得轻松自如，而我却一直害怕会把茶杯打翻，才开头学校就给我留下了坏印象。一想到我将留在这阴险恐怖的地方，跟一帮陌生人生活在一起，我心里悲伤极了。毕竟我才 7 岁，以前在家里有许多

玩具玩,十分开心。我有许多好玩具:一辆真的蒸汽机,一台幻灯,我还收集了玩具士兵,几乎有1000个;而在我现在的生活中全是上课,与玩具无缘。除了半天休假外,每天要上七八个小时的课,另外还有足球课或板球课。

母亲坐车离开学校之后,校长让我把我所有的钱都交给他,我交出了3块银币,他在本子上作了登记。他告诉我学校里经常有一个“商店”,出售各种东西,我可以用这7先令6便士去买我喜欢的东西。然后我们从校长舒适的接待室里走出来,进了一个冷冰冰的公寓,这便是学生上课和生活的场所。我被带进一间教室,坐在一张桌子旁,别的男生都出去了,教室里只有我和年级教师,他拿出薄薄的一本绿褐色的书,书里面有不同印刷体的字。

他问道:“你以前从没学过拉丁语,是吗?”

“没学过,先生。”

“这是拉丁语语法,”他打开书,翻到其中一页,然后指着一份表格里的字说,“你必须学这些,我半个小时后回来,看看你学到了什么。”

在这令人沮丧的晚上,我独自一人坐在桌前看着拉丁语的第一变位,心里十分难受。想想看那是什么情形吧。

Mensa	一张桌子
Mensa	桌子
Mensam	一张桌子
Mensae	一张桌子的
Mensae	移向一张桌子的
Mensa	来自一张桌子的

这表格究竟是什么意思?在我看来完全是一些胡言乱语、乱七八糟的东西。不过,有一件事我能做,那就是背书。虽然我

心里老大不高兴,我还是开始背诵这些看上去像藏头诗的拉丁语第一变位规则。

老师准时回来了。

“学完了?”

“我想我会说了,先生。”我含糊地答道。

他看上去对我的回答很满意,于是我壮着胆问了一句:

“这是什么意思,先生?”

“它就是这个意思。Mensa,指一张桌子。Mensa 是名词的第一变位,总共有 5 个变位。你现在学的是第一变位的单数形式。”

“但是,它是什么意思呢?”我又追问一句。

“Mensa 就等于英语里的一张桌子。”他回答道。

“那为什么 Mensa 又指桌子?那桌子又是什么意思呢?”我问道。

“Mensa,桌子,是呼格,”他答道。

“为什么要说桌子呢?”我想打破沙锅问到底。

“桌子,——你用这个词来称呼一张桌子。”他看我没听懂,又说,“当你跟一张桌子说话时,就用这个词。”

“但我从没跟桌子说过话呀。”我惊奇地脱口而出。

“如果你这样无礼的话,你会受到体罚的,你听着,体罚是非常严厉的。”这就是他最后的回答。

这是我与古典语言的第一次接触,我还得知,许多绝顶聪明的人从这种语言中获益匪浅,得到过莫大的安慰。

年级老师对体罚的看法与圣·詹姆斯校方的观点是一致的,从伊顿公学学来的用树枝鞭答学生的方法是其课程设置中的一大特色。我们校长处罚托付给他管教的小男孩时如此残酷,我确信,当时伊顿公学和哈罗公学的男生决不会受到这种待遇。

这种体罚的残酷甚于内务部所设的任何少年感化院中的惩罚。我晚年读到的材料也许能够说明他当时的性格。当时全校每月两三次把学生召集到图书馆，两个班长把违规学生拖到隔壁的房间里，直打到学生鲜血淋漓才罢手，其余的学生坐在那儿，听着隔壁传来的尖叫声，吓得直哆嗦。学生经常到校附属教堂做礼拜，听高教会<sup>①</sup>式的布道，这种布道进一步强化了这种教导学生的方式。埃弗雷斯特太太非常反对教皇，据她说，事实上教皇是支持芬尼亚组织的。埃弗雷斯特太太是一名低教会派<sup>②</sup>信徒，她憎恨礼拜用品和宗教仪式，极度反对教皇，这一切影响了我，使我强烈反对这位要人以及一切跟他有联系的宗教活动。因此，我没有从当时所受的精神教育中得到任何安慰，相反，我充分体验了世俗的力量。

两年多的在校生活充满了焦虑，我十分憎恨这所学校，我的功课没有任何进展，体育方面更不谈了。我整天数日子，数小时，看看究竟还有多长时间放假，我想早点回家，摆脱这可恨的劳役般的生活，回到我的小房间里摆弄我的士兵，玩打仗游戏。这些日子里，使我最快乐的事是读书。我九岁半时，父亲给了我一本《金银岛》，我还记得我当时如饥似渴地读这本书时的喜悦心情。我的老师曾有一次发现我读一些与我年龄不相称的书，而我当时是班级中的差生，他们十分生气。他们对此运用了很多对策，但我很倔。如果我觉得没有理由也没有兴趣学的东西，我是不会去学的。在我上学的12年里，没有人能够教会我写一

---

① 英国基督教圣公会中的一派，要求维持教会的较高权威地位，主张在教义、礼仪和规章上大量保持天主教的传统。

② 英国基督教圣公会中的一派，主张简化仪式，反对过分强调教会的权威地位，较倾向于清教徒。

句拉丁诗句,对希腊语我也只认得字母。父母花大把的钱为我提供学习机会,老师也不遗余力地提醒我注意,而我却愚蠢地、白白地浪费了这些机会,我无法原谅自己。如果老师通过这些古典语言的历史及其民族的风俗习惯让我接触这些语言,而不是让我学其语法和句法,我也许会学得好一些。

在圣·詹姆斯公学上学期间,我身体状况很差,后来由于生了一场重病,父母把我接走了。我们的家庭医生是著名的罗布森·鲁斯,当时他正在布赖顿实习,他认为我体质十分虚弱,需要得到他精心照顾,因此,我于1883年转到布赖顿一所由两位女士创办的学校。这所学校比圣·詹姆斯公学小一点,费用不高,也不那么严厉。学校比较简陋,没有以前那所学校豪华,但在这里我找到了圣·詹姆斯公学明显缺乏的友善和同情。我在这儿呆了3年,虽然我差点被双叶肺炎夺去了生命,但由于当地怡人的空气和环境,我渐渐地又强壮起来。在这所学校里,我可以学我感兴趣的东西:法语,历史,诗歌,还有骑马课和游泳课。这几年的学习生活给我留下了美好的回忆,与我早先的学校生活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由于埃弗雷斯特太太的影响,我对低教会派的信条十分偏爱,有一次使我十分尴尬。我们经常去布赖顿的一座王宫附属教堂做礼拜,我们学校的学生被安排坐在南北向的教堂长椅上,当大家诵经时必须把脸转向东,埃弗雷斯特太太肯定会认为这样做太循规蹈矩了,我想我有责任对此表示反对,因此我依然直视前方,我很清楚我已引起“轰动”。我已经作好了献身的准备,但是,回到学校后,校方对我的行为只字不提,我很失望,盼望下一次进一步表示我的信念,可惜后来一次去教堂做礼拜时,我们被安排坐在朝东的长椅上,因此背诵使徒信经时根本用不着动,我茫然了,如果从东方转过脸,那太过分了,我也觉得如果这样

做的话，太没道理了，于是我无可奈何地成了一个安分守己的学生。

这两位女士对我的这种胡思乱想作如此处理，她们想得十分周到，也十分巧妙。她们的心血没有白费，以后去做礼拜时，我再也不捣蛋了，也不再蠢蠢欲动了，因为没有受到抵制，也没有受到虐待，我很乐意地皈依了大度的宽容和正统的教义。

## 哈罗公学

我还没来得及过 12 岁的生日,就得进冷漠的考场了,考试将决定我今后 7 年的学习历程,对我来说是一大考验。考官们最重视的科目几乎都是我最不喜欢的,我很想考历史、诗歌以及写作,但是考官们特别偏爱拉丁语和数学,他们的意愿总是具有权威性的。此外,他们对这两门科目所出的考题,我总是无法给予满意的答案,他们本该就我知道的内容出题,可是他们总是问一些我不知道如何回答的题目。我想展示我的知识,而他们却找茬儿来奚落我的无知,这种形式的考试只会有一种结果:我的各项考试都很差。

我在哈罗公学的入学考试中的情况更是如此,不过,该校校长韦尔登博士却对我的拉丁语写作表现出极大的宽容,他十分欣赏我的整体能力,这一点很了不起。因为我对拉丁语试卷上的问题一窍不通:我把姓名写在卷子的最上面之后便写下问题标号“1”,思考一会儿之后,我又在上面加上了括弧,于是就有了“(1)”,后来我再也想不出与之有关的或是正确的答案;不知怎的,卷面上竟然还沾上了一滴墨水和几块污迹。我盯着这份令人伤心的卷子整整两个钟头,后来,仁慈的助理教员把我的空白卷和其他考生的卷子一起收上去,送到校长的桌子上。韦尔登博士看到我这微不足道的成绩后,得出我该进哈罗公学学习的结论,这多亏了他,说明他是能通过表面看实质,不以卷面情况

判断考生优劣,为此,我一直都极为尊敬他。

鉴于韦尔登博士的决定,我被排在四年级三班,也就是该校最低年级的最差班。学生名册上的名字是按字母顺序编排的,由于我的姓名斯宾塞·丘吉尔是以“S”开头的,所以我的名字毫无优势,被排在倒数第三名。遗憾的是,最后两名男生由于生病或其他原因都很快从这所学校消失了。

哈罗公学点名的方式与伊顿公学完全不同。在伊顿公学,男生们站成一群,点到名时,要举一下帽子;而在哈罗公学,男生们站在操场上,排成一队,老师点名时,学生依次从老师面前走过,因此这种排列使我有点厌恶地感觉到我的位置的卑贱。那是1887年,当年,我的父亲伦道夫·丘吉尔勋爵刚刚辞去下院领袖以及财政大臣的职务,但他仍然活跃在政界最上层,因此,大批的男男女女常常站在学校台阶上,等着看我走过来。我常常听到他们无礼地说:“怎么?他是最后一名!”

就这样,我默默无闻地过了将近一年。不过,在低年级呆得时间长了,我也取得了聪明男生从未有过的极大优势,他们都学拉丁语、希腊语等好东西去了,而我则一直学英语;大家认为我们班上的男生都是十足的低能儿,只能学英语。学校分配萨默维尔先生给最笨的学生教别人最瞧不起的英语写作这门功课,我非常喜欢这位老师,他的教学让我获益匪浅。他知道如何教会我们这些笨学生学好这门课,在这方面无人能与他相比。我们不仅学完了英语语法分析,而且经常不断练习。萨默维尔先生有自己的一套教学方法,他在黑板上写上相当长的句子,然后给句中的各个成分标上黑、红、蓝、绿等各种颜色,表示主语、谓语、宾语、关系从句、条件从句、连接从句和转折从句等。每个成分都有它各自的颜色及括号,这是一种句型练习,我们几乎每天都要进行这种操练。由于我上了3次四(3)班,所以我从头到尾学

了3遍,把句型学透了,我从骨子里记住了普通英语句子的这些最基本结构,这很了不起。后来,我那些曾经因为写过优美的拉丁诗篇以及简练的希腊警句而获得过奖励和荣誉的校友们为了谋生而不得不回过头来学英语时,我不觉得自己处于劣势。很自然,现在我很赞成男孩学英语;但愿他们都学英语,然后我让聪明孩子去学拉丁语作为一种荣誉,学希腊语作为一种嘉奖,但如果他们不懂英语,我就鞭笞他们,而且会揍得很凶。

我进哈罗公学正值夏天。哈罗的游泳池是我所见过的最大游泳池,它更像河湾,上面有两座桥,我们常常聚在那儿玩,一玩就是几个小时。我们一起游泳,休息时就坐在晒得发烫的池边的沥青地上,边晒太阳边吃大馒头。当然,我们常常闹着玩,溜到光着身子的朋友甚至对头的后面,猛地把他们推下池里,好玩极了。我常常跟我差不多大或者比我小的男生开这种玩笑。有一天,那时我进哈罗公学才1个月,我看到一个裹着浴巾的男生正站在游泳池边发呆,我见他不比我还大,心想他倒是一个很好的取乐对象,我悄悄地走到他身后,一把将他推入池内,出于人道我抓住了他的浴巾以免其浸湿。让我吃惊的是,从水池里露出了一张愤怒的脸,他气急败坏地很快游到岸边,显然他力气很大。我拔腿就逃,但那只是徒劳,他像风一样地飞快赶上我,死死地抓住我,一下子把我推进了深水区,我很快从游泳池的另一边爬上岸,却发现一群比我小的男生气冲冲地围着我说:“你完了,你知道你刚才干了什么?他是艾默里,六年级的,是个室长,得过体操冠军,得过足球徽章。”他们继续历数他的众多荣誉头衔,还说我是自讨苦吃。我吓得浑身抽搐,觉得自己犯了大不敬之罪。他裹着浴巾,个子又这么矮,我怎能看出他是谁呢?我赶紧准备道歉,战战兢兢地走近这位大人物说:“十分抱歉,我还以为你是四年级的呢,你长得这么矮。”他似乎根本不为所动,等我回过神

来,我又补充一句:“我父亲是个大人物,也很矮。”听我这么一说,他大笑起来,于是不疼不痒地说了几句我脸皮厚之类的话,警告我以后要小心点,事情就这样了结了。

后来我有幸多次看到他,那时相差3岁已不像在校时那么重要了。我们后来在内阁共事多年。

大家觉得不可思议的是我虽然老留在最低年级,却在全校比赛中能当着校长的面把麦考利<sup>①</sup>所著的1200行《古罗马之歌》一字不差地背出来,并得了奖。虽然我当时还在学校的最低年级,却成功地通过了军校初考。在这次考试中,许多比我强的男生都落榜了,似乎我这次考试发挥超常。我在这次考试中运气也真好,我们都知道试题中必有一题要求靠记忆画出某个国家的地图。考试的前一天晚上,我把地图册上各国的名称放进一顶帽子,然后摸到了新西兰,于是我便把这个地区的地理记得烂熟。果然,第二天试卷上第一题就是“画出新西兰地图”。这正应了孤注一掷这句话,如果这是在蒙特卡洛<sup>②</sup>,我的赌注该翻35番。当然,我的考试成绩非常高。

我的戎马生涯完全归功于我那一大批玩具士兵。我收集了近1500个玩具士兵,他们一样大小,全是英国兵,可组成带有一个骑兵旅的陆军师;我弟弟杰克指挥敌军。我们有一条限制军备的协定:他只能动用有色部队,而且不能拥有大炮,这一点至关重要;我能动用18门野战炮和几个要塞,除了运输设备外,其他后勤服务一应俱全,不过,运输常常是每个军队都缺乏的。父亲的老朋友亨利·德拉蒙德·沃尔夫爵士非常欣赏我的军队,他

---

① 麦考利(1800—1859),英国政治家、历史学家、辉格党议员,曾任英国陆军大臣等职,著有《英国史》、《古罗马之歌》等。

② 位于摩洛哥的著名赌城。

注意到了这一缺陷,给了我一点钱,于是这一问题基本解决了。

有一天,父亲亲自来检阅我的军队,所有部队都处于正确的进攻队形,他兴致勃勃地看着这一场面,足足研究了 20 分钟,这是罕见的。最后他问我是否想当兵,我当时想,指挥军队作战是十分露脸的事,因此立刻回答道:“想。”他当即相信了我的话。多年来我一直以为父亲以其经历及敏锐的洞察力发现了它具有军事天才的素质,但后来我才知道他只是认为我不够聪明,不是当律师的料。不管怎样,我的玩具士兵改变了我一生的方向,从此以后我所受的教育都是为了使我能进桑赫斯特陆军军官学校。再往后又学了点军事技术,其余都是我自学的。

\* \* \* \* \*

我在哈罗公学学了近四年半,其中有 3 年我在军事班学习。我是通过那次初考才被该班录取的。这个班男生来自学校中高年级,大小不一,他们都要考桑赫斯特陆军军官学校或伍尔奇军校。我们班上的学生并不按照学校的规矩逐年升级,因此尽管我们班上几乎全是五年级学生,但我还是没有升级,在点名册上仍然是最后几名。其实,我从未走出低年级,因此从来没有一个可供使唤的低年级学生。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成了别人所说的“三年老生”,再也用不着使唤自己了;由于我比我同级的其他男生大,因此我被任命为供高年级同学使唤的低年级学生的头,这是我生平第一个职务,具体工作包括保管供使唤学生的花名册,排出他们值日的项目及日期,然后抄送各班班长、足球及板球冠军等精英分子的宿舍,我履行这些职责一年多,大体上是听天由命。

就在这段时间内,我找到了学习拉丁语翻译的窍门,我不太

会用字典,用起字典来就像查电话号码簿,找到相应的开头字并不难,但然后我得翻来翻去,上下查音,常常发现离我要找的单词差三四页。总之,我觉得查字典很吃力,而别的男生却轻而易举。我和六年级的一个男生结盟,他非常聪明,读起拉丁文来跟读英语一样轻松,恺撒、奥维德、维吉尔、贺拉斯,甚至连马提雅尔的警句对他来说也是轻而易举的事。我每天的拉丁语作业是翻译10—15行警句,一般我得花1—1.5个小时才能翻完,而且很可能是错的,而我的朋友能在5分钟内逐字逐句地为我解释,我看到这些解释后便能牢牢记住。我的这位六年级朋友必须给校长写英语作文,而他对此十分头痛,几乎跟我惧怕拉丁语警句翻译一样。我们两人达成协议,他给我讲解拉丁语翻译,我为他做英语作文。这一安排妙极了,拉丁文老师似乎对我的作业相当满意,因此每天早晨我有了更多的可支配的时间;但我每周要为这位六年级朋友写一篇英语作文。我常常在房间里一边走来走去,一边做作文让他听写——就像现在这样<sup>①</sup>,于是他坐在角落里一字不漏地写下我的话。几个月过去了,没有出现任何破绽,但有一次我们差点被捉住。有一篇英语作文被认为写得特好,被“举荐”给校长,校长把我的朋友召去,表扬他作文写得好,很高兴地和我的朋友讨论起这篇文章来,“我对你的论点很感兴趣,我想你可以再深入一步。告诉我你心里究竟怎么想的。”韦尔登博士讲了一会儿,我的朋友一声不吭,吓得魂飞魄散。不过,校长不希望把一次表扬变成吹毛求疵,最后还是让他走了,并说了一句,“你的笔头表达看上去似乎要比口头表达好。”他回来时看上去好像刚脱离九死一生的险境,从那以后,我为他写的作文总是十分小心,只写大路货的文章。

---

① 丘吉尔写这本书时是让其秘书听写的。

韦尔登博士对我十分关心,他知道我的古典语言学得差,决心亲自辅导我。他的日常工作相当繁忙,但他每周3次在晚祷前对我进行一刻钟的单独辅导,我真是受宠若惊,因为校长只辅导班长以及学校里的秀才们,对此我感到很自豪,但我不愿经受这种磨难。学过拉丁语的读者就会知道,在入门阶段就会学到独立离格及其不太起眼的替代形式,如“Quum 过去完成式虚拟语气”,我总喜欢用“Quum”。这样写起来有点长,缺乏拉丁语的简洁和精练;不过,这样可以避免许多易犯的错误。我常常搞不清楚独立离格最后是“e”、“i”、“is”还是“ibus”结尾,而这些词尾用得是否正确是至关重要的。韦尔登博士如果发现有人用错一个字母,脸上就会露出痛苦的表情。记得后来我在内阁讨论会上有时会引用我仅有的几句拉丁语,这时阿斯奎斯先生的脸上常会露出同样的表情,似乎我的拉丁文不仅令人着恼,简直刺人心肺。不过,首相们的手中从来没有校长手中那样的大权,因此,晚上跟韦尔登博士在一起的一刻钟更增加了我生活中的紧张感。博士耐心辅导了近一个学期,最后无功而返,我顿时感到十分轻松。

在此我来讲讲对拉丁语的一些看法,这些看法也适合于希腊语。像英语这样的实用语言中,一些小单词能使其他重要词汇相互联系起来,而刻板的古罗马人却认为这种方法松散而又蹩脚,很难使他们满意。他们认为一个词必须根据不同的条件以某种繁琐的规则与其邻词互动。毫无疑问,较之英语而言,这种方法听起来不同凡响,看上去也是别具一格。这样,拉丁文句子组织在一起就像一台装配完美的机器,每一个短语都具有丰富的含义。即使你从小就学习这种方法也会觉得如此造句必定十分繁琐累人,不过,这种造句方法的确让罗马人和希腊人轻松地享受到了死后的美名:他们是思想领域及文学领域中的先锋,

当 they 从生活、爱情、战争、命运或行为中发现某些显见的结论，就用其语言把这些思想编成口号和警句；他们的语言正适合这种目的，因此他们一直拥有对这些警句的专利，从而使他们流芳百世。在上学时没有人告诉我这些，这都是我晚年才领悟到的。

我上学时就曾经怀疑把古典语言当作我们教育体制中的主体是否恰当。他们告诉我说格莱斯顿如何为了消遣而阅读《荷马史诗》，我觉得他是自作自受；他们还说读荷马著作将给我后半生带来极大快乐等等。当他们看出我并不相信时，又说古典语言将会对英语读写有极大帮助，指出英语里面许多词都是从拉丁语和希腊语演变而来的，如果知道这些单词的确切来源的话，用起来当然会更好。当时我勉强承认其实用价值，但现在我根本不相信这一套。外国人和苏格兰人现在串通一气，把这些拉丁词读得与英语相差十万八千里。他们把“audience”读成“owdience”，把“civil”读成“keyweel”。我所喜欢的一些格言如果按照他们的发音去读简直滑稽透顶，散布这些丑陋发音的人应该受到惩罚。

在后面关于印度的几章里，我们还会看到另外一种颠倒黑白的卖弄学问现象。我小时候，人人都说“旁遮普省”、“专家”、“安巴拉省”，也都这样写。但后来某个学者说，“不能这样写！你们必须正确地拼写。”所以现在的英国人便把这些词写成“旁吉普省”、“梵学者”或“安巴拉的麻烦”。印度人听到他这种稀奇古怪的说法时目瞪口呆，这就是印度人对其渊博学问的唯一反应。我对拼写是相当认真的，我总是一丝不苟。至于对《圣经》的修订，《祈祷书》中祷词的变更，尤其是《婚礼书》祷词的变动，我实在是难以容忍。

## 考 试

我考了3次才考上桑赫斯特陆军军官学校。考试有5门,其中数学、拉丁语和英语是必考科目,我又选了法语和化学。可是我只有两张王牌——英语和化学,得有3张王牌才能中彩,我得再找1张王牌。拉丁语我学不会,因为我从骨子里对其有偏见。拉丁语卷面总分是2000分,我也许只能得400分。法语倒是挺有趣,可惜太复杂了,在英国学法语很难,那就只有选数学了。第一次考试之后,我像分析战役一样分析了一下考试形势,结果显而易见,如果想打赢这一仗,没有一支援兵是不行的。数学是唯一的可用援兵,我不得不求助于数学,开始认真地啃数学。在我的一生中,我时常不得不在短时间内钻研自己不喜欢的科目,但我认为我在6个月内掌握了数学是最大的成功。第一次考试,2500分的数学我只得了500分;第二次,我的数学分数将近2000分,这一成就不仅归功于我坚定的决心,而且归功于C·H·P·梅奥先生,他是哈罗公学的一位受人尊敬的老师,他耐心地引导我,使我对数学产生了兴趣。他告诉我数学不是一堆不可救药的烂东西,那些滑稽的令人费解的符号不仅有其内涵,而且富有节奏,他还让我相信我并不是对数学一窍不通。

当然我所学的数学只是文职考试中要考的那些最基本的简单内容。我想,跟那些具有数学天赋的数学甲等生相比,我学到的东西只是鹅鸭池,而他们钻研的领域犹如大西洋,真是小巫见

大巫。不过,一旦我学进去,便很快学出了点门道。回顾那段苦学岁月,我还能记得当时学的一些主要东西。当然,我当时学到的知识远不止分数和十进制,我们还进入到一个颠颠倒倒的数学王国,这个王国的门口站着“二次方程”,“二次方程”愁眉苦脸地指着里面的“指数方程”,“指数方程”又把我们带到更威猛的“二项式定理”面前,再往里面还有一个暗室,据说有一条叫做“微积分”的恶龙,不过这个怪物已经超出了文职人员考试的范围,于是我们开始转了个弯,没有去攀登数学王国中的高峰,而是转到一个非常奇怪的走廊,里面全是些正弦、余弦和正切等等,像一团颠颠倒倒的字谜和藏头诗,很明显,它们十分重要,尤其是这些玩意在一起相乘时更是了不得,它们也有一个优点,那就是你能把许多结果背下来。在我第三次即最后一次考试中就有一道关于余弦、正切的平方根的题目,这道题决定了我以后的一生,这是一道难题,但幸运的是我在考试的前几天看到过它丑恶的嘴脸,考试时一眼就认出来了。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看到过这些东西了,我第三次考试成功之后,数学就像发烧时梦中的幻影一样消失了。我确信数学在工程学、天文学等诸如此类的学科中十分有用。在建造桥梁和开凿运河时,必须搞清各种压力和落差,这时数学是十分重要的;数学在天文学中的作用就更不用说了,计算天空有多少星星,甚至多少宇宙,计算它们之间的距离,预测日食和月食,预测彗星等星体的出现,这些都要依靠数学。令人高兴的是,世上有很多人具有数学天赋,而且对数学情有独钟,他们就像伟大的棋手,能蒙住眼睛同时下 16 盘棋,然后因癫痫而早夭,他们命该如此!不过,我希望数学家都能得到很好的报偿。我保证永远不会去抢他们的饭碗。

对于数学,我曾经有这样一种感觉,我觉得我看到了数学的

全部,无穷无尽的数学现象全都呈现在我的面前。某个数值由负到正在无限中演变,恰似金星的轨迹,也像伦敦市长就职典礼上的游行彩车。我恰好看到它是如何变化的,也能看清为何变化是不可避免的,还能看出一个步骤如何牵涉到其他步骤,其实这一切就像政治,但当时我刚刚吃过晚饭,以后也就没有深究。

最实际的一点是,如果那位老主考官大人没有出那道碰巧我在考前几天复习到的余弦、正切的平方根题目,这本书后面的几章也就不用了。我也许会走进教堂布道,无所畏惧地鼓吹与时代精神不符的正统说教;我也许到伦敦市里去闯荡生活,也许还能发大财;我也许会到殖民地去满足或至少去安抚土著,那样我也许会像林赛·戈登<sup>①</sup>或塞西尔·罗兹<sup>②</sup>那样风光了。我甚至也许会当律师,那些现在正自鸣得意地盘算秘密罪恶的人也许会由于我的辩护而被处于绞刑,总之,果真如此的话,我的一生早就改变了,也许还会影响到其他人的生活。

说到这儿,我们似乎该回到数学这个话题上来了,1894年之后,我再也没有碰过数学。总之,那位主考大人出了这道题改变了我的一生,这对我来说已足够了。后来我亲自接见过考试委员会人员,我还任命过他们的主任,我很钦佩他们,尊重他们,我们都非常尊敬他们,但是,他们绝不会想到在世事变迁中他们起了多么关键的作用。为此,我认为自由意志和命运其实是一

---

<sup>①</sup> 林塞·戈登(1833—1885),英国军人,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指挥焚烧圆明园的元凶。1863—1864年率清、英军队镇压太平军起义,1873年到埃及,1877—1880年任苏丹总督,并于1884年再度回到苏丹,企图平息马赫迪起义,在喀士穆被围困达10个月,在援军到达之前两天被击毙。

<sup>②</sup> 塞西尔·罗兹,南非金融家和政治家,生于英国,曾任开普殖民地总理。

回事,请各位读者也注意这一点。

我一直喜欢蝴蝶。在乌干达,我见过一种奇异的蝴蝶,如果从不同角度观察它,你会发现这种蝴蝶翅膀的颜色不断变化,能从暗暗的深褐色变成十分耀眼的蓝色。巴西也有这种蝴蝶,更大,更艳,其颜色对比也更鲜明。你想象不出颜色对比竟能如此强烈,但它却是同一只蝴蝶。蝴蝶是实实在在的,它光彩照人,时而在阳光下展翅,时而又消失在树林的浓荫中。你是相信自由意志还是相信命运,完全取决于你观察其翅膀的角度,而其翅膀至少同时具有两色。我不能放弃数学而陷入形而上学的泥潭。还是言归正传吧!

第二次报考桑赫斯特陆军军官学校失败后,我离开了哈罗公学。我父母把我交给一所补习学校,希望我能榜上有名。詹姆斯上尉和几位能人在克伦威尔路创办了这么一所学校,据他们说,只要不是天生的傻子,谁都能考上军校。这所补习学校对考官的心理作了一番科学研究,他们知道这种人对某个具体的科目会出什么样的题目,几乎万无一失;他们精通猜题,也能提供这些题目的正确答案。他们端起许多猎枪对准黑压压的一群鸟进行了一阵扫射,命中率极高。詹姆斯上尉其实是大战中大炮齐射战术发明人的先驱,他知道哪里是敌军大部队,然后从精心选好的位置对准目标射击,他只要每小时在每亩地上发射一定数量的子弹,保准能击中敌人,他用不着看见敌军,只需教他的枪手进行射击操练,因此,二十多年来,他的补习学校一直独占鳌头,这所学校的补习生大都能考上军校。中尉就像是稳坐赌城的赌神,但最重要的不同之处是,在大部分情况下的办法都稳操胜券,甚至最棘手的问题他也能够从容应付;他没有作出绝对的保证,但是赢的比率相当高。

不过,正当我要去接受这种有名的填鸭式补习时,祸从天降。

我的姑妈温伯恩夫人把她在伯恩茅斯的舒适庄园借给我们过冬，四五十英亩的松林依山坡起伏，一直延伸到英吉利海峡旁的悬崖上。这一片松林虽小但很险，中间有一个又窄又深的“峡谷”，峡谷上架着一座近五十码的简易石桥。我当时刚 18 岁，我的弟弟 12 岁，我的堂兄 14 岁，我们在一起玩，他们俩追我。我被他们追了 20 分钟之后，累得上气不接下气，所以决定过桥，但是当我跑到桥中间时惊恐地发现他们俩已兵分两路，一人站在桥头，另一人站在桥尾，两面夹攻，马上就要抓住我了，但我立刻想出了一个好主意，桥边的峡谷上长满了杉树，细长的树梢伸出路面，我问自己，“是否能跳到其中的一棵杉树上，顺着树干压断一层层树枝，一直滑到地面？”我边看，边估计，边想，同时爬过桥栏杆。站在桥两头的两个小家伙看呆了。跳，还是不跳？这是个问题！我纵身一跳，甩开双臂去抱树梢。论点是对的，但论据全错了。3 天后我才苏醒过来，过了三个多月我才能从床上爬下来。这一跳有 29 英尺，重重地摔在硬邦邦的地面上，但树枝无疑帮了不少忙。我母亲听到两个小家伙喊着“他从桥上跳下去了，我们讲话他也不搭理”时赶紧跑过来看，还给我灌了几口白兰地。父母一直有这种观念，不管花多少钱，重病必须得到最好的治疗。好多名医站在我的床前，给我看病。当我苏醒过来后，听说医疗费数额巨大，感到十分震惊，也感到受宠若惊。当时，父亲正在都柏林的菲茨吉本勋爵家过圣诞，听到消息后赶紧乘特快车赶回来，他还请来了伦敦最好的医生。除了普通的伤痛之外，我的一个肾破裂了。由于这位外科医生的高超医术和我强烈的求生欲望，诸位才读到这本书。当时整整 1 年我行动不便。当年卡尔顿俱乐部有人还开玩笑，“我听说伦道夫的儿子出事了”，“哦？玩追领袖的游戏？”——“不过，伦道夫是不大可能为此难过的！”

\* \* \* \* \*

1892年夏的选举中,保守统一党以40个议席之差落选,格莱斯顿在爱尔兰民族主义者的帮助下上了台。新议会在改选政府之后,根据惯例,高兴地休会6个月,因此1893年的议会大会和对爱尔兰地方自治问题重新辩论不得不在焦急中等待。父亲曾说过“保守统一党政府对我进行长达5年的抵制和诽谤”,所以,我们一家对上届政府的失败并不是很伤心,我们家族有许多很有势力的支脉,我们的大家族以及父亲的朋友都期盼着新局面的到来。有人认为我的父亲一旦处在反对党的地位,那么他在议会以及其党派中的地位会很快上升,该党由于我父亲6年前的辞职而被击败。

事实上,我比谁都更急切地希望父亲能在政界东山再起。我从小跟祖母和姑姑们在一起,很少听到关于政治方面的话题,但是我既然生在我父亲的屋檐下,就不可能不了解父亲在政治上曾栽过跟斗。父亲在陌生人、小孩以及下人面前从不提这个话题,以保持其尊严。我记得父亲曾在我面前抱怨过自己时背命蹇,但只有那么一次,而且只是一带而过而已。当时是1892年秋天,我们还住在纽马克特。当时我在父亲的书房外用双筒猎枪打兔子,枪声惊动了父亲,他十分生气,责备了我一番。当他得知我很伤心之后,他又找机会来安慰我,亲切地跟我谈了好长时间。在我的一生中,父亲跟我进行长时间推心置腹交谈只有三四次,每一次谈话都使我感到十分自豪。他向我解释为何老年人对年轻人考虑不周,说那是因为他们有时候正全神贯注地思考自己的事务,也许会因为一时生气而将话说得很粗暴。他说,他很高兴我喜欢射击,他已作了安排,9月1日让我在我

们自家的领地内打山鹑(当时已是8月末)。然后,他和蔼可亲地继续跟我谈起我的学校,我参军的事以及以后的成年生活。他一向矜持,而今天他突然如此健谈,我听得入迷了,我对他如此关心我的事情感到十分惊讶,最后他说:“记住,事情对我来说并不总是一帆风顺的,我的行为被人误解,我的话语被人歪曲……因此,千万别介意。”

当然,我是父亲的热情支持者,埃弗雷斯特太太也以她那温和的方式支持我的父亲。我们为了节省开销都住到了位于格罗夫纳广场50号的祖母家,埃弗雷斯特太太就在祖母家当管家。她在我家忠心耿耿地干了20年之后,领了一份退休金退休了,她把毕生积蓄托付给我父亲保管,为了安全有利地投资这笔积蓄,父亲乘着我们自家的马车到伦敦,专门与罗思柴尔德勋爵共进午餐。我十分清楚,由于父亲个人为了恢复托利党民主不懈努力,保守党那帮“老家伙”才得以长期执政,而当我父亲第一次失势时,这帮老家伙根本没有表示任何宽宏大量和感激之情。我们大家当然期盼父亲重掌大权。我们看到过路人脱帽向他致敬,工人看到他的大胡子就笑。多少年来,我读过他说过的每句话以及报纸上对他的评论。虽然他只是一位孤立的无公职议员,但是所有的报纸对其即使是在小市场上所讲的每句话都进行一字不漏的报道,大家对每句话都仔细推敲。现在他的机会似乎又到了。

我随家人到了伦敦,虽然躺在病床上,我密切注意着1893年政治事态的发展,对一切都了如指掌,因为母亲把她所听到的消息全都告诉了我。爱德华·马奇班克斯,也就是后来的特威德穆斯勋爵,是格莱斯顿先生的首席组织秘书,他与父亲的妹妹范妮结了婚,因此我们以超然的态度分享自由党结束长期下野后重新执政的喜悦,我们至少能了解到一些他们的希望和忧虑。当时,

政治在我看来似乎十分重要,富有生气,它们由具有非凡才智和个性的政治家掌握,处于各种地位的上层社会也参与其事,这是一种习惯,也是一种义务;而工人阶级不管有无选举权都跟在后面起哄,他们关注国家大事的发展,就像现代人看板球赛或足球赛一样,报纸只一味迎合当时受过教育者的流行观点。

由于卧病在床,我有足够的时间关心政治。我一直全身心地关注着格莱斯顿最后一次议会大战,在我心目中这场议会大战要比我8月份要参加的那场可怕的最后一次考试搏杀重要得多。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感到父亲的演讲不如从前,这些演讲虽不乏成功之处,但总的来说,他似乎很难把握住自己的成功。我当然希望自己赶紧成长,能够助他一臂之力,我知道他对此会不动声色地暗中感到欣慰。我想到了为其父助战的奥斯汀·张伯伦,还有帮助老格莱斯顿、整天跟在老头子后面的赫伯特·格莱斯顿;我梦想有一天托利党的民主既能把“老人邦”赶回老家,又能打败激进分子。

这一年,我在父亲家里遇见了许多议会冲突双方的关键人物,常常与他们一起吃饭。在饭桌上,父亲的同事和对手友好地就当时热门话题交换意见。就在那时,我第一次遇见到贝尔福、张伯伦、爱德华·卡森,还有罗斯伯里勋爵、阿斯奎斯、约翰·莫利以及其他一些内阁人物。这些人生活的世界很伟大,这个世界由崇高的法则统治,公众事务中每一件事都很重要,这个世界其实是一个剑拔弩张的残酷的决斗场,但是决斗双方有礼有节,彼此尊重。当然,只有当父亲请亲密朋友和政界要人到家作客时,我才能看到这种社交场面。我听别人不带任何偏见地说过,他(父亲)脾气十分暴躁,常常会出言不逊,甚至会说出最野蛮的话,因此那些不了解他的人对他总是心存戒备。

身体康复后,我开始到下院去听辩论。当格莱斯顿第二次

宣读《地方自治法案》接近尾声时，我甚至设法挤到名人旁听席上，当时的情景和一些小插曲现在还历历在目。当时，格莱斯顿看上去像一只凶猛的大白鹰，他在台上庄严而滔滔不绝地演说，口若悬河，手舞足蹈；台下听众中有人待机喝彩，也有人伺机起哄。他说自由党每次都能成功地实现其拥护的政策，正说在得意处，却发生了口误，他说，“从来没有一个事件使自由党付出如此惨重的代价，（《地方自治法案》）竟使自由党变得如此下贱。”托利党人顿时欢呼雀跃。格莱斯顿张开五指，挥挥手，镇住骚动说，“但我们又爬起来了……”

我还目睹了他就奥斯汀（张伯伦之子）的首次演说对张伯伦说的捧场之词：“我不打算对这篇演说多作溢美之词，我想用片言只字说出我的想法，这篇演说定会让一位父亲倍感欣慰，精神振奋。”当时我蹲在旁听席的地板上，透过栏杆，我能看出当时这番话在张伯伦身上的作用，他当时好像被一颗子弹击中了，他那苍白、几乎是土黄色的面孔一下子变红了，他欠了欠身，微微鞠了一躬，然后低着头弓身坐着。这些话不管如何精心挑选，一旦写下来，似乎看不出有多少意义，但此言既出，两人一时前嫌尽释。

还有一次，我在旁听席上听到父亲和威廉·哈考特爵士进行针锋相对的舌战，威廉爵士在辩论时似乎蛮不讲理，怒不可遏，但让我感到惊诧的是，几分钟后，他走到我坐的地方，微笑着向我作自我介绍，还问我对这次辩论有何看法。

\* \* \* \* \*

由于我身体受伤后很虚弱，而且对政治十分着迷，詹姆斯似乎不可能使我通过考试，但我总算通过了第三次考试，考上了桑赫斯特军校的骑兵班。因为骑兵学员的生活费用较高，所以考

步兵竞争更激烈,因此考上军校的最后几名考生进骑兵班还是比较容易的。过了考试这一关,我很高兴;能当上骑兵,我更高兴。对骑马和步行的各自相对优势,我已经形成了比较肯定的看法,骑马多有趣啊!况且骑兵的军服要比步兵的军服漂亮得多,所以我给父亲写信时兴致很高。使我吃惊的是他对此持有截然不同的看法,他认为我没考上步兵很丢脸。他本打算让我进第六十步兵团,这个团很有名气,有4个营组成,尽管穿的是黑军装,但袖子和领口却有一抹红色。他曾对我说过,要是能进第六十步兵团,你就可以在地中海中的某个要塞服役两三年,完全成熟后,你就可以到印度去工作了。他似乎已经给第六十步兵团的团长坎布里奇公爵写过一封信,想让我进他的团,并且得到了令人满意的回答。现在这些计划都化为泡影,带来了诸多麻烦,说不定还要花上一大笔钱。公爵不会有机会欢迎我了,地中海中的要塞也不需要骑兵。父亲曾说过,“当步兵只需养活一个人;当骑兵要养活一个人,加一匹马。”这话千真万确,一点也不过分。他根本没有想到,要养活的不是一匹马,而是两匹公务用的战马,还有一两匹狩猎用的马,更不用提那几匹打马球用的马了。他十分不满,不久我就收到他的一封来信,信中措辞严厉,对我的教育很失望,一点也不欣赏我考试的成功。他说我的考试只是勉强通过,并警告我不要变成“社会中的浪荡子”。对此,我感到伤心,也很吃惊,赶紧保证将来要做出更好的成绩。尽管如此,对能进桑赫斯特军校,我还是感到万分高兴,用不了18个月,我就能成为真正的骑兵军官了,于是我忙碌起来,订购了一大套士官生所必需的行头。

\* \* \* \* \*

这年夏天，父母让我和弟弟跟着一位老师到瑞士进行所谓的徒步旅行；不用说，我们实际上只要有钱就坐火车旅行。我和老师还爬了山，我们爬过韦特霍恩山和蒙特罗萨山。我们还目睹了伯恩尼斯·奥伯兰德山顶峰上日出时光芒四射的壮观景色，那是我一生中见过的奇迹。我渴望去爬马特霍恩山，但是爬这座山不仅要花费很多钱，而且老师说太危险，不让我去。如果老师知道我差点在洛桑湖里出事的话，他定会更加小心谨慎。我把这件事记下来，希望能以此警示别人。那天，我和一位比我小的男孩子到这个湖去划船，当我们的船划到离岸一英里多时，我们决定下湖游泳，于是我们脱掉衣服，跳进湖里，快活地游起来。船尾座位上有顶红色的小遮阳篷，在微风的带动下，这顶遮阳篷就像船帆一样，推船前移。当我们向船游去时，船会漂得离我们更远，这样试过几次后，我们已游过了一半左右的距离。风渐渐大了，我们也游累了，到这时，我还没有感到有任何危险，碧蓝的湖水在阳光的照耀下闪闪发光，风景如画的大山、山谷、旅馆、别墅在微笑。我知道死神就在附近，我似乎见到他了，他就在我们身边的水里游泳，一直在悄悄地对渐渐增大的风说话，让风以我们游泳的速度把船吹走。附近没有人来救我，如果没有帮助的话，我们永远到不了湖岸。游泳是我的拿手戏，我不仅游得轻松，而且游得很快，在哈罗公学时，我曾代表班级击败其他所有的游泳代表队，而现在我为活命而游水。有两次，我游到离船不到一码的地方，但每次总有一阵风把它吹走，我根本抓不到；后来，我奋力地游，在一阵强风再一次充满红帆之前，我赶紧抓住船边，爬上船，把船划到我的同伴身边。当时，我的同伴虽然精

疲力竭,但显然还没有意识到死神已逼近,我没有对老师讲这次危险的经历,但我从未忘却,也许一些读者也会记住此事。

在桑赫斯特军校的锻炼是我一生中的过渡时期,它结束了我12年的学校生活,在36个学期里,我从未取得丝毫的成功,未学过任何有用或有趣的东西,也从未玩过什么有意思的游戏。回想起来,这12年是我一生中既痛苦又无成绩的阶段。我的幼儿时代是在玩具中幸福地度过的;成年以后,我越来越幸福。12年的学校生活是我人生中灰暗沉闷的一段旅程,我劳而无功,惶惶不可终日,生活中到处是不快乐和束缚。

这种思绪不该使我过分夸大学生时期令人不快的一面。学生时代无疑是朝气蓬勃、充满欢笑的。哈罗公学是一所好学校,老师也很有敬业精神。哈罗的大部分男生都感到非常高兴,因为他们发现哈罗的教室和运动场都十分出色。我只能说我是一个例外——这无疑是由于我自身的缺点造成的。我宁愿做个泥瓦匠学徒或听差小厮,宁愿帮助父亲装点杂货店的橱窗;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会觉得很踏实、很自然;我也会从中学到更多的东西,我一定能干得更好,当然,我也一定会从中了解我的父亲,那将使我非常高兴。

社会的进步要求延长教育的时间,但这是违背人类的本性的!一个男孩很想跟在父亲的后面觅食,他很想尽其所能做些有益的事,很想挣钱帮助养家,他很想有自己能支配的闲暇时间,他只求能有以劳动养活自己的权利。总有一天,渴求知识的欲望也许会降临到那些有天赋的人身上,这样知识和思想便能打开心灵之门。有什么必要对那些不愿学习的人灌输知识呢?

总的来说,我的学校生活使我心灰意冷,除了在击剑比赛中取得过学校冠军之外,我没有取得任何出色成绩。我所有的同龄人,甚至比我小的男孩子,似乎都比我更能适应这个世界。如

果感到在比赛一开始就被别人远远地甩在后面,那的确不是滋味。我跟韦尔登博士告别时,他很有把握地预言我将来一定能一帆风顺,我感到十分惊讶,因为我看不出他的话有任何根据。他能这样说,我一直心存感激。

我完全赞成公学这种办学方式,但我不想再去读书了。

我在哈罗的最要好的朋友是杰克·米尔班克,他比我大两岁,是一位老男爵的儿子,他的家族祖祖辈辈都住在切奇斯特。他在体育上和学习上都不很出色,在这些方面他只比一般的同龄人略为好一点点,但他有一种与众不同的风度,有一副成熟的长相,谈起话来十分老练,这是我在其他哈罗学生中从未见过的。他是一位十足的绅士,总是镇定自若,穿着打扮一丝不苟。父亲来校看我时,经常把我俩一起带到国王大饭店去吃午饭,听他们两人谈话,我很兴奋,他们似乎是平等的,交谈时都能镇定自若。我多么希望我与父亲的关系也能如此啊!可惜,我只是个顽劣的学生,我插话时总是显得很笨拙,很愚蠢。

我和米尔班克一起准备进行一次冒险。我们发现,按老规矩,在考试周,如果自己不愿意的话就用不着踢足球,但近几年来,这一规整形同虚设,我们援引惯例,宣称我们必须把全身心放在学习上,所以,我们拒绝踢球,这样一来,我们遭到班长的一顿毒打。不过,我们控告了他,学校就此事进行了严肃的辩论,我们有三四天处于惶惶不安之中,不清楚将来的命运如何。人们对我们有偏见,他们怀疑我们并没有因为学业过重而疲惫,恰恰相反,我们很可能根本无事可做。不过,最终学校觉得这一周我们应该自主行事,我们勇敢捍卫了这一规定,使之得以一直延续了好几代。

米尔班克命中注定要当兵,而且他决心要参加第十轻骑兵团。他的父亲让他先参加民兵组织,走这条路虽然需要较长的

时间,但可以避免考试。他比我早一年离开哈罗,不久就当上了民兵副官。我们定期通信,假期经常见面,在本书后面,我还会提到他,他命中注定会得到最高的军事荣誉,在南非战争中,他虽然伤势严重,还是奋不顾身地跳进火海,营救他手下的一名骑兵,为此,他获得维多利亚十字勋章。在残酷的苏维拉湾战役中,他孤军作战,阵亡于加利波利半岛。

\* \* \* \* \*

我十分喜欢哈罗公学的校歌,其他校园歌曲只能望其项背。我们过去常常聚集在演说厅或教室,合唱这些著名的校歌。我相信,这些校歌是哈罗最宝贵的财富。伊顿公学就没有我们这样的校歌,他们只有一首关于划船的校歌,这首歌唱起来还可以,但跟着其节奏划船却很差劲,其歌词也很蹩脚。在哈罗公学时,我们常听名人演说,题目是一些科学题材或历史题材。这些讲座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权威人士给你讲故事是颇激动人心的,如果他还有幻灯,那就更不用说了,这对我来说是最好的学习途径。一旦我专心致志地听他们讲座,我也能做出与其不分上下的讲座来。到现在我还能记住其中的5次讲座。开第一次讲座的是鲍恩老师,他是哈罗公学中最有名的老师,是我们许多优美校园歌曲的创作者,他用通俗的方式给我们讲述了令人兴奋的滑铁卢战役,后来他还做了一次关于色当战役<sup>①</sup>的讲座,对这次讲座,我十分欣赏,几年后我才发现那是他几乎一字不漏地从胡珀的《色当》一书中摘录下来的,因为这本书是我的上校最喜欢的书籍之一。伟大的温珀<sup>②</sup>先生做过一次关

① 1870年普法战争中的一场。

② 爱德华·温珀(1840—1911),英国登山家、探险家。

于攀登阿尔卑斯山的讲座,他带来了许多照片,照片上的导游和游客或紧贴绝壁,或背向悬崖,那情形即使在照片上也令人心悸。我还听过一次关于蝴蝶如何变幻体色来保护自己的讲座,味道不佳的蝴蝶以其华丽的体色警告鸟类不要吃它;肉汁鲜美的蝴蝶则通过把自己伪装成树枝或树叶来保护自己,但这一现象是经过几百万年演变而来的,许多进化极其缓慢的蝴蝶被别的动物吃掉,最后绝迹了,因此幸存下来的蝴蝶多彩多姿,各有特色。最后,帕金先生做过关于“帝国联盟”的讲座,他告诉我们纳尔逊<sup>①</sup>的“英国期望每个英国人今天各尽其职”的指令在特拉法尔加海战<sup>②</sup>中起了什么样的作用,他还说如果我们和我们的殖民地能团结起来,总有一天纳尔逊的话不仅能在一支舰队中起作用,而且能在一群国家中发挥作用。我们在有生之年确实看到了这一天,老帕金在其生命中的最后一年里,参加过一次庆祝大战胜利的大型庆功宴会,当时我还向他提起过这次讲座。

令我不解的是他们为什么不经常举办这类讲座,他们可以每两周举办一次,让所有男生先写下他们能记住的内容,然后写下他们的看法,那样一来,老师会很快发现哪些人学得好,哪些人是笨蛋,然后让学得好的学生学新的东西,这样一来便能分出学生的优劣了。果真如此的话,哈罗公学就不会愚蠢地把我老归在差生类,我也一定会过得比较快活。

---

① 纳尔逊,英国著名海军统帅,指挥过著名的特拉法尔加海战,大败法国—西班牙联合舰队,他也在这次战斗中阵亡。

② 1850年10月21日英法之间的一场海战,发生在西班牙南部加纳斯和直布罗陀海峡之间的特拉法尔加海角,英国纳尔逊将军在“胜利号”舰上指挥英国舰队,一举击败法国舰队。

## 桑赫斯特军校

我在桑赫斯特军校开始了我人生中新的一页,我再也不会因为过去没有学好拉丁语、法语和数学而低人一等;现在我们得学新东西,大家都是从头开始。我们所学的课程包括战术、设防、地形学、军法、军政。此外,我们还要进行操练、体操练习以及马术训练。我们可以不参加任何体育活动,除非自己想去。军校的纪律很严,学习和操练的时间都很长,一天下来,人几乎要累瘫了。我对所学的东西很感兴趣,尤其是战术和设防。我父亲吩咐他的书店老板给我寄来学习中需要的所有书籍,因此我订购了哈姆利的《战争运作》、克拉夫特的《关于步兵、骑兵、炮兵的来函》、梅因的《步兵战术》,同时我还订购了一系列关于美国内战、普法战争、俄土战争的史书,这些战争是当时最近也是最好的战争范例。不久,我就有了一个小小的军事图书馆,为我的正规课程提供了一些背景知识。我不大喜欢操练,在“蹩脚班”呆了好几个月,这个班主要由那些需要特别调教的人组成的。野战实习是最令人兴奋的,我们挖战壕、筑掩体、垒沙袋,还设置铁蒺藜、造定向雷(一种原始地雷);我们用火药切断铁路交通,还学会了炸石桥、做浮舟;我们绘制坎伯利地区所有小山的等高线地图,在各个方向上进行侦察,并布置警戒线,为前锋和后卫部队制定模拟计划;我们甚至还制定过简单的战术方案。我们在校从未学过关于炸弹和手榴弹的知识;这些武器早就被淘汰了,早在18世纪人们就不使

用它们了，它们在现代战争中毫无用处。

当然，所有这一切都是很基本的，我们所学的东西都局限在下级军官该学的范围之内。但是有时我应邀去参谋学院吃饭，这所院校离我们学校不到一英里，其任务是培训全军中最优秀的军官，培养高级指挥人才。该学院的学习内容是如何指挥一个师、一个军、甚至一个兵团。他们学习有关军事基地、军需供给、通讯联络以及铁路运兵战略等。这一切令人兴奋，只可惜都是模拟的。如果早生 100 年的话，我们该处在一个多么辉煌的时代啊！想想看，如果我们在 1793 年是 19 岁的小伙子，那我们就有机会参加长达二十几年的反抗拿破仑的战争！不过，一切都已成为过去，自从克里米亚战争<sup>①</sup>之后，英国军队再也没有与白人军队交战过，而今全世界人民渐渐变得如此明智、如此爱和平、如此民主，伟大的战争年代一去不复返了。值得庆幸的是，世界上仍然有凶恶野蛮的民族：祖鲁人、阿富汗人、苏丹的德尔维希人<sup>②</sup>。有朝一日，有些人一时高兴会玩点花样，印度甚至有可能发生兵变。当时，印度人很神秘地在芒果树上乱涂东西。《旁观者》周刊上的一篇文章声称，几个月后我们将有可能需要再度征服印度，我们对此心驰神往，都想知道事情究竟是怎样的。当然我们都想能早些得到命令，去印度大平原上征战，获得奖章和荣誉，也许会像克莱武<sup>③</sup>一样，年轻时就能当上高级

---

① 1853—1856 年间俄国与英国、法国、奥斯曼、土耳其、撒丁联军之间的战争。

② 又译托钵僧，1880—1885 年追随苏丹玛赫迪反抗英埃统治的上埃及和苏丹的部落成员。

③ 克莱武(1725—1774)，英国首任孟加拉行政长官，1743 年去印度，参加东印度公司，1751 年率兵攻占阿尔科特。

指挥官！这些想法只是聊胜于无的安慰，与参加一场真正的欧洲战争相比，跟可怜的印度人打仗就像是在玩“犬兔”越野追逐赛<sup>①</sup>，根本不能与越野障碍赛<sup>②</sup>相提并论。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应该把握时代良机。

我十分喜欢马术训练，我的马术与大部分骑手一样娴熟。假期里，父亲安排我去奈次布里奇骑兵营与皇家骑兵卫士一起训练马术，于是我额外多了一次马术训练机会。在兵营的跑马场上我多次坠马，后来我到骑兵团报到后又进行了5个月的训练。经过这么多的训练，我想我已能够驾御一匹马了，这可是世上头等大事。

骑马是我在桑赫斯特的最大乐事，我和同班学员把所有的钱都用来从当地最佳的代养马房<sup>③</sup>借马。为了将来能出色地完成使命，我们花光了钱；我们在一位友好的要人的狩猎园内多次组织过定点越野赛马，甚至还举行过一次越野障碍赛马，在乡野上欢快地催马狂奔。在此，我要向为人父母者进一言，尤其是那些富裕的父母，“不要把钱给儿子；如果可能的话，给他几匹马。”骑在马上的人是不会感到悲伤的，即使有悲伤也是光荣的。马背上的时光是不会白白浪费的，常常有些年轻人因养马或赌马而毁掉自己，但决不会因为骑马而毁掉自己；当然，除非他们在策马奔驰中摔断了脖子，不过，那样死也死得光荣。

当我成为一名士官生之后，我在父亲的心目中有了新的地位，只要方便，假期里父亲便允许我跟他一起外出。他喜欢看杂

---

① 一种户外活动，假扮兔子者在前面边跑边撒纸屑，假扮猎犬者在后跟踪追赶。

② 一年一度在英国利物浦举行的赛马。

③ 出租马和马车的地方。

技、魔术和动物表演，我第一次去帝国剧院就是他带我去的。他也带我去位于特林的罗思柴尔德勋爵府上参加重要的政治会议，保守党内的领袖人物及其新秀常常聚集在这里开会。这时，他开始带我去会见他的赛马伙伴，于是我们又有了另一群朋友和新的话题。在我看来，他似乎拥有一切，或者说他拥有值得拥有的一切。然而，一旦我表现出一丝与他平等的意思，他立即就会生气。有一次，我主动提出帮他的私人秘书为他写几封信，他对此冷若冰霜。现在我知道了，这只是一个过渡阶段，要是他再活四五年的话，没有我的帮助他将很难办成事。然而他没能再活四五年！我们的友好关系即将发展到相互理解，经过一番努力，我们也许可以结成联盟，或者至少能够达成某种君子协定，就在此时，他却永远地离我而去了。

1894年春，大家都清楚我的父亲病得很重，但他仍然坚持进行政治活动，他几乎每周都在某重要场合发表一次演说。大家都看得出，他的演说愈来愈不成功，对他的演说所进行的一字不差的报道逐步从三栏减少到两栏，然后又减少到一栏半。有一次，《泰晤士报》报道说，演讲厅里没有坐满。后来我母亲和奶奶都要求他休息，奶奶一直反对父亲带病工作，而父亲坚持说自己没事，一切都很好。我知道，这两位与他最亲近、也是最关心他的人若非万不得已是不会向他施加压力的。

现在我对父亲的看法与我给他写传记时的看法有所不同。现在我的年龄已超过他在世时的年龄。我十分清楚，他辞职是个致命的错误。他喜欢走极端，当年正是他叱咤风云的时期。但是，1886年保守统一党获胜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当时政治上需要的是安定，对英国而言，索尔兹伯里代表着国民所需要的一切；他安安稳稳地统治了很久，自然乐于大权独揽，而不愿与一位控制了下院和国家财政的不安分的对手平分权力。一个人

丢了权力之后是不可能东山再起的，他也许能够在五六十岁时另谋一个职位，但绝不可能重新返他三十多岁时丢掉的职位。要想牢固地掌握一个党派或一个国家的领导权，领导者的素质和思想既要符合国家和人民的需要，又要能够投其所好。

伦道夫·丘吉尔勋爵当上了财政大臣之后，肩负重任。从那一刻起，在很大程度上他已不再是托利党人，他越来越热衷于采取格莱斯顿式的观点，只有在《爱尔兰自治法案》这个问题上是个例外；在所有的社会问题和劳工问题上，他的观点是当时辉格党人或中产阶级的自由党人所不能容忍的。在爱尔兰问题上，他的观点也是相当独立的，保守党人也不欣赏。我想，如果他在世时能保持身体健康的话，他很可能会抵制南非战争。他观点中有某种倾向工人阶级的成分，他也会因此遭人忌恨。他若想东山再起，唯一王牌是必须能够制止张伯伦的贸易保护运动，据我所知，他完全可能成为该运动的主要反对者之一，他绝不会受党派决议所左右，在宗派斗争中，他会抓住一切机会去赢得胜利。当他重任在肩时，他又会全心全意地为国家大事操劳。他心直口快，不搞计谋，这样倒是更好。

格莱斯顿善辩的名声不是依靠他的演讲稿，而是依靠他演说时在听众中产生的效果；伦道夫·丘吉尔勋爵在政治史上的地位取决于他的人格给他的同时代人留下的深刻印象，而不取决于他的言行。如果形势一直保持有利，这种深刻印象也许会发挥决定性的作用。他天生具有这种力量和魅力。

依照当时的世风，父亲曾给我写过很多信，如今我把他辛辛苦苦写出来的亲笔信又重读了一边，感觉到当时我根本没有领会他对我的关心。我很后悔我们住在一起的时间太短，未能相

互了解。在罗斯伯里勋爵<sup>①</sup>晚年,我常去看他,一方面是因为我十分敬重这位杰出人物,另一方面是因为我爱听他讲我父亲的事。当我和这位与父亲私交甚厚的名人交谈时,我感觉到我离父亲越来越近。最后一次见罗斯伯里时,我说真希望时光倒流,能平等地跟父亲交谈,这位年迈的政治家说:“哦,他会理解的。”

\* \* \* \* \*

1894年6月的一天,我正在绘一张丘巴姆科蒙的公路图,突然一位骑自行车的邮差给我送来学院人事参谋发来的命令,让我立刻去伦敦。我父亲第二天就要启程去周游世界,家人请求校方给我批假去见父亲,但是被拒绝了,于是父亲电告陆军大臣亨利·坎贝尔·班纳曼爵士<sup>②</sup>,“今天是我在英国的最后一天。”……我立刻赶赴伦敦。

第二天早晨,我与母亲和弟弟一起驾车去车站。尽管他在4年前的非洲之行中脸上蓄满了胡须,但还是能看出操心劳神使他满脸倦容。他轻轻地拍拍我的膝盖,动作很简单,但意味深长。

从那以后,他开始了漫长的周游世界之旅,我再也没有见过他,只记得他慢慢消失的身影。

---

<sup>①</sup> 罗斯伯里(1847—1929),英国自由党政治家、首相(1894—1895),曾任内政部次官、掌玺大臣、伦敦郡议会第一任主席,后两度出任外交大臣。

<sup>②</sup> 亨利·坎贝尔·班纳曼(1836—1908),英国政治家、首相(1905—1908),曾任陆军大臣。

\* \* \* \* \*

我在桑赫斯特学会了如何做人，也了解到军衔不同的军官在军中应该如何相处。我们的连长鲍尔少校来自威尔士团，是一位作风严谨、脾气暴躁的军人。此人一本正经、生性矜持、彬彬有礼，是一个无可挑剔、令人敬畏的人。他从来没有上过战场，但我们确信他是个宁死不屈的硬汉子。

军校有规定，学员外出首先必须在连队请假簿上写下姓名，这样才能假定自己已得到批假。有一天，我驾着借来的双驾马车去奥尔德肖特看望正在那儿的民兵营里训练的一位朋友。马车沿着马尔伯勒路行驶时，我正巧碰见鲍尔少校赶着一辆马车回桑赫斯特。我向他脱帽致敬时突然想起自己因为懒散大意，没有在请假簿上登记，不过，我想，“还有机会，晚饭前他是不会看请假簿的，我一回去就把姓名写上。”我匆匆忙忙地拜访民兵营的朋友，赶紧驾车回校。我6点钟到校，连忙顺着走廊溜到放请假簿的桌边，一眼就看见了请假簿下面上校的签名，我回来太迟了。他在奥尔德肖特见过我，又发现我没有在请假簿上登记。我又看了一遍，让我惊诧的是，少校已为我写下姓名，当然他的签名说明他批了我的假。

这件事让我了解了古老的英国军队中的生活：尽管军纪严明，但军官们相互间彬彬有礼。此事发生后，我再也没有掉以轻心过。

1915年冬天又发生了类似的一件事。当时，我正随近卫军第一团在拉维蒂的前线驻防。我的上校是以军纪严厉而闻名的杰弗里斯，是一位杰出的军官，他丝毫不受16个月防守的影响，反对在值勤时喝酒（军队定量分配的朗姆酒除外），甚至在严寒的冬

季前线也是如此。虽然没有下达正式命令,但他希望士兵不要把酒带进战壕。在黑暗潮湿的掩体内,大家正喝着一瓶葡萄酒,突然听到有人喊“指挥官”,只见杰弗里斯上校慢下脚步。一位颇有军事天才的年轻军官赶紧把照明掩体用的将要熄灭的蜡烛插进酒瓶口,这样的蜡烛架十分普遍。不过,6个月后,这位年轻军官休假时,在近卫军俱乐部遇见了杰弗里斯上校,上校说,“喝一杯葡萄酒?”这位军官欣然接受其邀请。上校买了一瓶酒,他们全喝完了,上校又问,“有没有蜡烛油味?”他俩一起笑了起来。

\* \* \* \* \*

如果读者允许我扯点题外话的话,我想说说在桑赫斯特最后一学期令我十分愤慨的一件事。那是由奥米斯顿·钱特夫人发起的净化运动。这位女士是伦敦市政会委员,1894年夏,她积极开展了一场净化剧场的运动,矛头主要指向帝国剧场的幕间休息区。每次演出,尤其是星期五,第一层楼厅的前排座位后面的大空间总是宾客满堂。年轻男女不仅演出间和幕间休息时一起交谈,而且时不时地喝酒提劲。奥米斯顿·钱特夫人和她的朋友们指责这些寻欢作乐者饮酒无度、道德败坏;她企图关闭幕间休息区,尤其是与其相邻的酒吧。当时大部分英国公众对此事持有不同看法,他们的看法得到《每日邮报》的支持,该报是当时最受欢迎的报纸。《每日邮报》以“假正经”为题刊登了一系列读者来信,来信者通常用笔名,如“五子之母”、“绅士与基督徒”、“自己活也让别人活”、“约翰·布尔”等等,这场争论激起了公众的浓厚兴趣,其中以我们桑赫斯特校友间的辩论最为激烈。我们习惯于在每月两次的短假中去光顾这个幕间休息区,每次短假是从星期六中午到星期天午夜。我们被钱特夫人的指责和含

沙射影激怒了；我们从未发现男女双方中任何一方的举止中有任何可抱怨的地方。事实上，任何人只要稍有越轨，哪怕是无心的，也会被身着制服的守门人粗暴地推出门外，这才是应该受到批评的。我们认为奥米斯顿·钱特夫人发起的运动毫无道理，而且与英国的自由传统背道而驰。

在这个问题上，我迫不及待地想要给予反击。有一天，我注意到一位绅士在《每日邮报》上建议创立一个公民团体以抵制和反击钱特夫人缺乏宽容的运动，我现在已记不起这位绅士的姓名了。这个团体被称为“娱乐保护协会”，该协会提议组成委员会并任命一位主管，以履行公务、吸纳成员、募集捐款、举行公众会议并发行会刊。读完该消息后，我立即去函表示自愿为该组织服务。我按照联系地址给这位尽心尽责的创始人写了一封信，表示十分赞同他的想法，同时也表示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与他充分合作。最后，我终于收到了一封信封印制得很精美的来信，表示很欢迎我提供帮助，同时邀请我参加将于下星期三6点钟在伦敦一家旅馆召开的首次董事会议。

星期三是半休日，表现好的学员可以请假去伦敦。我在前三天偷闲摸空写演讲稿，我想会上可能会要求我向一大群严肃的董事会成员发言，我将高举“汉普登<sup>①</sup>和西德尼<sup>②</sup>用鲜血换来的”英国的自由大旗，因为我以前从未在公开场合发言，所以这次发言对我来说是一件相当艰巨的任务。我把演讲稿反复修

---

① 汉普登(1594—1643)，英国议员，在长期的议会斗争中激烈攻击国王的政策，成为1642年查理一世想要拘捕的5名下院议员之一，内战中死于一次战役。

② 西德尼(1622—1683)，英国辉格党政治家，反对天主教徒约克公爵詹姆士继承王位，1683年因涉嫌密谋杀害查理二世和詹姆士而被处死。

改了三四次,尽量写得完美,然后牢记在心。这篇演讲稿为英国国民天赋的权利进行辩护,指出国家干涉守法公民的社会习惯的危险性,分析了不受健康的公众舆论支持的压制会造成不可避免的许多恶果;这篇演讲稿既未夸大这个事件,也不无视事实的存在,而是尽量以温和幽默的口吻和通俗易懂的逻辑思维说服听众;在结束语中,我甚至请求听众对那些误入歧途的对手要有耐心。在人类事务中毕竟是过失多于恶意,难道不是吗?写完演讲稿之后,我急切而又紧张地等待着重大时刻的到来。

星期三上午的任务一结束,我匆匆忙忙地吞了午饭,换了一身便服,赶到火车站,搭上了一辆去伦敦的慢车。我得在此提一下,当时我经济十分拮据,事实上,买了回程火车票之后,我口袋里只剩下几先令了,我得再等两个多星期才能领到下个月的10磅津贴。一路上我在心里默诵着演讲稿中的重点和重要段落。下了火车之后,我在滑铁卢乘了一辆双轮马车到莱斯顿广场,董事会议的会场就在广场附近的一家旅馆里。当我看到肮脏邋遢的偏僻街道时,十分惊讶,感到有点窘迫;当马车最终在旅馆门前停下时,我更惶然。但是,我在心里对自己说,他们避开豪华场所很可能是对的。如果想成功的话,这次运动一定要以人民的意志为基础,响应各阶层共有的本性,不能跟纨绔子弟和时髦阶层搅在一起。我对旅馆的守门人说:“我是来参加今天在此召开的娱乐保护协会会议的。”

守门人大惑不解,说道:“我想吸烟室里有位绅士是办这事的。”吸烟室是一小套昏暗的客房,我被引进室内,看到了新协会的创始人孤零零地坐在那儿。见此情景,我深感失望,但我尽量控制自己的沮丧。我问他:“我们什么时候开会?”他也显得很尴尬,说道:“我已给几个人写过信,但没有一个人来,只有你我两人,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起草章程。”我对他说:“你是用印有协

会抬头的信笺给我写信的。”他答道：“咳，那种信纸只需花5先令，要想创办这类协会，用印有抬头的信笺写信是一件好事，它会鼓励人们自告奋勇来参加。你看，你不是被引来了吗？”他似乎因为我的沉默而感到沮丧，停了一下，又说道：“如今在英国要想让人们做点事很难，他们逆来顺受，我不知道这个国家出了什么毛病，人们好像没有一点锐气了。”

把这种事情办下去不会有任何成效，跟这位创始人更没什么用处，因此，我委婉而又坚决地与他分了手。我来到大街上，演讲词还在胸中激荡，口袋里只剩下半个克朗。人行道上挤满了匆匆过往的行人，这些人一心只考虑他们的个人小事，对事关人类的大事情毫无兴趣、莫不关心。我对这些只关心自己琐事的过路者既同情又鄙视。显然，把公众的观点引向正途并不像我以前所想象的那么容易，如果民主制度下的这些懦夫不珍惜他们的自由，他们怎么能够守得住几百年的专制统治得来的大片疆土呢？此刻，我对大英帝国绝望了。这时我想起我还没吃饭，可惜我只有半克朗！不，这样不行！在这个美丽半休日里，我心情激动、满怀希望地来到伦敦，怀里揣着可能影响国家命运的演讲稿，可是却堵在心里没有机会说出来。我就这样回到桑赫斯特，吃个馒头，喝杯茶吗？绝对不行！于是我做了一件以前没做过的，今后也不会做的事。我来到斯特兰德大街，看到著名的阿顿巴勒典当行前悬挂的3个金球。我有一块非常精致的金表，是我上次过生日时父亲给我的礼物。毕竟帝国王冠上的宝石在艰难时期也被典当过，店员小心翼翼地掂了掂表之后问：“你想要多少钱？”我说：“5英镑就行。”店员把一些详情写进一本本子里，给我一张我只在歌剧里曾听说过的票据和一张五英镑的票子。我径直走到伦敦市中心，平安到家了。

第二天，桑赫斯特的朋友们都想知道会议进行的情况。我

事先给他们透露过我演讲稿中几点能够击中要害的论点,因此他们急于知道听众对此反应如何。会议是个什么样子?他们很羡慕我有胆量面对着一帮成年人、政治家、市政要员等诸如此类的人组成的董事会发表演讲,代表他们阐明观点。他们想知道详情,但我没有勇气向他们坦白,只能泛泛而谈,强调在一个生活舒适、总的来说又易于满足的国家里要想鼓动公众的情绪是多么困难。我还指出了循序渐进的重要性,而且在实施下一个步骤之前一定要把前一步做好。第一步是成立执行委员会,这一点已做到了;第二步是起草协会的章程并分配职责和权力,这一点正在着手做;第三步是吁请广大公众的支持,群众对此的反应是至关重要的。他们对这些说法有点怀疑,但我又有什么办法呢?如果我拥有一份报纸,那么我会把我的演讲稿一字不差地登上头版,字里行间还要注明哪些地方获得了委员会的喝彩,标题要醒目,此外还要连续发表有分量的后续文章,对我的演讲稿给予支持。这样的话,娱乐保护协会也许真的能取得进展。19世纪90年代初,许多事情尚未成形,该协会本可以在所有讲英语的国家里调动起强大的公众舆论,向世人发出响亮的警告。这样一来,强大的美国后来也许就用不着颁布禁酒令<sup>①</sup>了。在此,我们又一次看到命运的足迹,它们避开了绿草如茵的芳草地,转而走上了干燥崎岖的大路。

我命中注定要在这次运动中再次出击。钱特夫人的运动并未失败,它的来势显得如此凶猛,我们觉得跟她们进行英国式的妥协实在是太小心谨慎了。最后的处理结果是,滋事者的座位与

---

<sup>①</sup> 指1919—1933年间美国的禁酒法案和措施。当时在全国范围内通过法律,规定除医药用途外,禁止制造、贩卖和运输含酒精的饮料,此令至1996年完全解禁。

幕间休息区用屏风隔开。这样一来,从技术上说滋事者在幕间休息区之外,从法律上看,他们与幕间休息区之间的距离犹如隔着一个县。屏风进出口的宽度可由法律来规定,为了通风起见,屏风的高度可以有所降低。如此,维纳斯<sup>①</sup>和巴克斯<sup>②</sup>神庙虽然相隔不远,但终究被隔开了。如果维纳斯和巴克斯想攻击人性弱点的话,只能一个一个地进攻,或是轮流着来,没有办法一拥而上。那些“假正经”对此赞不绝口;剧院的业主发了一阵牢骚之后,似乎也只好认命;而桑赫斯特人士则不然,在罪恶的媾和过程中无人征求我们的意见。对这类虚伪的一套我感到深恶痛绝。当时,骗子当道,主宰着生活在自由民主国度内的人民的社会生活,我对此毫不了解。我希望国家职责和个人权利能有明确的定义,这种职责和权利可以根据公众的风俗和需要适当修改。

在帝国剧场安置屏风的第一个星期六,我们桑赫斯特的许多学员碰巧去那儿,当时还有好多与我们同龄的男大学生,当然,他们只是一群散漫的、无责任心的书呆子。大家仔细地看了看剧院的新结构,对此大加责备。有位年轻的绅士用手杖把屏风捅破,其他人也开始效仿,当同伴们也如法炮制时,我自然不能畏缩不前。突然,怪事发生了,大约有二三百个人的人群骚动起来,狂怒不已,大家冲向薄薄的屏风,把屏风撕个粉碎。此时,剧院方面束手无策。人们毁了栅栏,撕了屏风,不一会儿,障碍物被拆除了,滋事者的座区又和他们常常光顾的幕间休息区连在一起了。

在这乱哄哄的环境里,我作了平生第一次演讲。我站在碎片中,向激动不已的人群发表演说。我的演说辞没有保存下来,但在场的人都听得很专心,后来我还听别人议论过好几次。我抛开

---

① 维纳斯,罗马神话中的爱和美的女神。

② 巴克斯,罗马神话中的酒神。

了关于制定章程的论点,直接煽动人们的激情,最后说了一句:“今夜你们看到我们捣毁了这个屏风;在不久将进行的大选中,你们一定要推翻为此事负责的人。”话音刚落,人群中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我们一起向广场出发,手中挥舞着我们的战利品——碎木片和碎布片。这使我想起尤利乌斯·恺撒死时的情景——阴谋者冲向大街,手中挥舞着杀死暴君的血淋淋的短剑。我又想起攻破巴士底监狱的情景,对这件事的详细情况我很熟悉。

看来,推动革命的发展要比引发革命艰难得多。当晚,我们必须赶最后一班开往桑赫斯特的火车,否则我们会犯玩忽职守的错误。这列火车午夜后不久从滑铁卢站开出,把当天的死人运到伦敦公墓,现在仍然如此。它在凌晨3点到达终点站弗雷姆里,那儿靠近奥尔德肖特。我们还得行10英里才能到达皇家军事学院。我们在弗雷姆里站下车后发现已经没有交通车了,只好敲开当地一家旅店。也许我们敲门声太大,我们等了好久,都有点不耐烦了,突然门的上半部分打开了,里面伸出来一支大口径霰弹枪的枪口,枪口后面是一张苍白的、杀气腾腾的脸。在英国,事情很少会被逼到极端。我们站在那儿,纹丝不动,向他解释我们需要什么,而且我们给钱。店主定下神来,最后消了气,牵出一匹老马和一辆更古老的马车。我们七八个人驾着这辆马车顺利地回到坎伯利。我们没有麻烦门口的门卫,绕过正道回到宿舍,赶上了凌晨的集合。

这件事在当时引起了相当大的轰动,很多报纸甚至刊登了重要文章对此事进行评论。有好长一段时间我十分担心,惟恐自己会因为参与此事而引起太多的注意。果真如此,当然有很大危险,因为我父亲的名字仍然很引人注目。我对自己参加抵制暴政感到自豪,这其实是每个生活在自由国度里的公民应尽的职责,但我十分清楚,有人可能会持相反的观点,这种反调甚

至会成为主流观点。年长者和当权者总是认为年轻人行事轻率、鲁莽，他们的开明和对年轻人的理解是靠不住的。他们有时会出馊主意，挑出典型，“杀一儆百”。虽然我已作了牺牲的准备，但我希望能晚一点。幸运的是，当有人把我的名字与此事联系在一起时，公众对此已失去了兴趣，学院和战争办公室也没有人再提此事。这种好运是令人难忘的，一旦遇到背运的时刻你定会想起这种好运，人总有背运的时候。伦敦市政会选举不得法，那些自诩为革新主义者的人胜利了，他们用砖和泥重新砌起屏障，我们的努力付诸东流，但没有人会说我们未尽力。

\* \* \* \* \*

我在桑赫斯特的学业不久就结束了。在我们这批 150 名学员中，我以排名第八的优秀成绩毕业，不是像以前那样老排在最后几名。我说这一点是要说明，我学习重要的东西是相当快的。这是我一生中既艰苦又开心的经历，前后总共只有 3 学期。每学期期末，学生自然而然地从初级升到中级，再从中级升到高级。前后间隔很短，一年之后就升到了高级班。我们感觉到自己几乎每个星期都在成长。

1894 年 12 月，我毕业回家，完全有资格听候女王的调遣了。与我的学生时代相比较而言，我在军校交了许多朋友，有三四位仍然健在，其他朋友则都已不在人世了。南非战争不仅夺走了我的许多朋友，也夺去了我所在连队的大部分士兵的生命。大战<sup>①</sup>则几乎夺去其他所有朋友的生命，幸存下来的几个人或是屁股

---

<sup>①</sup> 此处指第一次世界大战。本书成书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尚未爆发，因此尚无一战之名。

上、或是胸部、或是脸上留下了敌人子弹穿透的伤痕。我向他们致敬。

我从桑赫斯特毕业后步入社会，社会像阿拉丁<sup>①</sup>的神秘洞一样展现在我的眼前。从1895年初开始一直到我现在写书这一刻，我无遐回首往事。对我来说无所事事的日子屈指可数，我就好像一部永不停息的电影中的一名演员。总的来说乐趣很多！1895年到1900年之间是我一生中最丰富多彩的一段时间，当然大战开始的前几个月例外，我在这段时间里的经历是本书的主要部分。

回首往事，我真诚地感谢至高无上的上帝赋予了我生存的机会。我所经历的每一天都是好日子，而且一天比一天好，我的生活中充满了坎坷和危险，时刻感觉到变幻无常，同时心中又充满了希望。来吧，世界上所有的年轻人！现在最需要你们去填补被战争夺去的一代人的空缺！你们不能失去一分一秒！你们一定要在生命之战中找到自己的位置。20—25岁正是你们大显身手的时期！不要安于现状！“世界是你们的，机会也是你们的！”继承前辈的遗产，承担起你们的责任！重新举起光荣的旗帜，向新的敌人挺进！人类的前方总有敌人，只要进攻你就能打败他们！不达目的不罢休，绝不能向失败低头！不要被个人的成功冲昏了头脑！你们会犯这样那样的错误，但只要你们心胸宽广、以诚待人，又精力旺盛，你们就不会伤害到这个世界，更不会让她痛苦！世界本来就是年轻人追求和征服的对象！只有不断征服她，她才会生存，才会繁荣兴旺！

---

① 《一千零一夜》中获得神灯的青年。

## 第四轻骑兵团

我现在向读者介绍一位在我当时的生活中起了重要作用的人,此人性格独特,气度非凡,他就是指挥第四轻骑兵团的布拉巴宗上校。第四轻骑兵团前一年离开爱尔兰后到奥尔德肖特,驻扎在东部骑兵营房。布拉巴宗上校是我家故交,我上学时见过他几次。我在桑赫斯特军校学习时曾应邀与他在该团的食堂共进晚餐,对此我深感荣幸。那是一次盛大的宴会,当时的骑兵团食堂在一个年轻人的眼里是相当壮观的。二三十名身穿蓝色镶金骑兵服的军官围坐在一张桌子旁,桌上摆着该团在二百多年来的比赛和战争中所获得的奖品和奖杯,这简直像国宴,到处洋溢着灿烂、富丽、庄重而严肃的气氛,在该团弦乐队的乐曲声中,我们开始享用丰盛的晚餐。我很谦逊地接受了他们对我的热烈欢迎,后来我又应邀去过几次。几个月后,我母亲告诉我,布拉巴宗上校十分希望我能进第四轻骑兵团,但是我父亲说“不行”。他似乎仍然相信,通过他的权力他还是能够把我送进步兵团的。坎布里奇公爵对我未能进入第六十步兵团深表不快,还说到一定时候他会想办法把问题解决的。“同时,”我父亲写道,“我知道布拉巴宗是军中最优秀的军人之一,但他无权把我的孩子吸引到第四轻骑兵团。”

不过,我最终还是进了第四轻骑兵团。父亲最后一次从国外回国后几乎无暇过问我的事。母亲向他解释事情是如何自然

而然地有了安排，他似乎很愿意让我成为一位骑兵军官，甚至对此非常满意。他生前对我说过的最后几句话中有一句是：“你有马了吗？”

\* \* \* \* \*

父亲于1月24日凌晨去世，当时我正睡在附近的一幢房子内，一听到消息，我赶紧在黑暗中穿过积雪很深的格罗夫纳广场往家赶。他去世时毫无痛苦，因为他已昏迷好长时间了。我曾梦想能跟他平等共处，能进议会支持他，但现在这一切都结束了，现在我只能继承他的遗志，完成他未竟的事业。

现在，我在很大程度上是自己命运的主宰者。母亲总是在我左右给予帮助和建议，但我已21岁了，而且她从未想对我行使家长式的控制。实际上，她很快成了我的热心支持者，利用她的一切影响和无穷的精力来促进我的计划，维护我的利益。她已年届不惑，但依然年轻、漂亮、迷人。我们关系平等，更像一对姐弟，而不像一对母子，至少在我看来是如此，这样的关系一直持续到最后。

\* \* \* \* \*

1895年3月，我正式加入第四轻骑兵团。我进入该团的时间比预期提前了6周。报到之后立即与其他几位下级军官一起接受严格的新军官的训练。我们每天要在马术学校、马厩或兵营中的广场上进行长达数小时的训练。因为我已参加过两次马术课程，所以能很好地适应马术训练，但我必须声明，第四轻骑兵团的训练之严格胜过我以前所参加过的任何一次军事训练。

当时的规矩是,新军官在头6个月必须受训练,跟骑兵一起进行骑马和徒步操练,接受同样的训练。在马术学校,新军官必须排在队列的最前面,在广场上,则站在其所在班的右边,他必须给班里的战士树榜样。这种任务并不总是能出色地完成的。在光背马上疾驰或慢跑时上下马、骑着未配脚镫甚至连马鞍也没有的马跳过很高的障碍物,有时还需双手反扣骑马越过障碍物或双膝夹着光溜溜的马背策马快跑,这样一来难免会发生不测。不知有多少次,我从跑马场上爬起来,身上酸痛难忍,但还必须扶正金边军帽,装出一副尊严的样子。此时,那20名新兵看到军官也遭受他们常常遭受的罪,窃笑不已。受训一开始我就拉伤了肌肉,无法夹紧马背,结果,我深受其苦;当时还没有电疗,而且如果因为肌肉拉伤而请假一天则被认为是孬种,因此我只能硬撑着。

该团的马术教练绰号为“猩猩”,是位可怕的暴君,适逢当时几个星期他的脾气异常暴躁。有位中尉在《奥尔德肖特时代报》上作了如下广告:“×××少校,骑术教授,驻东部骑兵营房。能用12课时授完狩猎课,18课时教会障碍马术。”这则广告使他大受嘲讽,因此可能会使他觉得骑术班上学员脸上的微笑意味着幸灾乐祸。

不过,在某种程度上,我完全赞成年轻人应接受严峻的考验;除了这一点,我的生活中充满了欢乐。年轻军官在从骑术学校毕业之前就可以带骑兵连外出骑马训练,或进行长途行军,有时甚至可以排成纵队进行正式演习。叮叮当当的骑兵演习很刺激,极富魅力。骑马飞奔演习则更带劲,更令人兴奋。马群骚动,马具叮当,动作刺激,帽子上羽毛飞扬,清一色的制服气度庄严,这一切使骑兵演习妙不可言。

在此,我得向读者解释清楚,骑兵行进时排成纵队,而打仗

时则排成并列队形。骑兵操练的目的主要是使部队能够敏捷地从一种队形换成另外一种队形。因此,按照梯形队形转换,几乎任何时候、任何方向上都有一队骑兵作前锋,这种方法适用于任何大型骑兵作战场面。骑兵团、骑兵旅、甚至骑兵师可以在瞬间组成前锋队列,作好冲锋准备。

现在的战争放弃了这一切,转而求助于戴眼镜的化学家,握操纵杆的飞行员以及机关枪,战争的发展走上了贪婪、卑鄙的机会主义之路,真是可耻!然而在1895年的奥尔德肖特还没有出现这类事情。骑兵,尤其是轻骑兵,在战争中还没有丧失他们长期以来拥有的用武之地。过去的战争残酷却又辉煌,而今战争已变得既残酷又卑劣。现在的战争完全变味了,这全归咎于民主和科学。自从这两者之一介入战事,战争的劫数已定。过去,只有一小部分训练有素的职业军人用古老的武器和错综复杂的战略战术来守卫国家。而今,不分男女老幼,大家一起上阵,相互搏斗,相互残杀,只留下一些目光迟钝的职员累计死亡人数。自从民主影响到战场,或者说强行控制了战场,战争再也不是君子游戏。让战争见鬼去吧!国际联盟也见鬼去吧!

在19世纪90年代,如果有幸能够看到三四十个骑兵队被调集到一起组成骑兵师也是一件令人兴奋的事。庞大壮观的骑兵队整装待发,一声令下,只见骑兵队按 $15^{\circ}$ 的角度变换前阵,外围的骑兵旅必须在厚厚的尘云中飞奔2英里。马蹄掀起的尘土遮天蔽日,骑兵们看不到眼前5码远处。操练一个上午,有20个骑兵坠马,共发生了6起事故,最后调遣终于成功,骑兵团、骑兵旅接到命令准备进攻,此时我们浑身是劲,禁不住兴奋得大喊起来。

回到营房后,我想到德国人能一次调遣20个骑兵师,而且每一个师都与我们的师一样强大;我又想到如果有六七个人守

着一架机关枪，冷静地躲在兵洞里与骑兵对垒，那又会怎么样呢？这样一想，我刚才演习中的热情一下子又低落下来。

维多利亚女王坐在皇家马车里检阅部队时，阅兵式极为壮观：奥尔德肖特要塞的守军全军出动，25000名骑兵、步兵、炮兵、工程兵和辎重兵团身着蓝金相间以及红灰相间的军服，雄赳赳地从她面前经过。要想让所有欧洲强国——法国、德国、奥地利以及俄罗斯——于同一天在各自国家的20个不同地点进行同样的阅兵式，那似乎不可能。我想，我们的政治家可以组织一种国际大会，与会国派出旗鼓相当的队伍，代表战争中的各个国家，就像参加奥运会一样，每个国家的代表队集中该国的军事精英，通过比赛来解决世界的统治权。不过，维多利亚时期的大臣们不善于组织，错过了机会，让战争白白地从这些精英和那些训练有素的军人手中溜走了，使战争堕落为令人厌恶的人、金钱和机器问题。

我们知道战争终将堕落，了解这种趋势的人得出以下结论：英国军队再也不会卷入欧洲冲突。我们只有一个陆军兵团、一个骑兵师、还有民兵——上帝保佑——以及志愿者，靠这点力量我们怎么能赢得战争呢！？当然，在1895年的奥尔德肖特指挥部没有一位好战的下级军官或好斗的参谋会相信我们这支小军队会再被派往欧洲战场。然而，那年春天与我们一起训练的骑兵上尉黑格<sup>①</sup>终究会有一天意识到自己手中兵力缺乏。在日后的一次重大战役中，他只能调集到40个英国师，外加第一美国兵团，总共只有60万人马，而且支援部队也只有区区400个炮兵旅。

---

<sup>①</sup> 黑格(1861—1928)，英国陆军元帅，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在法国战场上任英国远征军总司令。

我常想,其他任何一代人是否见过我们这一代人所经历过的天翻地覆的事实和价值变革。从小受的教育让我相信一些事情是永恒的、重要的,而现在这些事情却很少能持久,我所受的教育让我确信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已经发生了。

\* \* \* \* \*

布拉巴宗上校是一位爱尔兰的穷地主,一生都是在英国军队中度过的,他是英雄的化身。自从19世纪60年代初进了近卫军团,他一直是时尚的先驱,他是伦敦社交界最耀眼的军事明星之一,是威尔士亲王终身的亲密朋友。无论在宫廷还是在俱乐部,无论在赛马场还是在狩猎场,他都被视为十分出色的人。他虽然一直是单身,但绝不厌恶女性。他年轻时一定是出奇的潇洒,他有美男子的身材,身高虽不到六英尺,但看上去有那么高。现在,壮年的他更是风度翩翩。他面部轮廓分明、匀称,一双灰色的眼睛炯炯有神,结实的下颌,一撮小胡子使他面容更具神采。此外,他身上还具有前一代纨绔子弟的气质和风度。还有,不知是真的还是装出来的,他从未把“R”这个字母的音发清楚。他很健谈,谈话时思路敏捷,不管与何人谈话,也不管谈话的气氛是否友好,他从未冷场。

他戎马一生,经历颇曲折。由于手头拮据,他曾在近卫军团中干过6年又离开了,后来经历过一段相当艰难的时期。在1874年的亚山蒂战役中他是位志愿者,在这次战役中,他表现非常出色,所以上层人士四处活动,请求恢复他的军衔。事实上,他得到了史无前例的恩惠。威尔士亲王十分希望他能被委派到他所在的第十轻骑兵团,该团是当时的军队中限制最严格的,但由于当时该团没有空缺,他暂时被派往前线的一支步兵团

任职。有人问他：“你现在属于哪个团？”他回答道：“我总是记不清，不过他们的军服上镶有绿条条，就驻扎在滑铁卢附近。”

有一次，他问奥尔德肖特的火车站站长：“去伦敦的火车在哪儿？”“已经走了，上校。”“走了！再开一辆来。”

布拉巴宗最终调入第十轻骑兵团。他在1878年和1879年的阿富汗战争以及1884年的萨瓦金战役中都有出色表现，于是他在团中的威望不断提高。由于他在现役中连升两级，这样，他的军衔要比他所在团的团长还要高。这种情况至少引起过一次尴尬的局面，而这种局面也只有在那时的英国军队中才会出现。第十轻骑兵团的团长有一次对布拉巴宗所带领的骑兵连不满，竟然命令该连回营，布拉巴宗深感羞辱，在几个星期后的一次演习中，第十轻骑兵团与另外一个骑兵团组成一个旅，共同行动，这时团中的权威再也不起作用了。由于布拉巴宗的军衔最高，他自然而然有资格指挥该旅。面对他的团长，此时是自己的手下，布拉巴宗重复其团长上次说过的话，十分干脆，最后严厉地命令道：“先生，把你的团带回去。”这个插曲在军中掀起了波澜。不可否认，布拉巴宗有其理由。当时人们习惯于以一种僵硬的方式来行使自己的权利，这在现在看来很不合适。不过，对于每件事都可以有两种看法。

显然，他的资历不足以使他指挥第十轻骑兵团，于是战争办公室于1893年任命他指挥第四轻骑兵团。毫无疑问，这在该团的高级军官中引起了反响，任何一个团都不会因某个要改变他们面貌的陌生人的到来而欢欣鼓舞。当这位多次荣获奖章，在社会上和军队中拥有很高威望的可怕上校第一次掌管第四轻骑兵团的指挥大权时，该团气氛十分紧张。况且，该团的历史比第十轻骑兵团还要长。布拉巴宗根本没有迎合该团的意图，相反，他十分巧妙地展现其自信，不仅使得全团的人心服口服，而且赢

得了军官们的高度崇拜,至少可以说团里的尉官们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在他的手下,一些资深军官也被迫低头。一天晚上,他问一位倔脾气的后勤主任,“你是从哪位药剂师那儿搞到这种香槟酒的?”

对我来说,他是一位严于治军的军官,也是一位具有魅力的人。在食堂用餐时,他常常会谈论一些战争的、体育的、宗教的或非宗教的话题,从这些谈论中,我发现上校博览群书,知识面很广。比如,有一次我引用“上帝让风轻轻吹拂在剪过毛的羊羔身上”,布拉巴宗听后问,“你从哪儿看来的?”我很得意地答道,虽然人们常认为它出自《圣经》,但实际上它是斯特恩<sup>①</sup>《感伤旅行》中的一句话。他不动声色地问,“你读过这本书吗?”幸运的是,我很老实,而且又警惕。我承认自己没有读过,这本书似乎是上校最喜欢的书之一。

上校也遭受过挫折。在我调入第四轻骑兵团前不久,他跟伊夫林·伍德有过激烈的冲突,当时伊夫林·伍德在奥尔德肖特做总司令。布拉巴宗不仅在该团的操练服上作了不少小改动——不过十分合理,比如,在操练中把军服上的金镶带换成黄条条——而且他三十多年来下颌上一直留有帝王式的胡须。这一点完全违犯了女王法令之第七条,即“颌上以及唇下的胡须都要剃光”。但是三十多年来,不管是战争时期还是和平年代,从未有上级要求布拉巴宗把胡须剃掉,帝王式胡须成了他的特权和习惯,对此他十分自豪。他刚把他的团带进奥尔德肖特,伊夫林·伍德爵士就急忙表现出对谁都一视同仁的样子来。第四轻骑兵团的操练裤上的黄条条消失了,操练时穿的宽松咔叽短褂也

---

<sup>①</sup> 劳伦斯·斯特恩(1713—1768),英国小说家,感伤主义文学的代表人物,主要作品有小说《项狄传》和《感伤旅行》等。

被取消了,取而代之的是老一套的镶金带操练裤和紧身的夹克。上校不得不服从,但他私下向战争办公室抱怨此事。毫无疑问,他有他的道理。事实上,一年内,他那既合理又经济的创新在全军内得以推广。但是在战争指挥办公室和伦敦,没有人敢藐视伊夫林·伍德爵士,因为他有女王的法令做后盾。当伊夫林·伍德爵士了解到布拉巴宗批评过他的决定,他决定进行一次大胆的回击,他给上校一个书面的命令,要求上校在下一次检阅时必须“根据女王法令规定净面”。这对布拉巴宗来说是一种莫大的侮辱,但他只得服从。当天晚上他就作出牺牲,剃掉了胡须,次日凌晨,当他出现在部下面前时,大家看到他的模样都惊呆了,听到他的解释后更是震惊。此事给布拉巴宗的印象太深,他从此再也没有提这件事。除非是因为军务上的需要,他从此闭口不提伊夫林·伍德爵士。

我有幸在此人手下当差,后来在他在世的20年里,我一直与他长期保持着真挚的友谊。上校是一位十分教条的、顽固的死硬派托利党人。他的三个基本信条是:保护贸易,强制征兵,恢复《传染病防治法案》。他判断政府和政治家的标准是看他们是否或能否与他的信条一致,但是,自由贸易争端、劳合·乔治预算案以及爱尔兰独立等政治问题都没有影响到我们的关系。

\* \* \* \* \*

1895年夏,我们了解到主张地方自治的激进政府在下议院惨败,索尔兹伯里勋爵将再次上台组阁时,大家都很高兴。大家认为罗斯伯里勋爵爱国,都喜欢他。但是他的同僚太糟糕,把他拖下了台。人们说罗斯伯里太软弱,违心地向那帮人作出让步,此外爱尔兰民族主义者支持他执政。然而大家都清楚,爱尔兰

民族主义者不把大英帝国搞垮是不会罢休的。在讨论中我为约翰·莫利说了句话,而他们则说莫利是最坏的那一种人,跟芬尼亚组织成员和各种各样的卖国贼是一丘之貉。政府下台的原因之一是政府未能保证充足的火药供应,万一战争爆发了,没有火药怎么打仗呢?有人说事实上火药是充足的,但任何理由都可以用来把这帮混蛋打下台。当时自由党在奥尔德肖特很不受欢迎。大选证明,全国人民跟我们有同感,因为索尔兹伯里勋爵有了150个多数席位而重新执政。此后,保守党执政10年,其间我参加过多次战争,这些战争将占去本书很大的篇幅。贸易保护问题出台后保守党才被选下台。后来自由党上台执政,打过一次大仗,但现在战争已结束。

内阁庆功宴过后,我应邀参加在德文郡大厦举行的晚会。我发现所有的新内阁大臣穿着镶有金边的蓝色制服,看上去很精干,这些制服没有我们的漂亮,但其款式给我留下了印象。我与乔治·寇松谈过话,他是刚当选的外交事务次官,看上去神采奕奕,官运亨通,他谦恭有礼地接受了我的祝贺。他解释道,他的职位虽低,但它在下院代表外交办公室,因此他希望他能参与外交政策的制定,而不仅仅是捍卫和解释外交政策。在场的也有落选的年轻人,但他们不得不满脸陪笑,而且还必须笑得比任何人都开心,这些可怜的年轻人在大厦里走来走去,向那些得到了他们自己一心想得到职位的人道贺。因为根本没有人考虑到为我安排什么职位,所以我也就没有什么嫉妒心需要控制。

\* \* \* \* \*

就在这时,埃弗雷斯特太太去世了。听到她病重的消息后,我立即赶到伦敦去看她,她住在伦敦城北的妹妹家,她知道自己

处于危险中,但她只为我担心。那天雨下得很大,我的夹克都湿了。当她双手抚摸到我的夹克时,唯恐我会感冒,很是担心。我只得把夹克脱下来烘干,她这才平静下来。她唯一的愿望是见一见我弟弟杰克,遗憾的是我无法安排他们见面。我赶到伦敦市区去请了一位优秀专家,医生对她的病情进行会诊,认为她患的病是一种腹膜炎。我乘午夜的火车回奥尔德肖特,参加次日凌晨的集合。集合一结束,我又赶回到她床前,她还能认出我,但渐渐失去了知觉,很快就去世了。她一生清白,把慈爱献给了别人。她的想法不多,因此并不畏惧死亡,似乎对死亡毫不在乎。在我28年人生中,她是最亲近的朋友。她曾经照料过一位牧师近二十五年,我给这位牧师拍了一份电报,他现住在坎伯利,是副主教,他对埃弗雷斯特太太的精心照料记忆犹新。我们在埃弗雷斯特太太的墓前会面,他没有带小埃拉来。

我想起了可怜的老妇人的命运,想到众多的老妇在临终时无人照料,无依无靠。我参与过养老金和保险政策的制定,这是其他任何国家无法比拟,而这些政策对老妇来说无疑有很大帮助。对此,我感到很欣慰。

## 古 巴

在维多利亚时代的最后 10 年里,大英帝国几乎一直是太平盛世,因此英国军人获得勋章的机会越来越少,勋章所代表的冒险经历也极为罕见。参加过克里米亚战争以及平息过印度暴动的老兵都已退役。19 世纪 80 年代初参加过阿富汗战争和埃及战争的勇士都已荣升高位,从此,再也没有听到过愤怒的枪声。1895 年 1 月我加入第四轻骑兵团时,女王陛下的军队里没有一个上尉及此级别以下的军官曾亲眼目睹过任何战争。物以稀为贵,军事当局从未像现在这样珍视参战,各级军官也在寻找一切机会参战,因为这是各兵种提升晋级的捷径,是通向荣誉的金光大道。有机会参战的幸运儿在年长绅士和年轻女士的眼里更具魅力。我们这些年轻军官多么羡慕高级少校在阿布克里的战绩啊!我们又是多么羡慕上校荣获的一长串勋章啊!他们不止一次给我们叙述他们以前的激动人心的经历,我们百听不厌。我们真希望能有类似的记忆匣子,如果需要的话,可以向一群具有同情心的听众一遍一遍打开陈列。在饭后的愉快气氛中,我们常想我们是否会时来运转,是否也能有机会一仗接一仗地打。在马球比赛中、狩猎场上以及军事演习中的勇敢表现也许有一定的价值;但如果一个年轻军人上过战场,经受过枪林弹雨的洗礼,那么他的将军、他的部下以及他所约会的姑娘都会对他刮目相看,都会一致地、真诚地、发自内心地赏识他、佩服他、敬慕他。

当时的军人都渴望有机会上战场，这种愿望注定都会得到满足。我们的所有要求不久就得到了最充分的满足。我们这些下级军官本以为在当今的自由民主政府执政时期不可能有战争，这种看法不久就被证明是错误的。和平年代结束了，战争不会缺乏，军人可以在战争中打个够。唉，战争太多了，打也打不完。一期又一期有理想、有抱负的桑赫斯特军校学员以及皇家军队中无忧无虑的年轻军官都未能从命运安排的大量可怕战争中逃脱出来。不久，印度边境和苏丹即为军人提供了参战机会，英军上上下下都在激烈地争夺来之不易的参战机会。不久又爆发了更大规模的南非战争，完全满足了我们这支人数并不多的军队的参战愿望。从那以后，战争像洪水般蜂拥而至。

军队中的一年分为7个月的夏季集训和5个月的冬季休假，每位军官有固定的连续两个半月的休假。我所有的钱都花在打马球上了，无钱去狩猎，所以只好看看世界上有没有可以找到刺激和冒险的地方。整个世界太平日久，地球只有一小块地方不安宁。据说，西班牙人和古巴反抗者之间旷日持久的游击战进入一个非常严峻的阶段。西班牙人的司令是著名的马丁内斯·坎波斯元帅<sup>①</sup>，此人因征服摩尔人以及对西班牙人发表过文告而闻名于世。此人已被派往这座反叛之岛，西班牙政府正迅速把8万援军运过海，企图平息古巴的反叛。古巴战争正在进行。小时候我就考虑过战争和士兵问题，常在梦中想象第一次参战的感觉。我小时候认为，到处听到子弹的呼啸声、时刻冒着死亡和负伤的危险一定很刺激、很了不起。现在，既然自己已承担了军人的职责，我想最好能够私下进行一次预演，尝试一次，看我是否能经得住这种考验，因此，我把视线投向了古巴。

---

<sup>①</sup> 马丁内斯·坎波斯，西班牙陆军大臣和政治家。

我把想法告诉了我的好友雷金纳德·巴恩斯少尉,我发现他也很想去,此人后来长期在法国指挥骑兵师。上校乃至全团上下都赞成我们在战争中找到一席之地的想法,大家都认为这样做几乎跟一次重要的狩猎活动一样好;上尉及其以下级别的军官如果没有参加过狩猎就不会受到别人的尊敬。一想到这一点,我便给父亲的老朋友,当时的英国驻马德里大使亨利·沃尔夫爵士写信,问他能否帮助我们取得西班牙军事当局的许可。这位敬爱的老绅士在英国驻西班牙外交使团中资格最老,他在西班牙王室中的影响是无与伦比的,他为我费尽了心机。不久我们收到了一个包裹,包裹里有官方和私人的介绍信,大使向我们保证,我们一到哈瓦那<sup>①</sup> 就会受到司令官的热情欢迎,并且肯定会目睹一切。于是,我们于1895年11月初乘船到纽约,然后转往哈瓦那。

这一代人遭到过战争的摧残,疲于战争,厌倦战争,他们也许不会理解一位长期生活在和平年代的年轻英国军官接近真正战场时的迫切心情。凌晨天色刚亮,古巴的海岸从深蓝色的地平线上慢慢地展现在我的眼前,我有一种与希尔弗<sup>②</sup> 船长一起航海、第一次看到金银岛的感觉。这里的确有重大事件发生,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我也许会牺牲在这里。这些念头在吃早饭时消失了,在匆匆上岸时全被我抛在了脑后。

古巴是一个美丽的岛屿,难怪西班牙人称之为“安的列斯群岛之明珠”。此地气候温和,降水充沛,植被茂盛,土壤肥沃,景色十分迷人,这一切不由使我责怪我们的祖先心不在焉,白白地让这块肥肉滑到了别人的手里。不过,我们现在的民主政府已

---

① 古巴首都。

② 希尔弗为英国小说家史蒂文森的小说《金银岛》中的人物。

经继承了不少遗产，能否守得住这些遗产取决于我们。

35年前的哈瓦那城和哈瓦那港尽管没有现在这么辉煌，但在各方面都相当壮观。我们下榻在一家相当好的旅馆，吃了大量的橘子，抽了许多雪茄，随后把我们的证件呈交给当局，一切顺利。我们把信函呈交上去之后立刻就被看成是强大盟国在紧急时期派来的非官方但很重要的代表。我们越是想低调处理我们来访的性质，他们越是赞扬我们来访的潜在意义。司令正在视察各处的营地和要塞，但一切安排正如我们所愿。我们将在圣克拉拉见到元帅，乘车前往那儿是可行的，因为火车有装甲，首尾两节特殊车厢里面有卫队，车厢的两边还有坚硬的钢板保护，一旦有炮火攻击，你只要趴在车厢地板上就能安全到达目的地。我们于次日启程前往圣克拉拉。

马丁内斯·坎波斯元帅友好地接待了我们，然后把我们交给他的一位参谋。这位参谋是一位年轻的中尉，是得士安公爵的儿子，名叫胡安·奥唐奈，他的英语讲得相当棒。对这个名字我感到很惊讶，后来才得知，很久以前此名就变成了西班牙语。奥唐奈向我们解释道，如果我们想看打仗的话，我们应该参加机动纵队，这支纵队已于当天上午在巴尔德斯将军的带领下从圣克拉拉出发，赶往40英里以外被叛军占领的圣斯皮里图斯镇，可惜我们没赶上。这支纵队才走了1天，所以我们提出要求，想赶上他们。年轻的西班牙中尉摇摇头说：“你们走不出5英里。”我们问：“那么，敌人在哪儿？”他说：“他们神出鬼没，50个骑兵想去哪儿就能去哪儿，而两个人哪儿也不能去。”但我们还是有可能赶上巴尔德斯将军的，我们必须乘火车到西恩富戈斯，然后坐船去图纳。他说，从图纳到圣斯皮里图斯的铁路线有坚固的碉堡防卫着，因此军车能顺利行驶，这样我们可以在3天之内行驶150英里，到达圣斯皮里图斯，而巴尔德斯将军的部队要到第四

天晚上才能到达那儿，在那儿我们可以加入他们的纵队，参加以后的战斗。他们会给我们备好马和勤务兵，将军也会欢迎我们去当参谋的。

我们一路有惊无险，最后终于到达圣斯皮里图斯。这个镇是个小地方，卫生条件极差，到处流行天花和黄热病。我们晚上住在一家又脏又吵又挤的小旅店，次日晚巴尔德斯将军率部开进了小镇。这支部队相当强大，有4个营3000名步兵，2个骑兵中队，还有1个炮兵连。士兵看上去都很强壮，没有一个被行军拖垮。他们身穿棉军服，这些军服本来是白色的，沾上了灰尘泥土后变成了土黄色。他们背着很重的背包，腰间挂着两排子弹带，头上戴着巴拿马草帽。他们受到镇内友军的热烈欢迎，当地居民似乎也欢迎他们。

过了一会儿，我们到司令部去会见将军，他早已读过推荐我们的电报，十分热情地欢迎我们的到来。苏亚雷斯·巴尔德斯是师级将军，他率部在叛乱地区进行两个星期的行军有两个目的，一是检查西班牙人驻防的小镇以及要塞，二是随时随地打击敢于露面的叛乱者。他通过一名翻译向我们表示，给他派来两位强大的友好国家的杰出代表使他深感荣幸，他十分珍视大不列颠帝国所给予的道义上的支持。我们通过翻译对他表示感谢，并说我们相信在这儿一定会很愉快。翻译把这句话译得相当好，将军听了很满意。后来他宣布黎明出发；小镇到处是病，若非迫不得已，他1分钟也不愿多呆下去。天亮之前会有人把我们的马备好。他还邀请我们共进晚餐。

瞧，次日凌晨我是多么兴奋啊！还是夜里，但天空已经发白。我们就像是在一位名气不大却富有智慧的作家所说的“昏

暗神秘的黎明之神殿”<sup>①</sup>里。我们身穿军服，骑在马上，腰间挎着子弹上了膛的左轮手枪。昏暗中，全副武装的军人排着长长的队伍，向敌占区挺进。敌人也许就在附近，也许正在1英里之外埋伏着，对此我们一无所知。对敌友双方的素质我们同样不甚了解。我们与他们之间的争吵没有任何关系；除了不得不自卫，我们不能参加他们的战斗。但我们觉得这是我们一生中最伟大的时刻，事实上这确实是我们一生中所经历的最精彩的时刻之一。我们认为会有事情发生，我们盼望发生点什么事，但同时又希望自己不要受伤或牺牲。我们到底想得到什么呢？我们想要得到的是年轻人的诱惑——冒险，为冒险而冒险。经济拮据，还要旅行到万里之外，早上4点起床，只是因为希望和一群陌生人投入战斗，你也许会认为这太蠢了。这种做法当然不太理智，可是，我们很清楚，英国军队里有很多下级军官都宁愿拿出一个月的薪水以换取我们的机会。

然而，什么也没发生。天渐渐亮了起来，西班牙军队像一条长蛇，在无边无际的森林里和跌宕起伏的大地上蜿蜒前进。湿漉漉的大地在阳光的照耀下闪闪烁烁，流光溢彩。将近九点时我们行军约八英里，来到一片空地上，上面传令停止前进，准备吃早餐和午休。早餐是重要的一餐，步兵们生火煮饭；战马卸下马鞍，放在一旁吃草；咖啡和杂烩被端上了桌，供全体参谋人员用膳。这很像野餐。将军的副官拿出一个长金属瓶，瓶里装着饮料，他说是“朗可特酒”。我对这个说法记得很清楚，但直到最近几年我才搞清楚这个词的意思，这种饮料其实就是用朗姆酒调成的鸡尾酒。不管它叫什么名字，这种饮料十分好喝。这时树间已挂起了吊床，我们奉命上吊床休息，而士兵和团里的军官

---

① 语出麦凯的《印度的二十一天》。——作者原注

在采取必要的防备措施后躺在地上休息，大家在树阴下睡了约四个小时。

下午2点午休结束，静悄悄的露营地地上开始忙乱起来。到了3点，我们又上了路，以每小时不少于2.75英里的速度行进了4小时。夜幕降临时我们到达了夜营地。当天，这支纵队行军18.19英里，而步兵根本不觉得疲乏。他们是能吃苦耐劳的西班牙农民的儿子，大地之子，他们能够以惊人的毅力背负着沉重的装备在羊肠小道上跑步。长时间的午休对他们来说顶得上一夜的休息。

我确信罗马人的作息时间要比我们安排得好得多，他们一年四季都在黎明前起床，而我们除了战争时期从未见过黎明，有时我们能看到日落，而日落意味着悲伤，黎明意味着希望。午休和午睡要比夜间的休息更能使人恢复体力、振奋精神，我们不是生来就能从早上8点工作到深夜或玩到深夜的，我们整天把弦绷得很紧是不合理的，没有远见的。无论是做正事还是消遣，是干体力活还是脑力活，我们都应该把我们的时间和进度分成两部分。大战期间，我在海军部工作时，发现午餐后睡1小时能够使我每天多干近两个小时的工作。拉丁人的生活方式比我们盎格鲁撒克逊人的生活方式更合理，更接近自然，不过，他们有比较优越的气候条件。

按照这种作息时间，我们走了好几天，穿行在风景宜人的乡村，没有看到也没有听到任何战争的迹象和消息。同时，我们跟我们的西班牙主人相处得相当友好。我们都结结巴巴地用法语交流，虽然观察问题的角度不同，但我们能设法理解他们的观点。比如，参谋长本索中校有一次说：“我们打这场战争是为了维持我们国家的尊严。”他这样说使我很有感触。由于所受教育有限，以前我从未意识到其他国家也有这样的意识，只知道我们

英国人受到的教育要求我们有如此意识。看来他们对古巴的想法就跟我们对爱尔兰的想法一样，这一点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这些外国人对其国家和殖民地竟然持有与我们一样的观点，而且用以表达这种观点的语言也与我们如出一辙，好像他们就是英国人，脸皮太厚了，不过，我接受了这个事实并牢记在心。在此之前，我(私下里)还同情那些反叛者，至少同情他们的反叛；而今我开始能想象，如果西班牙人失去美丽的“安的列斯群岛之明珠”，他们会有多么的伤心，我为他们感到难过。

我们看不出他们如何能赢得这场战争。想想看，每个纵队有近 4000 人在无边无际的潮湿丛林里漫无目的地瞎撞，每小时的花费是多么巨大啊。在古巴大约有十二支这种规模的西班牙纵队，还有众多小规模纵队，都在不停地行军。各个营地和要塞以及铁路线两侧的碉堡内驻扎着近二十万西班牙军队。当时的西班牙并不富裕，我们知道，西班牙政府为供养 5000 英里以外的大洋彼岸的 25 万大军肯定要付出极大的代价和牺牲，这就像伸长胳膊举一只沉重的哑铃。而敌人如何呢？我们根本看不到他们，我们甚至连一声枪响都没有听见，但他们的的确确存在。西班牙军队采取周密的防备措施并不断增强兵力都是因为常有灾难发生。在深山老林里到处都是成群结队的衣衫褴褛的当地人，他们有足够的枪支弹药，尤其可怕的是他们每人都备有可怕的“大砍刀”。对他们来说，战争代价只须付出贫穷、危险和痛苦，而他们从来不缺乏这些东西。现在轮到西班牙人在游击战中到处吃败仗了，他们就像当年的拿破仑卫队，一队一队地、日复一日地在半岛上移动，到处都充满了神秘莫测的敌意，随时可能遭到猛烈的痛击。

11 月 29 日晚，我们在防卫森严的阿罗约布科村过夜。我们派出 2 个步兵营和 1 个骑兵中队跟随护送队到几个要塞去送

食品,其他还有约 1700 人寻找敌人,伺机战斗。这年的 11 月 30 日是我的 21 岁生日,当天我第一次听到了愤怒的枪声,听到子弹射进人体和在空中的呼啸声。

我们凌晨出发,地面上有一层薄雾,突然队伍后面响起了枪声。当时交战中的双方靠得很近,而且使用的是大口径来福枪,因此枪声震耳欲聋,硝烟和子弹出膛时的火光清晰可见。枪声似乎只有一弗隆<sup>①</sup>之遥,十分刺耳,很吓人。因为子弹没飞到我身边,我很快就安心下来。我觉得自己很乐观,“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薄雾中什么也看不见,过了一会儿,雾开始散去,我们发现我们正穿行在森林中的一片空地上。这是一条军用路,大约有 100 码宽。我们沿着这条路走了好几个小时,路上灌木丛生,于是军官们抽出砍刀,砍掉树枝;或者闹着玩,劈开长在树上的多汁的果实,冰凉的清水流下来,滴在那些不留神的人身上。

这一天,停止行军准备吃早饭时,大家都坐在自己的马旁边,吃自己口袋里的食物。我分到了半只瘦鸡。我正在啃鸡腿时,突然从森林边缘劈面射来一阵激烈的子弹,我身后的一匹马立刻跳了起来,但这并不是我的马。人群中出现了一阵骚动,一队士兵冲向枪响的地方,结果只发现几个空子弹盒。这时我一直在想那匹受伤的马,那是一匹栗色马,子弹射中其肋骨,血直往地上滴,伤口四周有一圈大约一英尺宽的深红色血迹。马牵拉着脑袋,没有倒下,但它快死了,马鞍和缰绳都已经被卸下来了。看到这一切,我不禁想到了射中这匹栗色马的子弹,子弹肯定是从离我的脑袋不到一英尺的地方飞过去的,因此可以说我经历了“枪林弹雨”。这倒有点意思,不过,我由此对我们的冒险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

<sup>①</sup> 英国长度单位,一弗隆等于八分之一英里。

第二天一整天我们都在追踪寻敌。以前走过的树林看上去有点像英国丛林，现在眼前是一片棕榈林，这种棕榈树下粗上细，大小不一，千姿百态。在这片棕榈林中走了三四个小时之后，我们又走到了一片开阔地。涉水过河后我们在一间简陋的茅屋附近停下来过夜。地图上竟有这间茅屋的名字！天很热，我和我的同伴说服两位比较年轻的参谋跟我们一起到河里洗澡。这条河从三面环绕着我们的宿营地，河水清澈、温暖，十分舒服，四周风景怡人。我们上岸穿衣时突然听到不远处传来一声枪响，后来又传来两声，最后枪声响成了一片。子弹“嗖嗖”地从我们头顶飞过，敌人显然正在进攻。我们赶紧穿好衣服，沿着河往回走，尽量显得从容不迫，最后终于回到了将军的司令部。当时，半英里之外正发生小战，子弹“嗖嗖”地飞落在营地上。反叛者的武器主要是雷明顿步枪，西班牙部队用的则是冲锋枪；雷明顿步枪的闷响与冲锋枪“嗒嗒”的脆响形成奇异的对比。约半小时后，反叛者打够了，抬着死伤的同伴撤退了。但愿那些死伤者有人照应。

我们在走廊上安心地吃了一顿饭，随后到小茅屋里的吊床上睡觉。不一会我就被枪声惊醒了，枪声零星响起，有时响成一片，在夜间回荡。一颗子弹掀起了茅屋顶，另外一颗子弹打伤了门外的一名勤务兵。我很想从吊床上跳下来，趴在地上，但一看其他人没有动弹，我想我也最好呆在原地不动。我给自己打气，因为在我和敌人的子弹之间的那张吊床上睡着一名大块头西班牙军官，此人可以说很胖。我对胖子向来没有成见，至少我没有因他饭量大而怨恨他。想着想着我就睡着了。

遭到一夜的骚扰之后，我们纵队第二天一大早就出发了。在薄雾掩护下，反叛者的狙击手等我们一过河就向我们射击。敌人在我们面前不断后撤，依仗各种有利地形向我们开火。虽

然被击中的人不算多，但子弹在长长的纵队间飞窜，使每个行军者都如履薄冰，这种行军实在是惊心动魄。8点钟，西班牙部队的队首走出了凹凸不平的地域，进入开阔的平地。草地上有一条宽路，路的一边是铁丝篱笆，另一边是一排矮树。这条路始于大平原的一侧，穿过平原，直通敌人的防线。路的两旁长着大片的齐腰深的荒草，半途中，大约有一英里左右的前方，路的右边有一片约有百棵棕榈树的小树林。大路尽头的右边有一列低矮的小山，山上到处有栅栏，山后是茂密的森林。这儿就是敌人的阵地。将军决定立即发起进攻。

战术相当简单。等西班牙部队的先遣营走出凹凸不平地域之后，派两个连从两侧包抄，骑兵队移到路的右边，炮兵居中。将军和参谋人员以及两个英国客人则跟在战线的后面，相距约五十码。第二个步兵营以连为单位排成纵队跟在大炮后面。一直走了300码，没有发生枪战。这时，远处的山顶上冒出阵阵浓烟，紧接着传来了阵阵枪声，随后，敌人的火力连续起来，敌阵上左右开弓。西班牙步兵开始边攻击边前进，双方的火力都很猛。我们的四周不断传来各种声音，如叹息，如口哨，如大黄蜂的嗡嗡声。将军及参谋人员一直向前，直到离浓烟中的栅栏只有四五百码远才停下来。我们停止前进，没有任何掩护地骑在马上，观看步兵进攻。这时，空中到处是子弹的“嗖嗖”声，被子弹击中的棕榈树发出噼里啪啦的声响。西班牙人精神抖擞，我们也不得不壮着胆子挺起胸。这种场面的确很危险，然而乱枪中的死伤人员并不多，我十分诧异。我们这一群人有20人，受伤的马和人加起来才三四个，无一人死亡。令我欣慰的是，西班牙军队的毛瑟枪阵阵齐响占了优势，反叛者的枪响渐渐减弱，最后全部停止了。不一会，我看见反叛者匆匆忙忙地躲进树林里，然后一片寂静。步兵继续前进，占领了敌人的阵地，乘胜追击是不太可

能的,因为丛林无法通过。

我们只剩下一天的口粮,只好从平原上撤回。西班牙人保全了荣誉,我们也满足了自己的好奇心,于是西班牙纵队回到海岸,我俩则返回英国。我们认为西班牙人是不可能很快结束古巴战争的。

## 豪恩斯洛

1896年春，第四轻骑兵团向豪恩斯洛和汉普顿宫开拔，准备秋天乘船赶往印度。在豪恩斯洛，我们把马让给了刚从前线归来的部队，于是，我们的骑兵训练到此结束了。我们轻骑兵团将在东方驻扎12年到14年，大小军官都放了长假，以便处理各自的事务。在我们与战马告别之前，我们在豪恩斯洛举行了最后一次阅兵式。在阅兵式上，任期已满的布拉巴宗上校作了一次军人式的简短发言，跟我们告别，他的发言十分出色。

在6个月的假期里，我过得十分惬意，实际上这几个月是我一生中仅有的一段闲暇时光。我住在家里，跟母亲呆在一起，每周乘地铁去豪恩斯洛军营两到三次。我们在赫尔林姆和雷纳马球场打马球，当时还没有罗汉普顿马球场。我有5匹相当不错的小马，而且都有培养前途，我尽情地享受伦敦的生活。当时的英国社会古风犹存，它是一个极其辉煌、极其强大的实体，自有一套行为规范准则及其实施办法，这一切现在早已被人遗忘了。在伦敦，大家相互几乎都十分了解。多少年来，统治英国的几百个大家族亲眼看着英国一步一步地走向辉煌的顶峰，这些大家族相互联姻，关系错综复杂，大家到处都会遇见朋友和亲戚。英国社会里的头面人物在议会里大多也都是重要的政治家，在赛马场上也是风云人物。索尔兹伯里勋爵有一个原则，纽马克特有赛马时，他从不召集内阁开会；下院也有一个惯例，只要德比

有马赛,就休会。当年,兰斯多恩大厦、德文郡大厦、斯坦福大厦常常举行盛大的晚会,参加晚会的大都是兴致很高、地位显赫的社交界人物,这些人与议会以及军政要员的关系都很密切。现在兰斯多恩大厦和德文郡大厦都变成了旅馆、公寓和饭店;斯坦福大厦变成了世界上最丑陋的博物馆,其暗淡的沙龙成了社会主义政府公务接待的场所。

但是,直到1896年,伦敦还未出现这种变化迹象,相反,人人都向往着来年的钻石大庆<sup>①</sup>。我从一个热闹的社交场所玩到另一个场所,在这些富丽堂皇的地方和豪华大厦里愉快地打发周末。这些地方的主人都和大英帝国的辉煌历史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我曾见过这已逝去的世界,哪怕为期只是短短的几个月,为此我感到十分荣幸。1897年,德文郡的公爵夫人举办过一次化装舞会,这场舞会我至今仍历历在目。迪斯累里曾在其小说里以浓墨渲染过舞会场面,这次舞会又重演了迪斯累里所描写的场景:夏日之夜的格林公园里人山人海,前来观看的来来往往的客人,听听舞曲,或许也在沉思当时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巨大差别。

1920年,保罗·康本结束了他长期出使英国的外交生涯,他屈驾光临我家,与我们共进午餐。我们的谈话围绕我们所经历的大事件以及从本世纪初一直到当时全世界所走过的历程。这位年迈的外交官说:“我在英国呆了20年,亲眼目睹了英国发生的革命,它比法国大革命更深刻、更彻底。统治阶级几乎完全被剥夺了政治权力;在很大程度上,他们的财产和土地也被剥夺了。这种革命在不知不觉中完成了,在这一过程中没有一个人丧生。”我想他的话是对的。

---

<sup>①</sup> 指1897年英国维多利亚女王即位60周年紀念。

\* \* \* \* \*

莉莲是我叔叔马尔伯勒公爵八世的遗孀，是一位美国海军准将的女儿，她结婚早，十分富有。最近她第三次结婚，嫁给了威廉·贝雷斯福德勋爵，他是沃特福德勋爵三兄弟中最年轻的一位。三兄弟都是名人，老大查利是著名的海军上将；老二马库斯在上流社会和赛马场上名望很高；老三“比尔”是一位勇士，在祖鲁兰<sup>①</sup> 战争中获得过维多利亚十字勋章<sup>②</sup>。我一生中与他们一直有联系，直至他们去世。

威廉勋爵和公爵夫人莉莲老年结婚，但他们的结合非常幸福，婚后过着富足美满的生活，他们住在多金附近的美丽的迪普顿，经常邀请我去他们那里。我十分喜欢比尔·贝雷斯福德，他似乎具有能使一个下级骑兵军官着迷的各种素质。他老于世故，熟悉俱乐部区<sup>③</sup> 和上流社会的方方面面。在达弗林勋爵和兰斯多恩勋爵先后担任印度总督时，他们为他做军事秘书多年。他是一位运动员，一生与马相伴，他喜欢打马球、猎野猪、赛马，也狩猎各种大动物，这些运动是他一生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年轻时在第十二轻骑兵团任职，赢过一次大赌注。晚饭后他从奈茨普里基的布鲁斯军人食堂步行到豪恩斯洛骑兵团营，在那儿逮到了第十轻骑兵团养的一只獾，装在袋子里扛回奈茨普里基。相对于其间的距离，他所用的时间出奇的短。在运动以及运动赌博方面，没有什么是他没尝试过的。他先后参加过三四次战

---

① 南非东部地区。

② 英国授予“对敌勇敢”有杰出功勋的军人的最高奖赏。

③ 位于伦敦圣詹姆斯宫附近，很多俱乐部集中于此。

争,并曾冒着生命危险从祖鲁人的刀口和弹雨中救出过一位同伴。虽然他对公众事务的观点带有官方色彩,但还是很实际的;在行为和礼仪问题上,他的观点有绝对权威。

我常去迪普顿,因为那儿既舒适又豪华。对于他那充满智慧的谈话,我是百听不厌,我也乐于讲出我的想法。他说文明的民族之间再也不会出现战争了,这个观点我一直牢记在心。他说:“我常看到有些国家之间快要打起来了,但总会有什么事情让他们撤兵。”他认为世界变得越来越理智,文明国家之间不会再发生这种可怕的事情了。我并不认为这种观点是绝对的,但我经常考虑它。有三四次,战争谣言四起,我自己总是想到比尔的观点,最终我看到这个观点三四次都被验证了。这观点是维多利亚时代生活的真实写照,然而,威廉·贝雷斯福德及其同辈人没有想到,后来的世界竟然会陷入如此可怕的困境之中。

1896年,我在迪普顿第一次遇见宾登·布拉德爵士。在印度边境上,这位将军是最受信任、最有经验的指挥官之一,他是比尔的终身朋友。1895年秋,他成功地攻克了马拉根德关口<sup>①</sup>,现在刚刚回国。如果印度边界再发生什么骚乱的话,他一定会重掌指挥大权,他手中握着开启未来欢乐的钥匙,我和他成了好朋友。在一个阳光灿烂的星期天早晨,将军在迪普顿暖洋洋的草坪上对我许诺,如果他能重返印度边界指挥战斗的话,他会让我跟他一同去。

我在迪普顿有过一次令人烦恼的经历。我应邀参加一次为威尔士亲王举办的周末晚会,这对一个少尉来说是莫大的荣幸。布拉巴宗上校也在受邀请之列。我清楚,自己必须好好表现,要守时、谦恭、矜持,总而言之,我必须把自己所有的良好素质全部

---

① 位于现在的巴基斯坦境内。

表现出来。我本该乘 6 点钟开往多金的火车，而我却决定乘 7:15 的那班火车。一切进展顺利，但到旅程过了一半时我意识到自己注定要迟到，赶不上晚宴了。火车应该在 8:18 到站，下车后还要坐 10 分钟的车，所以我只好提前在火车上更衣，与我同车厢的那位绅士对此十分关注。可是火车实在太慢，每次停靠站台时都要耽搁几分钟，而且每个小站都停。到多金时已是 8:40 了，我赶忙从车厢里跑出来，发现月台上站着一名仆人，已经等得不耐烦了。我跳进四轮马车，只见马车夫催马飞奔，心中暗想，在终点等待着我的肯定是一次严重的危机。不过，我想，“我会悄悄地溜进去，坐到餐桌边，然后再作道歉。”

我到达迪普顿后发现大家聚集在客厅，晚会除了我之外似乎只有 13 人。众所周知，当时英国王室最忌讳 13 个人坐下来吃饭。威尔士亲王直截了当地拒绝进餐，也不允许重新安排两张桌子；他一贯守时，8:30 准时到达。而现在已经是 8:48 了。大客厅站着经过精心挑选的贵客，大家情绪都很差；我只不过是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只是因为对他们特别关照我才有幸前来，但我却姗姗来迟。当然，我有一个绝好的借口，我后来不止一次用过这个借口，但当时我却并没有马上解释！我忘了借口，只是吞吞吐吐地道歉，走到威尔士亲王面前鞠了一个躬。他用极其严厉的口吻问道：“温斯顿，难道他们没有在团里教你们干什么都要准时吗？”说完，瞪了正皱眉的布拉巴宗上校一眼。这一刻实在可怕！我们两个人并排走进餐厅，坐下来正好 14 个人。威尔士亲王天生心地善良，大约一刻钟后，他和蔼可亲地跟我开了一句玩笑，打消了我的顾虑。

我认为迟到的确是个恶习，我一生中都在想方设法与这种恶习决裂。几年后韦尔登博士曾给我写过一封信，信中说：“如果有谁在同一天的每次约会中都要迟到 10 分钟的话，我绝对搞

不懂这种人的观点。”我完全赞成。如果想避免不守时,唯一直截了当的做法是回掉一两个约会,节省时间准时赶赴其他约会,但是很少有人能下决心做到这一点。你宁可拒绝1个名人的邀请也千万不要让9个人在沉闷的客厅里等你等得心焦。

\* \* \* \* \*

1895年12月,南非发生了一件事,当我回顾我的人生旅途时觉得这件事似乎是个祸害。当年的夏天,保守党获得了150个多数席位,因此索尔兹伯里勋爵重新上台执政,期望能有7年任期。他给自己定了一个主要任务,那就是洗雪格莱斯顿政府败于非洲之耻:一是戈登将军于苏丹被谋杀,格莱斯顿政府威风扫地;二是英军于马久巴山败于南非而投降。索尔兹伯里首相十分小心地采取了缓慢稳妥的步骤来解决这两件事;他谨慎地推进欧洲和平,保持国内安定。当俄国在远东的扩张威胁到英国的利益和日本的生存时,他居然愿意撤退,听任俄国命令英国在中国的舰队撤出亚瑟港;他竟然能容忍当时反对党对其优柔寡断的嘲讽。当美国就委内瑞拉发出奥尔尼照会(实际上是最后通牒)时,他竟然不愤慨,反而给了温和的回答。他一切都是为了大英帝国,一心只想解决英国与苏丹和德兰士瓦殖民地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张伯伦也十分活跃。从1886—1892年,张伯伦曾支持索尔兹伯里勋爵执政。张伯伦锋芒毕露,于1895年把刚执政不久的自由党人赶下了台。他后来决定参加索尔兹伯里首相的新内阁。在维多利亚中期,人们认为殖民事务部地位不高,然而这个部到了张伯伦手里却成了国家政策的主要工具。

索尔兹伯里首相在喀土穆<sup>①</sup>和哈里发谈判以及在比勒陀利亚<sup>②</sup>和克留格尔总统进行谈判时,发现这位来自伯明翰的激进的帝国主义者南非问题是他的坚强后盾。

在南非问题中,除了这些个人因素外,南非问题的局势一点一点地迈向危机。几年内,南非河边高地<sup>③</sup>深层采金业的发展使约翰内斯堡不仅在英国乃至世界的金融和经济事务中成为一个令人瞩目的因素。布尔<sup>④</sup>农民本来一直满足于在其祖先所移居的荒凉地区过着田园生活,现在却发现自己拥有大量金矿财源,应该为迅速增长的多民族的现代城市的繁荣兴旺负责。比勒陀利亚出现了一个强大的、能干的、野心勃勃的政府,在南非地区,它成为吸引荷兰移民群体志向的磁石,它通过向金矿征税来供养自己,它竟然与荷兰和德国搭上了关系,寻求欧洲人的支持。最为重要的是,它拥有一支不可估量的战斗力,五六万凶猛的、心胸狭窄的、有偏见的、虔诚的布尔农民组成了一支精干的持枪骑兵,自蒙古人之后,他们是最有战斗力的骑手。

约翰内斯堡的新居民被称为外族人,主要是英国人。他们对布尔政府糟糕腐败的管理十分不满,对其不断征收沉重的赋税更为不满,于是他们老调重弹,声称“我们在政府内没有代表,就不应征我们的税”。他们要求有选举权。但是他们人数众多,一定会把布尔政府选下台,取得德兰士瓦的统治权。这一权力是布尔人好不容易于1881年从英国人手里夺回来的,所以约翰内斯堡这外族人的正当权利绝不可能被承认。

---

① 苏丹首都。

② 南非首都。

③ 指德兰士瓦的约翰内斯堡市附近的产金丘陵。

④ 南非荷兰移民的后裔。

张伯伦捍卫约翰内斯堡的外族人的权力,索尔兹伯里首相紧随其后。不管从理论上讲还是出于民主的目的,这件事都是一边倒,外族人有理。但是不管你多么有理,你也无法说服一个人放弃其最珍贵的东西,不管新居民人数有多少、势力有多大,德兰士瓦的老居民都不会放弃其自治权,哪怕是一点点也不行。他们决心通过征税以获得必要工具和手段使外族人俯首称臣。如果他们之间的争执导致战争,克留格尔总统及其同僚们看不出欧洲有什么理由不站在他们一边,也看不出他们为什么不能成为全南非的主人。他们也有理。英国人长期挑拨布尔政府与其当地臣民和仆人之间的关系,为了避免英国人的统治,他们不是已经迁到了不毛之地了吗?如果英国人像波士顿茶党<sup>①</sup>那样蛮不讲理,那么布尔人也可以像美国南北战争中的南方奴隶主一样我行我素。布尔人声称,英国的帝国主义者为了抢夺金子,对布尔人步步紧逼,竟然向他们最后的避难所伸出了手。张伯伦竭力反驳道,布尔十分之九的财富是具有现代化生产能力的外族人创造的,然而布尔政府却拒绝给他们民权,因为布尔人害怕他们再也不能虐待卡菲尔人<sup>②</sup>了。可恶的争吵!

赛西尔·罗德斯<sup>③</sup>是渣打公司的董事长和创始人,在荷兰人的大力支持下当上了开普殖民地的总理。詹姆森大夫是该公司的一名管理人员,此人性格刚毅、很爱冲动,他在马弗京召集

---

① 为反对英国国会通过的征收高额茶税的《茶叶条例》,波士顿居民于1773年12月16日夜间伪装成印第安人,将波士顿港内载有东印度公司运往美国倾销的茶叶倒入大海。后英国国会通过了一条惩罚性法案,规定在赔偿茶款以前封锁波士顿的海上贸易。

② 卡菲尔人是对居住在南非东开普省的逢多人和科萨人的统称。

③ 赛西尔·罗德斯,南非金融家和政治家。

了一支六七百人的队伍。如果外族人为了夺取人权和政治自由而发动叛乱,如果有必要且罗德斯同意、英国政府赞成,他可以带领这支军队从马弗京出发,急行 150 英里,挺进约翰内斯堡,阻止不必要的流血。无巧不成书,此时约翰内斯堡真有密谋,外族人准备以武力争夺公民权。经费不成问题,因为参与密谋的人包括主要的金矿矿主。总的说来,他们得到了大部分矿工以及住在约翰内斯堡的非荷兰人的支持,尽管这种支持并不是很热情,在人数上,他们远远超过了住在德兰士瓦的布尔人。4月的一天早晨,约翰内斯堡成立了一个临时政府,于是詹姆森大夫带领 700 名人马和 2 门炮,穿过草原,直奔约翰内斯堡。

这件事震撼了欧洲,震惊了世界。德国皇帝给克留格尔总统发了一份电报,并命令正在附近的德国海军在迪拉果河湾登陆。英国受到了各国的强烈谴责。早有准备的布尔人部队轻而易举地包围了詹姆森大夫的队伍,经过激烈的战斗,詹姆森大夫被迫率部投降。这时,德兰士瓦大部队镇压了约翰内斯堡的叛乱,逮捕了所有参与叛乱的领导人及富翁。当詹姆森发动袭击的消息一传到英国,他的行为立即遭到英国政府的否认。在开普敦<sup>①</sup>,赛西尔·罗德斯草草说了一句,“他打乱了我的计划。”索尔兹伯里首相不慌不忙地用其强有力的外交手段平息了公愤。那些已被判死刑的约翰内斯堡叛乱头目获准用大笔钱赎身。詹姆森手下被布尔人引渡到英国审判,总指挥及军官们受到审判,被判 2 年监禁。

在自由党的监督下,人们进行了一次严格的调查,以查明张伯伦、罗德斯跟此事是否有牵连。这次调查花了很长时间,最后却毫无结果,不了了之。但这件事带来了一系列严重后果,英国

---

① 南非西南部港市。

在世界上的声誉受到了严重损害，荷兰人推翻了赛西尔·罗德斯在开普殖民地的统治。英国人把德国皇帝的电报看成是敌对情绪的展示，并对此耿耿于怀；德国皇帝面对英国的海上势力则感到自己完全处于劣势，把注意力转向了德国舰队的建立。南非政治再也不平静。英国殖民者指望大英帝国的援助，而荷兰人则聚集在两个布尔共和国的旗帜下。遭受这番挫折后，英国政府团结了起来，而德兰士瓦人变本加厉地对外族人征税，并购买武器，大肆武装自己。冲突之火燃烧了起来，只有更加有力的裁决才能解决这场争端。

在那个多事之夏，母亲经常邀请两党中的政治家、文艺界的著名人士以及一批俊杰英才到家里。有一次，她大度得过了头，约翰·威洛比爵士参与过詹姆森大夫事件，当时正保外候审，他是我们家的老朋友，正是他教会了我如何用玩具骑兵排兵布阵。有一天，我从豪恩斯洛回来，发现他早就到了我家，当时母亲还没有回来，这时门突然开了，仆人通报约翰·莫利来了。我立即意识到有麻烦了，但只能壮着胆子为他们相互引见，别无他法。约翰·莫利停下，僵硬地鞠了一躬，并没有伸出手来；威洛比对此不屑一顾。我心里十分不安，只有轮番跟他们讲一些客套话，制造谈话的气氛。母亲一会就回来了，我如释重负，她能从容地应付这种尴尬场面。如果没有人提示的话，不会有人发现饭桌上4个人中有两个从不直接交谈。到最后，我觉得他们并不介意相互交谈，但为了各自表明立场，他们不得不僵持下去。我怀疑这是母亲有意安排的，她想缓解由我们都关心的问题引发的困境；她想将詹姆森事件降格为普通政治问题，然而流血事件已经发生，性质就不同了。

当时我正在第二十一轻骑兵团服役，不用说我是完全赞成詹姆森的，我对争端双方的理由一清二楚。我渴望有一天我们

会“雪耻马久巴”。我们的保守党政府在危机时刻竟如此懦弱，我感到十分震惊，当我看到他们屈从于误入歧途的反对党的意见、甚至要惩罚勇敢的袭击者时，我感到羞耻。这些袭击者中的大多数人我都很熟悉。在后来的几年中，我将对南非有更多的了解。

## 印 度

乘船去东方的时刻终于到了，我们乘着载有 1200 人的运兵船，从索斯安普敦启航，航行了 23 天之后，抵达孟买，我们来到了一个异样的国度。

可以想象，我们这一船的官兵在船上闷了近一个月，现在突然见到周围出现了一大片棕榈林和孟买的宫殿，是多么高兴啊。我们隔着舷墙，越过碧波荡漾的海水，注视眼前的美景，大家都想立即上岸，看看印度到底是啥样。对一般旅客来说，烦琐的下船手续要拖很长时间，十分讨厌；对我们这些花皇家经费乘船的官兵来说，上岸手续则更是繁多，耽搁的时间更长。下午 3 点时来了一道命令，说我们将在 8 点钟天比较凉爽时登陆，在这段时间里部分军官可以独自上岸。一群小船一直停在我们船旁，随着水波上下摇晃。我们急不可耐地叫了几条船，一刻钟后我们就到了萨松码头。我很开心，我和两个朋友登上船后，只觉得小船摇晃得很厉害，丝毫不敢大意。我们的船划到一个大石墙边，石墙下是湿漉漉的台阶，还有供人抓握的铁环。船在浪中上下颠簸，落差达四五英尺。我赶忙伸手抓住铁环，但是我还没有站到台阶上小船就晃开了。我的右肩扭伤了，特别疼。我手忙脚乱地上了岸，感叹一番，揉了揉肩膀，一会就把这事给忘了。

在此，我奉劝年轻人一定要谨防肩膀脱臼。在许多事情上，关键是防止第一步的发生。使肩膀脱臼需要相当大的外力；肩

膀一旦脱臼,后果十分严重。虽然我的肩膀当时并没有完全脱位,但我的肩伤让我受了一辈子的罪,使我打马球时力不从心,打网球则根本不可能。在遇到危险和需要用力时,肩伤使我尴尬。从那以后,我的肩部时不时会脱臼,而且往往都是在意想不到的时刻,比如,当我把胳膊放在枕头下睡觉时,从图书馆书架上拿书时,从楼梯上滑倒时或游泳时等等,肩膀往往就在这种时刻脱位。有一次在下院,我挥动胳膊的幅度大了点,肩膀差点脱臼;当时我真担心,如果听众看到正在发言的演说者突然无缘无故地摔倒在地,费力地调整脱位的胳膊,他们一定会很吃惊。

这是一件倒霉事,不过,我是否因祸得福就不得而知了。如果不是因为我肩膀不适的话,在恩图曼战役的冲锋中我也许本该能用刀而不是用现代武器毛瑟枪了;如果我真是用刀的话,故事也许就讲不到这里了。我们必须牢记,不幸的降临很可能会救了你,使你免遭更大的不幸;如果你犯了大错,这个错误也许比经过深思熟虑的决定更使你受益。生活是一个整体,运气同样也是一个整体,它们的任何一部分都与整体密不可分。

让我们再把话题转到印度吧。布拉巴宗上校在其告别辞中称印度为“不列颠王国著名的领地”。我们被送往位于浦那的一个休养营地,夜里很晚才到达。在广阔的平原上有几个很大的双翼帐篷,在此我们度过了在印度的第二个晚上。天一亮,许多文质彬彬、规规矩矩、包着头巾的当地人来到营地求职,申请当管家、男仆和马夫;当时,这些佣人是下级骑兵军官家中的主力军。所有求职者都持有以前驻扎在此的部队所写的证明。简短地客套一番之后,他们便接管了我们的财产,承担起为我们料理日常家务的全部职责。如果你想有人伺候,不想烦家务,30年前的印度是个理想的去处。你只需把你的衣物交给男仆,把马交给马夫,把钱交给管家,就不必再烦心了。这样,你的内阁成

员已齐备了，内阁大臣各司其职，他们经验丰富而且忠心耿耿，做起事来一丝不苟。只要你给他们微薄的工资，说话时客气点，待他们公平些，那么什么事他们都会帮你干。他们的全部生活都围着你衣柜里的寻常衣服以及其他一些小事情转。有了他们的悉心照料，我们不用吃苦，不感到时间难熬，更不会感到有什么危险，我们的生活赛过王侯。

到我们帐篷求职的人当中有两三个马夫牵着供打马球用的小马，并带着他们主人的介绍信。后来来了一位与众不同的男子，他身穿镶有金边的红色礼服，手里拿着盖着大印的信封，他是桑赫斯特总督的信使，前来邀请我和我的同伴雨果·巴林到总督官邸去参加晚宴。当时我们一整天都在训斥我们手下的骑兵，叫他们带上遮阳帽，不要冒生命危险。晚上我们去总督官邸，享受了一次盛宴，喝到了冰镇香槟，我们为女王的健康干杯。晚宴结束后，总督大人亲切地问我对几个问题的看法，我觉得盛情难却，如果不全部回答就太不礼貌了。总督大人就英印事务问了我几个问题，具体是什么问题我现在已经忘了，只记得自己回答得相当全面。有几次他好像很想说出他自己的观点，但我觉得让人为难不太礼貌，他也就不说了。他考虑得很周到，特地派副官送我们回营。总的来说，经过 48 小时周密观察，我对印度有了一个相当良好的印象，我认为，有时人能够一眼看穿这类问题。金莱克曾经说过，“对事物的研究如果过于细腻会使人产生错觉，从而误导观察者的判断，还不如笼统地看一眼，反而能看到真相。”当我们躺下睡觉时，我们能够强烈地感受到英国在印度完成的伟大任务，也能感受到统治这些温顺的未开化民族是英国政府的高尚使命，其目的是为了印度人的福祉，也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利益。没过多久起床号就吹响了，我们必须乘 5:10 的火车去班加罗尔，全程需要 36 小时。

三角形的印度高原十分辽阔，由尼扎姆地区和迈索尔的马哈拉加地区组成。这两个地区的面积相当于一个法国，英国安扎在班加罗尔和锡康德拉巴德的两支卫戍部队维持着这个地区的安宁。这两支部队各有二三千英国士兵，每支部队还有 2 倍于英军人数的印度兵，因此，如果要进行训练和演习，总能找到足够的人马。按惯例，英军营房总是安扎在离其防守的人口众多城市五六英里处，其间安扎印度兵营房。英国军队住在既宽敞又凉爽的有廊柱的营房里，有足够的时间和空间去从容不迫地运筹帷幄。这里的公路是宽敞的林阴大道，有充足的净水水源，有漂亮的办公室、医院以及其他公共设施，有宽阔的阅兵场，还有骑术学校。这便是白人士兵的集体生活中心。

班加罗尔海拔 3000 多英尺，气候条件不错，虽然白天骄阳施威、炎热难熬，但是除了最热的几个月外，晚上都凉爽宜人。长在大花盆里的欧洲玫瑰香气袭人、千娇百媚；鲜花和野蔷薇争奇斗艳；沼泽地里有许多鹈和蛇；美丽的蝴蝶在阳光下翩翩起舞；婀娜多姿的舞女在月光下风情万种。

军官在营地里没有住所，每个月拿住房津贴。每个月领军饷时，军官们便能拿到一个装着银卢比的大网袋，里面是工资、杂费和住房津贴。骑兵营房外围有一溜孟加拉式的大平房，各家都有圈在院子里的花园。军官们到月底领取了军饷，骑着马慢悠悠地回到家，把钱袋扔给笑眯眯的管家，然后就再也用不着烦钱的事了。不过，除了女王陛下发给我们的津贴外，我们还需要家里额外支持三四倍于津贴的钱。我们军饷是每天 14 先令，另外每个月再发 3 镑以供养两匹战马，此外每年还有 500 镑饷薪，不过要按季度发放，这便是我赖以谋生的全部费用，其余的钱我就得从当地银行家那儿借高利贷了。有人要我们警惕这些银行家，不过，我倒是觉得他们十分和蔼，胖乎乎的，温文尔雅，

相当诚实,不过也十分贪婪。你只需在几张小纸片上签上名即可弄到一匹打马球用的小马,就像玩魔术似的。满脸堆笑的金融家站起来,双手捂着脸,换了拖鞋,心满意足地一溜小跑走了,直到3个月后的这一天才又露面。他们仅收取2%的月息,但因为很少有人赖账,所以他们的日子过得很不错。

我和雷金纳德·巴恩斯以及雨果·巴林三人把所有的钱合在一起,买了一座宫殿似的孟加拉式平房,淡粉红色,重瓦覆顶,几根白柱撑起幽深的门廊,房子四周有紫色的开花植物围成篱笆,院子大约占地两英亩。以前的住户给我们留下了大约150株名贵的玫瑰。我们砌了一个很大的马厩,泥墙瓦顶,能容纳30匹马。我们三个管家们组成了三人管家小组,三人之间从未出现不和。我们三人把等额的钱放进钱罐里之后,再也不烦生活上的琐事,全身心地对付生活中更重要的目标。

这个目标就是马球。除了公务之外,我们所有的兴趣都集中在马球上了,但你必须先有小马才能打马球。在从英国来印度的旅途中,我们团已成立了一个马球俱乐部,所有的军官(无论是否打马球)都定期向俱乐部捐适量的会费,因此为了争取这些必不可少的同盟,俱乐部就得为马球运动员提供争取荣誉的条件!刚从国内来的兵团在两三年内不可能在印度马球竞技场上站住脚,因为备齐像样的打马球的小马需要花两三年的功夫。但是,我们马球俱乐部领导和高级军官经过长时间的激烈讨论之后,决定鼓足勇气,出其不意地搏一回。孟买的拜库拉马场是一个重要马市,阿拉伯的大小马匹都经过这个马市进口到印度。浦那轻骑兵团是一支印度部队,但军官大多是英国人。该团驻地离马市近,占了地利,买阿拉伯马很方便。我们途经浦那时试过他们的小马,然后跟他们进行了重要谈判,最后决定我们团的马球俱乐部把浦那轻骑兵团所拥有的25匹好马全部买下,这

25匹马将是我们团在团际马球锦标赛上取胜的核心力量。我很难描绘,为了这一目标我们是如何紧张地投入这一伟大而又艰巨的任务中。在印度马球赛史上,从来没有一个来自南印度的骑兵团赢得过团际锦标赛奖杯。我们清楚,要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必须牺牲两三年时间,想方设法刻苦训练。如果排除一切干扰,我们不相信不会成功,为了胜利完成这项任务,我们安下心来,全身心地投入到训练中。

当然,我们当时还有很多军事任务。每天早晨天没亮,一个黑影就会用一只冷冰冰潮腻腻的手敏捷地托起你的下巴,用闪亮的剃刀抵住你涂满肥皂泡的、毫无防备的喉咙,这样你就一下吓醒了。6点钟团里出操,我们骑马来到一块开阔地,演习一个半小时,然后回家洗澡,到食堂吃早饭,9点钟去马厩和值班室,一直呆到10:30,在太阳最辣之前回家。在宽大的营地上来来回回的距离很长,步行是不行的,我们骑着马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中午时分,太阳最毒,不到11点,白人全部回宿舍。1:30时我们冒着酷热,一溜烟地冲到食堂吃中饭,然后回来睡觉,一直睡到5点钟。这时驻地又开始热闹起来。此时是打马球的时间,我们一天都在盼望着这一时刻的来临。当时,只要有机会参加练习和比赛,我从不放弃。驻地组织的马球比赛的细则早有规定,一名精明能干的印度小听差把所有军官的名字登记下来,记下他们想参加几局比赛,然后再平衡一下,以便确保“打得最好的人参加比赛最多”。我打马球很少少于8局,常常打到10—12局。

夕阳西下,当斜长的树影覆盖整个马球场时,我们已汗流浹背,精疲力竭,慢悠悠地骑着马回家,洗过热水澡,然后休息,到8:30去食堂吃晚饭,在军乐队奏出的悠扬乐曲声中,聆听着装满酒的酒杯里冰块溶化的叮当声。饭后,有些人玩当时流行的

“惠斯特”牌；如果他们运气好，打牌不会被长官查到，他们就坐在月光下抽烟，直到 10:30 或 11 点。最后传来“就寝”的军号声。这就是“漫长的印度一日”，这种日子我过了 3 年，感觉相当不错。

## 在班加罗尔勤学苦读

1896年冬,我刚满22岁,这时我有了强烈的求知欲,感到自己在许多学科领域里的知识都十分贫乏。我的词汇量很大,喜欢上了语言,文章也写得有板有眼。我发现自己能用大量的词语,但不能准确地解释其意;我很喜欢这些词语,但却不敢用,害怕用错了。我离开英国以前,我的一位朋友说,“基督福音是伦理的最高准则。”听起来很不错,但伦理是什么意思呢?我在哈罗公学上学时,在桑赫斯特军校时,从未有人向我提起过这个词。从字面上看,我想它的意思应该是“公学精神”、“公平比赛”、“团结精神”、“行为端正”或“爱国”等诸如此类的准则。后来有人告诉我,伦理所讲的不仅仅是你该做什么样的事,而且解释为什么应该做那些事;他还告诉我,有许许多多的书专门写这个题目。我真想花2英镑请个学者,请他给我做1个小时或1.5小时的伦理讲座,给我讲讲伦理的范畴、伦理学的主要分支和伦理所涉及的主要问题,我希望了解这门学问中有哪些是有争议的问题、谁是伦理学界的最高权威以及伦理学方面有哪些经典著作,但是,在班加罗尔无论出什么价,根本没有人会给我讲这些。对于军事战术,我很精通;对于政治,我也有自己的观点,但伦理学的概要对我来说还是一件新奇事,从未学过,在班加罗尔也学不到。

当时,我的脑海里老是盘算着诸如此类的念头。我当然知

道,大学里 19—20 岁的学生们整天都被灌输这些术语,他们知道许多使你发懵的难题,也知道不少使人莫名其妙的答案。我们对大学生们的自视清高向来不屑一顾,因为我们认为他们只是死啃书本,而我们则在领兵打仗、保卫帝国。虽然以前我憎恨他们的满腹经纶,但现在我十分希望能找到一位能胜任的老师来教我,希望我每天能有一小时左右的时间向他请教。

后来有人在说话时用了“苏格拉底方法”这个词组。什么是苏格拉底方法呢?这种方法的意思好像就是用几个棘手的问题与朋友争论,最后问得他黔驴技穷。那么,苏格拉底又是谁呢?他是一位擅辩的希腊人,有一个好唠叨、爱抱怨的老婆,因为他令某些人讨厌,对社会是个公害,最后被迫自杀。不过,他显然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他在饱学之士的心目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我想知道苏格拉底的故事,为什么他能流芳百世呢?为什么当时的政府会仅仅因为他的言论而判他死罪呢?他的言论肯定给雅典行政官的命运或这位巧舌如簧的教授自己的命运带来了无比巨大的压力。这种敌意不会是因为小事而引起的,很显然,很久以前苏格拉底就发表了具有爆炸性的言论。知识炸药!道德炸弹!但是士兵手册里却没有这些故事。

还有历史书呢。我在上学时就喜欢历史,但我们学到的只是枯燥无味的、干巴巴的压缩本,如《学生版休谟》<sup>①</sup>。有一次,我们的假期作业是读 100 页《学生版休谟》,不料,我还没回校,父亲就要检查我的读书情况。我看的那部分是查理一世时期的

---

<sup>①</sup> 休谟(1711—1776),苏格兰哲学家、历史学家,《学生版休谟》指为中小學生准备的休谟历史著作的简写本。

历史。他问一个有关《大抗议书》<sup>①</sup>的问题，对此我知道什么呢？我说，最后国会打败国王，砍了他的头。在我看来，这似乎是最大的抗议了，但这样的回答不行。父亲指着书说：“你作业的中间一部分讲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国会问题，它影响了我们宪法史的整个结构，你根本不理解这段历史的重要性。”他说得这么严重，我大惑不解，我当时根本看不出这有什么了不起。现在我想更多地了解这段历史。

因此，我决心认真阅读历史、哲学、经济等类书籍。我写信给母亲，要她给我寄来我曾听说过的书籍，她欣然应允，每月我都能收到一大包我认为自己必读的书籍。在历史方面，我决定从吉本<sup>②</sup>入手。有人告诉过我，我父亲很喜欢读吉本的书，他能把吉本的书背下来，吉本对他的演讲风格和写作风格影响很大。于是，我一头扎进迪安·米尔曼版的八卷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很快我便被书中的故事和写作风格征服了。印度的白天阳光炙人，早上我们从马厩里出来直到日落西山时我们才出来打马球，我把这段时间全都花在吉本的书上了，我从一章驰骋到另一章，觉得从书中得到了无穷的乐趣。在书页的空白处我写下自己的观点，不久便发现自己竟是作者的狂热的支持者，并极其反对狂妄自大的编辑对他的贬低，我并没有因为编辑在书中做了极不规范的注脚而不相信吉本，相反，迪安对吉本的否定和贬低激起了我的愤怒。我十分喜欢《罗马帝国衰亡史》，因此读完这本书之后我便开始读吉本的自传；幸运的是，他的自传

---

① 1614年英国国会在内战前夕向查理一世提出的抗议书，书中历数查理一世的苛政，并要求议会有内阁大臣的任免权及改革宗教。

② 爱德华·吉本(1737—1794)，英国历史学家，其名著有《罗马帝国衰亡史》等。

跟《罗马帝国衰亡史》装订在一起。他在自传中提到了他的保姆，他写道：“如果有人为我健康地活着而感到高兴——我想这样的人肯定是有的——那么他们应该感谢这位可敬可爱的妇人。”读到这里我就想起埃弗雷斯特太太，这句话可以作她的墓志铭。

读了吉本，我又开始读麦考利。我曾背过《古罗马之歌》，很是喜欢。当然我知道他写过历史，但从没读过，现在我开始读他写的历史，在浩瀚的历史海洋中遨游。我想起埃弗雷斯特太太的妹夫，即那位老牢头，他有一套麦考利写的历史，他把报纸副刊上的连载买下来，然后再装订在一起；老牢头对这本书敬若神明。我认为麦考利写的东西都是福音，所以当我读到他对伟大的马尔伯勒公爵尖刻的评价时，感到很伤心。当时身旁没有人能够告诉我，这位历史学家虽然文采飞扬，但他刚愎自用，是一个大文痞；他喜欢故事，而不喜欢事实，总是根据其文章的需要而信口雌黄。他亵渎了我对他的信任，辜负了老牢头那纯朴的虔诚，我对此一直耿耿于怀。不过，我也得承认，我确实从他身上获益匪浅。

我不仅喜爱他写的历史，而且特别迷恋他的散文。从他的散文中我了解了查塔姆、腓特烈大帝、纽金特勋爵对汉普顿的纪念、克莱武、沃伦·里斯廷斯、巴雷尔（恶狗）、骚塞的社会观等等，我还读过他所写的充满暴戾之气的文学杰作——罗伯特·蒙哥马利的诗歌。

从11月到次年5月，每天我都要读四五个小时的历史和哲学。我拜读了柏拉图的《理想国》——看来他和苏格拉底一样都主张实用。还拜读了韦尔登博士编校的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叔本华的《悲剧的诞生》、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以及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与此同时我还间或看一些名气不那么大的书。

这种学习方式非常新奇。首先,我如饥似渴地读书,而且接受能力强,什么书都看;其次,没有人跟我讲,“这本书不可信”、“你应该读一读某某人对这个问题的解答,两者结合才能发现问题的要点”或者“有一本对这个学科讲解得更透彻”等等诸如此类的指导。当时,我第一次开始羡慕大学里的那些初出茅庐的年轻人,他们有饱学之士的指点;那些教授们穷其毕生精力在各个领域内进行研究,迫切希望在有生之年把自己的宝贵财富传授给学生。而现在,我看到许多大学生虚度年华、没有抓住短暂而又宝贵的机会,我又可怜这些大学生。人生毕竟得在思和行之间作出选择,没有工作便无所谓玩乐。

当我把自己幻想成苏格拉底、构筑我自己的理想国时,我想对富裕之家的国民之子进行重大的教育改革。他们十六七岁时应该学一门手艺,干健康的手工活,在业余时间阅读大量的诗歌,唱歌,跳舞,进行体育锻炼,让他们把精力花在有益的事上,只到他们真正渴求知识、渴望了解事物时,我才让他们上大学。上大学是一种奖励、一种荣誉,只能给予那些在工厂、田野里能体现其真正价值的人以及那些具有卓越的素质和执著的求知热情的人。不过,这种设想定会引起混乱,最终也许会给我带来毒鸩。

\* \* \* \* \*

在随后的两年里,我博览群书,开始想到宗教问题。以前我都是毕恭毕敬地接受一切灌输给我的宗教教育,即使在假期里我每周也都要去一次教堂;在哈罗公学读书时,除了每天早晚要祷告之外,每个星期日我要做3次礼拜。参加这些宗教仪式很有好处,那几年我学了不少礼仪,终身受用不尽;从婚礼、洗礼和

葬礼上我积累不少宗教礼仪知识,但我从来没有想到过要检查一下自己到底已经积累了多少,或许我会发现自己做得还不够。但是,在我快乐的青年时代,我常常是不到星期天就去教堂做礼拜。在军队里我们定期列队进教堂,有时我带领信天主教的士兵去教堂,有时带领信新教的士兵去教堂。在英国军队里,宗教信仰不同的官兵能够相互容忍,大家对宗教信仰的差别几乎毫不在意,谁也不会因为他所信的宗教而受到任何束缚或歧视,军纪也为各人的宗教信仰自由提供方便。印度人崇拜的上百个神灵都被毕恭毕敬地供奉在皇家神庙里。在团里,我们常常争论,“我们有来世吗?”“我们有过前世吗?”“死后我们还能相互认识、相互见面呢,还是像佛教徒一样又开始另一个轮回呢?”大家一致认为,只要你光明磊落地生活、尽职尽责、以诚待人、对弱者和穷人友好,那么信什么或不信什么都无关紧要,一切都会好的。我想,这就是我们当今所说的“健康心理宗教”。

一些高级军官也谈论基督教对妇女的影响(“它使她们循规蹈矩”)及其对下层社会的普遍意义(“现在他们过不上好日子,但想到死后会有好日子过能够使它们更满足”)。基督教似乎还有利于整肃军纪,尤其是英国圣公会,它使军人想得到别人的尊敬、保持仪表的威严,从而避免了许多丑闻。从这一点来看,宗教仪式并不重要,它只不过是译成不同语言的同一种戒律,以迎合不同的种族和性格。不过,不管哪一种宗教,讲得太多总不是一件好事,尤其在当地人中,宗教狂热是极其危险的,会导致谋杀、兵变和叛乱。我想,这就是当时的宗教氛围。

这时我开始阅读到大量的书,这些书对我在哈罗公学所学到的宗教知识提出了一种挑战。第一本书是温伍德·里德写的《人类的殉难》。布拉巴宗最喜欢这本书,读过好多遍,把它看成是一种圣经。这本书简明扼要地对整个人类历史进行了恰如其

分的概述,尖锐地剖析了各种宗教中的种种神秘观念。这本书最终得出的结论是,我们将像蜡烛一样被燃尽,这个结论使我震惊,心里很不是滋味,后来我发现吉本也持有这种观点。在这一年冬天我又读了两本书,即莱基的《理性主义的崛起和影响》和《欧洲道德史》,终于使我形成了一种世俗观。曾经有一段时间,我一想起以前那些校长和神父向年轻的我灌输如此众多的谬误——当时我就是这么想的,我就十分气愤。当然,如果我上过大学,那么大学里的著名教授以及神学家们就会帮助解决这些疑难问题,他们至少会让我看一些很有说服力的、持相反观点的书。我曾有一段时间对宗教十分反感,如果这段时间延续下来的话,我也许就成了一个令人讨厌的家伙。后来的几年里,在战场上出生入死使我的反宗教情绪冷静了下来。我发现,无论我怎么想、怎么辩,当我要上战场时总是毫不迟疑地祈求上帝保佑,如果我能平安回家的话,我总是发自内心地感谢上帝,甚至在一些小事上我也要祈求上帝的保佑。在这几年乃至我一生中,我总能如愿以偿。这种做法似乎很自然,与反对这种做法的理论一样有说服力、一样实际,况且祈求上帝保佑能使人的心灵得到安慰,而反对这种做法的理论却没有多少作用。因此,我总是跟着感觉走,并不十分介意思与行的冲突。

让一个未受过教育的人读名言录是一件好事。巴特莱特的《常见语录》是一本好书,我曾用心地拜读过。一旦你记牢了语录,这些名言常常会激起你的灵感,使你更想去阅读其作者所写的书。在一本类似的书中,我曾见过一句似乎极其自相矛盾的法语格言:“情感自有其道理,但情感却不能明白道理。”在我看来,放弃情感而只追求理智是十分荒唐的,我看不出我为什么不能两者兼得。我并不担心想法和信仰相互矛盾,让大脑尽其所能对思想和逻辑进行探究是件好事,但这并不妨碍让心灵去祈

求上帝保佑,如果真的应验了也不妨心存感激。我想,赋予我们思想和灵魂的伟大的造物主看到两者不协调时是不会感到气愤的,毕竟,他肯定在一开始就预见到了这一点,当然他也能完全理解这一点。

当我看到我们的一些主教和神父们千方百计地想把《圣经》中的故事和现代的科学和历史知识一致起来时,我常常感到十分惊讶。使二者调和有什么必要呢?当你收到一封信,信的内容让你心情愉快、灵魂充实,告诉你在这个充满机会和同情的世界里,你将和你的至爱团圆,你干吗要为那个在途中被弄脏的信封的形状和颜色而担心呢?干吗还要担心信上是否贴了邮票、邮戳上的日期是否正确呢?这些事情也许蹊跷,但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信的内容以及你从中所得的好处。如果你仔细推理,就会得出十分明确的结论,那就是奇迹是不可能出现的:“人言很可能出错,但自然规律是不可违背的。”与此同时,当读到耶稣在加利利的迦拿<sup>①</sup>如何变水为酒、如何在湖上行走、如何死而复生时,你会感到欢欣鼓舞。人脑无法弄清无限,但数学的发现却使无限变得并不神秘。那种认为除了我们能理解的东西之外一切都是错误的想法是愚蠢的,那种认为人脑无法调和的思想会相互毁灭的想法更是荒谬。现在,有人说世界上有亿万个宇宙永远在漫无目的地运动,没有什么比这种说法更令我们的思想和感情难以接受得了。因此,我很早就养成了一种习惯:相信我想相信的东西,同时让理智自由探索。

我有几个堂兄有幸上过大学,他们常常逗我说,除了我们的思想,世上其实什么都不存在,整个世界只是一个梦,所有的现

---

<sup>①</sup> 加利利是巴勒斯坦北部一多山地区,迦拿是巴勒斯坦北部古城,相传为耶稣首次行神迹处。

象都是虚幻的,每个人都在创造自己的世界,你的想象力越强,你所创造出来的世界就越精彩,人一旦停止了梦想,世界也就不复存在了。玩这些有趣的思想杂技倒是挺有意思的,虽然没有害处,但也没有一点用处。我在此奉劝年轻的读者,千万别把这种游戏当真,玄学家可以推出定论,激起你去对他们的荒谬观点进行反证。

我常常依赖自己多年前就得出的观点。我们抬头看见了太阳,看得眼睛发花,我们的感官清楚地记住了这个现象。太阳光芒四射地挂在天空,似乎只能和我们的感官一样真实。幸而除了我们感觉器官之外还有一种方法能证明太阳的真实性,那就是数学。天文学家可以不用感觉器官,只靠一系列数学分析就能计算出何时会出现日食;他们纯粹依靠推理即可预言某天太阳上会出现一块黑斑。到那天,你自己去看,你的感官会证明他们的计算是准确无误的。这样,庞大的数学运算过程所得到的证据进一步证明了你的视觉所得到的证据,两者毫不相干。我们用两种不同的方法分别证明了太阳的真实性。相信形而上学的朋友说,天文学家的计算所需要的数据最初一定是通过感官得到的,我说“不”,这些数据可以由放在阳光下的自动计算器算得,根本无需人类的感官,至少这在理论上是可行的。如果喜欢形而上学的朋友还要坚持说,这些计算结果是别人告诉我们的,在这过程我们的耳朵起了作用,我就会回答说,数学推理过程有其自身的真实性和价值,一旦得出结论就成了一个新的独立因素。在这一点上,我还想重申我的观点:太阳是真的,而且是热的,跟地狱一样热;如果玄学家对此怀疑,那他们该去那儿看个究竟。

\* \* \* \* \*

我初次在印度的马球场上露面很有戏剧性。我们到印度刚6个月,海德拉巴地区便举行了戈尔孔达马球锦标赛。在尼扎姆领地和附近英国军营里有六七支马球队,其中包括刚刚从班加罗尔被我们接替下来的第十九轻骑兵团。30年前,第十九轻骑兵团接替第四轻骑兵团驻防任务时,有个二等兵对第四轻骑兵团的营房状况说了一句不恭不敬的话,从此两个团的士兵结了冤。虽然当时的当事人无一人还在团内,但团里的士兵对此事都了解,仍耿耿于怀,好像此事是一个月前发生似的。不过,这种紧张的关系没有影响到两团正式军官之间的关系,我们在第十九轻骑兵团的军官食堂受到该团军官的盛情款待,我被安排住在一位名叫切德伍德的年轻上尉的家里,此人现在是印度战区的总司令。除了其他几支驻军的马球队之外,我们的对手还有两支难以对付的印度马球队:首相队和著名的戈尔康达旅代表队,即尼扎姆的保镖队。在印度南部,戈尔康达队是当地公认的最佳马球队,这支队曾与印度北部两支当地最强的马球队伯蒂亚拉队和焦特布尔队进行过多次比赛,总是不分上下。戈尔康达队非常富裕,拥有很多马,队员个个精通马术和打马球的技巧,这是当时年轻的印度人和英国军官共同的理想。

我们有了从浦那轻骑兵团买下的马群作为后盾,在德干高原上长途跋涉时我们跃跃欲试,决心大干一场。作为我们的主人,第十九轻骑兵团展开双臂欢迎我们的到来,并非常委婉地告诉我们,抽签结果是我们第一场就得跟戈尔康达队交锋,真是不幸。他们真心真意地说,我们才到印度不久,第一场比赛就遇上了一支百分之百会赢得这次锦标赛的对手,真是倒霉。

那天早晨,我们观看了驻军的阅兵式。英国部队、印度正规军以及尼扎姆部队排成纵队从我们面前走过,场面十分壮观,好像是军事要人在检阅似的,最后出场的是20头大象拖着一门巨炮。当时阅兵式上的大象在行进中要抬起它们的象牙作为敬礼,它们的表演相当精彩。后来大象的敬礼仪式被取消,因为粗俗的人看到会窃笑,大象的尊严和管象人的尊严会受到伤害。再往后,大象拖炮的仪式也被取消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大群拖拉机拖着体积更大的、杀伤力更强的大炮。文明进步了,但我却怀念那些大象以及它们的敬礼。

马球赛于下午举行,在海得拉巴举行的马球锦标赛十分壮观。球场外的场地上挤满了印度各阶层的观众,他们全神贯注地观看比赛。帐篷里和有凉棚的看台上坐满了英国观众以及德干高原上的印度上流人物。大家都认为我们队很快会在这场比赛中输掉。我们的对手动作敏捷、速度快,比赛的前几分钟内他们就连进3球,而我们1球未进。当时我们几乎也相信大家的看法了,但是,没过多长时间我们便在观众的激动的欢呼声中连进9球,最终以9比3击败戈尔康达队。后来的几天中我们不费吹灰之力击败了其他对手,创造了刚到印度50天就摘取了一流锦标赛桂冠的记录,以后这一记录从未被打破过。

读者可以想象,我们为了这一伟大而艰巨的任务花了多少心血。人们都以为我们得花几年时间才能完成这一任务,而我们只用50天就胜利完成了。

1897年最热的季节到来之际,上面有通知说一部分军官可以享受回英国3个月的休假。因为大家都是刚到印度,很少有人想回国,我认为浪费这种机会很可惜,因此自告奋勇地填补这种空缺。5月底,我冒着炎热酷暑,从孟买乘船回国,一路上挨着难以忍受的晕船滋味。当我又能坐起来时,我们的船已经航

越了印度洋的三分之二。不久我认识了一个人，他叫伊恩·汉密尔顿，是个瘦高个上校，当时他在印度负责步枪射击训练，他向我指出，我忽略了一件事，那就是希腊和土耳其之间出现了紧张关系。事实上，这两国之间的战争一触即发。伊恩是个浪漫主义者，他支持希腊人，希望能以某种身分与他们共同战斗。我从小就是个保守派，因此我支持土耳其人，我想我可以以战地记者的身分跟随他们的军队一起战斗。我认为他们一定会打败希腊人，因为他们在人数上占优势，平均下来，至少有五个土耳其人对付一个希腊人，而且土耳其装备比希腊强得多。伊恩听后深感痛苦，因此我声明自己不会参加真正的战斗，只是去看热闹，报道新闻。当我们到达塞得港<sup>①</sup>时，得知希腊人已被打败了，他们已十分明智地逃脱了这场不公平的较量。几个强国正想方设法通过外交手段保护希腊人，使其免遭毁灭，因此，我决定不去巴尔干地区的战场，而是在意大利逛了2个星期，爬了维苏威火山，看了庞贝城，最重要的是游览了罗马城。在此，我又一次重温吉本描述其晚年第一次游罗马时心情的词句，虽然我没有他那样的渊博学问，但是我还是满怀崇敬的心情寻觅其足迹。

在回伦敦享受生活前，这是一段安排得十分美满的前奏。

---

① 埃及一港口。

## 马拉坎德野战军

帕坦人<sup>①</sup>反叛时，我正在古德伍德的草坪上，一边享受美丽的天气，一边挣点钱花。我从报上了解到那儿已有3个旅组成的一支野战军，领头的是宾登·布拉德爵士。我立刻给他拍了一封电报，提醒他别忘了自己的许诺，随后赶紧乘火车去布林迪西赶印度邮船。我搬出了威廉·贝雷斯福德勋爵来为自己压阵，请他也帮我向将军求情。在我离开维多利亚之前，他在马尔伯勒俱乐部热情地款待了我。贝雷斯福德家族的人都很有风度，他们让人感觉到这个世界和世上的每一个人都是举足轻重的。我还记得他向比我年长许多的俱乐部朋友宣布我的去向时的神态。“他今晚要去东方——到战场上去了。”“去东方”这种措辞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大多数人也许会说“他将到印度去”。但对于那一代人，东方意味着冒险之路，也意味着英国的征服地。他们问是否去前线？我只能说我希望如此。他们对我非常友好、非常热情，使我自我感觉良好，但我的将来还得取决于宾登·布拉德爵士的作战计划。

我刚巧赶上这列火车，情绪十分高昂。

乘船去印度一次就足够了，再去就嫌多了。这正是一年中最热季节，红海热得令人窒息。当时没有电风扇，只有由手拉

---

<sup>①</sup> 分布在阿富汗东部和巴基斯坦西北部的民族。

摇的布风扇<sup>①</sup>，布风扇在拥挤的餐厅里来回使劲地吹动，使空气中到处充满了热气腾腾的饭菜味。但是，身体上的不适跟我心里的焦虑相比根本算不了什么。我放弃了整整两个星期的休假。我到达布林迪西时，宾登·布拉德爵士没有来电报，我想，到亚丁<sup>②</sup>时一定会收到布拉德将军的来电。到亚丁后，我急不可耐地等着船上的乘务员分发电报，可是分发完了最后一封也没有我的，令我十分绝望。不过，到了孟买我得到了好消息，将军发来的电报说：“太难；无空缺，先来当战地记者；我尽力把你安排进来。B.B。”

我得首先到班加罗尔的团部请假，也就是说我必须朝与我想去地方的相反方向乘两天的火车去团部。团部看到我提前归队十分惊讶，但多了一个少尉值班总是受欢迎的。此时，《先锋报》聘我为战地记者，母亲也在英国与《每日邮报》达成协议，《每日邮报》同时发表我的稿件，报社愿意按每一栏目5英镑付酬，这点钱并不算多，因为我必须自己负担所有费用。我带着报社证明，忐忑不安地把宾登·布拉德爵士的电报呈交给团长。上校对我很宽容，命运对我也十分慷慨。虽然电报并不是正式的公函，但上校批准我去碰碰运气。当晚，我和一位侍仆背上行装，冲向班加罗尔火车站，买了一张去瑙谢拉的火车票。印度售票员从我手中接了一小袋卢比后，从小窗口递出一张普通车票。我十分好奇，问瑙谢拉有多远，这位随和的印度售票员看了一下火车时刻表，轻描淡写地说2028英里。印度真大。这就意味着我得在酷暑中坐5天的火车。虽然我没伴，但我有许多书可看，

---

① 印度的一种吊在天花板上形似布幕、由仆人拉绳使之摇动的扇子。

② 原也门民主共和国的首都。

时间也就很快地过去了,并不难熬。印度的火车车厢里面四周镶着皮草,有厚厚的百叶窗挡着灼热的太阳;摇着圆形的湿草扇可以使车厢里面很凉爽。我在一个阴暗的车厢里呆了5天,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油灯下、或在从车厢的缝隙里透进来的日光下看书的。

我在拉瓦尔品第下车,玩了一天一夜,因为我有一个朋友在驻扎在拉瓦尔品第的第四龙骑兵近卫团里任少尉。虽然拉瓦尔品第离前线还有几百英里,但此地的气氛也不安宁,当地的驻军希望被派往北部,因此停批一切休假,随时待命作战。晚饭后,我们聚在军士食堂里,食堂里正在进行一场热烈的即席演唱会。没有什么比气味更能使人回想起过去的了,其次就是曲调。我的头脑里储存了我所参加过的每一次战争的调子,甚至储存了我一生中每一个关键时刻的调子。下一次我回家时,我将把这些曲调全录在留声机里,然后再坐在椅子上,点上雪茄,回味早已消失的人、事、情、境;这些画面和感觉虽然很苍白,但很真实,隐约再现了过去时光。当时士兵们所唱的歌我还能记得十分清楚,有一首歌叫《新式照相》,唱的是刚刚面世的一种令人震惊的新发明,据说这种新发明能够透过屏幕或其他不透明的物体拍出像来。我是在这个军士食堂第一次听到这支歌的,当时似乎觉得不久的将来便不再会有什么隐私了。歌词中有几句是这样的:

你看到的每样东西里面  
都有可怕的东西、令人恐怖的东西,  
这就是新式照相。

当然,我们当时只觉得这是笑话,但后来我在报纸上读到,将来

有一天也许可以看到人体内的每一根骨头！还有一支歌，其中的合唱部分是：

英国问道：  
危险将至时  
印度人是反抗还是死？

当然会有人对歌，但是对得最好的歌词是：

远在大海彼岸的伟大的白人母亲，  
愿她永远是帝国的主宰。  
祝她万寿无疆，  
祖国江山永固。

这种情绪使我意气风发，尤其是在受到该团的食堂盛情款待后，我更感到精神振奋。不过，我告诫自己举止要谨慎，因为当时我所在的团与这个团之间有点不愉快。第四龙骑兵团的一位军官按照军队的常规给我团的一位上尉拍了一封电报，电文是，“请报出从你团调入到第四龙骑兵团的最低条件。”我团的上尉高高兴兴地回电说，“一万英镑、一个贵族头衔，外加一套行李。”第四龙骑兵团对此大为恼火，认为是轻视了该团。后来在1898年和1899年的马球锦标赛中，这场纠纷使我们两团的比赛争斗得更加激烈。

我不该让读者忘了我正在火速赶往前线。离开班加罗尔后的第六天清晨，我到达了瑙谢拉火车站，即马拉坎德野战军的卸载点。我坐在一辆双轮马车上，中途换了好几次快马，顶着酷热难当的天气，穿过40英里的大平原，然后才沿着蜿蜒曲折的马

拉坎德山隘的陡峭山坡往上爬。这个山口3年前就被宾登·布拉德爵士攻了下来,现在,总司令部和由各兵种组成的一个旅就驻扎在此山的山顶上。我出现在参谋部时满身黄土,将军不在,他带领快速突击部队去对付奔纳瓦尔人去了。这是一个十分难以对付的部落,他们拥有一个山谷,在此山谷中已生活了几个世纪,挡住了所有外来者。1863年,帝国政府向奔纳派出了一支远征队,结果发生了英印年鉴中所谓的翁比拉战役。奔纳瓦尔人顽强抵抗,与远征军在臭名昭著的皮克特悬崖上展开了拉锯战,几百号英国兵和印度兵陈尸荒野。谁也搞不清楚宾登·布拉德爵士对付这些闻名的悍匪需要多长时间。此时,他们安排我和参谋们一起用餐,并告诉我说我可以在任何一个帐篷里铺开自己的铺盖。我俯首帖耳地听他们的安排,十分注意自己的言谈举止,唯恐在新的环境里弄出什么差错,坏了自己的名声,况且我是费了不少力气才爬上来的。

将军只花了5天时间,软硬兼施,征服了奔纳瓦尔人,但对我来说,时间似乎很长。我尽量利用好这几天时间,学会了一个新本领。在此之前,我从来不会喝威士忌酒,我特别讨厌它的味道,我真不明白,怎么会有这么多的军官频频地要威士忌加苏打。我喜欢红白葡萄酒,尤其喜欢香槟酒;要是在特殊场合,我也能喝一小杯白兰地。但是,这种有烟味的威士忌我从来不碰。当时的天气酷热难当,尽管我还能忍受,但这种热也是够难受的;5天来,除了茶之外什么喝的都没有。要么只有温水、温水加酸橙汁、或温水加威士忌,面对这几种选择,我准备搏一搏。有了这种高昂的士气支撑着我,我希望自己能够适应战地情况,克服肉体上的弱点。2天过后,我已经完全消除了自己对威士忌酒味的厌恶感,而且,这种成绩并不是暂时的;相反,那几天所养成的习惯陪伴了我一生。习惯了威士忌之后,原先令人反感

的酒味变得十分诱人；直到今天，虽然我饮酒时很有节制，但只要是在适当的场合，我从来不会在这种生活在东方的白人军官所喝的基本饮料面前退缩。

当然，喝威士忌酒在当时的英国也是一个新生事物。除了在荒野打猎时或某个非常阴冷的地方，我父亲从来不喝威士忌；他生活在“白兰地加苏打”的年代，喝白兰地加苏打水确实是相当高雅的；不过，经过足够的试验和思考之后，从一个公正的角度来看，我认为在日常生活中，经过稀释的威士忌比白兰地加苏打更实用。

既然我在马拉坎德山顶上卷进了这个话题，我得声明，我和其他年轻军官所受的教育跟当时的大学生所受的教育完全两样。牛津和剑桥的大学生喝起酒来毫无节制，他们甚至成立俱乐部、举办正式宴会，使每个人都喝得一醉方休。而在桑赫斯特军校和军队中，醉酒是很丢脸的，不仅会受到社会的指责，受到体罚，而且如果军官喝醉了，那就要革职。我从小所受的教育和训练使我蔑视醉鬼——当然在非常特别的场合和一些周年庆祝会上醉酒除外。我真想让大学里的那些嗜酒的秀才们排成一排，视其酗酒程度酌情鞭打。我认为酒是众神给人的厚礼。当时，我十分反对酒鬼、禁酒论者以及其他贪婪之徒，但现在我能宽容他们的脆弱。当时的下级军官都十分偏执，他们常常认为，喝醉酒的人和不许别人喝酒的人都该挨踢。当然，我们现在理智多了，这都是受大战的熏陶。

我也利用这5天为即将到来的军事行动做各方面的准备。我必须买2匹好马，雇1名马夫，还要把行军包里的东西备齐。根据英印军队在战争时期的习惯，在前一周阵亡的军官的葬礼一结束（如果有葬礼的话），他们的遗物，包括他们的衣物，就要进行拍卖，这对阵亡军官来说真是太不幸了，但对我来说倒是很

便当。这样,我很快就备齐了行头。不过,看到阵亡战友的遗物——大衣、衬衫、靴子、水壶、手枪、毯子以及锅等等——随随便便地拍卖给陌生人,我觉得十分残酷。但是,这样做毕竟也有道理,至少合乎节约的最高准则。拍卖市场挺不错,无需支付运输费用。死者的遗物实际上是以垄断形式拍卖的,营地上拍卖师远比任何寡妇或母亲了解某某副官或某某上尉的遗物的价格。处理阵亡军官的遗物如此,处理阵亡士兵的遗物更是如此。然而,我必须承认,几周后当我第一次把一位阵亡朋友的绶带披在肩上时,感到十分悲痛,因为我前一天亲眼看到他英勇战死沙场。

现在应该让读者了解这次战役的大局了。英军守在马拉坎德山隘的顶峰已有3年,扼住了山下的公路;这条路从斯瓦特山谷开始,沿途绕过其他山谷,穿过斯瓦特河,一直到奇特拉尔。奇特拉尔在当时是军事要冲,从那以后这个地区似乎平安无事,但毫无疑问,在当时奇特拉尔是非常重要的。斯瓦特山谷里的土著人祖祖辈辈生于斯长于斯,已把山谷看成了自己的领土,英军在此地出现使他们很恼火,他们对此怒不可遏;政府认为这是由宗教原因引起的,其实,这种现象很好解释,可以说是人之常情。当地的土著向马拉坎德山隘的守军和查克达拉山上的小堡垒发起了进攻。查克达拉堡垒矗立在一块大岩石上,这块岩石就像一个小直布罗陀山,这个堡垒保卫着斯瓦特河上的长吊桥。误入歧途的土著人打死了许多人,包括许多爱好和平的当地妇女儿童。因为土著的突然袭击,英军在防守马拉坎德山隘的过程中也出现过危机,但最后还是挺过去了。晨曦中,向导骑兵团和第十一孟加拉长矛轻骑兵团把这些冥顽不化、暴虐成性的土著从斯瓦特山谷的一边赶到另一边,声称他们已杀戮了很多土著。查克达拉堡垒这座小直布罗陀山终于解了围,被保住了。

铁索桥完好无损。英赫曼德人是白沙瓦地区的另一族极难对付的土著，制服了英赫曼德人，由 12000 人和 4000 牲畜组成的讨伐大军将通过这座铁索桥开进山里，穿过迪尔和巴米尔山谷，经过马蒙德地区，最后再回到印度大平原的文明世界中来。

宾登·布拉德爵士征服奔纳瓦尔人后班师回营，他是位经验丰富的军官，几乎没伤一兵一卒就把奔纳瓦尔人征服了。他喜欢这些野蛮的土著，懂得用什么方式与他们谈判。帕坦人很奇怪，他们有各种各样的恐怖风俗和骇人听闻的报复方式，他们特别善于讨价还价，如果对手很强大，而且能平等地和他们谈判，他们会十分满意，这样便很容易与他们达成协议。宾登·布拉德爵士相当顺利地解决了与奔纳瓦尔人的冲突，其间只打过一次仗，而且是一次小战役，很快就结束了。在这次战役中，宾登的副官芬卡斯尔勋爵和另一位军官在危急中奋勇救出一名伤员，为此他们俩获得维多利亚十字勋章。总司令布拉德将军是我在迪普顿认识的老友，现在他终于回来了，他的周围是前呼后拥的参谋和卫队，后面跟着他手下的年轻勇士。

在充满野性的山区里，在手持步枪的野蛮的土著人中，宾登·布拉德爵士十分惹人注目。他现在身着制服骑在马上，身旁有旗手，前后有骑兵队，比我在安全舒适的英国所看到的宾登更显得威武。无论在战争中还是在和平时期，他对英印军队的状况都很了解，因此没有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身为臭名昭著的布拉德上校的直系后代，他对此深感自豪。查理二世在位时，那位布拉德上校曾企图通过武力盗取伦敦塔里的御宝，这件事在史书里有记载。上校手拿御宝正准备离开塔门时被捕了，他因叛国罪以及好几桩重罪而受审，可是他却被宣布无罪释放，而且立即被任命为御林军队长。这种奇怪的结果引起人们的胡乱猜测，说他从伦敦塔盗宝这件事有国王本人的默许。当时正是艰

难时期,国王确实手头拮据,而且这种事在欧洲各地早已出现过。尽管如此,宾登·布拉德爵士却把他祖先企图盗宝一事看成是其家族史中最荣耀的一件事,因此他对印度边境的帕坦人十分同情,因为这些土著人完全能够理解此事的方方面面,也许会毫不吝啬为对方鼓掌。如果将军能把所有的帕坦人聚集在一起,把其祖先的故事详细地讲给他们听,那么我们3个旅本来根本不用带着长长的骡队和骆驼队,来到这些山区和人烟稀少的高原吃苦受累,可是后来几周我就是在这样的地方度过的。

将军当时已是一位老兵,现在仍健在。在这次战役中,他个人经历过一次严峻考验。土著人代表团(叫族长会议)中的一位狂热分子突然拔出一把刀,从约八码远的地方向将军猛扑过来。宾登·布拉德爵士骑在马上,抽出左轮手枪,从两码以外将袭击者击毙;而当时我们大多数人都以为,师长以上的将军身上的手枪只是个装饰品。不难想象,野战军全军上下——包括最低贱的清道夫——有多么开心。

在此,我无意叙述这场战役,关于这段历史我已经写了一本书,可惜的是书已绝版,因此,我将用几句话概括一下这场战役情况。马拉坎德野战军的3个旅连续扫荡了上面提到过的所有山谷,赶走土著人的牲口做口粮,割下他们的庄稼给牲口做饲料,这些给土著带来了许多不便。领子上镶有白领章的政治官员<sup>①</sup>随野战军一同出征,他们总是跟当地的头人、宗教人士和社会名流谈判。这些政治官员很不受军官们的欢迎,因为军官们认为他们喜欢捣乱,说他们总是草率行事,有损大英帝国的名声,而且还不让别人知道。他们做事优柔寡断。我们野战军中有一位名叫迪恩的少校,此人是一位十分出色的政治官员,他总是干涉军事行

---

① 指英国政府任命到保护国担任统治者常驻顾问的官员。

动,大家都很讨厌他。当我们枪弹上膛、跃跃欲试地准备大战一场时,这位迪恩少校便会命令我们停止战斗。我们常说,他是怎么当上少校的呢?他至多是个平庸政客而已。当地的头人都是他的老朋友,关系亲密得像是一家人;他们的友谊不受任何事情影响。在战斗的间隙,他们之间的谈话是朋友间的对话,而他们跟我们的将军谈起话来就像是强盗与强盗之间的对话。

我们不了解芝加哥警察和匪帮之间的关系,但这肯定跟迪恩与当地头人之间的关系如出一辙。毫无疑问,他们必定能够相互理解;他们都厌恶民主、商品化、赚钱、商务、诚实以及各种各样的俗人等等。我们真想开枪射击。天气这么热,热量似乎可以用双手托起来,它就像只背包压在你的肩上,像一场恶梦罩在你的头上;我们辛辛苦苦冒着酷暑从大老远的地方赶来,可不是来听你们这些政治官员和杀人成性的土著没完没了地谈些见不得人的事的。同时,敌方也有“宁死不屈”、“血气方刚”之辈。他们想朝我们开火,我们也想向他们开枪。但我们都被镇住了:使他们不敢出手的是他们的长辈,也即相对于我们现在所谓的“老人帮”;我们不敢动手则是因为政治官员们身上的白领章。然而,事情往往如此,野蛮人先动了手。土著人不听“老人帮”的话,又不怕我们的政府官员。很多人战死,在我们这方,死了的人还能给遗孀争取到政府的抚恤金,受伤者则只能靠一条腿蹦跶一辈子了。当时的场面非常激动人心,没被打死也没被打伤的人觉得场面十分热闹。

这几句话有些不大恭敬,我说这几句话的目的只是想说明印度政府的耐心。印度政府之所以有耐心是因为它十分清楚,一旦事情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它可以向任何人开枪。印度政府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是如何避免这种可恶的结局。这个政府死气沉沉,处处受制于法律以及各种各样的和谈和错综复杂的

私人关系。它不但受下院的牵制,还受制于形形色色的、纯粹是英印式的约束和羁绊,这些羁绊大可至宽容大度的传统观念,小可至各种官僚主义的拖沓和扯皮。所以,社会各阶层的建设任务应该在和平时期进行;主流是统治阶层的势力,同时又要对统治阶层的势力从各个方面进行牵制。当然,有些事情总是要发生的,出现差错也是不可避免的。“令人遗憾的事”会时有发生,这正是我在下面的一章中所要讲述的内容。

## 马蒙德山谷

在印度边境驻营是一桩美差,无论是这里的景致还是这里的人都是举世无双的。壁立千仞的山谷下面,流淌着从山上融化下来的雪水,泛着玉珠激流向前。部队顶着黄铜色的苍穹穿行在迷宫般的大峡谷中。在这粗犷的美景中生活的当地人,其性格与其环境一样豪放。当地的帕坦人总是战事不断,只是在收获季节里,因为生存的需要,他们才会暂时休战。在这里,每个人都英勇善战,既懂政治也懂宗教。每一个大屋都是一个堡垒,虽是土坯垒就但屋上都有防护墙、角楼、射击孔、护卫塔楼、吊桥等,一应俱全。每一个村都有自己的防御工事。每家每户、每个家族都有世仇。数不清的部落和各种各样的部落联合体相互之间有无数的新仇旧怨要清算,任何一笔账都要算清楚。在他们的社会生活中,除了收获季节中有一套规矩外,他们还有一套相当复杂的礼仪规范,而且大家都能严格遵守。懂得这套规矩并能恪守礼仪的人可以手无寸铁地在边境上畅通无阻,然而如果坏了一点点规矩就有了性命之忧。因此,帕坦人的生活可谓丰富多彩。这里人烟稀少,充裕的阳光和水源哺育着群山里肥沃的土地,当地人用不着付出什么劳动便能收获足够的粮食以养育为数不多的人口。

19世纪为这块世外桃源带来了两种东西:一是后膛装弹式步枪,二是大英政府;前者是一种奢侈之物,绝对是好东西,后者

则是十足的累赘。步枪使用方便,冲锋枪更是如此,这些东西在印度高原上最受欢迎。在 1500 码开外便有准确杀伤力的武器,使能够弄到这种武器的每一个家庭欣喜若狂。有了这种武器的人可以呆在自己家里朝 1 英里外的邻居开火,也可以躲在山上,从很远的射程外向山下的骑手射击;甚至村庄与村庄之间也可足不出户地交火,所以,当地人为买到这种伟大的科学产物开出了天价。流窜在印度各地的盗枪贼与贩卖枪支的走私犯齐心协力,使这种人人觊觎的武器在边境上慢慢地多了起来,甚至极大地强化了帕坦人对基督教文明的崇拜。

大英政府的行动则完全不能令人满意,简直令人十分扫兴。如果帕坦人冲出山来到平原上抢粮,他们不但会被赶回山里而且事后还要有一大串横加干涉之事,间或还有讨伐大军兴师动众地进山,惩处土著,要他们为自己造成的损失支付赔偿。如果这些讨伐队进山后,打了就走,谁也不会在乎;本来,印度政府奉行“杀完就撤”政策,讨伐队经常是打了就走。但到了 19 世纪末,这些入侵者开始在山里修路,特别是那条通往奇特拉尔的大路。为了保护公路的安全,他们威胁当地人,修筑堡垒,或向当地人发放补贴;对后一种方法没有人反对,但帕坦人十分厌恶这种修路不止的趋势。大路两旁的人应保持安静,不能在大路旁交火,更不能向路上的行人开枪;对帕坦人来说,这样的要求太过分了,一系列争执由此而生。

\* \* \* \* \*

我们向莫赫曼德进军途中,马蒙德山谷是必经之地。这个山谷是个箕形盆地,大约有十英里宽。我们与马蒙德人没有什么过结,他们恶名在外,所以我们竭力避免与他们纠缠上。然

而，我们的营地里到处都是漂亮的帐篷，还有成群的马、骡、骆驼和驴，马蒙德人实在受不了这种诱惑。夜晚，我们的篝火在四边形的营地中闪烁，正好当他们的靶子。单人狙击是免不了的，天一黑，我们的先锋旅便成了靶子，但损失不大，仅有几个人受了伤。吃晚饭时，有一阵子我们被迫熄了烛火，宾登·布拉德爵士不动声色地吃完了晚饭。第二天一早，我们不理马蒙德人的放肆，继续向纳瓦盖挺进，然而，土著人的情绪已经激动起来了，两天后，我们的第二个旅一到，好几百个当地人手执各种各样的新旧武器，向我们的人马热热闹闹地足足开了3个小时的火。好在大部分官兵已经掘出了浅浅的壕坑，而且营地周围还有防御战壕。然而，晚上我们被打死近四十名官兵，还有不少马和驮运物资的牲口。接到报告后，宾登·布拉德爵士命令还击。指挥第二个旅的是杰弗里斯将军，他奉命于次日开进马蒙德山谷，严惩野蛮的敌人。他们将扫荡整个山谷，毁掉所有庄稼，炸掉水库，尽可能多地摧毁山谷里的堡垒，打死任何敢于阻挡他们前进的人。宾登爵士对我说：“如果你想看打仗，你可以回去到杰弗里斯的部队里。”于是我找了一个返回第二个旅的孟加拉骑兵作伴，小心翼翼地穿过两个营地间的10英里地，于傍晚到达杰弗里斯的指挥部。

整整一夜，子弹在营地上空横飞，但现在我们每人都有了一个可以隐藏的地坑，马和骡子也得到了很好的保护。9月16日一大早，由一支孟加拉骑兵中队在前方开路，全旅人马呈战斗队形开进马蒙德山谷，不久便在宽大的山谷里分散开来。全旅分成三支独立分队，每支分队各有其讨伐任务，三支分队呈扇形散开；因为整个旅只有不到1200人，所以我们不久便分散成零星的小股部队。我跟着中间那支分队，这支分队的任务是冲到山谷的尽头。我走在骑兵队里。

我们一枪未发便到了山谷顶头，村庄里和平原上看不到一个人影。走近山前，我们从望远镜里发现有很多人影聚在一个圆锥形的小山上。我们下了马，大约有十五支卡宾枪从700码外一齐朝山上开火，山上立刻冒出团团硝烟，子弹在我们所在的小树林里呼啸。这场冲突持续约一个小时，这时步兵也越过平原，离我们越来越近了。他们到达后，决定由第三十五锡克兵团的先锋连进攻山头，另外两个连沿着此山左侧的一个山坡向一个村庄攻击前进，隔着山上的大石头和山下的玉米地可隐约看到这个村庄的屋顶。骑兵的任务是在平原上布防，并与旅长手下的预备队保持联系，这支预备队主要由东肯特团的人马组成。

我决定跟着第二组去攻打村庄，我丢下马，与步兵一起朝山坡爬去。烈日当空，炎热难当，我们迈着沉重的步子，磕磕绊绊地往上爬，一会儿穿过玉米田，一会儿翻过大石块，有时走在山间石道上，有时走在光秃秃的山坡上。山上偶尔打来几次冷枪，此外平安无事。我们越爬越高，马蒙德山谷恰似一个椭圆形的箬箕呈现在我们的眼前。我坐在一块石头上，停下来擦去眉毛上的汗水，同时朝山下打量。当时大约已是11点钟。首先引起我注意的是，看不到部队了；半英里外的山脚下有几个下了马的骑兵，远处冒出一缕细烟，那是被摧毁的堡垒在燃烧。大部队哪儿去了？几小时前出发时我们有1200多人，现在全被大山谷吞了。我拿起望远镜，在山下的平地上搜索起来；到处可见泥巴垒墙的村庄和堡垒，陡深的河道和水库在闪光，不时还能见到几片耕地和零星的树林，只是不见英印旅的影子。

我这才意识到，我们这组人其实很少，连我自己在内才有5名英国军官，此外还有大约八十五名锡克兵，仅此而已。我们这几个人已经来到令人敬畏的马蒙德山谷的顶端，准备来讨伐山里最偏远的村庄。我刚从桑赫斯特军校毕业不久，还能记得课

程中有关“兵力分散”的警告；早上大军出营时的小心谨慎与我们现在这几个人所处的形势形成了极大的反差，然而，正如大多数莽撞的年轻人一样，我想找点麻烦，只希望能发生点刺激的事。事情果然发生了。

我们终于来到了这个仅有几间土屋的小村庄，与其他村庄一样，这个小村子也是空的。这个村庄坐落在一个山坡上，与后面的群山相连。我与1名军官和8名锡克兵在小村朝山的那一面躺了下来，其他人则进了那些土屋里搜索或坐在土屋后休息。一刻钟过去了，什么事也没发生。这时连长来了。

“我们准备撤退，”他对少尉说，“你留下来掩护，等我们撤到下面的那个山丘上你再撤。”他又补充道，“预备队似乎没有跟上来，团长认为，我们在此没有人接应，太危险。”

我觉得这种想法很有道理，我们又等了10分钟。在这段时间里，我看不到我们连的主力在干什么，我想他们一定是在往村子下面的那个山丘上撤。突然，山边活跃了起来，岩石后闪出了利刃，鲜艳的旗帜到处飘扬，我们前方冒出了十几团很分散的硝烟，附近响起了巨大的爆炸声。在我们的上方，从1000英尺、2000英尺、3000英尺的高山上出现了身着白色或蓝色衣服的人影，他们像猴子爬树一样顺着山上的岩脊爬了下来。呐喊声四起。咳！咳！咳！砰！砰！砰！山上到处都冒起硝烟，那些援山而下的身影离我们越来越近。8个锡克兵各自为战，开枪的速度越来越快。那些虎视眈眈的人影不断从山上下来，我们前方100码左右已经聚起了几十个人。这些靶子太诱人了，我从身边的锡克兵手里借来了步枪，他很高兴地为我递子弹。我仔细瞄准，朝聚在石头后面的人射击；我们周围也是子弹横飞，但我们紧紧地趴在地上，所以并未受到伤害。就这样我们打了5分钟，越打越激烈，我们总算找到了冒险机会。这时我们身后传

来了一个英国人的声音，原来是营副来了。

“撤！没时间了，我们在山丘后面掩护你们。”

借我步枪的那个锡克兵把八九颗子弹丢在了地上。不能让任何枪支弹药落在土著人的手中，这是规矩。这个锡克兵太激动了，于是我把子弹一颗一颗地递给他，让他放回子弹袋，幸亏我想到了这一点。我们组的其他人已经站起来来回撤。子弹从石头后面猛扫过来，到处是一片尖叫声和呐喊声。我估计，就在这一刹那间，我们有五六个人又躺了下来。果然如此，2人阵亡，3人负伤了。有一个人胸部中弹，鲜血喷涌而出；另外一个仰面躺在地上，又是踢又是蹬；那位英国军官在我身后直打转，他脸上血肉模糊，右眼也被打出来了。这确实是一次冒险。

在印度边境上，打仗时不能把伤员丢在后面不管，任何人落在帕坦人的手里都会被剁成碎片。这时，营副转回头，还带来了一个英国少尉，一个锡克人准尉和二三名士兵。我们一起扶起伤员，拖拖曳曳地往山下撤。我们十一二个人架着4名伤员，穿过那几间屋子，来到一块光秃秃的空地上，连长带着五六个兵正等在这里。下面150码开外的那个山丘应该是我们掩护部队的位置，但却看不到他们的人影。也许是在下一个山丘吧。我们顾不得伤员的抗议，拖着他们往前赶。我们没有任何人作后卫，大家都在架着伤员，所以我估计我们很快便会遇上麻烦。我们正走在这块空地中间，突然从山上的屋后窜出二三十个怒气冲冲的人，他们拼命开火，手中还舞着刀。

后面发生的事我只能零星地记得几个片断。帮助伤兵的两名锡克兵中，有一个被打中了腿，他痛得狂呼乱叫，包头巾也散开了，长发披落，那样子就像是一个可怜的怪脸玩偶。从下面赶来两个人扶住伤员，我和新来的少尉则抓住怪脸玩偶的衣领把他往前拖；幸好我们走的是下坡路。他显然是被路上的尖石头

弄痛了，他要我们放手，让他自己走；他又是蹦又是爬，跌跌撞撞地，但走得不算慢，总算保住了性命。我朝左边一看，营副也中弹了，由4个兵架着走；他实在太沉，那几个当兵的死死地揪着他。这时，从房子后面冲出五六个手持大刀的帕坦人；架着营副的那几个兵一看帕坦人来了，撒手就跑，丢下了可怜在营副。领头的一个帕坦人冲上前来，挥起大刀向倒在地上的营副砍了三四刀。当时，我不顾一切，只想杀了这个家伙。我身上带着锋利的军刀，上学时我曾得过击剑奖牌，于是我决心与这个家伙决斗一场。这个野蛮的家伙看到我向他走去，相距二十码左右时，他用左手拾起一块大石头，向我扔过来，然后他挥着手中的刀，等我上来。他身后不远处还有人在等着我，我改变了主意，决定不用刀。我拔出手枪，仔细瞄准，开了一枪，没打中，又开了一枪，还是没打中，紧接着又开了一枪，究竟有没有打中他，我也搞不清楚，反正他往后跑了二三码，又躲到一块大石头后面去了。到处都是枪声，我四下一看，看不到一个朋友，只剩下我一个人孤零零地站在敌人面前。我撒开双腿，拼命地跑，子弹擦肩而过。我跑到第一个山丘跟前，谢天谢地，锡克兵正守在下面那个山丘后面，他们拼命向我打手势，不一会儿我便来到他们中间。

我们还得沿着山脊走四分之三英里才能走回平原，在我们的两旁还有几条山脊。我们的追兵顺着这几条山脊飞奔，不断朝我们的两翼开火，想切断我们的去路。我记不清我们到底走了多长时间才到谷底，反正我们一直在向下撤，走得很慢。我们架着2名受伤的军官和6名受伤的锡克兵，一共用了约二十人；我们身后丢下了1名阵亡军官和十几个或死或伤的士兵，他们都被帕坦人剁成了碎片。

在这段时间里，我拣起了一个死亡士兵的步枪和弹药，朝左侧80—120码开外的山脊打了三四十枪，每打一枪都经过仔细

瞄准。在这种情况下射击,最大的困难是,人跑得上气不接下气,也不知是因为太累还是太紧张,两手发抖。但我敢肯定,我从来没有不瞄准就瞎放枪。

到达谷底时,我们乱哄哄地围成一堆,不过我们还是带着伤员。山下有我们连留下的预备队、一名中校营长和几名勤务兵。我们把伤员放在地上,连里的幸存者肩并肩排成两排。在我们的两侧,二三百名土著人散开呈半圆形,把我们围在当中。白人军官竭尽全力,想把锡克兵聚拢在一起,这种队形就像是一个巨大的靶子,但目前只能如此,无论如何,这要比兵力分散好。帕坦人也挤在一起,兴奋异常。

中校对我说:“东肯特团离此地不到半英里。去叫他们赶快来,否则我们全完了。”

我正要转身上路,这时想起了一件事。在我的想象中,这个连已经被消灭了;作为师长的勤务参谋,我是唯一的幸存者,如果上气不接下气地拼命跑回去报告这个坏消息,请求援助,如何解释呢?

“长官,我必须拿到书面命令。”

中校有点吃惊,他东翻西找,摸出了笔记本,写了起来。

就在这时,连长在一片闹哄哄的声音中大声命令士兵们停止射击,不要乱开火。我听到一声令下:“齐射。准备。打。”轰!至少有十几个土著人倒下了。再一次齐射,他们动摇了。第三次齐射,他们退到了山脚下。冲锋号吹响了,大家齐声呐喊,危机过去了。这时,东肯特团的先头小分队也出现了。感谢上帝!

我们欢庆胜利并吃了午饭。然而,在天黑之前,我们还有不少事呢。

\* \* \* \* \*

东肯特团到达后,为了挣回面子并运回营副的遗体,我们决定打回山坡上去。我们一直打到下午5点钟。

与此同时,第三十五锡克团的另一个连在我们的右侧往山上进攻,他们的遭遇更惨。后来他们回到谷底的平原上时带回了十几名伤员,把好几名军官和15名士兵丢在山上喂了狼。山谷里落下了夜幕,早上匆匆忙忙派出的各支分遣队在夜色里、暴雨中回营了,后面跟着尾随而至的野蛮的敌人。我跟着东肯特团和伤亡惨重的第三十五锡克团一起回营,我们走进营地周围的战壕时天已经黑了下來,其他各路人马都已经回来了,他们打了一天,虽然损失不大,但总是未尽人意。然而,将军怎么不见了?他的参谋们哪儿去了?那支骡拉炮队呢?

营地四周有重兵把守,在零星的枪声中我们吃了点东西。两个小时过去了,将军哪儿去了?我们现在知道了,他除了带着炮队,还带了半个连的士兵和10个白人军官。突然,约三英里之外的山谷里传来了炮声;过一会儿又响了二十几炮,接着便沉寂下来。出什么事了?在黑灯瞎火的夜里,将军的炮队在打什么呢?显然,他们是在向近距离目标开炮,他们肯定是与敌人缠在一起了。不过,这几声炮响是否是求救信号呢?我们是否应该派出援兵呢?主动请战的人肯定是会有的,于是,高级军官们紧急磋商。只要出了什么差错,人们往往会抛开规矩不管,所以我也参加了他们的讨论。最后决定,夜间不派任何部队出营。大山谷里到处都是陷阱和障碍,在黑漆漆的夜里派出一支人马到处瞎撞,只会进一步造成麻烦;如果营地受到攻击,这样还会削弱营地的战斗力,而营地受到攻击是很有可能的。不管将军

和炮队现在在哪儿，他们必须坚持到天亮。山谷里又传来了炮声；还好，他们还未被消灭。我第一次看到了战争中的焦虑和紧张，显然战争并非完全是快乐的冒险。我们已处在危险中，任何事都可能发生。当天夜里他们作出决定，第二天天一亮，孟加拉轻骑兵中队由步兵掩护，出营去援救将军。现在已经过了午夜，我连马靴也没脱，呼呼睡了几个小时。

在白天里，开阔的谷地对我们来说没有什么可怕的，我们在一个土屋小村里发现了将军和炮队。他吃了不少苦头，头部受了伤，但并不严重。天黑时，他带着人马钻进几间屋里，把这几间屋当成了临时堡垒。这时，马蒙德人也进了村。整整一夜，在这个迷宫般的小村子里，战斗从一间屋打到另一间屋，从一条小巷打到另一条小巷。袭击者对地形了如指掌，他们是在自己家里打仗；防御者则一点也不了解地形，只能在黑暗中坚守。土著人穿墙越户，用枪打，用刀戳。这是一场近战，敌我交错，相互对射；大炮被当成了手枪，朝二三码以外的敌人就开了炮。10个英国军官伤了4个，士兵死伤达三分之一，几乎所有骡子非死即伤，到处是血。大难不死的军官个个形容枯槁，幸好现在一切都结束了。于是我们打死了受了伤的骡子，并吃了早饭。

回营后，我们的将军在远处的一个山头上利用日光反射信号与远在纳瓦盖的宾登·布拉德爵士取得了联系。宾登爵士和我们的先行旅也于前一夜遭到猛烈攻击，他们损失了几百头牲口和二三十个士兵。宾登爵士命令我们呆在马蒙德山谷，用火与刀把山谷夷为平地。我们奉命照办，但十分谨慎；我们有条不紊，一个村庄接着一个村庄，烧了房屋、填了水井、炸平塔楼、砍了大树、焚了庄稼、毁了水库，以示惩罚。只要村子坐落在谷底的平原上，毁起来是很容易的；土著们坐在山上，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家园被毁了。然而，当我们进攻山脚下的村庄时，他们奋

起抵抗。在每一个村子里我们都要损失二三名英国军官和15—20名士兵。这样做是否值得,我说不清楚,总之,半个月过后,整个山谷成了一片废墟。我们的面子保住了。

## 远征蒂拉赫<sup>①</sup>

9月16日我们失利后,军队作了一番调整,我被临时调入第三十一旁遮普步兵团。除团长外,该团只有3名白人军官。我先后在以下几个团里正式服过役:第四轻骑兵团,第三十一旁遮普步兵团,第二十一长矛轻骑兵团,第二近卫军团,皇家苏格兰燧发枪团,最后是牛津炮兵团。这些团驻守在亚洲、非洲和欧洲等不同地区,各团情况迥异,但旁遮普步兵团是最为独特的一个团。我虽然是个骑兵军官,但在桑赫斯特军校我也受过步兵训练,我自信在大小战斗的指挥上我是能胜任的。在这个团里,语言障碍很严重。因为军官缺乏,这些士兵被划归我的麾下,而我跟他们连一句话也搭不上,几乎只能靠打手势和做动作相互沟通。他们的语言我只会说三个词,一个是“Maro”(杀),一个是“Chalo”(冲),还有一个叫 Tally ho! 这个词不用解释,意思很明确。在这种情况下,连长和士兵根本不可能像操练手册所要求的那样结成亲密的关系。不过我们硬是挺过来了,经过三四次战斗也没有出现意外;这几次战斗并没有什么了不起,但对参战者来说却是很好的锻炼,十分令人振奋,这肯定是我以身作则的结果。

尽管我无法进入他们的思想感情深处,但我渐渐发现了旁

---

<sup>①</sup> 山名,位于现在的巴基斯坦境内。

遮普士兵的可敬之处。毫无疑问，他们很喜欢在战斗中有白人军官在身旁，他们仔细观察军官的一举一动，你笑他们也就跟着笑，所以我笑得非常勤勉。与此同时，我不断通过电报和信件向《先锋报》和《每日邮报》发稿。

现在，我很有希望永久性地加入马拉坎德野战军，有望在崇山峻岭间走上些时日。然而战斗的性质已经变了，9月16日我们失利的消息在土著人中间早已传遍了；当然，马蒙德人很可能放风说他们打了个大胜仗，他们夸大了我们的伤亡人数，而且他们肯定宣称自己在战斗中是有计划的；我们也这么说，但他们并不读我们的报纸。整个边境地区兴奋异常。9月底，更加强大的阿夫里迪人也加入了反叛者的行列。阿夫里迪人生活在白沙瓦北部、开伯尔山口以东的蒂拉赫山区。蒂拉赫地区的山比马拉坎德地区的山更高更陡，蒂拉赫的山谷又陡又深，谷底不平，这种地形对土著十分有利，对正规军来说很棘手。蒂拉赫山区的中心有一块像马蒙德山谷一样的平原，但面积更大，只有经过山间峡谷才能进入这块名叫马伊丹的平原。这块平原就像是汉普顿宫<sup>①</sup>一样的迷宫，只不过它的周围是山而不是栅栏。

印度政府心血来潮，决定派兵远征蒂拉赫，毁掉阿夫里迪人的粮草、牲畜和房屋，在严冬之际把他们的男女老幼全都赶进深山，让他们吃苦头。为此，他们需要动用两个师，每个师有3个旅、35000人，此外还需要大量人员保障交通运输和大本营的安全。这支部队按计划调集完毕，在白沙瓦和科哈特结集，准备进攻蒂拉赫。白人的部队从未到过马伊丹，这次行动被当作阿富汗战争以后边境地区最严重的一次战事，指挥权交给最优秀、最

---

<sup>①</sup> 伦敦附近泰晤士河畔的宫殿，建于都铎和斯图亚特王朝，是英国皇家住地。

有经验的威廉·洛克哈特爵士。宾登·布拉德爵士继续留守马拉坎德,拖住当地的土著人。于是,我们现行的军事行动停止了;与此同时,旁遮普省的白人预备役军官也充实到团里来,于是我盯上了蒂拉赫远征军,千方百计想加入这支队伍,可是我在这支部队的上层没有熟人。伊恩·汉密尔顿上校在这支部队中指挥一个旅,本来他肯定是可以帮忙的,然而,不幸的是他在向科哈特山口进军的途中摔下了马,跌断了腿,丢了旅长职位,未能参战,简直伤心极了。我脱离了一支部队,还未来得及加入另一支部队;在这种不上不下的情况下,我的团长又从印度南部催我归队。尽管宾登·布拉德爵士愿意收留我,我的希望还是落空了,只好回到班加罗尔。

回营后,团里的军官对我以礼相待,但他们普遍认为我休假已经够长的了,应该好好静下心来处理日常事务。团里的秋季练兵已进入高潮,不久就要举行军事演习。就这样,马蒙德山谷的枪声还在我耳边回响,两个星期后我已经在2000英里之外忙着演习、放空枪了。只听得耳边枪声四起,但见周围的人个个都伸着脑袋,谁也不隐蔽,这情形真古怪。除此之外,生活一如继往,我们依然日复一日地顶着烈日,口干舌燥地行军、露营。我们所在的迈索尔地区风景秀丽,大树枝繁叶茂,水泊星罗棋布;我们演习场地在努迪德鲁格山周围,这座山里有金矿,山里到处是红叶似火的树林。

这样的生活没有什么可抱怨的。日复一日,月复一月,我密切关注着关于蒂拉赫战役的新闻报道。两个师的人马杀进山中,最后经过多次战斗,付出了极大的伤亡代价才到达蒂拉赫中部的平原。部队的下一步行动应该是在严冬到来之前撤出蒂拉赫,这一点他们做到了,但撤离得还不够快。义愤填膺的阿夫里迪人现在扬眉吐气,他们沿着山脊向正在山脚下的河道里艰难

跋涉的大军狂扫猛射。在撤退途中，部队每天都要涉过 10—12 条河，河水冰冷刺骨，几百名士兵、几千头牲畜被子弹击中，沿着巴拉山谷撤退的第二师遭到穷追猛打。我们私下里听说，这次撤退不像是讨伐队的凯旋，倒更像是一次大溃退。到底是谁受到了惩罚？到底谁为此付出了代价？这是明摆着的事实。好几个月以来，这支 35000 人的大军在这些峡谷里围剿阿夫里迪人，阿夫里迪人也在围剿这支大军，同时还有 20000 大军防守交通线。这笔开销如果用卢比<sup>①</sup> 计算的话，总数大得惊人。加尔各答的那些自作聪明的家伙愁眉不展，英国国内的反对党则更是怨声不绝。

对远征蒂拉赫的失利我并不感到很难过，他们不让我加入这支远征军是很自私的，我估计他们次年春天还得再次远征，于是我加倍努力，想加入大军。我母亲鼎力相助，她为了我不遗余力地到处奔忙。在我的指挥下，她狠下了一番功夫，围攻沃尔斯利勋爵和罗伯兹勋爵，但这两座“堡垒”就是顽固不化。罗伯兹写道：

我很乐意助令公子一臂之力，但乔治·怀特爵士大权独揽，温斯顿曾在马拉坎德野战军中布拉德将军的麾下干过，现在既然乔治·怀特爵士不同意他加入布拉德的部队，我与洛克哈特将军联系也没有用。我敢肯定，乔治·怀特爵士肯定不会批准他参加蒂拉赫野战军。

我将致电乔治·怀特爵士，但在这种情况下，他肯定会怪我这么做的。

---

<sup>①</sup> 印度货币单位。

与此同时,我被拴在班加罗尔,脱身不得,不过,圣诞节期间很容易弄到10天假期,10天并不算长,但足够到边境往返一趟的了。当然,在未作好准备之前我是不会贸然前往基地司令部的。军界就像一只怪猫,只要你不被它的爪子抓到,这只猫还是很好玩的;但如果这只猫恼怒了,也十分难以对付,而且很难使它平息下来。于是我决定不去边境,先到印度政府所在地加尔各答,希望从这里弄到上前线的职位。当时,乘火车从班加罗尔到加尔各答需要三天半时间,这样,扣除往返的时间我只有60个小时左右办这件大事。当年的印度总督是埃尔金勋爵,后来我在他的手下当过殖民事务次官;他对有人介绍来的年轻军官十分客气,我受到了热情款待,参加了加尔各答卫戍部队所举行的两周一次的定点越野赛马,我居然赢了。赢了赛马当然很好,可惜我的正事没有一点进展。来加尔各答之前,我调动了各方面的关系,并听取了军中最高层人士的意见,他们一致认为我应该直接去找人事参谋主任,但此人很不友好,幸好我已记不得此人姓名了。当时,如果他同意,我就可以上前线;如果他反对,此事谁也办不成。于是,我来到他办公室的候见室,请求接见,他直截了当地拒绝接待我,我意识到我的事要落空了。这两天我在餐桌上遇到的军中上层人物心中窃笑,他们都知道我此行的目的,也知道我会受到什么样的待遇。从总司令乔治·怀特到普通军官,他们都十分友好,但他们的友好态度似乎暗示着有些话题最好不要谈。就这样,60小时过后,我被迫又爬上火车,心灰意冷地赶回班加罗尔。

这一年冬天,我写出了生平第一本书。我从国内得知,我投给《每日邮报》的稿件反响颇佳,投给《先锋报》的稿件反应也不错,我打算在这些稿件的基础上搞一点文学创作。朋友们告诉我,芬卡斯尔勋爵也在写一本关于这次远征的书。我们在比赛,

看谁的书先写出来。我不久便体会到了写作的乐趣，本来每天中午的时间全花在午休和打牌上，现在我把这三四个小时全花在了写作上，乐此不疲。圣诞节过后不久我便完成了手稿，并寄回国交给母亲去卖，她把这本书安排在朗曼公司出版。

养成了写作习惯后，我开始写小说，我打算写一部长篇。我觉得写小说比精确地叙述史实要快得多。小说一旦开了头，故事便可自我发展。我以反叛为主题，把故事安排在巴尔干地区或南美洲的某个虚构理想国；故事的主线是某位自由派领袖的命运，他推翻了专制政府但不久就被社会主义革命的洪流吞没了。随着故事的发展，我的战友对此十分感兴趣，他们提出各种各样的建议，要我加点爱情内容，但我未能接受，我在书中写了很多有关战争和政治的内容，夹杂着当时我能想象得出的评论和议论。故事的结局是，一支强大的钢铁舰队镇压了叛军首都。写这部小说只用了两个月，后来发表在《麦克米伦杂志》上，小说的名字叫《萨伏罗拉》，随后又出了几次单行本。在几年时间里，这本书为我赚了大约 700 英镑，我一直劝我的朋友们不要读这本小说。

与此同时，我那本关于边境战争的书正式出版了。

把校样寄到印度需要两个月，为了不浪费这段时间，我把校对任务委托给我的一个叔父，他才华出众，并善于写作。但因为种种原因，他漏掉了上百个令人吃惊的印刷错误，而且对我的标点未作任何修改。尽管如此，《马拉坎德野战军》一书一举成名，读者众多。评论家虽然对印刷错误等讹舛多有嘲讽，但他们却争先恐后地对这本书大加颂扬。一大捆书评与样书一起寄到我手中，我读着这些恭维话心里十分高兴、十分自豪，同时也因为书中的讹舛而惶恐。诸位肯定还记得，我以前从来没受过表扬；读书时，我的作业上的批语总是“平庸”、“凌乱”、“马虎”、“差”、

“实在差”等等。而今，主要文学报纸和学识渊博的评论家给了我通栏的溢美之词，这个世界真伟大！想起他们对我的“风格”的赞誉，我现在都应该感觉到脸红。《雅典娜》的评语是，“满篇都是内皮尔<sup>①</sup>式的雄文，但却是由出版商的疯疯颠颠的校对人胡乱加的标点。”别家报纸没有这么挑剔，更多的是恭维。《先锋报》说什么“其睿智和领悟力超越了他的年龄”。这种话真受用！我欣喜若狂。我意识到，如果这本书能得到认可，以后的机会多着呢；我觉得我找到了一种新的谋生方法，前程无量。几个月内，这本小书为我赚得的钱就抵得上我当少尉的两年军饷。当时世界上好几个地方正发生战争，我决定等战争一结束，我们赢了马球赛之后，立刻弃军从文，在英国享受完全独立的生活，再不受军纪的约束，不要别人对我指手划脚，也不让号声搅了我的梦想。

在我接到的所有信中，有一封使我特别兴奋。这封信表明，威尔士亲王<sup>②</sup>对年轻人十分关心，他一直如此。因此我把这封信抄录如下：

亲爱的温斯顿：

我忍不住想写几句话，恭贺你的大作获得成功！我怀着极大的兴趣拜读了你的大作，我觉得描写和语言总的来说都很出色。每个人都在读这本书，大家对它都赞不绝口。你亲历过战争，你会希望进一步体验军旅生活的。我相信，你与芬凯瑟一样，有机会获得维多利亚十字勋章。他打算

---

① 罗伯特·内皮尔(1810—1890)，英国陆军元帅，曾率兵入侵中国和埃塞俄比亚，后任驻印度英军总司令等职。

② 即后来的英国国王爱德华七世。——作者原注

弃军从政,我深觉遗憾,希望你不要步他的后尘。

你来日方长,在当上议员之前应该留在部队里。

祝事业有成!

爱德华

1898年5月22日于马尔伯勒公爵府

5月中旬我们团的马球队要北上参加一年一度的骑兵马球锦标赛,在此之前我再也请不到假了。我有幸在马球队谋得一席之地,不久便来到举办锦标赛的城市密拉特。我觉得,我们无疑是参赛球队中的第二强队,我们败在达勒姆轻步兵队的手下,这支球队是唯一的一支曾在骑兵马球锦标赛中夺冠的步兵球队,他们战无不胜,所有球队都败在他们手下,连当地的最佳球队也不例外。这些步兵战士把戈尔康达和拉杰普塔纳地区的球队打得望风披靡,使当地王公的颜面丧失殆尽。在印度的马球年赛中,没有哪一支球队的记录可与他们的成绩相媲美,他们的成就得益于一个人的智慧和毅力。此人便是德莱尔少校,后来他在加利波利战役中一举成名,还在西部战线上出任过军长。当时,他组织训练的这支球队连续4年打遍印度无敌手。在他于印度执教马球的最后一年里,我们败在他那高超的球艺之下。

密拉特在班加罗尔以北1400英里,但距离前线还有600多英里的路程。我们的假期在锦标赛结束后的第三天便告结束,而乘火车回班加罗尔正好需要3天时间。从密拉特到白沙瓦需要一天半时间。现在我拼了命,觉得应该冒一次险。伊恩·汉密尔顿伤势已经痊愈,重新接管了从蒂拉赫撤回的那个旅。他在军中威信很高,是乔治·怀特爵士的老朋友,与威廉·洛克哈特爵士的关系也很不错。我与伊恩·汉密尔顿久有联络,他为我出了不少力。他传给我的消息不是很振奋人心,远征军中还有不少

空缺未填满,但人事安排取决于加尔各答方面,由人事参谋主任决定,只有一种情况例外,即威廉·洛克哈特爵士的私人参谋可自行任命。我并不认识威廉·洛克哈特爵士,据我所知,我的父母与他也没有交往。我怎么可能打通他这道关节呢?当然,说服他任命我为他的参谋更不可能;他私人班子中下级参谋的位子只有两三个,人人对此都垂涎三尺,怎么能轮得到我呢?况且,他的参谋班子已经齐了。不过,伊恩·汉密尔顿上校赞成我冒险一试。他写道:“我将尽力而为。总司令有个副官叫霍尔丹,与我在戈登的苏格兰团共过事,他能量极大,实际上全军上下都说他的影响太大了。如果他对你有好感,什么事都好办。我正在为你铺路。他与你没有交情,但也没有过结。如果你能来努力一番,你也许能凭你的口才说服他,把这件事办成。”

这便是他来信中的大意,在我们半决赛失利后的第二天上午我接到了这封信。我坐在火车里,向车窗外左顾右盼。花一天半时间乘火车赶到白沙瓦,在白沙瓦停留几个小时,然后在假期结束前用四天半的时间赶回班加罗尔,这明显是不可能的。总而言之,如果我乘车北上而又不能在前线谋到职位,那么我至少得超假48小时。我十分清楚,这是违反军纪的,应当受到处罚。正常情况下,打个电报申请延长假期是很容易的,但一旦团里了解了我去前线的目的,那么不但假期不能延长,他们还会立刻召我归队。在这种情况下,我还是决定冒险一搏,于是我立刻动身前往白沙瓦。

在早晨的清冽空气里,我带着一颗怦怦直跳的心来到司令部找威廉·洛克哈特爵士。我向里面的副官通报了姓名,于是,令人敬畏的霍尔丹先生走了出来,他不太热情,但显然对我还有点兴趣,显得举棋不定。我不记得自己是如何说的了,但我肯定有好几次把话送到了点子上。霍尔丹少校在砾石小路上徘徊了

半个小时左右,随后说道:“好吧,我进去问问总司令,看他怎么说。”他离开后,我独自在小路上彷徨,没过多久他就出来了。“威廉爵士决定,”他说道,“任命你为他的个人勤务参谋,你立刻到任。我们正在与印度政府和你的团联系。”

刹那间我的命运发生了变化,刚才还是飘忽不定,现在一下子把握住了机会。我的衣领上挂上了红领章;人事参谋主任也在《政府公报》上宣布了对我的委任;团里从遥远的班加罗尔为我送来了马匹和佣人;我一下子变成了总司令的侍从。这个富有魅力的大人物熟悉边境上的每一寸土地,经历过40年来边境上的每一次战争,我不但有幸每天都能聆听他的谈话,而且有机会察看他的部队中的每一部分,而且总会遇上笑脸。

在前两个星期里,作为年轻人和下属,我表现得很规矩,而且别人也这么对待我。在餐桌上,我总是保持沉默,只是偶尔机敏地问一个问题。但有一件事使我在威廉·洛克哈特爵士的幕僚中的地位发生了变化。每天散步时,霍尔丹少校经常带着我一起走,不久我们关系便密切起来。他对我讲了很多有关洛克哈特将军以及参谋们的事;他还对我讲了内部人员对这支部队和各项行动的看法,很多事情都是我和公众所没有意识到的。有一天,他提起了一件事,有一位被遣送回英国的报纸记者在《半月评论》上写了一篇文章,对远征蒂拉赫的行动进行了严厉的批评——用他的话说,这种批评不公正。洛克哈特将军和司令部的参谋人员深受中伤。日后的英军总司令尼科尔森将军当时是洛克哈特司令的参谋长,此时已经有了“老尼克”这个绰号,他写了一篇妙文对此加以反驳,这篇文章已经随上一批邮件发往英国。

别人善待我,及时给我好的建议,现在我报恩的机会来了。我说,高级军官与一名被开除的随军记者在报纸上争执战事中

的是是非非，别人会认为这有失体统；我说，我敢肯定政府会大吃一惊，战争办公室也会对此火冒三丈；我说，军队参谋应该把为自己辩护的任务交给上级，或交给政治家；我说，不管有什么理由，一旦摆出来便会被别人看成是心虚的表现。霍尔丹少校为此深感不安。我们立刻转身往回走。总司令和参谋们彻夜商谈。第二天，他们问我如何才能把已经寄出的文章截下来？是否应该通知战争办公室，请他们出面向《半月评论》的编辑施压，禁止他发表这篇文章呢？编辑会答应这种要求吗？我说，他应该是位绅士，如果他接到作者的电报要求他不要让文章见报，那么他应该立即照办；不管他本人如何失望，他得尊重作者的意见。一个电报发回英国，接着就传来了令人放心的答复。这件事过后，我开始进入亲信参谋的圈子，别人也开始拿我当成人对待。我认为，在春季战役中我将处于一个很有利的地位，于是，我开始打算插手更重要的问题。总司令似乎对我很满意，我如鱼得水。不幸的是，我的好运来得太晚；本来我们每天都在盼着能进行一次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然而希望逐渐变得渺茫。与土著人进行一番长期谈判后，双方最终达成了和解。作为初出茅庐的政治家，我不得不赞成这种明智之举，然而这却有违我来白沙瓦的初衷。

这一切正像是河狸筑坝，堤坝筑好了，河狸正准备捕鱼，这时一场大水毁了坝，冲走了鱼，也卷走了它的好运。一切又得从头开始。

## 与基钦纳<sup>①</sup> 之间的麻烦

印度边境的战斗还没有结束,从苏丹又传来消息说,一场新的战役即将开始。索尔兹伯里政府公开表示要挺进喀土穆<sup>②</sup>,摧毁德尔维希政权,解放受摇摇欲坠的德尔维希暴政统治的广大地区。蒂拉赫远征军正在遣散,但新战役的第一阶段已经开始了。赫伯特·基钦纳爵士已带领约有两万人马的英埃联军抵达尼罗河和阿特巴拉河的交汇处,一举击溃了哈里发派来抵挡基钦纳手下的马哈茂德中尉所带领的军队。现在已经到了大战苏丹的最后阶段,即向南挺进 200 英里,直捣德尔维希首都,与德尔维希帝国决一死战。

我十分渴望能参加这次战役。

但是我又遇到了一位难以对付的大人物的抵制。我刚参军时,想上前线,几乎每个人都友好地激励我。……整个世界很友善。(第一眼看去确是这样。有了这种第一印象,年轻人做事便不会鲁莽。)

当然,第一眼已看过了,我现在感觉到,许多人偏听一面之

---

① 基钦纳(1850—1916),英国陆军元帅,曾率军击败苏丹,残酷镇压南非布尔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任陆军大臣,因所乘巡洋舰触雷沉没而溺水而死。

② 苏丹首都。

辞,对我有了偏见,很不赞成我的行动,他们开始对我抱有不友好的、甚至敌对的态度,他们开始说这样的话:“这家伙究竟是谁?他是怎么混进各次战役的?他怎么可以一边为报纸撰稿,一边当军官呢?一个下级军官怎么竟敢对上司评头论足呢?将军们为什么对他如此偏爱?他是怎么让他所在团给他批这么多假的呢?看看那些辛勤工作的军人,他们从未离开自己的日常岗位。我们已经受够了,简直是受不了。他现在很年轻,也许以后他可以这样做,但现在丘吉尔少尉必须受到长期管束。”有些话简直就是对我的诽谤。在军队的某些上层人物和下层人物的口中时不时会冒出“追逐奖章者”、“自我标榜者”之类的话,我想他们所说的话一定会使读者感到惊讶和痛苦。被迫记下人性中这些不良的一面实在是令人沮丧;奇怪的是,说不清是怎么回事,我每走一步,甚至在我还没有把步子迈出之前,似乎总会有人说三道四。

在准备参加苏丹战役的早期我就意识到,埃及军队的英国司令赫伯特·基钦纳爵士毫不隐讳地对我表示不满和敌意。虽然战争办公室同意我参加苏丹战役,但是我的申请最终遭到了拒绝,而另外几位与我情况相同的军官却获得批准。我通过不同渠道打听到的结果表明,是最高指挥官拒绝了我的申请,我不可能从班加罗尔的军营扫除如此重大的障碍。蒂拉赫远征军遣散之后,我可以享受一段时间的休假,我决定赶紧赶往大英帝国的中心,到伦敦去把这件事理论清楚。

一到伦敦,我立刻把所有力量动员了起来。为促成我的愿望,我母亲全力以赴,左一次右一次地邀请当时的达官显贵赴宴,前前后后有两个月,他们在餐桌上对我的问题进行着紧张的谈判。但是母亲的一切努力都是徒劳,影响我去埃及的阻力对于母亲来说太强大了,又太遥远,她力所不能及。母亲和基钦纳

爵士相当熟悉,为了我,她甚至亲自写信给将军。将军十分委婉地回信说,他手下参加这场战役的军官已绰绰有余;同时他还收到许多其他军官的申请,这些军官的资历远远胜于我;不过,信中又说,如果将来有机会的话,他会很乐意,云云。

当时已是6月底了,军队的总行动必须在8月初开始,时间已不能用星期而只能用天来计算了。

就在这时,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索尔兹伯里首相碰巧读到了我写的《马拉坎德野战军》。在政治上,以前他和我父亲之间的关系有所不幸,但他对这本书不仅感兴趣而且被深深地吸引了。他突发奇想,要会会这本书的作者。7月的一个早上,我收到他的私人秘书绍默格·麦克唐纳爵士的来信,告诉我首相读了我的书,非常满意,很想与我讨论其中的某些章节。信中问我能否找一天到外事办公室去拜访他一下,如果跟我的安排不冲突的话,下周四4点钟对他来说最合适。读者肯定能猜到我是如何回信的。

这位大人物是大英帝国的首脑、保守党的领袖,这是他第三度出任英国首相,同时兼任外交大臣,现在正是他政治生涯的巅峰。他在约定时间接见了。我第一次走进那间宽敞的房间,在那里可以俯瞰皇家骑兵卫队的阅兵式。后来不管是和平时期还是战争年代,我在此多年亲眼看着许多重大问题得到了解决。

这位英明的老政治家身上表现出伟大、庄严的气质。他坚决抵制现代思想,也许在某种程度上也正因为如此,索尔兹伯里勋爵在艰难时期为团结大英帝国不断壮大的力量起了巨大的作用,这是其他任何历史伟人所不能比的。很少有人能够预见这种力量,更无人能够衡量这种力量到底有多大。我记得十分清楚,他站在门口,用古老的礼节彬彬有礼地接见了,他打了一个迷人的欢迎手势,把我领到大房子中间的小沙发上坐下。

“我对你的书十分感兴趣，我读得几乎陶醉了，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我不仅欣赏其内容，而且欣赏其风格。两院关于印度边境政策的争辩十分激烈，许多误解使他们混淆不清。与我读过的文件相比，你的描述使我能够更清楚地了解这些发生在边境山谷中的战斗。”

我想我至多能受到 20 分钟的接见，我无意超过这个限度，因此看看时间差不多了我便准备起身告辞，但他跟我谈论了半个多小时，最后他才领我穿过地毯来到门口。临别时，他说：“希望你能允许我这样说，你让我想起令尊，在我的政治生涯中，有许多重要时光是与他一起度过的。无论何时，只要你有什么事我能帮上忙，千万要跟我说。”

回家后，我对这句话想了好久。我不想让老勋爵为我的事而为难，然而，从另一方面看，他与我告别时所说的话似乎能够帮我获得我当时最想得到的东西。首相是赫伯特·基钦纳爵士最强有力的支持者，如果首相发话，基钦纳一定会放弃反对我参战的决定，满足我的这个小小愿望。在以后的岁月里，我自己也处理过很多这类事；当年轻人要求上前线却遭到官僚的阻挠时，我常常不理睬反对意见，总是说：“他们只不过是要求去挡枪眼而已，让他们去吧！”

因此，我考虑了几天之后，向绍默格·麦克唐纳爵士求助，我孩提时就在社交圈子里见过他。那时已是 7 月份的第三周，看来在进攻喀士穆之前，我似乎没有任何办法加入英军在阿特巴拉地区的军队了。一天晚上，我找到了绍默格，发现他正着装去赴宴。我问他，能不能请首相发一份电报给赫伯特·基钦纳爵士？战争办公室已经推荐了我，我所在的团也批了我的假，第二十一长矛轻骑兵团也同意接受我，因此没有一点其他障碍。这种要求是否太过分了？能否帮我试探一下索尔兹伯里勋爵对此

有何看法？

绍默格回答道：“我肯定他会竭尽全力的，他对你十分满意，但是他不能越过某种界限，他可以用一种让人知道他很想让你去的方式提问，但如果将军不同意的话，你不能指望首相施加压力。”我说我对此已经心满意足了。

这位颇有骑士风度的秘书说：“我立即去办这事。”在索尔兹伯里勋爵长期的执政过程中，他是勋爵难得的知己和坚定的支持者。后来，他虽然年事已高，但坚决要求去大战的战壕里参战，到前线后就中了炮弹碎片身亡。

他没去赴宴，调头就去找他的上司。天黑之前，一份电报已发向远在埃及的英国总司令，电告他，虽然索尔兹伯里勋爵并不想干涉英国总司令在任命部下问题上的想法和决定，但在不妨碍公务的情况下，如果我想参加这次军事行动的愿望能得到满足，首相个人将会十分高兴。很快，首相就收到回电，回电是：赫伯特·基钦纳爵士已有了他所需要的军官，如果将来真有空缺的话，在考虑这位年轻军官之前肯定还会有其他军官值得考虑。

这一令人不快的通知最终传到我的耳中。如果我此刻真打退堂鼓的话，我根本就不可能经历恩图曼战役中那激动人心的场面。但就在这时，我得到了一则消息，给我带来了最后一线希望。

弗朗西斯·约恩爵士是一位非常杰出的法官，一直是我家的朋友；他的夫人，即现在的圣赫利尔夫人，常在军界活动，经常能够遇见人事行政参谋主任伊夫林·伍德爵士。她随后在伦敦市政委员会所进行的工作可以说是她的才能的展现，从中可以看出她对男人以及重大事务很有影响。她告诉我，在一次宴会上她亲耳听到伊夫林·伍德爵士说，赫伯特·基钦纳爵士对战争办公室推荐的军官人选挑三拣四实在太过分了，在他个人看来，他

根本不愿意看到战争办公室受到一支充其量不过是英军一支很小部队的指挥官的藐视。埃及部队毫无疑问应受到英国驻埃及的总司令的调配,而英军分遣队(由1个步兵师,1个炮兵旅以及1个骑兵团即第二十一长矛轻骑兵团组成)却是远征军的一部分,其内部组织理应完全由战争办公室支配。她告诉我,伊夫林·伍德爵士表露过对此事相当不满。然后我问她:“你有没有告诉他首相亲自为我发过电报呢?”她说没有。我对她说:“请告诉他,让我们看看他是否会奋起捍卫自己的特权。”

两天后,我收到战争办公室传来的简明通知,通知如下:

兹委任你为参加苏丹战役的第二十一长矛轻骑兵团的编外少尉。立即前往开罗的阿贝西亚营地的团指挥部报到。费用自理。如你在将来的军事行动中或因其他原因阵亡或受伤,英军不负任何费用。

奥利弗·博斯威克是《晨邮报》业主的儿子,在该报经营方面很有影响。他是我的同龄人,也是我的好朋友。拿破仑有句名言:“必须以战养战。”我现在感觉到这句名言的威力了。当晚我和奥利弗达成协议,一有机会我就给《晨邮报》写稿,稿酬为每栏15英镑。饭后,这位心灵研究会会长不合时宜地要我答应他,一旦真有什么不幸的事发生,我一定要跟他联系。第二天早晨,我赶上11点去马赛的火车,母亲在月台上跟我告别,6天后我到达了开罗。

\* \* \* \* \*

阿贝西亚军营到处是一派忙碌的景象。第二十一长矛轻骑

兵团有两个中队已经沿尼罗河溯流而上；另外两个中队也将于次日启程。为了增强第二十一长矛轻骑兵团的战斗力的战斗力，从别的骑兵团总共调来了7名军官。这些军官被分派到各个中队，负责指挥一个连。本来先遣中队为我预留了一个连，因为我行程耽搁，他们不知道我到底来不来，于是把这个连给了罗伯特·格伦费尔少尉，出发时他兴高采烈。在大本营里，我们本以为出发太迟，赶不上战斗了。也许前两个中队还能赶上，但谁也说不准了。格伦费尔给家里写信时说，“我真走运，我现在负责指挥本应属于温斯顿的一个连，而且我们是第一批出发。”我们的生命中总有机遇的存在，但我们无法看清它是如何运作的。在9月2日的战斗中，骑兵团发起冲锋，这个骑兵连被打得七零八落，年轻勇敢的连长牺牲了，他是格伦费尔家族中为大英帝国的战争而献身的第一位勇士。他有两个弟弟在后来的大战中阵亡，其中一位在献身前曾获得维多利亚十字勋章。格伦费尔兄弟的勇气并驾齐驱。

第二十一长矛轻骑兵团迅速、顺利地行军1400英里，准时插入非洲的心脏，这是基钦纳用兵的一贯特征。我们先坐火车到达阿西尤特；然后乘汽船到阿苏安；在菲莱，我们牵着马绕过大瀑布；在谢尔拉尔，我们又乘船航行4天后到达了瓦迪哈勒法；从那儿我们乘火车沿着军用铁路，越过了400英里的沙漠。这条军用铁路的建成预示着德尔维希政府的灭亡。我们离开开罗整整14天，最终到达了部队的大本营和铁路基地，阿特巴拉河在这儿汇入了浩大的尼罗河。

这次行军十分愉快，行军安排十分周到，我们感到非常舒服，非常方便。我们一路上无牵无挂，兴高采烈；到处能领略到新奇美丽的风景；大家都很激动地期待着即将到来的战斗；一想到我们是这次战斗中唯一的一支英国骑兵团，我心里便喜滋滋

的。这一切使我们觉得这次经历十分愉快，不过，我一路上却一直担心害怕。在开罗，我没有听到赫伯特·基钦纳爵士就战争办公室对我的任命发表任何看法。我不知道基钦纳在接到战争办公室推翻其拒绝接受我的电报之后会有何感觉，在我的想象中，基钦纳可能已经向战争办公室发出了抗议电报，这对战争办公室的决定无疑是个考验。这可能有点夸张了，不过像我这样心情焦急的人往往会这样想。在我的想象中，势可遮天的总司令顽固地发出抗议后，白厅里的人事行政参谋主任肯定被搞得焦头烂额。我每时每刻都在准备接到返回的命令。“将他遣送回基地，等战斗结束后，让他和新配备的马一同过来。”我现在毕竟受这位总司令的指挥，如果他想发出这类命令岂不是易如反掌。每当我乘坐的火车要进站时，或当我乘坐的轮船要靠岸时，我那双恐慌的眼睛总是在人群中来回搜索；一旦看到有人佩带参谋徽章，我就断定自己要完了。我想，逃离法网的罪犯每到一个落脚点就会跟我有同样的心情。不过，谢天谢地，好在当时没有无线电报，否则我心里就一刻也不得安宁了。当然，我们不能逃脱普通电报的纠缠，即使在当时，无论你走多远，电报线也能把你缠住。但我们有至少三四天时间跟无情的外部世界完全隔绝，在这三四天里我可以平安无事地沿着大河溯流而上。

在行军中，一站又一站过去了，没有出事，于是，希望在我胸中变得越来越强烈。在我们到达瓦迪哈勒法之前，我心里开始踏实起来。我暗自思忖，下面这场战斗对他来说性命攸关，他必须把部队集中起来，而且又要指挥部队前进，事无巨细，他事必躬亲，在这么一副复杂的重担面前，他也许有别的事情要过问，早忘了要与一位倒霉的少尉作梗这件事了。他也许没有时间、也没有耐心用密码电报去和战争办公室纠缠了。他也许忘了，他也许压根不知道这件事，这样最好。8月14日晚，我们从阿

特巴拉军营渡过尼罗河到达其左岸,准备行军 200 英里,直捣德尔维希的首都。当时我觉得我有理由相信:“死亡的痛苦已经过去了。”

我的一切努力毕竟没有白费。后来我得知,基钦纳爵士知道战争办公室对我的任命时,只是耸了耸肩,便转身处理大事去了。

## 恩图曼之战前夜

再也不会再有恩图曼战役那样的场面了，那场战役是一系列剧烈冲突的最终结果，正是这类冲突给战争带来了独特魅力。一切都赤裸裸地暴露在眼前。部队穿行在茫茫的荒漠平原上，尼罗河蜿蜒而过，浩浩荡荡。辽阔的沙漠平原上，时而出现骑兵，时而出现步兵。一声令下，骑兵策马疾冲，步兵则昂首站立，结队抵抗。从尼罗河两岸的岩丘上俯瞰，所有场景尽收眼底；海市蜃楼中的水影扭曲、模糊了这一切。这一切仿佛经过精雕细琢，最后又都消失在虚幻的粼粼波光里。一条条耀眼的河流——那里当然只有沙漠——从行进中的士兵的腰部和膝部穿过。炮兵的大炮或骑兵纵队在朦胧中飘忽，最后出现在赭色的坚硬沙漠上，驻扎在深红的山石和紫色的山阴间。火辣辣的日光刺破苍穹，从暗褐、青绿过渡到深蓝，沉沉地压在士兵们的身上。

8月15日晚，第二十一长矛轻骑兵团到达尼罗河左岸，在阿特巴拉汇合，随后又走了9天，才到沙布卢卡瀑布北面的先遣部队营地。这个地方很特别，在长达4000英里的尼罗河上，大自然唯独在此设置了一堵巨大的石墙。在这堵墙前，尼罗河不是绕道10英里，从它的西头过，而是直冲向这块巨石，从这块拦路石的中间夺路而出。沙布卢卡地形险要，易守难攻，如果不把所有的山都挪开，那么轮船逆流而上简直是天方夜谭。这种地

形对德尔维希部队有利，他们如果有人埋伏在沙布卢卡山后面，就随时可以从侧翼袭击敌军。当赫伯特·基钦纳勋爵从他的骑兵、侦察兵以及间谍处获悉此处无敌军防守时，无疑感到如释重负。

尽管如此，我们在行军途中绕过这些山脚时还是万分小心。所有骑兵做了一次大范围的包抄行动。尽管我们的部队走在里侧，但我们早上从沙布卢卡北面的尼罗河岸边出发，走到晚上扎营于恩图曼市旁，还是走了约二十五英里。我们骑兵巡逻队在灌木丛中巡逻时，个个睁大眼睛，随时准备遭遇到敌人，同时竖直耳朵，时刻等待着第一声枪响，但是除了偶尔几个飞驰而过的骑马人，我们没有受到丝毫干扰。夕阳染红了广阔的平原，我们平静地跟着长长的身影，口干舌燥地走向甜滋滋的尼罗河。此时，几艘平底的炮艇和汽船拖着一长串载有军需品的帆船，安然驶过瀑布。8月27日，我们在沙漠中的部队与尼罗河上的部队会师于沙布卢卡山的南侧，穿过平原，再有5天的行军就到我们的目的地了。

28日，部队最后一次向前挺进。我们进入了战斗状态，每天只走8—10英里，以保存体力，因为随时都可能发生战斗。我们的人和马都轻装上阵，除了基本的必需品外，什么也没带；每天晚上我们从尼罗河及河上的舰队那里取得淡水与食物。每年这个时候非洲的这部分地区天气酷热，虽然穿着厚厚的军装，戴着子弹袋与宽沿头盔，我们依旧感到太阳的烤炙。火热的光线似要穿透全身，挂在马鞍边的帆布水袋由于水的蒸发显得很凉爽，但不到傍晚便空空如也。晚上步兵扎下营地，骑兵保护部队也撤了回来。黄昏时分，我们结队来到水流湍急的尼罗河边开怀痛饮，惬意极了！

在这个时候，英国骑兵都认定根本不会有战争。该不是骗

局吧？真有德尔维希人吗？他们是不是英埃联军总司令和他的下属编造出来的呢？消息灵通人士说，恩图曼确实聚集着很多德尔维希人，但他们都不想打仗，现已向科尔多凡方向后退了几百英里了。“我们将一直向赤道开进？”这无所谓，眼下这份工作可算是美差，我们有开心的生活，健康的身体，激动人心的拉练，还有充足的食物和无限的饮用水——至少在黎明与黄昏时分是如此；我们总是不停地在发现新大地，说不定哪一天我们还能发现别的什么东西。但是31日晚上，我与一个苏丹营中的一些英国军官共进晚餐时，听到了不同看法，他们说：“敌人有不少人！”这些军官与他们打了10年。德尔维希人肯定会为其国都“英勇奋战”，他们不是那种临阵脱逃的人。我们将会发现他们守卫在恩图曼市外，现在我们距离这座城市只有18英里了。

9月1日，我们照常行军，刚开始非常平静，但接近九点钟，巡逻兵开始发现有情况。前方传来的消息陆续传遍了穿行在海市蜃楼中的部队。当时，我所在的骑兵连的任务只是支援先头巡逻部队。我们按捺住越来越强烈的兴奋缓缓前行。约十点半钟，我们到达一处高地，只见前方约一英里处我们的先头巡逻队停了下来，观察着他们正前方的什么东西。不多久我们也奉命停止前进。这时一位一直巡逻的很和气的中尉走过来，带来了一则很重要的消息。“敌人出现了。”他喜滋滋地说。“在哪儿？”我们问。“就在那儿，看不见吗？那条长长的黑线就是他们，他们没逃。”说着他继续赶路。我们都注意到远处这条黑线，不过原来都以为是灌木丛。在我们这个地点用最好的双筒望远镜也发现不了其他情况。这时又来了一位从前哨回来的准尉。

“有多少敌人？”

“不少，”他答道，“相当多。”说着也继续赶路。

接着来了一道命令，要求增援部队派一位人强马壮的少尉

到前哨的上校那里。

“丘吉尔先生。”我们中队长一声令下，我立即策马而去。

在一些沙丘附近的低凹处，我找到了马丁上校。

“早上好，”他说，“敌人刚开始前进，速度很快。我命令你去察看敌情，然后以最快的速度赶回来亲自向总司令汇报。注意别让马累垮了，总司令与步兵在一起。”

我终于能见到基钦纳了！他看见我会吃惊吗？他是否会发怒？会不会说“你来这里干什么？我想我告诉过你不要来”。也许他会不屑一顾？也许他只听取情报，不会留意送情报的小军官的名字？不管怎样，把敌人正在逼近的情报送给这位大人物，是我所能找到的、可以与之交谈的最好理由。这次机会与即将来临的战斗一样让我兴奋不已。这时，留在后方和去前方与敌人搏斗一样有趣。

彻底地侦察了敌情，了解了所有要向上汇报的前线情况后，我便骑马越过6英里的沙漠，从前方的骑兵先头部队赶回后面的主力部队。烈日当空，我估计我们很可能整个下午都会在马背上征杀，所以我十分当心我的战马。大约走了四十分钟，我接近了大部队。稍稍休息了片刻，让战马喘口气，自己则站在一处黑色的山丘顶上四下打量。站在山头能俯视全貌。只见景色十分壮观，英军与埃及军队按战斗队形前进。5支大军，每支由3—4个步兵营组成，散开队形，沿着尼罗河呈梯形分布。紧随其后的是长长的炮队，最后是载着军需品的绵延不绝的骆驼队。尼罗河上，与大军并行的是一支大型的船队，满载物品，由几十艘汽船拉着。舰队中，隐约出现七八艘整装待发的白色炮艇。在沙漠上靠近敌军的一侧，12支埃及骑兵中队遥相呼应，支援前线部队。沙漠深处还有几支灰褐色的骆驼队方阵。

我不想到达目的地时气喘吁吁，所以让马稍作歇息后，我才

朝部队的中部驰去。不一会,只见前方一面鲜艳的红旗之后有一支相当规模的马队。走到近前,在埃及军旗旁,我看见了英国国旗。基钦纳独自骑马走在前边,离司令部的参谋人员有2—3匹马的距离。两名旗手紧随其后,其他英埃联军中的主要参谋人员一同随行,这情形与连环画中一模一样。

我绕了半个圈子,从侧面走过去,使自己处于稍后于基钦纳的位置,向他行了军礼。我第一次看到这副引人注目的面容,或许多少年后这个面孔依旧会为世人所知。他转向我,神情严肃。他那浓密的胡须、奇特的眼睛、紫红色的面颊与下颌令人难忘。

“报告长官,我来自第二十一长矛轻骑兵团,有情况向您汇报。”他微微点头示意我说下去。根据自己侦察来的情况,我尽可能简要地描述了一下形势:敌人近在眼前,人数众多。敌军主力在7英里外,几乎正处在我们现在的位置和恩图曼之间;11点钟他们还没有动静,但11点05分他们开始行动。40分钟以前我离开时,他们依然在快速推进。

他静静地听取我的汇报,我们的战马踏在沙地上发出嘎吱声。停顿了好久他才又问,“你说德尔维希部队正在前进,你看我还有多少时间?”我脱口而出,“报告长官,如果敌军保持现在的速度,您至少有1小时,甚至1个半小时。”他突然扬起头,那样子让我疑惑不解,不知他是接受还是否认了我的估计。然后他稍稍欠了欠身,示意我的任务已完成了。我敬了礼,勒住缰绳,让其随行人员跟了上去。

我开始计算速度与距离,急切地想知道刚才自己断然所下的结论是否有道理。我自信偏差不会太大。德尔维希部队最快时速不过四英里,我估计敌我相距7英里,1个半小时绰绰有余。

我的思绪被一声友善的声音打断了。“跟我们一起吃午饭

吧。”说话的是情报处长雷金纳德·温盖特爵士的副官。他将我引见给他的首长，这位长官友好地接待了我。毫无疑问，吃了一顿饱饭，结识了一位朋友，充分了解将要发生的大事的可能性让我倍感愉快，与此同时，我看见所有步兵都排成列，对着尼罗河形成一弧形。在先头部队的前面，多刺的灌木丛被迅速砍倒，捆扎成路障。正前方很快出现了饼干盒堆成的一堵矮墙，上面铺着一层白色的油布，油布上摆上了许多诱人的瓶子和大碟子，碟子里盛有罐装牛肉和什锦菜。虽然战斗迫在眉睫，但旷野上忽然魔术般地出现这种情形，使我心里充满了感激之情。这种感觉远远超出了我们平常餐前祷告时的心情。

大家都下了马，勤务兵立刻上前把马牵走。用餐的时间到了，我却并没有看见基钦纳，他似乎与参谋人员保持一定的距离。我不知道他是在另外一堆饼干盒上单独用的餐，还是根本就没有用餐，对此我并无兴趣。我埋头大吃牛肉，猛喝饮料。这顿饭好像德比马赛的赛前午餐。大家都兴致勃勃，心情极好。我记得当时身边是德国参谋部的代表巴伦·冯·蒂德曼，他说：“今天是9月1日，是我们德国的一个伟大的日子。现在是你们英国人的伟大的日子了：色当<sup>①</sup>和苏丹。”他显然对这句话很满意，重复了好几遍。一些军官听出了其中的挖苦之意。“真会有战争吗？”我问温盖特将军。“当然，很可能。”“什么时候？”我又问。“明天？”“不，”他说，“现在，就在这里，一两个小时内。”这段时间对我来说真是快活。我这个可怜的少尉在这些部队的权贵面前，开始还觉得很拘束，可在欢乐气氛的感染下，我也无所顾忌地挥舞起手中的刀叉来。

---

<sup>①</sup> 法国东北部军事重镇，在1870年9月1日的色当战役中，20万德军包围色当，迫使拿破仑三世率10万法军投降，第二帝国垮台。

步兵纵队在快速集结,荆棘护栅在他们面前一点点地向前延伸。我们前方光秃秃的沙漠向尼罗河边微微隆起,形成一个新月形沙丘。沙丘那边是我们先遣骑兵,或许还有步步逼近的敌军。1小时之内,此地就会出现冲杀的德尔维希部队,尸首遍地,步兵掩在荆棘路障后,步枪齐射,众炮齐鸣。我们肯定会取得胜利,当然是我们消灭敌军。然而,尽管我们有精良的现代武器,德尔维希部队在阿比克利和塔买地区不止一次地击破英军阵地,并一再攻破只有埃军驻守的前沿。在我的想象中,沙漠平川上可能很快就会出现几种形式的战斗。这时,传来轰、轰、轰几声巨响,榴弹炮从某个岛上向恩图曼的马赫迪<sup>①</sup> 墓地开火,战斗开始了。

不过,9月1日没有发生战斗。我刚刚重返骑兵队,德尔维希部队就停止了前进。一阵枪声大作过后,他们似乎要安营过夜了。我们整个下午和晚上都在观察他们的动静,双方的骑兵巡逻队都在奔忙。直到夜晚,我们才回到尼罗河边,同时接到命令,人马必须安置在尼罗河岸边的路障内。

在这一隐蔽却并不安全的地方,我们获悉可靠情报:敌人将在夜间发起进攻。上面还宣布,不管在什么情况下,谁也不准从路障里往外射击,即使为了保命也不许开枪,否则将会受到最严厉的处罚。如果德尔维希部队攻破防线杀入营地,我们将用长矛或军刀徒步抵抗。不过近卫步兵第一团第一营和步兵旅的一个营就驻扎于路障旁,位于我们的正前方100码处,所以我们很坦然。把安全托付给这样的精锐部队,我们很放心,于是我们便去准备晚餐。

在这地方,我有一次很有趣的经历。我与战友漫步于尼罗

---

<sup>①</sup> 1881年领导苏丹起义的宗教领袖。

河边时，有人从离岸二三十英尺的炮艇上向我们呼喊。这只船由贝蒂上尉指挥，他在尼罗河上的舰队里服役多年，注定了要在水上取得功名。船上的军官身着白色制服，他们很想知道骑兵见闻，我们当然也愿意与之分享。夕阳下，我们隔水聊天。得知路障内禁止使用武器，他们特别高兴。对于我们付出的代价，他们开了很多玩笑。他们说一旦最糟糕的事情发生，他们会热情邀请我们到船上去。我们严辞拒绝了，同时表明了我们的自信，表示我们打算用军刀与长矛在沙丘中与德尔维希部队摸黑苦战。玩笑过后，好运降临了。

“你们怎么不喝酒？我们这里可是应有尽有。接住！”说时迟那时快，从炮艇上往岸边抛来一大瓶香槟酒，落在尼罗河里。所幸老天爷帮忙，那里的河水很浅，河床也很松软。我快步下河，水只到我膝部，我拾起这一珍贵礼物，把它带回了营地。

这种战争很令人兴奋。它不像在大战中，没人认为会在这场战争中送命，虽然每个旅或每个团总会有几个到几十个士兵付出生命的代价，但在那逝去的轻松岁月里，对于那些参加小规模战争的英军士兵来说，这点损失只是一场精彩游戏中的一点冒险因素。我们中的绝大多数后来都经历了大战，后来的战争不同了，死亡司空见惯，受了重伤倒还是幸运的。在机枪与大炮的猛烈火力下，整个旅可能会不剩一兵一卒，能侥幸逃脱一次鱼雷进攻的人心里都清楚，下一次或下下次再难逃厄运。

事件的规模决定了一切。当晚我们这些年轻人在距离60000名装备精良的疯狂的德尔维希部队只有3英里之遥的营地休息，时刻提防着他们的袭击。我们相信战斗最迟在黎明前肯定打响，因此，如果我们认定自己受到了战争的威胁，这种想法应该是可以原谅的。

## 冲锋的感受

半夜我们便起身了,5点钟,第二十一轻骑兵团在路障外集合完毕。澳洲血统的中队长芬恩少校几天前曾答应过我,条件成熟时给我一次露脸的机会。我担心他会把那天我去基钦纳勋爵那里执行任务算在内。不过,担心是多余的,我奉命出列,与一支巡逻队一起去侦察瑟汉姆山山顶与尼罗河之间的山脉,我们中队派出的其他巡逻队以及埃及骑兵巡逻队也都分别在黑暗中受命急驰而去。我带着6名士兵及1名下士快速踏过平原,不久便爬上了陌生的山坡。黎明真奇妙。摸清真相之前的一刻钟时间里是战争中最紧张的时刻。山上是否有敌军把守?我们是否正越过黑暗进入无数敌人的包围中?每一步都有生命危险,却又无暇作过多的防范。大部队就在我们后面。天色已慢慢露出了曙光,我们爬坡时已是蒙蒙亮。山顶会有什么呢?这段时间让人既紧张又激动。

接近山脊时,我让一名士兵在100码之后跟着我们,一旦有情况发生,他可及时回去报告。四周万籁俱寂,只有我们的马蹄声。到达山脊线时,我们勒住了缰绳。视野慢慢地开阔起来,我们已能看清200码以内的物体。现在四分之一英里以外的地方也能看见了。山上悄然无声,只听得见我们自己的呼吸。没有伏兵,也没有敌军把守!更远处的平原光秃秃地呈现在我们脚下:现在我们能望见半英里外的地方了。

果然不出所料,敌军已撤了营,逃往科尔多凡。仗打不起来了!且慢!天色越来越亮,笼罩着大地的面纱被层层揭开。远处平原上是什么在发亮?没问题,亮光淡下去了。不过,亮光下面的黑点又是什么?敌军!他们就在那里!这一大片黑点是成千上万的敌人,亮点是他们的武器在反光。这时天色已大亮,我跨下马,在战地记事簿上写下“德尔维希部队仍在瑟汉姆山西南一英里半的地方”。我让下士将这则消息直接呈交总司令,并标上军事用语×××,表明“十万火急”。

一轮绚丽的红日在身后冉冉升起,但我们无暇欣赏,我们正在观察别的东西。这时天已大亮,可用望远镜了。远处黑压压的一块颜色正在变化,比灰褐色的平原淡了,慢慢地变成了浅褐色,现在近趋于白色。我们面前是一支四五英里长的庞大军队,黑压压地遮住了地平线,一直延伸到瑟汉姆山的阴影里。能遇到这一刻不枉此生。我们又跨上马,突然新情况出现了,这人群并非静止不动,他们在前进,速度很快,如潮水般涌上前来。耳边传来的阵阵吼声又是什么?他们在欢呼上帝,欢呼穆罕默德和神圣的哈里发<sup>①</sup>,他们认为自己必胜,过一会我们就能见分晓了。我们勒住战马,又在山坡上愣了几分钟,这才冲下山。

清晨的阳光斜照着大地,为大地染上了富丽的色彩。这片巨大的人群分明已分成许多纵队,闪亮的兵器点缀其中,许许多多鲜艳的军旗在空中飘扬。我们所见的正如出现在东征的十字军眼前的情形。我兴奋地策马来到沙丘前,第二十一轻骑兵团曾于前一天到过此地,这里距敌军仅400码。我们又停下来,我让4名骑兵向人群射击,另外2名士兵则负责看马。敌人潮水

---

<sup>①</sup> 穆罕默德的继承人,中世纪政教合一的阿拉伯国家和奥斯曼帝国国家元首的称号。

般涌来。前面传来一阵枪响,落在我们左面,沙丘间顿时扬起片片尘土。基督徒无处安身。我们迅速离开,所幸人马均未受伤。我们返回山脊时,下士也急急奔来,他从司令部带来了参谋长的手谕:“尽可能守在原地,报告敌军进攻动向。”有趣!简直绝了!我们骑在马上,在敌军的射程内观察一切,并直接与总指挥部联系。

于是我们继续留在原地近半小时,亲眼目睹了罕见的场面。敌军暂时被我们右边的瑟汉姆山挡在了视线之外。只有约6000名士兵的一个师直接向山脊进发。他们已经爬上了山坡。从我们所在的位置能清楚地看见山的西侧,在尼罗河那边聚集着我们的部队,河上停泊着炮艇,大炮严阵以待。在敌军这一侧,敌兵穿着花花绿绿的衣服,正以整齐的长条形队形往上爬。我们离自己的炮兵有2500码,但离我们炮兵的靶子只有200多码的距离。我称德尔维希部队为“白旗军”,他们那些竖在空中的黄白相间的军旗就像是贝叶挂毯<sup>①</sup>。此时,平原中的德尔维希主力部队已进入我军的射程之内,英埃联军的大炮开始射击。我则目不转睛地盯着近前的敌军。山头上,“白旗军”停下来重整队形,沿山顶一字排开。我军的大炮对准了他们,两三个炮兵连及所有炮艇,至少三十门大炮一起开火,火力密集。炮弹呼啸着迎面飞来,在白旗军中爆炸。我们骑在马上看呆了,因为我们距离敌军太近,所以我们自己也身处险境。死神疯狂地降临到人群中。几十面敌人的军旗倒下了,敌军一下子躺倒几百号人马。敌人的队伍被炸成几段,到处都横七竖八地堆积着死尸。在猛烈的炮火中,德尔维希士兵跳起来又倒下去,可没有一人往

---

<sup>①</sup> 可能制成于12世纪,长231英尺,宽20英寸,上绣诺尔曼人征服英格兰的历史场面。

后退缩，他们在步枪的硝烟中一排排不停地扑向我们的路障。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敌人注意到我们。这时我看到在我们左面，巴加拉骑手<sup>①</sup>正三三两两越过平原朝山脊奔来，其中一支由3人组成的巡逻队已进入我们的射程之内。他们一身黑，戴着蒙头斗篷，似乎是僧侣骑手，他们手持长矛，阴险可怕。我骑在马上向他们开了几枪，他们避开了。我觉得在攻击中，我们可以撤离山脊，慢慢撤往尼罗河边，这样我们既可观察双方作战又可避免受伤。正在这时，传来芬恩少校的命令：“步兵即将开火，立即返回路障内。”我只得服从命令，放弃与参谋长的联系。可是，事实上留在山上更安全，我们刚刚回到步兵防线内，激烈的枪战就打响了。

\* \* \* \* \*

我无意介绍恩图曼战役的概况。这场战役早已众所周知，任何对此感兴趣的人无疑都熟知其每一个细节。在此我只想介绍一下这场战役的经过，谈谈自己在这场战役中的亲身经历。

哈里发的军队有6万多人，他们以战斗阵形从其营地出发，爬上了隔开对垒双方的高地，然后冲下缓坡。基钦纳的2万大军在尼罗河畔布好了阵形迎接他们。这是一次两个不同时代之间的冲突，中世纪的武器、战术及狂热与19世纪的发明和军事组织针锋相对，其结果不足为奇。这些撒拉逊人<sup>②</sup>的后裔从缓坡上冲向尼罗河边的英军，他们遇到了两个半训练有素的步兵

---

① 巴加拉人是北非努比亚和东苏丹的游牧阿拉伯人。

② 原指叙利亚及其附近沙漠地区的游牧民族。后希腊人和罗马人用来称呼抵抗十字军的伊斯兰教徒和阿拉伯人。

师的猛烈射击。英军严阵以待,在沿岸及炮艇上的七十多门大炮的支援下,打得敌军根本无还手之力,敌军的攻势瘫痪了,损失达六七千人,不得不在英埃联军防线 700 码之外停了下来。不过德尔维希部队拥有近两万支新旧不一的各式步枪。长矛队无法向前冲,于是枪手卧倒在地,开始连续向荆棘围栏路障胡乱射击。这是他们第一次让对手蒙受损失。在短时间内,英埃联军伤亡大约 200 人。

一见敌军的进攻被击退,同时意识到自己军队比德尔维希部队更接近恩图曼市,基钦纳立刻指挥他的 5 个旅排成梯形队列。左翼部队向南挺进,直逼恩图曼,企图切断德尔维希残余部队与其首都的联系,切断其粮食和水源供给,最终将他们赶进茫茫的大沙漠,但是德尔维希部队根本没有被击溃,其左翼部队甚至还未投入战斗,哈里发军队的 15000 名后备军仍未出动。这些部队正以大无畏的精神勇往直前,向英埃联军扑来。此时的英埃联军散开了队形,自由行进在沙漠上。第二次交锋比第一次残酷得多。德尔维希先头部队很快逼近我军,相距只有一二百码。我军后卫苏丹旅受到两面夹击,多亏赫克托·麦克唐纳将军沉着冷静,指挥有方,这才免除了苏丹旅的灭顶之灾。先进的武器和严明的组织纪律最终压倒了无畏的英勇,经过一场血腥的屠杀,两万多名士兵倒在了战场上,尸体堆积如山,犹如“风中的雪堆”。德尔维希部队被打得七零八落,彻底瓦解了,消失在沙漠中的海市蜃楼里。

在战斗中,埃及骑兵和骆驼队一直在保卫路障的右翼,左翼只有第二十一轻骑兵团。敌人第一次袭击被击溃后,我们奉命冲出路障,去弄清楚位于我主力部队与恩图曼之间的敌军兵力,如有可能,将这些敌军打回去,为我们的部队开道。团级军官当然无法知道整个战局。第一次战斗中我们等候在尼罗河边,隐

藏在峭立的尼罗河岸里,躲过了从头上纷纷飞过的子弹。战斗刚趋于缓和,四面八方便传来消息说敌人的进攻已被击退。一位将军带着参谋策马赶来,命令我们立刻上马出击。两分钟后,4个中队的骑兵便上马踏出路障,向南冲去。我们又登上先前攀登过的瑟汉姆山,从山顶上看得见整个恩图曼平原,六七英里外的灰蒙蒙的恩图曼城和市内的圆顶清真寺也依稀可见。我们不断停下来进行侦察,部队呈纵队前进。一个团中有4个中队,每个中队分成4支小分队,分队与分队之间相互连接。我指挥倒数第二支分队,共有20—25名骑兵。

我们都盼着发起冲锋。自打从开罗出发那天起,我们心里就只有这一个念头。当然冲锋肯定会有。当年,特别是布尔战争<sup>①</sup>前,英国骑兵几乎只学习如何冲锋陷阵,现在机会来了。然而,我们将对付什么样的敌人,冲杀在什么样的战场,从哪个方位出击,为何目的,所有这一切对我们来说还是个未知数。我们窥视着被海市蜃楼扭曲的平原,强压着激动,在坚硬的沙地上继续前进。这时我注意到侧前方约300码处,约有150个蓝黑色物体,相互间间隔二三码,排成一排,与我们的前进方向平行。我肯定那一定是人,是敌人,蜷伏在地面上。恰在此时,传来了“跑步前进”的军号声,于是整个骑兵队开始从这些人面前冲过去。此刻,战事稍息,周围一片死寂。刹那间,每个蓝黑物体周围冒出一团团烟雾,一排枪声打破了异常的沉寂。对着近距离内的大目标,敌人弹无虚发。队伍中不时有战马掀跳起来,一些骑兵翻落在地。

毫无疑问,我们团长企图绕过这些德尔维希步兵,然后从有利地势攻其侧翼。团长发现德尔维希大部队躲在步兵后面,隐

---

<sup>①</sup> 1899—1902年英军与布尔人之间的战争。

蔽在我们视野之外的一片凹地中。战斗打响后，我军损失开始增大。团长认为，我们的队伍拉长战线穿过辽阔的平原并非明智之举，于是军号响起“成战斗队形向右转”的命令。顿时16支骑兵分队一齐调转马头冲向蓝衣敌兵。第二十一轻骑兵团开始了战场上的第一次冲锋！

在此，我把当时自己所见所想的实际情况描述一番。我经常回忆这场战役，因此25年前的这场战斗依然历历在目。骑兵形成战队后，我指挥的那支分队处在右面第二支的位置。我骑的是一匹稳健的灰色阿拉伯马驹。冲锋前军官们就已拔刀在手。因为我的肩膀有毛病，所以我决定万一遇上白刃战，我决定改用手枪而不用军刀。我在伦敦买了把当时最新款式的毛瑟自动手枪，沿尼罗河行进时，我反复练习过。这便是当时我所用的武器。我得先将军刀放入刀鞘中，在奔跑的马上做这一动作可不是件容易事，然后再从木制枪匣中拔出手枪并推上膛。这两个动作要花很长时间，因此在这期间我除了瞥几眼左面的火力情况外，没有时间环视四周。

就在前方约半个马球场的距离内，我发现一排蓝衣敌兵正卧倒在地，疯狂射击，他们周围硝烟弥漫。我左右两侧的部队队形齐整，身后是一长列挥舞着长矛准备出击的骑兵。我们稳步向前疾驰，马蹄声与步枪声掩住了子弹的呼啸声。我又朝敌军望去，发现敌情突然发生了变化。蓝衣士兵仍在射击，但在其身后出现一块凹地，就像一条下陷的道路，里面挤满了士兵。这些士兵从隐蔽处站了起来，鲜艳的军旗也像魔术般突然飘在空中，他们的骑兵也不知从什么地方冒了出来，出现在队伍中。这密密麻麻的部队多达10—12排，将干涸的河道塞得满满的，兵器在阳光下闪闪发亮。与此同时，我看见我军右翼正对着敌军左翼，我这支分队正好冲击敌军另一侧，这样一来，我右边的骑兵

就遭遇不上敌军了。在我右边的分队指挥官是第七轻骑兵团的沃曼尔德中尉，他也察觉出这一情况。我们一起全速前进，并向内侧包抄过去。当时谁也无暇恐惧，根本来不及多作思考，一心只想如何战斗。

冲突迫在眉睫。在我正前方不到十码处，两名蓝衣敌兵卧在路上，相互间隔着几码。我从其中间穿插过去，他们开了枪。我从硝烟中穿过，意识到自己没受伤，而紧跟在我身后的骑兵却牺牲了，不知是否因这些子弹所致。战马跑到下坡处时我勒住了马，这匹小马如豹一般敏捷，它跳到离地面四五英尺的河床上。在河床里，我发现周围有几十号人，但他们并不集中，因此未与我发生实际冲突。我左面的第二支分队是格伦费尔指挥的部队，他们被敌军挡住了去路，损失惨重。我们的冲锋很像是骑警在驱散人群。顷刻间，我的小马驹已爬上河道的对岸。我开始四下打量。

我又一次策马奔跑在沙漠上。我觉得敌军在向四处溃散，正前方有个敌兵摔倒了。诸位读者一定记得我是一名骑兵，我们所接受的训练使我们相信一旦骑兵冲进步兵中，那么后者的命运将掌握在前者手里。所以我的第一感觉是那名敌兵被吓坏了。其实不然，他正欲抽刀砍断我的腿筋，好在我有足够的时间与空间策马跃出其刀锋可及的范围。我倚在马的左侧，距离他约三码远，朝他开了两枪。当我坐直身子，发现面前又有个举刀的身影，我又举枪开了火。我俩离得非常近，枪口几乎碰到了他，于是人与刀一起消失在我的身后。我左面10码远有位身穿鲜艳的紧身上衣、头戴铁盔的阿拉伯骑兵，马上披着锁子甲。我向他开枪，他躲开了。这时我让马减慢速度、缓步向前，又四下打量起来。

从一方面说，骑兵冲锋很像日常生活，只要你一切正常，坐

稳马鞍,握紧缰绳,武装整齐,那么敌人便会远远地躲着你;一旦你失去脚镫,断了缰绳,丢了武器,或是战马负伤,敌人便会从四面八方围攻你。在我左侧有不少战友便是这种命运,他们在敌群中被拦截住,被敌人从四面揪住,刀砍矛刺,最后落马,被狂怒的敌人剁成碎片。但当时我并未看到这种场面,因此依然很乐观,认为我们是战场的主宰,把敌人踏倒驱散,一举歼灭。我勒住马,四下望望,只见左面四五十码处有一大批敌兵聚集在一起,以求相互照应。他们十分疯狂,来回跳动着,上下挥舞着手中的长矛,整个场面飘忽不定。我军骑兵混杂在蜂拥的敌兵中,对此我有个一闪而过的印象,但不知该如何来形容。在我周围有几个零星的敌兵,他们似乎不想攻击我。我的分队在哪里?其他部队又在哪里?周围 100 码内看不见一个自己人。我回过头望着敌兵,发现有二三个步枪手正蹲在地上向我瞄准。那天上午我第一次产生了恐惧感,觉得自己真正是单枪匹马。我觉得枪手一定会击中我,其余敌兵便会像恶狼一样将我吞噬。我怎么这么愚蠢,竟会徘徊在敌人中间!我伏在马背上,赶紧策马离开了敌群。走了二三百码,我发现自己的分队已经转过身,正在集结。

另外三支分队在附近集结,突然,一名敌兵从我们的部队中间跳了出来,不知道他是怎么来的,肯定是从某个灌木丛或洞里跳出来的。所有士兵的长矛都刺向他,但他来回躲闪着,引起一阵骚乱。他多处负伤,但他挣扎着向我举起了长矛。我在离他不到一码的地方朝他开了一枪,他倒在地上,死了。杀人真容易!但我没有为此而不安。发现手枪里的子弹打完了,于是我什么也没想,又往枪膛里装了 10 颗子弹。

当时,我仍然以为我们重创了敌军,但我军损失不大。我的分队中有三四名士兵失踪,6 名士兵和八九匹战马被长矛或军

刀刺伤。我们都希望能立即再次发起冲锋。战士们神情严肃，已作好一切准备，好几名士兵请求扔掉长矛，改用军刀。我问一名中士打得是否尽兴，他回答说，“嗯，谈不上尽兴，长官，不过我想下次感觉会好些。”队伍中一阵哄笑。

这时，从敌人方向跑回来几个人马，他们的样子看上去让人胆寒：战马身上血如泉涌，用三条腿竭力挣扎着；士兵们步履踉跄，伤口鲜血淋漓；他们被钩状长矛刺中，胳膊与面孔血肉模糊，肠子也淌了出来。他们惨叫着，哀嚎着，倒在地上，死了。我们的首要任务是去解救这些伤员。指挥官们的血冷了下来，他们第一次想到了手中的卡宾枪。一切依旧是乱哄哄的，但此时冲锋号响起来了，指挥员发出了战斗命令，于是我们冲向敌群，来到一处可对河道进行全方位扫射的位置。两个中队的骑兵下了马，几分钟内我们的火力便打退了300码外的敌兵，战场仍然控制在我们手中。从我们第一次列队冲锋到现在只有20分钟。我们停下来准备在河床上用早餐。在这里可以看到一向不可一世的英国骑兵原来是多么无能。德尔维希部队已经拖走了他们的伤员，战场上有三四十具尸体，其中的二十多具是我们骑兵团的骑兵，尸首被砍得面目全非，几乎无法辨认。在短短的两三分钟内，我团310名官兵中死伤5名军官、65名士兵、120匹战马，全团的有生力量损失近四分之一。

以上是我在这次著名战役中的遭遇。骑兵和步兵交战时，在双方都还未伤元气的情况下，骑兵和步兵很少会混战在一起；一般说来，不是步兵沉着应战击落骑兵，就是步兵乱成一团，被骑兵砍倒。但是在恩图曼的河道里，与第二十一轻骑兵团交锋的两三千德尔维希部队根本未伤元气，也不怕骑兵，虽然他们的火力不足以制止我军的冲锋，但他们曾与阿比西尼亚多次交战，对付骑兵很有经验。他们对骑兵的冲锋很熟悉，对这种战斗的

打法了如指掌。还有一事值得一提，这场战斗中双方使用了相同的武器，英军采用的也是军刀与长矛。

\* \* \* \* \*

看到我们第一次出击后，一艘白色炮艇也急忙沿尼罗河而上，以期能给予增援。艇上贝蒂提心吊胆地目睹了全过程。多年以后我遇到他时才得知他亲眼目睹了我们的冲锋。我们相逢时，我已是英国海军部第一大臣，而他则是皇家海军中最年轻的上将。我问他：“那场战斗像什么？印象如何？”贝蒂上将说：“它看起来就像块葡萄干布丁：许许多多的葡萄干散落在一块巨大的板油上。”这一比喻虽很平常，但用作这个冒险故事的结尾却很合适。

## 离开部队

德尔维希部队被彻底击溃，精打细算的基钦纳随即将开支庞大的骑兵派遣回国。战后第三天，第二十一轻骑兵团即向北踏上归途。我得到允许，与近卫步兵第一团一起乘大型帆船沿尼罗河而下，在开罗，我遇见了英国皇家警卫骑兵团陆军少尉迪尼·莫利纽克斯，他与我一样也被编入第二十一轻骑兵团。他右腕上部被砍伤，肌肉组织受重创，连手枪也握不住，他的战马也同时被击中。莫利纽克斯被一名骑兵奋不顾身救了出来。现在他在一名护士的看护下前往英国，我决定陪他同行。我们正交谈着，医生走进来为他包扎伤口。伤口很可怕，医生急于为他移植新皮，他低声对护士说了些什么，于是护士卷起袖子露出胳膊，两人退到角落。医生开始想从她胳膊上切取一块皮肤准备移植在莫利纽克斯的伤口上，可怜的护士吓得脸色煞白，于是医生便转向我，他是一位地地道道的爱尔兰人。“俺得从你身上取一块。”他说。没有其他退路，我便卷起了袖子。他和蔼地继续说道：“你听说过活剥人皮吧，喏，就是这种感觉。”他开始从我前臂里侧切取了1先令大小的一块皮肤，上面还附着肉。当他慢慢地切取皮肤时，我深深地体会到了他所说的那种痛苦的滋味。不过，我勉强支撑了下来。他终于成功地切下了一块粘有薄薄一层肉的皮肤，这块珍贵的皮肤马上被缝合在我朋友的伤口上，至今它还在那里，我的朋友终身受益，而我只落得一个疤痕作纪

念。

\* \* \* \* \*

我的父母一直生活在伦敦社交界的中心，生活条件相当优越。但他们并不富裕，少有积蓄。相反，在他们忙碌的日常生活和社交中，债务不断增长。然而，1891年父亲去南非时，在一个价值不菲的金矿中得到了部分股份，他弄到了5000股兰特金矿的原始股。他生前的最后一年里，这些股票在股市上几乎天天上涨。到他去世时，股票价格已是本金的20倍，不久，又增至五六十倍。如果他多活一年，就会拥有一笔可观的财富。当时税赋很轻，钱币的购买力至少是现在的两倍，25万英镑算是一笔很大的财富了。不过，他去世时所拥有的财产几乎只相当于他所欠的债务，当然这些股票都被卖了。一切安排妥当后，只留给母亲婚约上规定属于她的那部分财产，不过，这笔财产足以使她过上舒适惬意的日子了。

我始终不想成为母亲的包袱。在各种运动及马球锦标赛中，我考虑最多的便是军营生活中的经济问题。每年500英镑的生活费不足以支付我在马球及骑兵团里的开支。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赤字逐年增加，虽说数目不大，但毕竟是赤字。我明白过来，自己所学的这一行永远无法提供足够的资金让我不欠债，更不用说如自己所愿，不靠薪水独立生活了。花多年宝贵时间接受教育，只获得一份日薪14先令的职位，同时要养两匹马，还得购买昂贵的军服，这的确不是明智之举。很显然，如果继续服役几年，我将陷入困境，还会连累亲友。从另一方面看，我已写了两本书，为《晨邮报》撰写的战地通讯稿所得稿酬相当于3年来女王对我这份辛苦又危险的工作所付报酬的5倍。因为国会

的限制,女王甚至无力支付士兵起码的生活费。因此带着很多遗憾,我决定尽早放弃军营生活。为《晨邮报》撰写的有关恩图曼战役的系列报道虽未署名,却为我挣得300多英镑。在家与母亲一起生活开销要小些。我还希望从另一本有关苏丹战争的新书中挣到至少够我开支两年的稿费,这本书我已定名为《尼罗河上的战争》。此外,我计划与《先锋报》签订合同,在伦敦每周为他们撰稿,每篇3英镑。不过这稿酬与我作为一名少尉所得军饷大致相等,后来我的稿酬提高了。

就这样,1899年我的计划如下:回印度夺取马球锦标赛冠军;申请退役;减轻母亲的负担;写新书并为《先锋报》撰稿;寻机进入国会。这些计划大体上都实现了。实际上从这年开始,我就完全自立了。1919年,我又意外地继承了早已过世的曾外祖母伦敦德里侯爵夫人弗朗西丝·安妮的一大笔遗产。从此,我养活自己并养活一家人,家里再没缺过任何所需的东西。我为此感到骄傲,并拿自己作为范例教育儿子,教育所有的孩子。

\* \* \* \* \*

我决定11月底回印度,为来年2月份的马球锦标赛作准备。这期间,我发觉自己在国内受到特别的厚爱,为《晨邮报》撰写的稿件引起了公众的广泛注意,大家都想知道有关恩图曼战役的情况,他们特别关心骑兵团的冲锋。因此我经常出现在晚宴上、俱乐部里及纽马克特,周围簇拥着听众和打听消息的人,这些人的年纪都长我许多,还有一些年轻女士也津津乐道于我的闲扯与我的个人生活。总之,那几个礼拜过得轻松自在。

此时我结识了一批新任保守党议员,这些人后来与我关系甚密。一天,伊恩·马尔科姆邀请我共进午餐,同席的有休·塞西

尔勋爵、珀西勋爵(已故诺森伯兰郡公爵的弟弟)和贝尔卡勒斯勋爵(现在的克劳福德勋爵)。这些人都是新兴的保守党政治家,以往多届议会从未接纳过如此有声望、有势力的一批议员。他们听说过我的故事,而且由于我父亲生前的名望,他们都很有兴趣见见我,自然我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表现一下。在这些只比自己大两三年的年轻人面前,我心里不无羡慕。他们都出身名门,且在牛津或剑桥受过高等教育,都有一批忠实的托利党拥护者。在这些上等人中间,我觉得自己是个十足的下里巴人。

休·塞西尔勋爵年轻有为,才智出众。他生活在首相府二十多年,从小就耳濡目染国家大事。塞西尔家族不论男女,谈话与争辩时十分坦率、自由。这个家族鼓励发表不同见解,长辈与晚辈间、兄弟姐妹间经常你一言我一语,相互巧辩,似乎大家都平等。休勋爵在解释国教政府、分析埃拉斯都支持者<sup>①</sup>与高教会派信徒的异同时,曾令整个下院全场鸦雀无声达一个多小时。他长于辞令,善于巧辩。他才思敏捷,出语惊人,让人感到听他说话是种乐趣。

珀西勋爵是位善于思考的浪漫青年,信仰伊尔文派。他气度不凡,学术上颇有建树。两年前在牛津获得该年度纽迪吉特最佳诗歌奖<sup>②</sup>,他游历过很多地方,踏遍了小亚细亚高原和高加索地区,与高贵的野蛮人一起畅饮,同狂热的神教信徒一起斋戒。他迷恋东方恰似迪斯累里对东方的神往。珀西本人简直就是《坦克雷德》和《科宁斯比》<sup>③</sup>书中人物。

我们的话题转向讨论别的民族是否有权建立自治政府,还

---

① 主张宗教应受国家支配的人。

② 英国罗杰·纽迪吉特爵士于1805年在牛津大学设立的诗歌奖。

③ 《坦克雷德》和《科宁斯比》为迪斯累里所著的两本小说。

是只配受制于一个好政府。人类生来具有哪些权利？这些权利又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进而又谈到了作为一种体制的奴隶制度。在这些问题上，这些人竟毫不犹豫地舆舆论唱反调，这使我相当惊讶。更让我吃惊的是自己无法用显而易见的正确观点反驳他们机智的诡辩，这甚至使我十分恼火。这些人比我更加了解这些问题，我那些自由、平等和博爱的论点受到他们严厉抨击。我用“英国不要奴隶制度”这一论点为自己辩护，他们则认为奴隶制度的存在可能是正当的，也可能是错误的。“英国不要奴隶制”无疑是个值得尊敬的借口，但这与奴隶制度的存在有何道义上的联系呢？面对这些认为太阳只不过是人们凭空臆造出来的人，我很难拿出论据来证明我的论点。争论开始时似乎都是我占着上风，不久便感到自己很想走上圣·詹姆士大街或皮卡迪利大街，垒起路障，纠集一伙人为自由、公正与民主而战。最后，休勋爵让我别太介意刚才的辩论。这些问题值得研究，但他与朋友们并非我想象的那样拥护奴隶制，似乎他们只是故意戏弄我，让我奔跑在满是陷阱的路上，看我出洋相。

这次较量使我意识到，结束在印度举行的马球锦标赛后，我一定得去牛津深造，以期从牛津生活中获得知识和乐趣。我开始打听入学的手续。即使对待像我这样年纪的学生，考试及其他手续似乎仍不可或缺。我当然可以交学费进这所大学，与大学生一起听讲座，与教授们辩论，课外阅读他们推荐的书籍。然而这一切是不可能的。进牛津不仅要考拉丁文，还要考希腊语。掌握了英语中规则动词的我已不可能再静下心来苦苦琢磨希腊文中的不规则动词。经过再三考虑，我不得不带着深深的遗憾将此计划搁置一旁。

11月上旬，我拜访了设立在圣·斯蒂芬大厦的保守党总部，打算在国会中谋一席位。我的一位远亲菲兹罗伊·斯图尔特很

久以来一直在那里义务工作。他先引见我认识了总管米德尔顿先生,大家都称他为“领队”。因保守党在1895年大选中赢得了胜利,因此米德尔顿先生倍受尊重。在政党内部,如果因领导不当,政策失误,疏忽大意,或者哪怕是出于不可抗拒的形势而致使选举失败,总管总要被炒鱿鱼。因此,一旦选举得胜,这类人物享有殊荣也是应该的。“领队”十分热情,表示保守党非常愿意为我谋一席位,并祝我早日进入国会。接着他十分含蓄地谈到了资金问题,问我能否支付开销?一年中能为选区提供多少资金?我表示自己非常乐意参加竞选,但除了个人开销外,我无力支付其他费用。听了这话,“领队”似乎十分失望,表示最可靠的选区总希望从议员那里得到最大捐助。他举了些例子,说明议员每年要在募捐和慈善活动中捐资1000英镑或更多的资金,以回报选区对他的支持。一些有风险的席位不必支付那么多,希望渺茫的席位更是十分便宜。不过,他表示将竭尽全力,还说由于我父亲的缘故,我将是个例外。他补充道,我在战争中的经历将受到工人托利分子的欢迎。

临别前,我又与菲兹罗伊·斯图尔特谈了一次。瞧见他桌上的一本厚书时,我眼睛一亮。封面的白色标签上印有“招聘演讲者”。我疑惑地盯着这几个字,奇怪!演讲者也要招聘?还有厚厚的一本申请登记簿。我一直渴望有机会发表演讲,但从未接到过邀请,也未被允许这样做。在第四轻骑兵团和桑赫斯特根本没有演讲,因此我对菲兹罗伊·斯图尔特说:“这是怎么回事?莫非有很多会议需要演讲者?”“是的,”他答道,“领队告诉我,你不留下点什么,不能放你走,能与你预约一次吗?”我听了心潮起伏,迫不及待同时又忐忑不安。不过在人生的障碍赛中,每个人都得跨越一个个障碍。恢复了平静后,我露出一副毫不在乎的样子说,如果条件适合,且有人愿意听我讲,那么我就愿意接受

这一请求。菲兹罗伊打开了登记簿。

平时有很多室内会议与室外会议,此外还有义卖、集会等,这些场合都需要有演讲者。我左寻右觅,恰似玩童扒着食品柜的窗子往里面瞧,最后我选定贝思作为自己发表第一次正式演讲的场所。10天后我将在樱草会<sup>①</sup>举办的一次聚会上发表演说,地点在H·D·斯克林先生家的公园里,位于一个能俯视古城的山丘上。我强抑着激动离开了总部。

接下来几天,我一直提心吊胆,害怕计划泡汤。也许斯克林先生或其他要人不想邀请我,或者他们已找到更中意的人选,不过,一切很顺利,我如期收到一封正式邀请函,《晨邮报》上刊登了这次聚会的通告。奥利弗·博思威克写信说,届时《晨邮报》将特派记者去贝思,一字不漏地记下我的演讲内容,并将它发表在报纸的显要位置。这使我热情倍增,同时也更加紧张。我花了大量时间准备讲演稿,用心背诵下来,以致在梦中也能倒背如流。我决定在演讲中为大英帝国辩护,措辞激烈,气势逼人。我特别得意自己写的一句话:“保守党的民主主义是日渐丰满的大海,自由党的激进主义是行将干涸的排水沟,英国人民将更多得益于保守党的民主。”对于诸如此类的连珠妙语我沾沾自喜。这些词句一旦从笔尖流出,便思如涌泉。我很快就准备好了可演讲好几次的稿件。我问及自己可讲多久,被告知约一刻钟,于是我将演讲严格控制在25分钟内。我拿着马表反复练习,发现我能在20分钟内结束演讲,听众打断演讲的时间也包括在内。最重要的是一定不能慌乱,不能轻易地对听众的弱点作出妥协。观众在台下,他们能怎么样呢?既然他们是来听演讲的,那么他

---

<sup>①</sup> 1883年为纪念有樱草爱好的比肯斯菲尔德伯爵而组织的一个保守党协会。

们就得听我讲。

这一天终于来了。我从帕丁顿<sup>①</sup> 乘上火车,《晨邮报》记者也在这列车上,他身穿灰色长风衣,十分和气。我们坐在一起,当车厢里只剩下我俩时,我说了几句讲稿中的片断,就像是闲谈中不经意聊到一样。接着我俩又一起坐马车上了山。斯克林先生一家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室外招待会正在进行,有投靶游戏、赛马以及各种简单的游戏节目。天气晴好,大家都玩得十分尽兴。考虑到上次经历,我焦急地打听会议情况。一切按计划进行,5点钟铃就会响,所有客人都将聚集在帐篷入口处,那里已搭起了平台。这个地区的保守党主席将为我作介绍。我是唯一的演讲者。

铃声一响,我们来到帐篷旁,登上平台。所谓平台只是4块架在一些小木桶上的木板,上面既无桌子也无椅子。客人们很不情愿地(我的感觉)停下简单的娱乐活动,当聚集大约100人左右时,主席便站起来为我作了简单介绍。在桑赫斯特和军队里,恭维话很少,奉承一名少尉更是没有的事。如果你得到了维多利亚十字勋章或者越野障碍赛马冠军,或是取得了军中重量级拳击冠军,你只会从朋友们那里得到善意的警告,让你不要被好运气冲昏头脑。然而政界则截然不同,涂脂抹粉的水平简直登峰造极。我父亲生前常遭陷害,此时则被热情洋溢地评价为保守党历史上最伟大的领导者之一。至于我在古巴、印度前线及尼罗河上的战斗经历,我只求这位主席的话千万不要传到我在的团里。他大谈特谈我作战英勇,文采过人。我唯恐听众在台下起哄叫嚷,“噫!胡说!”或其他类似的话。可奇怪的是,他们就像在聆听福音一样专注地听着,我松了口气。

---

① 英国伦敦西部一住宅区。

轮到我发言了。我鼓起勇气,定了定神,开始了讲演。我有条不紊地一步步、一条条往下说:感觉很顺利。台下听众越聚越多,似乎都很高兴。在适当的时候,我停下来给他们喝彩机会,甚至在我事先未料到的地方,他们也高声叫好。演讲结束时,台下掌声如雷,经久不息。我会做演讲!它似乎很容易。那位记者与我一同返回,我发言时他就站在我面前,逐字记录着。他向我表示热烈祝贺。第二天的《晨邮报》一整栏都报道此事,甚至还附了一篇评论,感谢政界又出了一位新人。我开始对自己、对整个世界都非常满意。怀着这种心情我乘船去了印度。

\* \* \* \* \*

现在让我们将话题转到更重要的事情上。骑兵团所有军官一致同意送我们这支马球队去参加在密拉特<sup>①</sup>举行的马球锦标赛。一名准尉带着30匹马驹乘坐一辆特别火车开始了长达1400英里的旅程。随行的除了马夫外,还有几名可靠的军士,包括一名兽医,他们都归准尉指挥。火车每天行驶约200英里,马驹每天晚上被带出去活动,这样到达目的地时马驹可如同出发前那么强壮。我们分批出发,但同时到达。去密拉特之前,我们先在焦特布尔<sup>②</sup>训练了两个星期。在焦特布尔,我们是珀泰布·辛格的客人,他的侄儿是当地的土邦主,尚未成年,所以他是焦特布尔的摄政王。珀泰布在其宽敞、阴凉的石屋里盛情款待我们。每天晚上他与其族人以及焦特布尔的其他贵族一起认真地与我们进行模拟比赛。他的族人中有两人是印度最好的马球

---

① 印度城市,北方邦密拉特亚首府。

② 印度拉贾坦邦西部城市,焦特布尔县首府。

手,这两人名叫赫季·辛格和多库尔·辛格。除战争外,马球是珀泰布的第一大爱好。比赛中他不时地停下来指出我们的错误,并就如何提高我们的球技及如何配合提出建议。“快,再快些,要像箭一般。”他高喊着。在比赛中,焦特布尔马球场上扬起阵阵红尘,比赛中逆风迎着尘埃很麻烦,甚至有危险。透过尘土只看得见包着头巾的身影在疾驰,有时球会突然从尘埃中扑过来。进行一场完整的比赛往往很困难,我们不得不避开尘埃打球。拉杰普特人<sup>①</sup>已习惯了这种场面,不过渐渐地我们也适应了。

在离开焦特布尔前往密拉特的前一天晚上,一场厄运降临到我头上。下楼吃晚饭时,我一脚滑倒在石阶上,肩膀脱了臼,使它复位很容易,但肌肉已被扭伤。第二天上午,我的右臂无法动弹。以往的痛苦经验表明,至少3个星期我不能用劲击球,即便3周过后,我也只能在很小范围内活动胳膊。距离锦标赛只有4天时间,诸位可以想象我有多么沮丧。我的胳膊本来已经一天天好起来,并且我一直打1号位,球队对我的表现相当满意。可现在我却成了残疾,幸亏我们有预备队员。当队友扶起我时,我说比赛时千万不要让我上场。第二天一整天他们都在严肃地考虑这事,最后队长告诉我,不管怎样,他们决定让我参赛。他们认为,即使我无法击球,只要能握住球棍,凭我的经验与对球队的了解,我应该能为胜利创造最有利的条件。我弄清楚此项决定并非出于怜悯而是完全出于球队自身利益,于是我答应尽最大努力。当时对比赛中的越位还有一定限制。1号球员的任务就是自始至终与对方后卫进行角逐,对方总是灵活调转马头,千方百计逼你越位。如果1号球员占领对方后卫的位置,将他赶出场外并处处牵制他,那么他用不着击球,只要能做

---

<sup>①</sup> 印度中部和北部各部落人。

到这一点,对自己的球队便有莫大的好处。我们都知道,第四龙骑兵团是我们的劲敌,其后卫是他们的队长哈德雷斯·劳埃德,此人是该球队中最棒的球员,他后来成为对抗美国队的国际级球员。

我将胳膊肘包扎好,痛苦地握着球棒打了比赛的前两场,我们队都赢了。虽然我能做得很有限,但队友们似乎很满意。我们队的2号艾伯特·萨沃里是位击球能手,在比赛中我负责为他扫清障碍。很多运动都以球为本,马球则是这些运动中的佼佼者。它融球术与马术为一体,集击球与骑马的乐趣于一身。此外,打马球需要队员之间的默契配合,队员之间的配合比队员的个人发挥更重要,这也是足球和垒球等集体运动的精髓。

难忘的一天到来了。果然不出所料,我队与第四龙骑兵团争夺冠亚军。比赛从一开始就很紧张激烈,双方打得不相上下,平坦坚硬的马球场上,球在队员间准确无误地来回传递着,每个队员都十分清楚球应该往哪儿打。双方争夺着,比分不断拉平。很快我队得了1分,对方得了2分。有段时间比分僵持不下,我一直盯住对方后卫,将他逼得手忙脚乱。在一次混乱的抢球中,离对方球门不远处,我突然看见球正旋转着朝我飞来,离我很近,我俯身向前,举起球棒将它轻轻一推,球进了! 2平! 除了1号有残疾外,我队是支实力很强的球队。3号是队长雷金纳德·霍尔,他的球技在印度少有敌手。后卫巴纳斯,是我在古巴的同伴,他是球队的核心,他能准确无误地将球反手击到我与萨沃里所在的位置。打马球是3年来我们生活中的主要活动,我们倾注了全部精力。现在我又得到一次机会,球又落到我身旁,离对方球门不远。这次球速很快,我来不及考虑,立刻伸出球棒将其拨进球门。3比2! 不过很快对方队员在场上发起猛攻,也得了1分。3平。

在此必须说明一下,当时的马球比赛为了避免平局的产生,辅助球也计分。在球门两侧距离球门半个球门的位置分别插有小旗。如果球未进球门却滚进了球门与旗之间,就算进了一个辅助球。无论进多少辅助球也抵不上真正进一球,但一旦比分相同,就得看辅助球的多少。对方进的辅助球比我们多,除非再得1分,否则我们会输掉这场比赛。好运再一次降临到我头上,我将马蹄间的球轻轻一击,又进了!第七局比赛结束了。

打最后一场时我队积4分另加3个辅助球,对手积3分外加4个辅助球。如果他们再得1分,他们就赢了。我很少看到双方队员的神情如此紧张,这不像是比赛,倒像是一场生与死的较量。比球赛更严重的问题也不会引起如此紧张的情绪。我只记得最后一局我们在赛场上来回奔跑着,拼命进攻,拼命反攻。我不停地祈祷:“上帝保佑!”比赛结束的铃声响了,我们淌着汗,骑在马上精疲力竭,但我们可以自豪地宣布:“我们取得了1899年团际马球锦标赛的胜利。”我们长时间沉浸在欢乐中,内心十分满足。我们晚上大摆庆功宴,酒也不再是禁品。不过请不要忌妒这些来自不同骑兵队的球员的喜悦心情,他们中没几个活到老。此后,这支球队再也没有参加过比赛。一年后,艾伯特·萨沃里在南非的德兰士瓦牺牲,巴纳斯在南非的纳塔尔受重伤。我步入了政界,肩伤也越来越严重。我们再也没能聚在一起。打那以后,也再没有哪支来自印度南部的骑兵获得这一殊荣。

在我离开部队回国前,团里对我很好。与他们最后一次进餐时,他们为我的健康干杯,用这种方式表达对我的赞誉是罕见的。与他们在一起是多么快乐啊!军队是一所大学校,它教会我们严明的纪律和深厚的友情。这些知识也许与大学里传授的知识一样宝贵。当然我还是希望这两种知识都能拥有。

\* \* \* \* \*

与此同时,我继续《尼罗河上的战争》的创作。这本书的规模在扩大,开始只打算叙述恩图曼战役的前后经过,到后来几乎写成了一部苏丹的兴衰史。我参考了很多书,阅读了所有有关这方面的素材,打算写出厚厚的几卷。我有意模仿麦考利与吉本的写作风格,前者擅长用对照手法,后者则喜好用所有格结尾的长句。写作中我也穿插些自己的写作风格。我开始意识到写作不仅仅是处理好句子,段落也很关键,两者实际上同样重要,在叙事作品中尤为如此,麦考利善于分段。一个句子必须包含一个完整的意思,同样,一个段落也必须包括一个明确的事件。句与句的连接必须很自然,同样,段与段之间的衔接也必须像火车车厢间的自动搭钩一样紧密。分章问题也摆到了我面前,每章必须相对独立,各章分量应相当,长度也须大致相等。有些章节很好处理,但如果把许多不同事件串在一起,而且其中任何一个事件都不能省,那么问题就来了。最后还要对作品进行总体把握,保证做到详略得当,有条有理。我认识到,把握好时间顺序是写好叙事作品的关键,也意识到了“良好的鉴赏力是一部好作品的基础”。我告诫自己千万不要像一些庸俗作者那样,以诸如“洪水灭世前4000年”之类的句子开头。此外,我喜欢重复自己最喜欢的一句法文“令人反感的艺术就是无所不谈”,我认为可以在此再重复一遍。

写书其乐无穷。写作是一种人生,它可以成为你的一个伴侣,能在你周围筑起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水晶空间,你就像鱼缸里的一条金鱼,不过这是金鱼自己造出来的缸。写作活动一直伴随着我,旅途中也不停息,因此我从不感到无所事事。不是玻

璃需要打磨,就是结构需要调整,要么就是缸体需要加固。我注意到生活中很多不同的事物间存在着很大的相似之处。写书不同于造房、打仗,也不同于作画。技巧不同,材料也不同,但其原理是一样的。基础一定要打牢,数据要收集好,前提必须与结论相符,在此基础上才能再作修饰,这样的成品仅仅是某一主题的表现。在战争中也是如此,不管别人如何干扰,如何制造事端,优秀的将领总能达到预期目的而不会受制于作战计划。

在回国的轮船上,我与G·W·斯蒂文斯先生交上了朋友。他是迄今为止我遇到的才华最出众的一名记者,是哈姆斯沃斯先生创办的《每日邮报》的星级作家。这份报纸刚创办不久,斯蒂文斯迫使《每日邮报》的质量上了一个台阶。创办伊始,这份报纸主要依靠斯蒂文斯的文章支撑着。哈姆斯沃斯对我宠爱有加,让斯蒂文斯写信给我,他照办了。“繁荣读者队伍”是这份报纸在其早期的座右铭。我被他们列为受欢迎的作者,我期待着。

有一天我正在轮船的沙龙里写作。故事已进入高潮,我军在尼罗河附近经过一昼夜的行军,到达阿布哈姆德,准备出击。我正用浓墨渲染故事中的场景:“拂晓,薄雾从河面袅袅升起,又被冉冉升起的太阳慢慢驱散,德尔维希的城市及其身后的半环形山丘已现出轮廓。一场战争即将在这一地区爆发。”“哈哈!”斯蒂文斯突然从我身后冒出来。“你来结尾,”说着我起身来到甲板上,我很想知道他怎样往下写,同时希望他的继续能助我一臂之力。可是我回来一看,他只在纸上写了几个小小的“砰一砰! 砰一砰! 砰! 砰!”又在纸的最后写了个硕大的“轰!!!”说实话,我对他这种轻率的举动很反感。斯蒂文斯除了用风趣、调侃的笔调为《每日邮报》撰稿外,还擅长很多不同写作风格。其间有一篇关于大英帝国未来,名为《新吉本》的匿名文章,写得简直就像是从小吉本的书里抄出来的,可当斯蒂文斯坦白自己就是

其作者时，我大吃一惊。

后来斯蒂文斯读了我的初稿，并提出了宝贵建议。“我认为，我所读的这部分书稿是对 G·W·斯蒂文斯作品的有益补充，很有价值。文字水平一流，思想周密，组织严谨，说理透彻，描写生动。唯一不足之处是你的个人观点的发挥，虽然这些观点表达清晰，入木三分，很有道理，但个人观点发挥得太多太滥。如果是我，我会删去对 1898 年 1 月的看法，只在最后稍微提一下，否则读者会感到厌倦的。喜欢大段说理文字的人往往用不着别人对他们讲什么道理。”他热情开朗、玩世不恭的个性以及妙语连珠的口才使他成为我旅途中的良伴。1899 年夏我们很快建立起友谊。不过那是我遇到他的最后一个夏天，次年 2 月他在莱迪史密斯死于伤寒。

\* \* \* \* \*

返回途中，我在开罗停留两个星期，为自己的书搜集资料，寻求苏丹战争中的几位重要角色的帮助。这样，我认识了年轻的加拿大皇家工程师吉鲁尔德，沙漠中的铁路就是他修的。认识了矮小的澳大利亚军官斯莱廷·帕夏，他在哈里发监狱里呆了 10 年，其小说《苏丹战火》是有关这一题材的经典之作。我还遇到了情报局局长雷金纳德·温盖特爵士，我已经欠了他一顿饭的情。同时我结识了埃及水利署署长加斯丁。此外，还结识了许多埃及有名的政治家和知名人士。这些人在战争中不同程度地发挥了自己的作用。也正因为这些人的管理，埃及在不到二十年的时间里从一个民不聊生的无政府国家走向繁荣。我还认识了他们的领导克罗默勋爵，他邀请我到英国驻埃及的使馆，并表示愿意阅读我已成文的有关苏丹解放与戈登之死的章节。于是

我将一大包打印稿送给他，几天后便收到他用蓝色笔批注过的文稿，我既高兴又吃惊。被批注过的文稿让我回想起小时候在哈罗公学上学时自己的拉丁文作业。克罗默勋爵在我拙作上颇费了一番功夫，因此我恭恭敬敬地采纳了他的建议和批评。这些建议写得很详细，有时十分严厉。例如，戈登将军曾当过里彭勋爵的私人秘书。写到这一节时，我是这样说的：“一轮光彩夺目的太阳成了一个小人物的一颗卫星。”克罗默勋爵对此的评语是“用‘光彩夺目的太阳’称颂戈登实属溢美之辞，而用‘小人物’比喻作为总督的里彭勋爵很不公平。里彭也许不会介意，但他的朋友们会很恼火，许多人则会嘲笑你。”我回信表示将删去这句自己一直很得意的比喻，并虚心采纳其他批评。这一切消除了克罗默勋爵的戒心，他很高兴继续饶有兴趣地看我的作品。他写道：“我知道，我的评语很严厉，但都是出于善意，你也能看出我的用心很明智。我以自己要求别人对待我的态度对待你，我在写重要文章或做大事之前，总是请朋友提出批评意见。自己的不足之处在行动前被善意地批评指出，要比事后受到恶意攻击强得多，那时候再想改变就太晚了。我希望你的作品能成功，而且我相信一定会成功。我希望看到年轻人事业有成，这是生活给我的为数不多的乐趣之一。”

那两个星期我经常与克罗默勋爵见面，他的学识与才智使我受益匪浅。他沉着镇定，这种素质是派驻到东方国家的英国高级行政长官所必备的。这又让我想起自己喜欢的一句法国名言：“只有安宁才能把握住心灵。”克罗默勋爵总是不慌不忙，从不急于求成。他稳坐钓鱼台，静观事态的发生发展，直到自己能果断顺利地出面解决。为此他能轻松地长期等待。事实上，他常常会等上四五年才等到机会。克罗默勋爵统治埃及16年，拒绝了一切虚名，只做一名英国领事。他的地位不明确，他也许什

么都不是,但实际上他是一切的主宰,他的话就是法律。有一批机灵的年轻助手跟着克罗默勋爵,他们像克罗默一样从不出风头。克罗默假借这批年轻人耐心地控制着埃及政府各部门的方方面面以及埃及政策的每一个细节。英国与埃及政府交替更迭,他目睹了苏丹的失而复得。他一直掌管着财政大权,熟练操纵着埃及的政务。他的毕生事业正如日中天,他举重若轻,行使着无上权力,我很高兴能在这个时候见到他。他对我的事十分尽心,我感到很荣幸。我们现在很需要这样的人,可惜这样的人物再也没有了。

## 奥尔德姆<sup>①</sup>

1899年春,我得知世间还有一位丘吉尔,他也写书,所著小说在美国十分畅销。许多人写来贺信,赞扬我的小说技巧。起初以为这些贺词都是针对我的小说《萨伏罗拉》的,后来才意识到另外还有一位温斯顿·丘吉尔先生,幸好他是在大洋彼岸。我给大洋彼岸的另一个“我”写信,他也回了信。这两封信也许还有点文学价值。

温斯顿·丘吉尔向温斯顿·丘吉尔致敬,恳请他关注一件事关两位温斯顿·丘吉尔先生的问题。他从报纸上得知温斯顿·丘吉尔先生准备出版另一部小说《理查德·卡弗尔》,相信这部小说将会在英美两国走红。温斯顿·丘吉尔先生目前也正在《麦克米伦》杂志上发表连载小说,并期望在两国也能有一定销量。他还准备在10月1日出版另一部有关苏丹战争的军事纪实。毫无疑问,如果在此前未意识到的话,那么温斯顿·丘吉尔先生从此信中应该能够意识到温斯顿·丘吉尔先生的作品将会被张冠李戴到另一位温

---

<sup>①</sup> 英格兰北部曼彻斯特市郡的一个教区和自治市。早期为兼营羊毛的农业中心,19世纪成为棉纺织业城镇。丘吉尔第一次在此竞选议员失利。

斯顿·丘吉尔先生头上。他相信温斯顿·丘吉尔先生也和他一样不希望此事发生。为了将来尽可能避免误会，温斯顿·丘吉尔先生决定在所有的出版作品中都署名为“温斯顿·斯宾塞·丘吉尔”，而不用先前的“温斯顿·丘吉尔”。相信这种作法会被温斯顿·丘吉尔先生所接受。兹冒昧地建议，为了防止这种巧合混淆视听，两位温斯顿·丘吉尔先生最好能在各自的作品中添加简短说明，向读者解释哪些作品是这位温斯顿·丘吉尔所著，哪些是那位温斯顿·丘吉尔先生所写。如果温斯顿·丘吉尔先生同意温斯顿·丘吉尔先生所提建议，准备添加的简短说明可留作日后再议。借此机会，温斯顿·丘吉尔先生向温斯顿·丘吉尔先生的作品及写作风格表示敬仰。这些作品无论是发表在杂志上还是单行出版都引起了温斯顿·丘吉尔先生的关注。同时，他相信温斯顿·丘吉尔先生可能同样也注意到了他的作品。

1899年6月7日于伦敦

温斯顿·丘吉尔先生非常感谢温斯顿·丘吉尔先生提出这个让他担忧的问题。温斯顿·丘吉尔先生感谢温斯顿·丘吉尔先生特意在其作品中署上“温斯顿·斯宾塞·丘吉尔”。温斯顿·丘吉尔先生急切地表示假如自己还有其他名字的话，他会毫不犹豫地添上一个。自温斯顿·斯宾塞·丘吉尔先生(今后以此称谓)的作品问世以来，已引起温斯顿·丘吉尔先生的注意。他发现温斯顿·斯宾塞·丘吉尔先生的作品与他自己的小说创作并无冲突。

温斯顿·斯宾塞·丘吉尔先生建议在各自作品前加上说明以区别温斯顿·斯宾塞·丘吉尔和温斯顿·丘吉尔的作品，说明的措辞由两位丘吉尔先生商定，温斯顿·丘吉尔先生十

分乐意接受这一建议。如果能承蒙温斯顿·斯宾塞·丘吉尔先生为温斯顿·丘吉尔先生起草这一说明,那么对其内容的细节,温斯顿·丘吉尔先生一概接受。

此外,温斯顿·丘吉尔先生将征求朋友及出版商的意见,在书的扉页上的姓名后面加上“美国”字样。如果他们认为这样做很好,那么他将请出版商在以后的版本中作相应更改。

温斯顿·丘吉尔先生愿借此机会奉上两本他所著的小说。他佩服温斯顿·斯宾塞·丘吉尔先生的作品,并期待着能拜读到《萨伏罗拉》。

1899年6月21日于佛蒙特

一切都得到了圆满解决。读者渐渐明白了同一时期有两位同名同姓的不同作家,其中一位是文学界人物,另外一位是政界人物,双方的作品今后不会再被混淆。1年以后我去波士顿时,温斯顿·丘吉尔先生是第一位迎接我的人,他热热闹闹地为我举办了一次全由年轻人参加的宴会。宴会上,我俩发表了热情的演说,赞扬对方。不过一些误会还是难免,我的信件寄到了他那里,他的账单送到了我这边。不用说,这些误会都被及时纠正了。

\* \* \* \* \*

一天,我被奥尔德姆地区的保守党议员罗伯特·阿斯科罗夫特先生请到下院。他带我进了一间吸烟室,谈起了一项重要计划。奥尔德姆是有两个议员席位的选区,那时候这两个席位都属于保守党。作为一名资深议员,罗伯特的议席很牢固,他不仅

受到保守党选民的支持,同时还是深受奥尔德姆棉业工会信赖的律师。可他的那一位同事身体状况一直不佳,所以罗伯特一直想另找一个人选,与他组成双驾马车,并肩参加竞选。他显然觉得我能行。他说了一番颇为通情达理的话,“年轻人通常不能像老年人那样有钱。”对于这一痛苦的事实我不知该如何反驳。不过他似乎在告诉我一切障碍都能克服。最后我答应尽早定下日子,在他的帮助下,到奥尔德姆做一次演讲。

大会的时间已经确定。几个星期后,我却遗憾地从报纸上获悉罗伯特去世的消息。很奇怪,像他这样身体健康、整天忙碌的人会走得这么快,而那位让他颇为担心的同事却健在。罗伯特·阿斯科罗夫特在奥尔德姆的工人中享有很高威望,工人们自发集资 2000 多英镑为他立了一座雕像,并称之为“工人之友”。他们规定(我认为这也是兰开夏人的个性)这些捐款除了建纪念碑外不得用于其他地方,如为医院增设病床,扩建图书馆,建造喷泉等。他们不愿意给自己送礼物。

罗伯特的议席得有人填补,他们马上选中了我。据说我早就被这位刚去世的议员选中了,我的名字也已列入演讲者名单,再加上人们还没忘记我父亲,这事就定了下来。在没有提出任何要求、也没有任何委员会对我进行考察的情况下,我直接收到一份正面邀请,请我去竞选该席位。在保守党总部,“领队”似乎对地方上的决定很满意,但他强烈主张利用这次补缺候选的机会将两个席位都拿出来重新选举。尽管他认为保守党目前没有把握赢得这次补缺选举,不过索尔兹伯里勋爵不会在乎失去两个席位。他们担心几个月后奥尔德姆地区的议会会再度出现空缺。即使在这项补缺选举中把该地区的两个议席都丢了,到下次大选时还可以再夺回来。我注意到了,这种态度是非同寻常的,然而对我来说,在当时那种情况下,任何形势下的任何政治

争斗总比没有争斗要强,因此,我亮出大旗,投入了战斗。

我一头扎进选民众多的补缺选举中。我一生中参加过 14 次竞选,每次都要浪费近一个月的时间。人生短暂,将自己生命中的 14 个月用在这种乏味的竞选演说上真是可悲可叹。我参加过 5 次补缺选举,补缺选举比普选还要难。各界人士、各种组织都将注意力集中在可怜的候选人身上。如果他是政府的支持者,那世界上一切不幸、人类社会的所有缺陷统统都会被提出来,公众吵嚷着要求他解释对此将采取怎样的措施。

当时保守党开始不吃香了。对于选民来说,自由党已经很久未出来执政了,局面应该变一变,连续性并非民主的宠儿。除了在关键时刻,英国人有权把王室的大臣赶下台,有权变更国策;无论谁当大臣,也无论是什么样的国策,他们有权这样做,不管这国策是好是坏。我现在是逆水行舟,凶多吉少。当时,保守党在下院通过一项向教会交纳什一税的法案,使英国圣公会中的教士的日子好过些。不信奉英国国教的新教教徒,包括卫斯理教派的信徒,对此很不以为然,这些人在兰开夏郡很有势力。激进派分子厚颜无耻地讥讽这项慈善措施为“教士救济税”。到奥尔德姆之前,我并不关心这场纠纷。我所受的教育及军旅生活对我的熏陶使我对这类问题毫无兴趣。因此我问别人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我的主要支持者大多同意激进派的观点,认为教士救济税绝对是个错误。他们刚解释完毕,我便有了对策。教士的生活当然要有保障,否则他们怎能行使其职责呢?然而,为什么不能像部队那样平均分配生活补助呢?我们可以统计各教派中教士的人数,将教士人数累加起来,把钱平分掉。这个方法公平合理,不会引起矛盾。我很惊讶此前竟没有人想到过。可当我向委员会中的一些成员提及这种计划时,竟无人认为它能解决问题。实际上他们认为这根本不是个办法。既然大家都这

么认为,那么他们肯定是对的。于是我放弃了这一和解企图,另寻其他话题来讨好这个选区的选民。

这时,一位新同事开始与我并肩作战,他的加入被认为是总部的绝招。此人就是詹姆士·莫德斯雷先生,一个社会主义者,颇受人尊敬的纺织工会秘书,也是我所遇到的最货真价实的托利党工人候选人。他大胆地声明自己对托利民主和托利社会主义的赞赏。他声称保守党与自由党都是虚伪的,但自由党尤甚。对他来说,为了理解他并信任他的工人阶级的利益,他能与我这位英国贵族后裔一起站在演讲台上并肩战斗,他感到很自豪。形势的发展令人瞩目,好几天一切似乎都很顺利。“贵族后裔与社会主义者”的搭配似乎成了政界奇妙的新动向。可令人气愤的是,可恶的激进党分子竟想玷污这一好印象,许多工会的支持者也来凑热闹,纷纷指责可怜的莫德斯雷先生背叛了自己的阶级,同时对保守党大放厥词,竟然连索尔兹伯里勋爵也不放过,说他不主张进步,与现代民主格格不入云云。对于这些诽谤,我们当然坚决予以反驳。最后所有自由党和激进的工会分子都离我们而去,为他们的党投票去了,我俩只剩下我们最坚定的支持者,然而连我们自己的支持者也因为演讲台上出现了一位邪恶的社会主义者而心怀不满。

与此同时,我们的两名自由党对手证实了他们自己的非凡能力。年长的艾莫特先生来自本地的纺纱工人家庭,他正值中年,既有经验又有金钱,在当地深深扎下了根。他才智过人,后来当上了大官,成了自由党领袖,是位不容易击败的对手。年轻潇洒的朗西曼先生,能力强,家境富裕,也是位出色的候选人。我与可怜的工会盟友两人要拿出 500 英镑都极为困难,可就这样,我们还是被指责为社会特权阶层的代表。而我们的对手,显然腰缠万贯,却声称自己是广大贫苦人民的代言人。世界真是

颠倒了！

斗争漫长而艰辛。我竭力为政府的优点和现存的社会体系作辩护，颂扬圣公会以及国家的统一，声称“英国历史上从未有过如此多的人口，人民也从未如此丰衣足食”。我谈到英国的兴旺与强盛，谈到苏丹的解放，谈到禁止进口由囚徒生产的外国货的必要性；莫德斯雷先生跟在我后面亦步亦趋。我们的对手哀叹广大工人大众的不幸，感慨贫民窟的脏乱，对贫富间的明显差异深表遗憾，对教士救济税的不公尤为不满。幸亏兰开夏郡的劳动人民善于在竞争双方之间分摊他们的选票，否则这场竞争将彻底倒向其中的一方。他们运用了各种各样的补救措施，弥补了这场竞争中明显的不平等。我从早到晚滔滔不绝地作演说，莫德斯雷先生也不停地重复着自由党比托利党更虚伪的观点。

奥尔德姆完全是工人阶级的选区。当时，这个地区十分繁荣。奥尔德姆人不仅将棉纺织品运往印度、中国和日本，还制造纺织机器出口到印度、中国及日本。这个城里没有旅馆，也没有豪华别墅，却有许许多多知足常乐的工人家庭。半个多世纪以来，这里的情况一直在慢慢好转，居民逐渐富裕起来，姑娘们戴上了羊毛头巾，脚上穿起了木屐。在我的有生之年中，我亲眼见过他们吃足了经济衰退的苦，即便如此，他们的生活水平仍比他们心目中的富裕生活好。当时流行着这样一句口头禅，“兴旺不过四代”：第一代人挣钱，第二代人守业，第三代人败家，第四代人又回头过苦日子。奥尔德姆人喜欢穿丝袜，这种习惯我早年还不知道，后来由于对丝袜征税，他们的生活受到影响，可是他们无法摆脱日渐萧条的棉纺业。与兰开夏郡的工人接触过的人都为他们祝福。

选举中，我所有的主要支持者都恳求我放弃对教士救济税

的辩护。由于我不了解实行这个措施的必要性,对此毫无感触,因此放弃为这个法案辩解的念头对我诱惑很大,我最终屈服了。在支持者的热烈欢呼声中我表示,如果我当选,我不会对这项税收投赞成票。这下可犯了大错。实际上,如果想为政府或政党作辩护,你就得爱屋及乌,否则你的发言根本不起作用。我的声明一结束,一场围绕这一法案的激烈争论便展开了。由于自己的候选人在这个问题上不敢直面兰开夏选民,保守党政府因此成了笑柄。奥尔德姆的自由党人以此变本加厉地大肆攻击该法案。活到老就要学到老!客观地说,当时我是位相当不错的候选人。让我欣慰的是,无论如何我们对自己这一方抱有极大热情,为大英帝国感到自豪,为英国的悠久传统而感到骄傲。选举结果揭晓后,我和莫德斯雷先生都失败了。在 23000 张选票中,我落后 1300 张,莫德斯雷先生比我还少 30 张。

失败后,指责接踵而来,大家一齐把矛头指向我。后来我注意到他们总是拿我当靶子,也许是因为他们认为我的承受力强吧。托利党中的高层人士以及卡尔顿俱乐部称“他与社会主义者搅在一起,失败了也是活该。任何讲原则的人都不会这样!”下院领袖贝尔福听说我反对教士什一税法案后,在议会走廊上评价道:“我本以为他是个有前途的年轻人,但看来他的前途不止一条。”党报发表了重要文章批评将如此重要的工人阶级选区交给这样一位乳臭未干的年轻人,声称这种作法是个错误。所有人都迫不及待地想从这件事里脱身。我沮丧地回到伦敦,仿佛半瓶开启的香槟或苏打水,一个晚上没盖瓶塞,一点气也没有了。

回到母亲家里,没有一个人来看望我。不过,贝尔福先生总是那么善解人意,给我写了封亲笔信。我从积年旧档中将此信找出来献给读者:

很遗憾得知你在奥尔德姆选举失利。我非常希望你能很快进入国会,来到我与令尊当年并肩战斗过的地方,希望你不要因此而气馁。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这次补缺选举对我们不利。选举中,反对党可以免遭批评,不用将自己的方案摆出来,这一点是反对党的优势。如果执政党方案中再包括如地方自治法案之类的前途无望的内容,则对反对党更加有利。此外,反对意见正好迎合公众的口味。雇主不喜欢补偿法案,医生不喜欢免疫法案,公众不喜欢教士,所以什一税就不受欢迎。教士对你否定这条税法心怀不满,即使你答应为利物浦议案投赞成票,奥兰治党<sup>①</sup>人还会对你怒气冲天。那些得益于我们政策的人不会表示感谢,而那些认为自己受到损失的人则对我们的政策怀恨在心。在这种情况下去竞争兰开夏的议席,希望十分渺茫。

不要紧,一切会好的。这一小小的挫折不会一辈子影响你的政治前途。

1899年10月7日

7月底,我与张伯伦先生进行了一次长谈。尽管我曾在父亲家里见过他几次,在一些场合他也十分友好地与我打招呼,但这是我第一次与他正式交往。我俩都是詹妮夫人的客人,她在泰晤士河畔有所舒适的房子,下午我们乘汽艇在泰晤士河上游玩。阿斯奎斯先生业余从来不谈工作,张伯伦先生则不同,他的话题总不离政治,他为人坦率正直,说话直来直去,与他交谈就是受政治教育。他对政治游戏中的每一环节、每一方面都了如

---

<sup>①</sup> 1795年成立于北爱尔兰的秘密社团,拥护新教和王权。

指掌,对两大政党内部的驱动力量洞若观火。在午餐和晚宴上,谈话基本上都是在我俩之间进行的,南非问题又成为一个话题。当时,英国与克留格尔总统<sup>①</sup>就敏感的宗族主权进行谈判,引起国内外普遍关注。诸位肯定知道我是主张强硬措施的。张伯伦说:“如果冲锋号吹响后无人响应,那么吹了也没用。”后来我们从一位老人身旁经过,这位老人僵直地坐在岸边草坪的椅子上。詹妮夫人说:“看,那是拉布谢尔先生。”“老不死!”张伯伦先生说着将头掉了过去,轻蔑厌恶的表情在他脸上一闪而过,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此刻,我意识到,这位态度和蔼的名人与自由党领袖格莱斯顿先生积怨甚深。

此后我一心扑在《尼罗河上的战争》这本书上,最辛苦的工作已经完成,现在我正集中精力校对。现在我不受军纪约束,所以可以无所顾忌地谈论自己对基钦纳勋爵的看法。我当然不会放过这种机会。我对他侮辱马赫迪的陵墓表示震惊,他野蛮地命令士兵将马赫迪的脑袋砍下来放在煤油罐里作为战利品,我对此表示愤慨。这起事件在下院引起了激烈争论。约翰·莫利和《曼彻斯特卫报》编辑斯考特先生对基钦纳将军大加责伐,我深以为然。马赫迪人头事件只是许多令人愤慨的事件中的一件。自由党人认为这种野蛮行径简直就是匈奴人和汪达尔人<sup>②</sup>的所作所为,而托利党人则认为这种事很有趣。因此我在

---

<sup>①</sup> 克留格尔(1825—1904),南非布尔人政治家、南非共和国总统。他领导了布尔人争取脱离英国统治的斗争,1881年第一次布尔战争后建立了布尔人国家——德兰士瓦,并就任总统。他断然拒绝英国移民与布尔人政治平等的要求,因而导致第二次布尔战争(1899—1902)。

<sup>②</sup> 匈奴人是蒙古的游牧民族,公元4—5世纪在欧洲建立了庞大的帝国,入侵古罗马。汪达尔人是日耳曼民族的一支,455年曾洗劫罗马。这两个民族性格强悍,在欧洲人心目中是野蛮的象征。

这个问题上显然与托利党不一致。

我们打算 10 月中旬出版《尼罗河上的战争》。我在《萨伏罗拉》和这本书上整整花了 1 年时间，我翘首以待自己这两大卷巨著的问世。

不过到了 10 月中旬，其他事情又接踵而至。

## 随布勒去开普

激烈的争端皆因小事而起,但其根源非同一般,南非战争的前奏引起了国内外密切关注。自马久巴山<sup>①</sup>战役以来,英国人与布尔人间的关系及此前两国间长期存在的误解早已被世人所知。1899年的历次谈判备受关注;在下院的辩论中,反对党对此大加责难。夏秋两季过后,英国政界分为两派,一派认为与布尔共和国的战争势在必行,另一派则尽其所能,设法加以阻拦。

1899年夏,天气闷热,气氛也日趋紧张,充满了火药味,大有风雨欲来之势。3年前詹姆森<sup>②</sup>发起那次袭击后,德兰士瓦地区有布尔人的重兵把守,装备精良的警察对外族人严加管制。德国人正准备在约翰内斯堡城外的一个制高点修筑堡垒,调来炮兵控制市区。枪炮子弹源源不断地从荷兰和德国运来,足够装备两个布尔共和国,还能把开普殖民地<sup>③</sup>中的大批荷兰人也

---

① 南非境内一座海拔 1981 米的大山,位于德兰士瓦与纳塔尔之间,1881 年布尔人在此击败英军。

② 詹姆森(1853—1917),南非政治家,内科医生。1878 年来到南非金伯利行医。1895 年与其朋友罗得斯组织袭击,企图推翻德兰士瓦的布尔政府。失败被俘后押送回英国,短期监禁后返回南非。1902 年罗得斯去世,詹姆森接任进步党领袖,后任开普殖民地内阁总理(1904—1908)。

③ 1806 年英国建立的殖民地,1910 年成立南非联邦时,该地成为一省份,称好望角省,又称开普省。

武装起来。受叛乱和战争的威胁,英国政府逐渐往纳塔尔省及开普地区增派卫戍部队。与此同时,唐宁街与比勒陀利亚之间你来我往,不断向对方发出外交照会和紧急公函,形势日趋严重。

10月初,德兰士瓦地区的决策者贸然作出决定,挑起了事端。10月8日,比勒陀利亚发出最后通牒,要求英军在3天之内从共和国边境撤离,停止继续增兵。从那一刻起,战争已成定局。

最后通牒的电报刚从收录器纸带上打出不到一小时,奥利弗·波思维克登门请我做《晨邮报》战地记者,条件是每月250英镑,报销所有开支,充分享有行动与言论自由,雇用时间至少为4个月。这些待遇优于以往任何战地记者的待遇。对于我这样一个只需谋生而无需承担任何责任的24岁年轻人来说,这些条件当然很有诱惑力。最早的一班轮船迪努塔·卡索尔号11日出发,我也一同前往。

带着喜悦的期盼心情,我在家里利用仅有的一点时间收拾准备。伦敦充满了爱国激情和党派间的激烈争论。消息频传,布尔人已行动起来,他们的军队已开往开普殖民地和纳塔尔地区;英国方面任命雷德沃斯·布勒爵士为总司令,出动了所有后备军,唯一的一个军团也即刻派往桌湾。

临行前,我想该去拜访张伯伦先生。尽管他身为大臣,政务繁忙,但他还是约我在他办公室见面。因为我无法及时赶到,他便让我第二天一早到他家里去。我如约拜访了这位不寻常的人物,此时此刻正是他政治生涯中的关键时刻。他与往常一样,抽着雪茄,又递了一支给我。我们就当前局势聊了约十分钟,我也谈了谈自己的打算。他说:“我要到殖民事务办公室上班,你不妨跟我一起走,这样路上还可以聊聊。”

那时从他家所在地王子花园到白厅<sup>①</sup> 需一刻钟,这大概是走完这段路程的最短时间。张伯伦先生对战争的进程非常乐观。

他说:“布勒将军出发得或许太迟了,应该明智些,早点动身。如果布尔人现在入侵纳塔尔,乔治·怀特爵士与其 16000 名士兵可以轻而易举地把问题解决。”

“那马弗京地区<sup>②</sup> 呢?”

“噢,马弗京或许会受到围攻。不过如果我们的部队连几个星期也不能坚持的话,那还指望什么呢?”

接着,他慎重补充道:“当然,我得依据战争办公室意见说话。他们都很有信心,我只能以他们所说为准。”

当年,英国的战争办公室深受下院两代议员吝啬成癖习性的影响。当时战争办公室的想法完全脱离了实际;澳大利亚请求允许派一支部队过来,可是战争办公室的回答是:“最好只派步兵,不要骑兵。”战争办公室自己的情报部门准备了两大卷有关布尔共和国的详尽资料,这些资料后来上呈给国会。该部门的负责人约翰·阿德爵士告诉战争事务大臣兰斯多恩勋爵,说需要 20 万名士兵,但兰斯多恩不屑一顾。两大卷资料送到布勒将军那里,可不到一小时布勒便把资料退回来,还说自己“对南非情况了如指掌”。似乎只有政务次官乔治·温德姆先生(那几天我们曾在一起吃过饭)意识到了此次任务的艰巨性。他说布尔人准备充分,目的明确,备有大量军火,其中包括一种发射 1 英寸子弹的新式重型机枪。他认为战争初始阶段将对英军很不

---

① 伦敦的一条街道,英国政府机关所在地。

② 南非中部城镇,位于开普省北部。在布尔战争期间,英国驻军曾在此顶住了布尔人长达 217 天的围困。

利。英军会受到小股敌军的攻击,机动灵活的敌军可能会围攻英军,拦住英军的去路,用重型机枪把英军士兵打得体无完肤。当时我年少气盛,当我得知战争形势不会是一边倒、战争也不会仅仅是走过场时,十分欣慰。我觉得布尔人敢于向整个大英帝国挑战,很有勇气,他们并非毫无还手之力,而且是他们首先发难,对此我很高兴。

让我们吸取教训吧。千万不要相信战争会一帆风顺,也不要以为卷入战争大潮的人都能摸清潮水和飓风的习性。热衷于战争的政治家必须充分意识到,一旦开战信号发出,他便不再是政策的主宰,而只是前景难卜的局势的奴隶而已。一旦宣战,不合时宜的战争办公室,懦弱无能、狂妄自大的指挥官,靠不住的盟军,心怀敌意的中立国,邪恶的命运之神,不祥的意外事件,估算失误等等,都想插手。不论你对胜利有多大把握,千万记牢,对方肯定也认为自己有取胜之机,否则就不会有战争了。

\* \* \* \* \*

父亲的故交比利·杰勒德曾得到布勒爵士允诺,一旦接到部队的指挥权,布勒将军就带上比利做幕僚。杰勒德勋爵年事已高,家产丰厚,颇有名望,是赛马场的主要拥有者之一。因为他即将赴前线参战,所以欧内斯特·卡斯尔爵士在卡尔顿饭店设宴为他送行。我是应邀而来的二类客人,威尔士亲王及40名领导层的其他成员也亲临晚宴。杰勒德的任务是照应布勒将军的生活起居,所以很多人从地窖里拿出了数不清的上等香槟及陈年白兰地送给他。送礼的客人们对杰勒德爵士说,他可以与我共享这些美酒。大家心情舒畅,劲头十足,战争之初总是如此。客人中有一人也要赴前线,以往喝酒他总是控制不住自己,所以成

了人们的谈资。他起身告辞时，马库斯·贝雷斯福德爵士一本正经地说：“再见，老伙计。记住 V.C.<sup>①</sup>。”这位可怜的朋友深受感动，回答道：“我尽力争取。”“噢？”马库斯听了说，“你误会了，我不是说勋章，我说的是法国白兰地。”

这里要补充的是，这些香槟和白兰地，包括我的那一份，都在乱哄哄的战争中失踪了。为了确保这些酒能安然无恙地到达司令部，杰勒德在酒瓶上贴了“蓖麻油”的标签。两个月后，他在纳塔尔见酒还未运到，便往德班的军事基地发了封急电，要“蓖麻油”。基地回电说，由于工作上的失误，寄给他的这些药品的包裹已经分发给各医院去了。好在基地备有很多蓖麻油，他们马上发货！

后来我们在南非战场的许多经历都与此相似。

10月11日，迪努塔·卡索尔号从索斯安普敦出发，这一天正值布尔人最后通牒到期。船上不仅有《邮晨报》记者，还有雷德沃斯·布勒爵士及英国驻扎在南非的唯一一支部队的司令部的所有参谋人员。布勒是典型的英国人，总是一本正经、沉默寡言，说话也令人费解。他不善言辞，正式讨论中，他总是咕哝着，或是点头或是摇头。在平常谈话中，他从不谈论公务。年轻时他是位表现勇敢、战术熟练的军官，近二十年一直在白厅担任重要行政职务。由于他的政治观点倾向自由主义，所以他被认为是个很有头脑的军人。他声名远扬，无怪乎受到人们的无比信任。1899年11月9日，索尔兹伯里勋爵在伦敦市政厅说：“我对英国士兵的信任就如同我信任布勒爵士一样。”他显然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他不辞劳苦、任劳任怨地解决一个又一个问题，

---

① V.C. 在此语意双关，既指“Victoria Cross”，维多利亚十字勋章，也指“Vieux Cognac”，法国上等白兰地。

消除一个又一个灾难,从未失去国家对他的尊重和部队对他的信任。这位老于世故、有主见的大人物在这场战争中留给英国人的印象与日后法国约瑟夫<sup>①</sup>元帅留给法国人民的印象颇有相似之处。

和平与战争悬而未决,在战争的第一声枪还未打响前,我们便踏上了征途。由于当时还没有无线电,因此总司令、司令部参谋人员以及《晨邮报》记者与外界彻底失去了联系。我们希望第四天到达马德拉岛时能得到点消息。可除了得知谈判已结束,双方部队都已出动外,没有任何其他消息。悬念未释,我们重又起航了。

接下来的两个星期里我们与世隔绝,无从知晓令我们牵挂的战争局势。整整两个星期,晴空万里,风平浪静。轮船漫不经心地向前行驶着,也不知道加快速度,真是罕见。英国约有五十年未与任何白人交战了,因此战争中的时间概念早已从英国人的头脑中消失了。宁静笼罩着这艘轮船,船上乘客,无论军人还是平民,都玩着海上旅行中的老一套游戏。布勒每天在甲板上踱着步,平静得让人猜不透。参谋人员普遍认为,在轮船到达之前战争就会结束。轮船上有些军官实在想象不出,像布尔人这种非正规军怎么能抵抗训练有素的英军呢。如果布尔人攻入纳塔尔,他们立即会遭到佩恩·西蒙斯将军安置在纳塔尔北部的顿提地区的1个步兵旅、1个骑兵团及2个炮兵连的反击。参谋人员担心,这样一来布尔人会吓破了胆,从此再不敢与正规军交锋。这种可能性让人沮丧,我一点也不奇怪布勒爵士为何总闷

---

<sup>①</sup> 约瑟夫(1852—1933),法国元帅。1911年被任命为法国军队战时总司令。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因低估德军兵力,致使其制定的作战方案失败。1916年德军攻占凡尔登,而法军却缺乏准备,故被解除指挥权。

闷不乐。

在惴惴不安中,两个星期过去了。我心中有各种各样的猜测,从克鲁格攻占开普敦到乔治·怀特爵士或佩恩·西蒙斯将军攻占比勒陀利亚,不过没有一个假设能让自己信服。好在再过两天就会知道这令人恍惚的两个星期里所发生的一切了。间歇将要结束,帷幕又将拉开,我们会看到什么呢?布勒将军惴惴不安,心里一定不是滋味。他肯定迫切希望能够知道实情。政府真是愚蠢,干吗不在5天前派一艘鱼雷快艇接他,向他通报情况呢?这样他就可以及时调整状态,不慌不忙地思考所要采取的第一步措施了。

突然,甲板上一阵骚动,正前方一艘轮船驶入眼帘,是从大陆方向来的,肯定知道消息。我们迅速聚在一起。如果不是几位年轻人兴奋地你一言我一语地说了几句话,那么这艘轮船肯定会与我们失之交臂:“肯定能从这艘船上得到些消息!为什么不拦住它?船上一定有开普的报纸!不能眼睁睁地让它开过去!”

这些嘀咕声传到了上级军官那里。经过慎重考虑,他们认为,在海上拦船是少见的。如果没有充分的理由就拉响船上警报,那么对方可能会要求英国政府赔偿损失,或是其他诸如此类的惩罚。最后折衷一下,发出了问讯的信号。收到这一信号后,这艘船便改道向我们驶来。这是一艘不定期货船,船上约有二十人。他们都聚在一起看着我们,我们也围过来看着他们。货船甲板上竖起一块黑板,上面写着:

布尔人被击败

三次战斗

佩恩·西蒙斯阵亡

这艘船消失在我们身后,只剩下我们在沉思这则含义隐晦的消息。

参谋人员愕然。两军显然真的打起来了,竟然还有1名英国将军阵亡!战斗一定十分激烈,布尔军队可能已所剩无几。3次失利后,他们还有可能继续这种毫无取胜希望的战斗吗?阴云笼罩着我们,只有布勒将军叫人琢磨不透,他从望远镜里看到这则消息却无动于衷。几分钟后,一位参谋终于忍不住对他说:

“好像一切已结束,长官。”

在这样的询问下,这位大人物回答道:

“我敢说,比勒陀利亚外围还有许多战斗在等待我们。”

他在军事方面的直觉一向准确,的确还有许多战斗在等着我们。这席话鼓舞了士气,不一会就在船上传遍了。大家的眼睛变得雪亮,心情也轻松下来,参谋人员相互庆贺,随从副官欢喜雀跃。我高声说道:“其实只要花上10分钟让那艘船停下来,打听些可靠消息,我们就能知道情况了。”大家都十分乐观,因此谁也没有打断我的话。他们听后对我说:

“缺乏耐心是年轻人的弱点。我们自然很快就会知道所发生的一切。布勒总司令就很冷静,尽管在开普敦登陆后他就得着手处理这些情况,可他却不去打听。更何况在他看来,剩下的战斗要等我们到达比勒陀利亚后才会进行。比勒陀利亚距离开普敦700英里,所以我们有足够的时间做各种安排,处理因布尔人抵抗而遗留下来的问题。还有,对战地记者,特别是一名刚脱下军官制服的人来说,总喜欢对上级的决定提出疑问,真令人遗憾。”

但我仍然执迷不悟,对此难以心悦诚服。

## 装甲列车

我们到达桌湾时天色已黑，岸边闪烁着无数灯光，很快一些汽艇将轮船围住，原来是高级官员和部队军官携带战报赶来了。司令部的参谋人员连夜审阅，我也找来一大堆报纸研究起来。

布尔军已入侵纳塔尔，在邓迪袭击了我先头部队。尽管他们在塔拉纳高地失利，却杀害了佩恩·西蒙斯将军，并差一点将其手下三四千名正在匆忙往莱迪史密斯地区撤退的英军围住。在莱迪史密斯，乔治·怀特爵士率领一万二三千士兵，凭借四五十门大炮及一个骑兵旅的掩护，试图阻止布尔军继续前进。我当时并不清楚英国政府的用意是让怀特将军向南撤离，越过图盖拉河，拖住敌人，直到与从英国和印度赶去的增援部队会合。最重要的是，他自己不能让敌人切断去路，被敌人包围。英军的作战计划是暂时放弃纳塔尔北部无法防御的三角地带，同时让布勒将军率领大部队从开普殖民地出发，途经奥兰治自由邦<sup>①</sup>，前往比勒陀利亚。可不久这些计划全被打乱了。

记得在多年后的一次晚宴上，我对贝尔福先生谈及乔治·怀特将军所受待遇不公，他那和蔼可亲的笑脸立刻变得严厉起来，

---

<sup>①</sup> 奥兰治自由邦，南非共和国一省，东界纳塔尔省和莱索托王国，南面和西面与开普省接壤，北邻德兰士瓦省。1854年布尔人设立奥兰治自由邦，1910年它成为南非联邦的一个省。

仿佛彻底换了个人。他说：“我们在莱迪史密斯久战不决，是他一手造成的。”

10月31日，也就是我们到达桌湾的那天，莱迪史密斯出了大事。怀特将军在埃兰德拉格特取得胜利后，试图进攻周围神出鬼没的布尔军，灾难因此降临。约1200名英国步兵在尼科尔森山脊被迫投降，余部被赶回莱迪史密斯，由进攻匆忙转入防守，莱迪史密斯变成了一座大兵营，四周被布尔军团团包围，铁路也被切断，他们只得坐待救援。布尔军在四面包围英军之后，留下三分之二力量围困莱迪史密斯，其余人马则准备越过图盖拉河进入纳塔尔南部。与此同时，西面的布尔军也包围了马弗京与金伯利，并驻扎下来，准备饿死英军。此外，开普殖民地中的荷兰人居住区也动荡不安，濒临叛乱。在整个南非次大陆上，兄弟相残，英国政府此时除了海军大炮外，已无计可施。

我不清楚英军的作战计划，也不了解敌方情况，纳塔尔失利的消息也在封锁之中，但我们一登陆就明白了，首次激战就会在纳塔尔爆发。布勒将军的部队得在1个月或6个星期后才能在开普敦和伊丽莎白港结集完毕，因此我有时间先去纳塔尔观战，然后再回到开普殖民地与大部队同行。当时我是这么想的，几天后布勒爵士也悲哀地得出同样结论。经过奥兰治自由邦的所有交通当然已被切断，要到纳塔尔必须乘火车行700英里，途经德阿尔和斯通姆博格，到达伊丽莎白港，然后再乘坐小型邮船或拖船到德班，共需4天。德阿尔到斯通姆博格这段铁路与战线平行，没有防御，随时可能被敌军切断。不过上级认为穿过这段铁路是可能的。于是我与《曼彻斯特卫报》记者J·B·阿特金斯一起出发了。阿特金斯是位英俊小伙，后来成了《旁观者》的编辑。我们乘坐的火车实际上是最后一班，我们到达斯通姆博格时，车站工作人员已经打点行李准备撤离了。

我们从东伦敦<sup>①</sup> 乘坐一艘约 150 吨的汽船,顶着南极大风而行。当时感觉这艘小船会被巨浪掀翻,或者会撞在礁石上。在港口的灯光里,我们从 1 英里以外就可以清楚地看到无数张牙舞爪的礁石,不过这些担心很快便被可怕的阵发性晕船所代替。能幸存下来真是运气,当时认为根本救不了自己。在船尾的甲板下,有一间令人窒息的小船舱,六七名船员吃住都在里面。我躺在铺上,身体极度虚弱。只知道这艘船被风浪打得左右摇晃,上下颠簸,忽而被巨浪掀起,忽而又被掳落下来。时间过得很慢,下午遥遥无期,晚上时间更长,黑夜似乎没有尽头。想到泰特斯·欧茨<sup>②</sup> 受尽了鞭刑,但还是活了很久,我坚信上帝会保佑,这是当时我心中唯一的一丝安慰。

万事万物总有终结,所幸肉体痛苦忘得很快,然而我的德班之旅仍留在我的记忆里,正如歌谣所说:

昨天虽已消失,  
回忆却铭刻心里,  
伴我一同步入岁月的坟墓。

\* \* \* \* \*

到达德班,我们随即连夜赶往彼得马里茨堡<sup>③</sup>,医院里满是伤员,我看到雷奇·巴内斯,在我朋友伊恩·汉密尔顿将军指挥的

---

① 南非开普东南部港市。

② 泰特斯·欧茨(1649—1705),1678 年制造阴谋,向政府报告说耶稣会教士计划谋杀国王理查二世,后被证实是说谎,他也因此受鞭刑。

③ 纳塔尔省省会。

埃兰德斯拉格特战斗中,他被敌人近距离击中大腿。他向我详细描述了战斗经过,说布尔人马术高超、枪法熟练,还让我看了他受伤的大腿。没有伤着骨头,但整条腿呈紫黑色。不过后来医生对我说那只是青肿,并非我所担心的肌肉坏死。当天夜里我又赶往埃斯特科特,这是一个只有几百名居民的小镇,是铁路的尽头。

我打算进入莱迪史密斯,在那里,伊恩·汉密尔顿会照顾我、让我大饱眼福的。可惜太迟了,大门已闭,布尔军占领了图盖拉河上的柯兰索车站与铁路桥。弗伦奇将军与其参谋,包括黑格与赫伯特·劳伦斯<sup>①</sup>,冒着敌人的炮火刚刚乘最后一班火车,离开莱迪史密斯赶往开普殖民地,英军骑兵主力将在那里结集。我只能在埃斯特科特等候,此地只有匆忙拼凑起来的少数士兵,准备保护纳塔尔南部,抗击布尔军的侵犯。守卫这片土地的力量只剩下一个营的都柏林燧发枪团,二三门大炮,几个连的纳塔尔兵,两个德班轻步兵连以及一列装甲列车,其余的英军部队都被困在莱迪史密斯。增援部队正从大英帝国的各个角落赶来。呆在埃斯特科特的那一星期里,我们几乎每天都有被包围的可能。除了加固工事和为自己鼓气外,我们几乎束手无策。

在埃斯特科特,我遇到了老朋友利奥·艾默里,也就是10年前在哈罗公学不幸被我推下水的那位班长。目前他是《时代》周刊的战地记者,后来在国会和政府我们又共事多年。这是我俩第一次在平等、友好的条件下见面。我们与《曼彻斯特卫报》的记者3人同住在火车站的转轨三角地带的空帐篷里。晚上走在小镇独一无二的街道上,我又遇见了霍尔丹少校。在远征

---

<sup>①</sup> 两人分别是1917—1918年间的总司令与总参谋长。——作者原注

蒂拉赫时，我能成为威廉·洛克哈特爵士手下的一名参谋，他帮了很大忙。他在埃兰德斯拉格特受了伤，现在他希望能到莱迪史密斯重返自己的部队。他也被困于此，暂时被委派指挥一个连的都柏林燧发枪团士兵。时间过得很慢，大家心急如焚。我们的驻地十分危险，一万多名布尔骑兵随时可能扑过来或切断我们的退路。我们必须坚守埃斯特科特。每天清晨，骑兵侦察队便被派往10—15英里以外的地方侦察敌情，以便及时通报敌军动向。不幸的是总指挥此时却想派装甲列车沿未遭破坏的16英里长的铁路去增援骑兵侦察队。

装甲列车看似固若金汤，但实际上十分脆弱。敌人只要炸毁一座桥或一个涵洞就可把这一庞然大物置于孤立无援的境地，使其任人宰割。可总指挥似乎没意识到这一点，他决定从为数不多的士兵中抽调兵力乘坐共有6节车厢的装甲车向柯兰索方向进行侦察。派出的兵力包括都柏林燧发枪团的一个连，德班轻骑兵团一个连，外加一门能发6磅重炮弹的舰炮以及一些从“恐怖号”舰上下来的水手，还有一些残兵。霍尔丹少校是此次行动的指挥。出发前的那天晚上，即11月14日，霍尔丹毫不隐瞒地对我流露出自己对部队此番行动的担心。当然他渴望冒险，渴望与敌人交锋，在战争之初大家都是如此。他问我是否愿意同行。那还用说！战友盛情难却，同时我也有责任为《晨邮报》收集消息，况且我又喜欢惹麻烦，于是我未加思考，欣然应允。

接下来发生的战事已众所皆知，常被提及。装甲列车在迭宕起伏的纳塔尔地区向敌人方面前进了约十四英里，一直到达奇夫里站也未见敌军一兵一卒，什么动静也没有。我们在此停留了一会儿，向总指挥发去电报，报告我们的方位。电报刚发完，我们便发现山头有人影在快速行进。这座山丘隔在我们与

大本营之间,距离铁路线约 600 码。这些人当然是布尔兵,就跟在我们后面。他们会对铁路下手吗?事不宜迟,我们随即往回赶。接近山丘时,我在车厢尾部站在一个盒子上,伸头向外一看,发现山顶上有一群布尔兵。突然,在他们中间出现了 3 个带轮子的东西,立刻火光闪亮,持续了十几次。一团巨大的球状烟雾升起来,在空中逐渐变成圆锥状,离头顶好像只有几英尺。是榴霰弹!这是我第一次在战场上见到榴霰弹,而且这次差一点成为我最后一次见到这玩意。铁皮车厢被子弹打得咣咣直响,列车前面轰隆一声,接着传来一阵剧烈的爆炸声。铁路沿山脚曲折而下,在敌军炮火的刺激下,同时也因为是下坡,列车车速猛增。敌人的炮火只来得及再作一次攻击,我们便可以绕过山脚,消失在敌人的视线之外。前面一定还有陷阱,这念头在我脑海里一闪而过。我正准备建议霍尔丹派士兵去告诉司机放慢车速,突然剧烈的撞击把车厢里所有的人都撞翻在地。时速高达 40 英里的装甲列车撞上了障碍物或某处断轨,被甩出了铁轨。

我所在的车厢里无人受重伤。几秒钟后我爬出来,从车厢顶上向外看。火车停在离敌军山头 1200 码的山脚下。山上几十个人影向前冲,卧倒在草丛中,草丛中立刻发出密集的步枪火力。子弹在头顶上呼啸着,像冰雹砸在铁皮车厢上。我从车顶上下来,与霍尔丹争论到底怎么办,最后我们达成一致意见,由他指挥都柏林燧发枪团士兵,外加那门小舰炮,在尾部车厢尽力压制敌人火力。我去前面看看火车出了什么问题,铁轨坏成了什么样子,能否修好铁路,以及能否把铁路上的坏车厢清除出轨。

我悄悄潜出车厢,顺着铁轨跑到前面。机车还在铁轨上,第一节普通车厢底朝天,翻了个身,里面死了几个人,还有几位铺路工人严重受伤。这节车厢已完全翻出铁轨。接下来的两节载

有德班轻步兵连的装甲车厢也都被撞出轨道，一节车身还立着，另一节则歪在一旁，两节车厢卡在一起堵住了后面车厢的去路。德班轻步兵被撞得鼻青脸肿，有些人伤势严重，那节倒伏在地的车厢成了他们的临时掩蔽处。敌人火力不断，不久步枪声中又夹进了大炮的轰鸣。我们遭到敌军的伏击。

我经过机车，又有一颗炮弹在头顶上炸开，炮弹碎片在空中尖叫着向四下飞落。司机立刻从车头里面跳出来，往翻倒在地的车厢下面躲，他的脸被弹片划伤，鲜血往下淌。他忿忿不平地喊冤喊屈：我只是老百姓。他们以为我得到了什么好处？让我当炮灰？做梦！我不会在此再呆上半分钟！看来他被刚才的炮弹炸懵了。这会妨碍他继续开车，然而只有他懂得驾驶，一旦他不干，逃生的希望便将破灭。于是我告诉他一个人在同一天不会两次受伤，受了伤还能坚守岗位的人总会因其勇敢受到奖励，这样的机会以后也许不会再有了。听我这么一说，他振作起来，抹掉脸上的鲜血，又回到机车内，听我的指挥<sup>①</sup>。

我想出个主意：我们可以开动机车将两节受损车厢撞出铁轨，这样整个部队就有可能撤离现场。铁路线未遭损坏，铁轨也没有移位。回到霍尔丹所在车厢，我通过一小孔告诉他目前的情况及自己的建议。他表示完全同意并设法阻住敌人的火力。

很幸运，在随后的1小时里我未受伤。我在火车上爬上爬下，站在露天里指挥司机怎么做。首先我们必须使半挂在铁轨

---

<sup>①</sup> 十多年后我才兑现自己的诺言。当时，这位司机未受到部队任何嘉奖。1911年我出任内政大臣，便向国王建议向司机颁发阿尔贝特奖章。我与纳塔尔省省长及当地铁路局取得联系，将过去的档案又翻出来。司机和司炉都获得了奖章，这是平民百姓所能得到的最高奖励。——作者原注

上的那节车厢完全脱轨，所以先得开动机车，将半节车身在铁轨上的车厢往后拖，直到它与另外一节脱开，然后再将它彻底甩出铁轨。这节报废的铁皮车厢很沉，机车轮子打滑几次后我们才使上劲。车厢终于被拉开了，我招呼士兵自愿过来从其侧面往外推，机车则从后面向前顶。显然，在侧面推车厢的士兵将暴露在危险之中。我叫了 20 名士兵，他们嘴上都立刻答应，但实际上只有 9 人站了出来，包括 1 名德班轻步兵少校和四五名都柏林燧发枪团士兵。所幸车厢在几个人的推动下，加上机车恰到好处的一撞，终于翻出铁轨。路障清除了，危险即将过去，成功在望，但就在此时发生了一件最失望的事。

机车的踏板宽约六英尺，比前面的煤水车宽，与刚才翻倒的车厢一角卡在一起。用力顶似乎很不安全，机车有脱轨的危险。我们将机车与后面的车厢分离，不时将其退后一二码，再加足马力撞击障碍物，但是每次移动便会产生新问题。刚翻倒的车厢与先前倒在地上的那节车厢成“T”状缠在一起，机车越是使劲撞，路障越是严重。

这时我想到，如果两节车厢因撞击而卡得更紧，那么若将一节车厢往后拉，它们就会松开。不过现在有个问题：机车车钩无法够到五六英尺外的那节车厢。我们到处找车钩，还真的发现了一个，于是机车将那节车厢往后拖了一码，使车厢完全脱轨。道路畅通了，但机车踏板又卡住了车厢一角，我们被迫停下来。清理工作十分紧张，吸引了我的全部注意力，那情景仿佛是在步枪射程内的铁靶前干活，同时敌人不停地朝铁靶射击。炮弹频频爆炸，子弹纷纷射来，我们又是拖车厢，又是撞车厢，折腾了 70 分钟。长仅五六寸的铁板竟然成了决定我们胜败荣辱的关键。

我们不得不小心翼翼，不让机车出轨，但此时敌人又在另一

侧增添了一门大炮,火力越来越猛,我决定冒险一搏。机车退到最大限度,然后全速冲向障碍物。随着一声刺耳的轰鸣,机车在铁轨上震颤着,被撞车厢直立起来,让开一条道,路障终于被排除了。但是后面的3节车厢落在50码外,还是在障碍物的另一侧。原来,机车冲过去以后那节破车厢又复了位。怎么办?当然不能将机车倒回去。我们能不能靠人力把后面的车厢拖到机车边呢?它们比机车窄,刚好能通过。

我又回到霍尔丹那里,他同意这个计划,命令士兵爬出车厢往前推。这一计划听来可行,却因形势所迫而落空。车身很沉,需所有士兵一起努力,而敌军火力凶猛,士兵都从暴露在敌人火力之下的一侧躲开了。由于我军不再还击,大批敌军出现在对面山头,拼命向我们开火,最后我们不得不决定由机车带着伤员以步行速度缓缓前进,都柏林及德班士兵以机车为掩护步行撤离。40名伤员挤上机车和煤水车,伤员大多鲜血淋漓。就这样,我们慢慢往前走。我在机车里指挥司机,机车里挤满了人,简直寸步难移。炮弹在四周爆炸,一些炮弹击中了机车,还有一些炮弹落在地上,溅起的沙石击打着车厢。车速加快了,外面的士兵掉队了。我让司机停车,但此时已离后面的步兵300码远。前面是一座很长的蓝科兰茨河大桥。我让司机把车开到桥那边等,自己则从机车里挤出来,顺着铁轨往回寻找霍尔丹。

可一切都在发生变化。往回走不到200码,我没有发现霍尔丹他们,却看见两名身穿便服的人出现在铁轨上。“铺路工,”我自言自语道,但马上意识到是布尔兵。这两人身材高大,身体健壮,身着黑衣,耷拉着帽子,端着步枪,离我不到100码。我急忙转身朝机车跑去。那两人开了枪,子弹从我身旁飞过。我处在一段路堑中,深达6英尺。我紧靠边上,却无处躲藏。再看那两个布尔兵,一个正跪在地上向我瞄准。只有跑!我又向前奔,

两颗子弹又打空了。不能再这样下去，必须逃出这可恶的路堑！我快速向左爬上去，尘土四溅。我安然穿过铁丝网，路堑外有一小块凹地。我蹲在那里，喘口气。

50 码外有个铺路工住的小屋，可以藏身。约二十码外是蓝柯兰茨河峡谷，那里也有许多藏身之处，我决定朝河边跑。我站起身，突然发现铁路的另一边，隔着两道铁丝网，一个身材高大的人骑在马上，右手握着步枪。他勒住马，挥舞着步枪，冲我大声命令着。我们相隔 40 码，尽管我是记者，但那天上午我带着毛瑟手枪。我心想可以干掉这个家伙，经历了刚才的遭遇，我更是迫不及待地想这么做。一摸腰带，手枪不见了，清理路障时，自己忙着跳上跳下，跑来跑去，肯定把它丢在车上了。我现在手无寸铁！那名布尔兵依旧骑在马上，枪口对准我。马、布尔兵和我都一动不动地站着。我朝铺路工的屋子和蓝柯兰茨河望望，那人仍在向我瞄准。看来逃跑彻底无望，布尔兵如果开枪，肯定会将我击中，于是我举起双手做了俘虏。

在接下来痛苦的几分钟里，伟大的拿破仑的话浮现在我的脑海：“身单力孤，手无寸铁时，投降是可以宽恕的。”然而，那个布尔人也许打不中我，况且蓝柯兰茨河谷近在眼前，两道铁丝网并未剪断。可是，一切都晚了，那名布尔兵放下枪示意我过去，我顺从了。我穿过铁丝网，越过铁轨站在他旁边。他跳下马，开始朝正从桥上撤退的机车与英兵射击，直到他们消失得无影无踪，这才罢手。他重又上马，我在他旁边，迈着沉重的步子向原先我与霍尔丹分手的地方走去。一个人影也没有，他们都已成了俘虏。天正下着大雨，走在茂密的草丛中，我突然想起一件令我不安的事，我的卡叽布外套上的两只口袋里装着毛瑟手枪的弹夹，每个弹夹里有 10 发子弹。这些子弹与我在恩图曼用的一模一样，是毛瑟手枪的专用子弹，叫做“软鼻弹”。此前一直没想

起来,现在才意识到将其带在身上十分危险。我悄悄将右袋里的弹夹扔在地上,没被发现。左手握着另一弹夹正准备扔时,那名布尔兵狠狠地盯住我,用英语问道:“手上拿的是什么?”

“这是什么?”我故意装傻,将手摊开,“捡到的。”

他接过子弹,看了看便丢了。我们继续向前,来到一群战俘跟前。周围是许多布尔骑兵,三三两两排成很长纵队,不少人撑着伞。雨哗哗地下着。

\* \* \* \* \*

以上便是1899年11月15日装甲列车的故事和我被俘的经过。

3年后,布尔人将领代表他们饱经战乱的国家访问英国,寻求贷款及帮助。在一次非官方的午宴上,我被介绍给他们的领导博塔将军<sup>①</sup>。双方谈到那次战争,我简要地讲述了自己被俘的故事。博塔默默听着,然后说道:“认不出我了?我就是那个俘虏你的布尔兵。就是我!”他的眼里闪着兴奋之情。博塔身穿白衬衫,外面穿着礼服,除了身材和黝黑的肤色外,与我当年在战争中看到的邋遢模样截然不同。确实是他。当年他在纳塔尔从军时还只是个自由民,由于他不主张战争,因此在战争之初他并没有获得指挥权。那次是他第一次参战。作为一名自由民在部队服役,他骑马冲在最前面,奋勇追击。就这样我们相遇了。

我对路易斯·博塔十分感兴趣。我俩在奇特的情况下相识,最后结成了朋友,我非常珍惜我们的友谊。从这个伟岸、强悍的

---

<sup>①</sup> 路易斯·博塔(1862—1919),南非联邦首任总理(1910—1919)。第二次布尔战争中任德兰士瓦军总司令。1910年南非联邦成立,任总理。

身影中,我看到的是一位开国元勋,一位睿智的政治家,一位农民出身的勇士,一位聪明的猎手,一位出类拔萃的伟人。

1906年,作为德兰士瓦的首任总理,他来到伦敦参加帝国会议。英国政府在威斯敏斯特会议厅举办了大型宴会,招待英联邦各国总理。我当时任殖民事务次官。这位不久前还是英国敌人的布尔人领袖穿过大厅入席,他中途停下来,对站在我身旁的我母亲说:“我俩什么世面都见过。”千真万确。

因篇幅所限,我不能在此一一罗列在我与这位伟人的长期交往中的许多要事。是他将库利南钻石<sup>①</sup>赠送给英王,这块钻石纯净如水,比任何一块钻石都要大至少二十倍。当时我负责解释德兰士瓦和奥兰治自由邦的自治政策,并通过下院执行宪法议案。后来在商务部和海军部任职期间,我经常与博塔将军及其同事史末资<sup>②</sup>接触。他们在1906年至大战结束的15年内,出色地治理着他们的国家。

博塔总觉得他自己对我有着某种特殊的吸引力,无论他何时访问欧洲,我俩总能经常见面,不是在会议或晚宴上,便是在家里或办公室里。他可靠的直觉提醒他大战即将来临。1913年他从德国疗养回来,郑重其事地警告我笼罩在德国境内的紧张危险气氛。他说:“你们要作好准备,不要相信德国人,我知道他们很危险,他们对你们不怀好意。我听到过一些你们听不到

---

<sup>①</sup> 世界上最大的钻石,1905年在南非德兰士瓦的布莱尔矿山发现,重约3106克拉。1907年,德兰士瓦政府将其作为礼物赠予英王爱德华七世。

<sup>②</sup> 简·克里斯蒂安·史末资(1870—1950),南非政治家、总理。英布战争时任布尔军指挥官,战后主张布尔人自治和英布合作,对1910年南非联邦的成立起了重大作用。

的话,你们海军要作好准备,我感到气氛不对。而且,”他补充道,“如果真的打起来,我也将一切就绪。德军进攻你们时,我会进攻德国的西南非洲殖民地,将他们一网打尽,到那时我会尽自己的职责。不过你,还有英国海军,千万不要措手不及。”

机遇和传奇把我俩的命运维系在一起。1914年7月28日或29日,即大战爆发的前一周中间,质询时间<sup>①</sup>过后,我走出下院,在王宫苑遇上南非大臣德拉夫先生,此人是我早就认识的一位能人。他问:“这意味着什么?你认为会发生什么事?”我答道:“我认为战争即将来临,而且英国也会卷入。博塔知道事态的严重性吗?”德拉夫神情严峻地走开了。我也未多想,但此事还有下文。

那天晚上德拉夫发了封电报给博塔,说“丘吉尔认定会发生战争且英国会卷入”,或诸如此类的话。博塔当时不在首都,他去了德兰士瓦北部地区,史末资将军在比勒陀利亚暂时代理他的职务。电报放在史末资面前,他看了看,推到一边,继续埋在文件堆里。文件处理完毕后,他又拿起电文。“一定有情况,否则德拉夫不会发电报。”于是他给正在德兰士瓦北部地区的总理发了份内容相同的电报。好几小时后博塔将军才收到电报,不过还算及时。那天晚上他正打算坐火车前往德拉瓜湾<sup>②</sup>,然后乘德国轮船返回开普敦。他后来告诉我,如果不是这份电报,大战爆发时,他也许正坐在德国人的轮船上。果真如此的话,这位至高无上的南非领袖在南非联邦的大部分地区处于叛乱边缘之际,却要落入敌手了,如果这一灾难发生了,后果将不堪设想。一接到电报,他立即取消所有计划,乘坐专列在大战前夕及时赶

① 英国议会中大臣答复议员所提问题的时间。

② 旧称马普托湾,印度洋中莫桑比克南部一海湾,宽约三十公里。

回比勒陀利亚。

他在战争中所起的巨大作用有历史为证。他的冒险和非凡勇气,他那出色的指挥才能、横扫西南非德军的不凡气概,1917年他在帝国战争内阁会议上直率而热烈的发言以及1919年大战胜利后他在巴黎和会上表现出的政治家风范都载入了史册。

他最后一次离开英国时,我正在战争事务大臣任上,他来到办公室与我道别。我俩谈了很久,谈到人生的坎坷以及两人所经历的艰难时事。在战后胜利的日子里,许多国家的高级官员来办公室拜访我,只有他一人是我亲自陪下楼梯送进轿车的。以后我再也没有见到他,回国后他很快就去世了。不论是和平还是战争,是失败还是胜利,博塔将军永远是其国家的救世主。

\* \* \* \* \*

我希望读者原谅上述冗长的题外话,让我们回到原先叙述的事件上吧。我浑身透湿,与其他战俘以及一些重伤员坐在地上,诅咒着自己的命运及当时自己的一时心血来潮。我本来完全可以体面地随机车撤离。实际上,按照侥幸逃回去的人的说法,我回到部队还会受到热烈欢迎,完全没必要千方百计使自己卷入这场于事无补的灾难中。我赶回战场不但对别人毫无帮助,而且使自己失去了在战争中的冒险机会。无私救人的美德给我带来了什么奖赏呢?我百思不得其解。然而,如果我能未卜先知的話,我当时应该能认识到这次不幸实际上为我未来的人生旅途打下基础。我并没有成为战争的局外人,并没有因为被俘而消沉。后来我逃了出来,并因此出了名。也正因为如此,我的候选人资格才得到很多选区的承认。同时这次经历使我有写作素材,使我得以大赚一笔,有了自食其力和进入下院的资

本。如果当时我跟着机车回去,尽管会受到表扬重用,但一个月后,与雷德沃斯·布勒将军的几位参谋一样,我很可能会在柯兰索河上游被敌军打破脑袋。

可这些事都无法预知。在布尔军司令部帐篷外,我郁郁地排在俘虏队伍里。后来我从战俘中被挑出来站在一边,心情更是沉重。我了解军法,知道身着军装的非军事人员如果在战斗中表现积极,即使他一枪未发,也有可能被就地处决。在大战中,任何国家的军队都不愿在这种事情上浪费10分钟。我孤零零地站在大雨中,内心焦虑不安。脑子里思考着该如何应答对我的各种提问,想象着如果他们对我说我死期将近,自己又会是如何反应。这样过了约一刻钟,帐篷里的布尔军官一番商议之后,三言两语将我打发回战俘队伍中,我立刻如释重负。几分钟后,一位布尔人地方治安官从帐篷中出来对我说:“尽管你是记者,但我们不打算放你走。毕竟我们不是每天都能抓到贵族子弟的。”听了这话我很开心。其实我的惊慌是多余的,对于白人来说,布尔人是最人道的,卡菲尔人则另当别论,在布尔人看来,哪怕是在战场上消灭一个白人都是件令人痛心、令人震惊的事。他们是我在四大洲经历过的战争中所遇到的最善良的敌人。

最终,我们这些战俘在布尔军监督下,前往60英里外的埃兰德斯拉格特,这里是布尔军铁路卸载点,他们从那里再把我们押往比勒陀利亚。

## 监禁的日子

战俘也许是最幸运的囚徒，但日子仍然不好过，一旦落入敌人手中，就得听凭其摆布，靠其仁慈苟延残喘，凭其怜悯维持生计，对他们俯首贴耳，唯命是从，耐着性子期待着他们会有好心情。战争仍在继续，重大战事也在发生，我们失去了很多参战冒险的好机会。一天天如此漫长，时间一点点向前蠕动。没有任何娱乐，想阅读找不到东西看，写作更是不可能。从早到晚都是单调、乏味的生活。

此外，整个监狱的环境，哪怕是最宽松有序的牢房，也都令人作呕。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战俘们经常为琐事争吵不休，更不用谈彼此能获得一丝乐趣了。如果你从未受过约束，也不知当囚犯的滋味，那么你一旦被囚禁在狭小空间，四周围有铁丝网，有哨兵持枪监视，还有许多条条框框束缚你，你一定会感到羞辱。一生中，我最深恶痛绝的便是这次被俘。所幸时间很短，在纳塔尔地区，我从身陷囹圄到成功越狱，前后不足一月。越狱后又遭到追捕，但人毕竟自由了。回首往事，我总不免对犯人和俘虏产生深切同情。我无法想象一个人，尤其是受过教育的人，被长年囚禁在监狱里会是什么滋味。日复一日，逝去的是虚度的无聊日子，面对的仍是被监禁的漫长未来。正因如此，多年后在我担任内政大臣、掌管所有监狱期间，我在尽力保持政策的连续性的前提下，丰富犯人的生活，为受过教育的犯人提供书籍，

为所有犯人不定期提供某种娱乐,使他们生活有盼头,也有可供回味的东西。如果犯人罪有应得,必须坐牢,我尽可能为之减轻坐牢带来的痛苦。我憎恨对人施以刑法,但有时责任在身,万不得已时我会想:死刑比无期徒刑实际上仁慈得多。

犯人很容易情绪低落。当然,如果被关在牢里,终日见不到阳光,吃不饱,孤单一人,那么他的情绪只能影响到他自己。可如果犯人年轻,吃得又好、精力充沛,看守也不严,他就有机会与其他犯人密谋,那么他就有可能把思想化为决心,把决心化为行动。

我们又是步行又是乘火车,走了3天才从前线到达比勒陀利亚的囚所。我们在敌我双方的炮声中,绕过包围莱迪史密斯的布尔军阵线,到达埃兰德斯拉格特车站。我和霍尔丹少校、一位名叫弗兰克的都柏林燧发枪团年轻中尉<sup>①</sup>,以及50名士兵被装进火车。我们不紧不慢地走了几百英里,进入了敌国的腹地。火车驶出不远,一位帝国轻骑兵团的骑兵便加入了战俘队伍。他叫布鲁基,南非殖民地居民,当天在巡逻时被俘。他在布尔人面前谎称自己是军官。由于他能说一口流利的荷兰语和卡菲尔语,对周围环境十分熟悉,我们也就没有揭穿他,我们正需要这样的人。11月18日,我们到达比勒陀利亚,士兵们被押往设在跑马场的监狱,我们4名军官则关押在国立示范学校。我们沿途一直在低声商量各种逃跑计划,决定一有机会就想方设法越狱。我们4人中有3人在不同时间、不同环境下从国立示范学校越狱,除了1人外,所有战俘只有我们越狱成功。

在示范学校里,我们遇到了所有在早期战斗中被俘的英军

---

<sup>①</sup> 一位风度翩翩、能力出众的军官。1915年4月25日,在土耳其西北部加利波利半岛遇难,时任上校。——作者原注

军官，他们大多是在尼科尔森山脊之役中被俘的。我们这些新来的战俘被关在同一牢房，我们对牢房作了仔细研究。我们一心只想自由，时时刻刻都在绞尽脑汁寻机脱逃。我们很快发现看守中存在不少漏洞。我们在监狱里自由度很大，一天中绝大部分时间都无人监视，因此我们得以不停地筹备计划。不出一星期，一个十分大胆的越狱计划便初具雏形。

经过仔细讨论，我们拟定了一个孤注一掷的惊人计划。一切都根据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而制定。国立示范学校里关押着60名英军军官，10名勤务兵，有40名南非共和国警察看守。这40名看守中，10名始终在学校的四角步哨。每天通常有10名看守不在岗，去了镇上，其余20名则歇息在看守帐篷里，或是擦拭武器，或是抽烟打牌。看守帐篷搭在四方形院内的一角，晚上30名不值班的看守在里面睡大觉。

如果我们能制伏看守，解除他们的武装，那么我们就迈出了很关键的一步。我们有必要先探得看守晚上的休息情况。他们的步枪和手枪放在哪里？有多少人睡觉时还是全副武装或带着手枪？无论白天黑夜我们都仔细观察，终于发现所有无需值班的看守都睡在帐篷两边，一边躺两排。不用在夜间换岗的看守休息时都脱去军靴和大部分衣服，即使一两小时内要换岗的看守也首先解去子弹带，脱去上衣与军靴。步枪与子弹带堆在一起，挂在两根帐篷杆上。因此晚上除了哨兵换岗的几段时间外，30名看守距离众志成城、身手矫健的战俘只五六十码，四周只有帐篷保护，处境决非他们所想象的那么安全。

帐篷入口有哨兵把守。这种情况如不尝试，谁也无法预料能否拿下帐篷。哨兵可能会与里面的警察聊天，闲聊些令人吃惊的事，或某人得了急病之类的话题。这时二三名勇敢的战俘趁机从帐篷后面的缝隙里爬进去，从架上抓些步枪或手枪，把刚

刚从睡梦中惊醒的看守制伏,同时趁武装哨兵发愣之际将其擒住。想不发一枪一弹或不被察觉就攻下帐篷比登天还难。我们只能说在战争史上,或者说犯罪史上有着许多相类似的出乎意料的大胆举动。如果这一步成功,也只是实现了第一步。

第二步要对付 10 名武装哨兵。这一步情况复杂,因为 3 名哨兵守在院四周带刺栅栏外,距离栅栏仅一码之遥,他们白天经常会倚着栅栏聊天,晚上却不然。他们在院外,我们鞭长莫及。其余 7 名哨兵把守院内。这 10 名看守(外 3 里 7)每位都值得我们仔细研究。

如果有一两名看守逃脱后发出警报,计划也不至于落空。我们一旦制伏看守,把枪支分发到各人手中,我们就能组成一支武装,相信不论是从数量上还是从纪律和智谋上,我们都胜过至少半小时后才能赶来救援的布尔军。我们可以在半小时内做很多事。显然,凌晨 2 点钟,也就是中班岗的中间是最有利的时机。如果每个英国军官都能各尽其责,行动准确无误不出差错,那么即使有些小失误,我们也很有希望征服国立示范学校。

整个大院被挂在旗杆上的电灯照得通明,不过我们发现这些电灯的电线从我们牢房过。我们当中有人声称自己可以随时切断电路,使整个大院陷入一片黑暗。实际上有天晚上已作了实验。在攻下帐篷的信号发出后,哪怕只停电 1 分钟,抓住不知所措的在岗哨兵就不那么困难了。学校体操房里还有很多哑铃,谁能说黑暗中用哑铃武装自己的 3 名犯人抵不上 1 名全副武装的哨兵呢? 尽管我们只有哑铃,但我们目标明确,不顾一切,而哨兵虽手中有枪,却不敢用它。一旦我们奇袭看守帐篷成功,同时又能解除大部分哨兵的武装,那么我们在敌军首府比勒陀利亚的心脏里用 30 支短枪和 30 支步枪武装起 60 名军官,这样一来,这项富有传奇色彩的伟大计划中的最艰难阶段便大功

告成了。下一步呢？

离这所学校约一英里半的地方是比勒陀利亚跑马场，四周围着带刺的电网，里面关押着 2000 名英国战俘，这些战俘是普通士兵和军士。我们能够与他们取得联系，共商越狱计划。联系渠道很简单，国立示范学校里的军官战俘有十多名勤务兵，总有几人不时借故被退回跑马场，然后再从中选出几名过来。这样就能定期了解这 2000 名士兵的感受及其处境。这些士兵怨声载道，生活单调，食不果腹，居住条件极差。有一次他们竟冲向入口处的看守。虽未发生流血事件，但布尔人为看押如此众多的士兵伤透了脑筋。我们获悉跑马场内只有 120 名警察看守，外加两挺机关枪。毫无疑问，这样一支部队如果准备充分，肯定能压住任何暴动。但如果在士兵们造反之际，场内看守遭到身后 60 名英军武装军官的袭击，那又会怎么样呢？假如机关枪从其身后响起，假如 2000 士兵有计划有组织地从正面向他们发起进攻，那又会怎么样呢？谁又能说在漆黑的夜晚和一片慌乱中，人多势众、计划周密不占绝对优势呢？果真如此的话，越狱计划的第三步也将实现。那么，下一步呢？

在整个比勒陀利亚，会使用武器者不足 500，而且绝大多数是免征兵役的富裕自由民、一些不宜参军者以及政府官员和职员等。他们名义上成立了一支卫戍部队并配备了步枪，仅此而已。实际上，这个组织并未运转。越狱第一步如果成功，第二步就容易了，第三步则更容易。想象中我们似乎已是这座城市的主人，城外的堡垒只有为数不多的留守人员把守，其他人都上了前线。堡垒上的大炮炮口一律朝外，如果后方遭到袭击，根本不起防御作用。假如我们成功地控制了这座城市，自然就很容易占领这些堡垒。最近的英军部队距离比勒陀利亚仅 300 英里，如果一切顺利，我们可一鼓作气攻占这座城市。我们有一支相

当强大的队伍,粮草弹药充足,我们至少能像马弗京那样防守一段时间。

整个计划将在黄昏与次日黎明结束。敌人过多久才会发动反攻?估计几天之后。因此我们必须占领南非共和国铁路的中心枢纽。我们可向各方向上的每条铁路线派出火车,小心翼翼向前驶出四五十英里进行侦察,然后返回。归途中将身后每座桥和涵洞炸毁,这样可以争取到时间,有效组织起城防。如果这种事真能发生,如果布尔军如梦方醒,发现因为自己麻痹大意,把大量战俘集中在一地而又缺乏足够的守军,因此导致首都落入战俘之手,那么他们需要抽调出多少人马包围这座城市呢?布尔军擅长在开阔地作战,整个布尔战争中,他们从未顺利攻下过任何防守严密的地方。金伯利、马弗京、莱迪史密斯便是例证。只要遇到我军战壕或坚固阵地,他们只好退缩,但在一望无际的草原上,他们所向披靡。如果拿下比勒陀利亚,我们可以防御数月。多么伟大的战功啊!克留格尔总统及其政府将成为我们的阶下囚。他不是说什么“骇人的人性”吗,这次该轮到 he 惊骇不已了。

有了这些王牌在手,我们也许可以体面地和谈,通过友善公平的调解结束战争,这样军队也就不必再行军打仗、耗时费力了。这一宏伟梦想已萦绕在我们脑海多日。几位性急的人甚至缝好了英国国旗,以备“那天”使用。可一切仍是个梦。战俘中有二三名高级军官得知这一计划后坚决反对,我当然不能说他们的想法没有道理。这种情况很容易让人想起喜剧中的场面,剧中的丑角总是煞有介事地宣称:“1200名全副武装的马帮正准备洗劫小镇。”“那他们为什么不动手呢?”“警察不允许。”的确,难就难在这点上。10名头脑清醒、全副武装的人对一项宏大的计划来说也许只是个小障碍,但对我们的计划来说则极为

关键。于是,我们放弃了集体行动计划,转而致力于研究单人行动方案。

## 越 狱 (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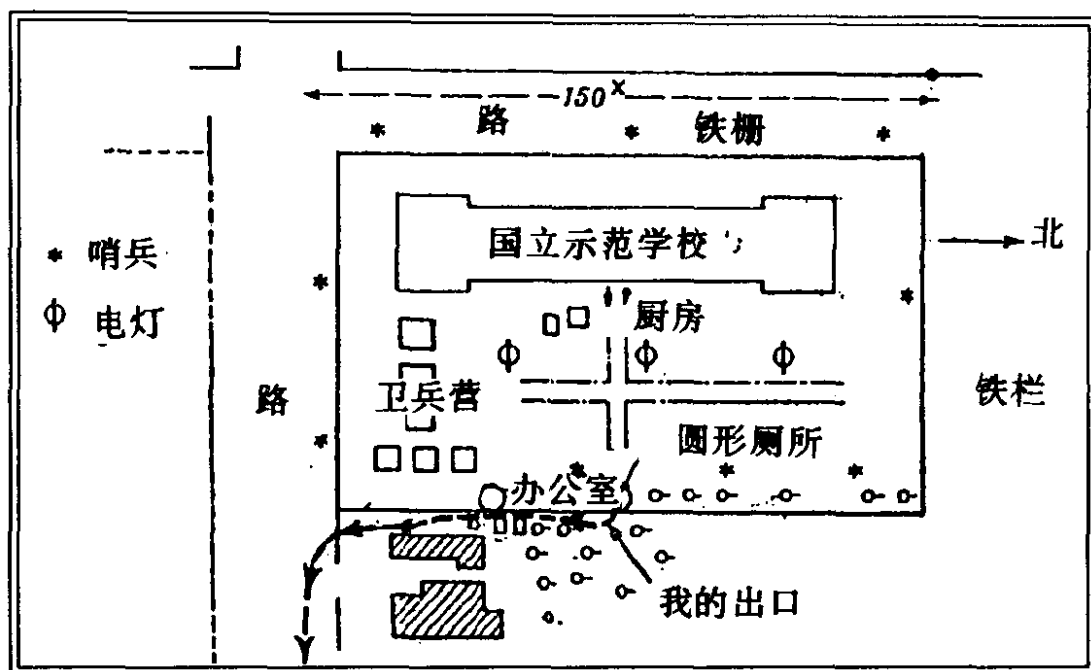
被关押的前三个星期,我一方面参与策划各种暴动和越狱计划,另一方面一直在与布尔当局交涉,要求他们放了我,因为我是记者。他们的回复是由于我参加了装甲列车上的战斗,因而失去了非战斗人员的身份。我争辩说自己在战斗中一枪未发,被俘时也手无寸铁。这的确是事实。但那时布尔人看到了纳塔尔的报纸,上面大张旗鼓地报道了我的行动,将机车与伤员的撤离归功于我。因此朱伯特将军<sup>①</sup>说,尽管我没发一枪一弹,但我放跑了机车,使布尔军作战受挫,因此只能以战犯对待我。12月的第一个星期我得此消息,便立刻决定越狱。

现在我将当时所写的文字原封不动地抄录于此。

国立示范学校坐落在一处四方院中,两旁围着铁丝网,另外两边是高约十英尺的波纹马口铁栅栏。这些栅栏对于年轻人来说并非大障碍,但院内有哨兵监视,他们装备着步枪和手枪,每隔50码有一个哨兵,成了一道几乎无法逾越的障碍。没有什么比这些活墙更难穿越的了。

---

<sup>①</sup> 皮特·朱伯特(1831—1900),南非政治家和将领。1877年英吞并德兰士瓦,朱伯特任总司令(1880),领导布尔人抗击英军。1899年布尔战争再次爆发时任共和国军队统帅。



从国立示范学校越狱示意图

经过焦急的思考与不停的观察，一些战俘发现，当东边的哨兵巡逻时，他们有一段时间看不见圆形厕所附近几码长的墙头。院中的电灯将整个院子照得通明，东面的墙却在阴影里。第一步是要逃过厕所附近两名哨兵的视线，而这又得等到他们同时转过身才行。过墙是一幢别墅的花园。越狱计划只能到这一步，以后的一切都不得而知。如何逃出花园，如何穿过马路而不被察觉，如何躲过城里的巡逻兵，以及如何走完 280 英里到达葡萄牙殖民地的边境，这些都是以后要面临的问题。

12 月 11 日，我与霍尔丹少校和布鲁基中尉试了一次，没成功。躲进厕所并不困难，但要爬过墙却极其危险。如果 15 码外的哨兵在适当位置正好往这边看的话，那么爬在墙上的人就会被看得一清二楚。哨兵是发出口令还是开枪射击，那就要看他们的性情了，谁也说不清他们会干什么。

尽管如此,我还是决定第二天再次冒险。12日这天过得真慢,我先是担心,后来逐渐感到绝望。到了晚上,两位战友作了努力,却未发现任何可乘之机。我越过四方院躲进圆形厕所,从其金属框上的孔眼往外注意哨兵。有段时间他们一直碍手碍脚地站在那里,突然,一个哨兵转过身朝另一哨兵走去,两人开始闲聊了起来,他们都背对着我。

机不可失!我站在墙角下的一块凸起处,双手抓住墙顶,翻上墙头。前两次我颇为踌躇,上去了又下来,第三次下定决心,翻了过去。我的背心被顶上的金属装饰物钩住,不得不停下来花很长时间把自己解脱出来。我骑在墙上朝哨兵瞟了一眼,他们仍在15码处背对着我聊天。一名哨兵正在点烟,手中的光亮在我脑海中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轻轻落下,藏进隔壁花园的灌木丛中。自由了!越狱的第一步已经迈出,无法再回头了,我继续在原地等待战友。月光下,花园里的灌木丛投下一大块黑影,是一个很好的藏身之处。我藏了约一小时,焦急万分。花园里不断有人走动,一个人甚至在离我仅几码远的地方向这里张望。其他人在哪里?他们为什么不试试?

突然从院里传来声音:“没希望了!”我潜回墙边。只听两名军官战俘在院里走来走去,嘴里咕噜着拉丁语,谈笑风生。我听见他们提到了我的名字,于是我冒险咳嗽了一声。一名军官马上又聊了起来,另一名军官则缓慢而又清晰地说:“他们跑不掉,哨兵已经起了疑心。全完了,你能回来吗?”此时此刻,我一点也不害怕了。回去是不可能的,我无法保证越墙时不被发现,况且墙外也没有支脚点让我爬上去,我只有勇往直前。我对自己说:“我肯定会被他们抓回来,但我至少要试一试。”我对那两名军官悄悄地说:“我单

枪匹马行动。”

此时我以一种平静的心态看待将要发生的一切。失败是肯定的，成功的希望几乎没有，危险肯定是有的。通向马路的大门离哨兵只有几码远，我对自己说：“要鼓足勇气。”然后戴上帽子，大步跨到花园中，大摇大摆地从别墅的窗前经过，走出大门向左拐去。我从距离哨兵不到五码的地方经过，我不清楚他是否看到了我，因为我一直未回头。心里竭力抑制着想跑的冲动。走了约100码未听到任何动静，我知道第二道障碍已经克服。我成了比勒陀利亚市内的逃犯。

嘴里哼着曲儿，我悠然走在马路中央。街上到处是自由民，根本没有人注意到我。不一会儿我来到郊外，在一座小桥上坐下来，考虑了一番。现在我身处敌国腹地，离德拉瓜湾大约300英里，没有一个熟人能够帮忙。我的越狱黎明时一定会被发现，追捕令也会随之而来。所有出口都有封锁，城市有警戒，乡间有巡逻队，火车上有搜查，铁路线上有哨兵把守。我穿着一身褐色法兰绒便装，口袋里有75英镑和4块巧克力，但指南针和地图还有维持体力的鸦片和肉块都在国立示范学校的战友们身上。糟糕的是，我不会说一句荷兰语或卡菲尔语，怎么才能弄到食物、辨清方向呢？

当希望破灭时，恐惧也就消失了。我想了个计划，一定要找到通往德拉瓜湾的铁路。尽管铁路线上有警戒，但没有地图或指南针的帮助，我只有依靠铁路。我抬头望着星星，只见猎户座星光闪烁。大约一年前我在沙漠中迷路时，是它引着我找到了尼罗河岸，为我找到了水源。现在它应该能够把我引向自由之路。水与自由，缺一不可。

向南走了约半英里，我看到了铁路，却不知是通向德拉

瓜湾还是通向彼得斯堡。如果是通往德拉瓜湾,那铁路一定是向东的。但这条铁路是向北的。不过它也许是在山间绕着弯。我决定沿这条铁路走。夜色怡人,一阵凉风吹在脸上,使我心里一阵狂喜。不管怎样,我自由了,尽管才1小时,也是很了不起的,冒险的激情越来越浓。除非天上的星星为我而战,否则我是逃不了的,既然如此,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我沿着铁路线走着,步履轻快。不时有警戒哨所的灯光在闪亮,每座桥都有人把守,可我却一关关躲过来了。遇到危险的地方便绕过去,没采取什么其他预防办法,或许这正是我能成功越狱的原因。

我一边走一边继续考虑着自己的计划。我不可能步行300英里走到边境,应该爬火车,藏在座位下、车厢上或车钩处。我想起保罗·包尔提丘德就是这样从学校里逃出来的。脑海中想象着自己从火车座位下钻出来,恳求坐在头等车厢里的大腹便便的乘客搭救我。该乘哪列火车呢?当然是第一列。走了约两个钟头,我发现前面有车站的信号灯。我绕过铁路,躲在离月台200码的铁轨旁的沟里。我估计火车会停在车站,到我这里时速度不会很快。1小时过去了,我开始急躁起来。这时突然听见汽笛和轰隆声,接着一辆装有巨型黄色前灯的机车驶入我眼帘。火车到站停了5分钟,又鸣笛出发了。我伏在铁轨旁,脑子里一遍遍重复着要做的动作。一定要等到机车驶过时再冲上去,否则会被发现,然后再飞快爬上车厢。

火车慢慢启动,然后加快了速度,这一过程所用时间比我所预计的要短。灯光迅速接近,车轮的嘎嗒声变成了轰隆声,一团黑影在我上方一晃而过,机车里的炉火映出了司机的轮廓,机车吐着蒸汽疾驶而去。我扑了上去,伸手一抓

落空了；又一抓，又落空了；再一抓，终于抓住了把手，双脚悬空，脚趾擦着铁轨。我一用劲登上了前面第五节车厢的搭钩。这是列货车，上面全是粘有煤尘的麻袋，麻袋里装的是要运回煤矿的空袋子。我爬上去躲在这些麻袋中，5分钟过后，这些麻袋将我埋得严严实实，靠上去软软的，很舒服。或许司机看见我冲上了火车，到了下个车站就会拉警报，不过也许他并没有看见。火车往哪里去？什么时候卸货？会遭到搜查吗？火车是在德拉瓜湾铁路上吗？天亮以后该怎么办？算了，别操心。这个晚上已够走运的了，见机行事吧。我决定先睡上一觉，没有比火车的嘎嗒声更动听的催眠曲了。这列火车带着一名在逃犯，正以时速20英里的速度离开了敌军首都。

不知道睡了多久，我突然醒来。兴奋感已荡然无存，困难沉重地压在心头。我必须在拂晓前跳下火车，这样可以乘着黑暗找个池塘喝点水，同时找个藏身之处。第二天晚上我可以再上另一列火车。如果连麻袋一起被卸下车，那就太危险了。于是我从舒适的麻袋中爬出来，又站在车厢间的搭钩上。火车开得很快，可我认为到了该跳车的时候了。于是，左手抓住车厢后的铁把手，我纵身往下一跳，脚撞在地上后向前冲了两大步，然后翻在沟里。我受到很大震动，却未受伤。这列火车继续匆匆前行。

天依旧是漆黑一片。我处在一个荒凉的山谷中，四周是低矮的山丘，长满了浸有露水的杂草。我在附近的溪谷中寻找水源，很快发现了一池清水。我口干舌燥，不停地喝着，直到肚里装满了足够一天消耗的水，这才罢休。

天开始放亮，太阳冲破大片黑云，露出霞光。我发现铁路向正东方向延伸，如释重负。我走对了。

饮足了水,我开始往山里走,希望能找到一个藏身之处。天色已大亮,我躲进一个深谷旁的小树林中,决定在此待到黄昏。可以聊以自慰的是,无人知道我身在何处,包括我自己。现在是凌晨4点,到天黑还有14个小时,我很想趁自己还有力气赶紧上路。刚开始天气很冷,渐渐地太阳呈威了,10点钟阳光已很炽热。我唯一的伙伴是一只巨大的秃鹫,它对我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不时发出可怕而不祥的嘎嘎声。我居高临下,可以俯视整个山谷,西面3英里外有个小镇,小镇里的屋顶都是马口铁做的,附近还有分散的农庄,每个农庄周围都长着一丛树,为平坦单调的高原增添了生气。山脚下有一处卡菲尔人村庄,村民们的身影出现在田地间和正在牧场上吃草的山羊和奶牛群中……这一天,我吃了一块巧克力,加上热辣辣的阳光照射,我感到焦渴万分。池塘离这里有半英里远,但我不敢离开小树林,因为偶尔有一些白人骑马或步行走过山谷。一个布尔人还朝离我不远的小鸟开了两枪。不过没人发现我。

前一天晚上的激动已跑得无影无踪,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不寒而栗的感觉。我饿得发慌,越狱前没吃晚饭,巧克力虽能抵挡一阵,却填不饱肚子。我无法入睡,心狂跳不已,为自己的前途未卜担心。我想遍了种种不利的可能,一想到自己要被再次抓获并押送回比勒陀利亚,心里就又恨又怕,这种感受无法用语言来表达。有些人在悠然自得时说过一些很有哲理的话,但此时此刻这些话对我没有丝毫的安慰作用。看来这些人都是些只能同甘不能共苦的朋友。我痛苦地意识到,靠自己这点智慧与微薄的力量无法摆脱敌人,没有万能上帝的帮助,我无法成功。我不停地祈祷着,上帝似乎很快就应允了。

上述文字是我多年前写下的，当时对这段冒险经历还记忆犹新。那时候没有再往下写，因为再写下去就会损害到那些曾帮助过我的人的自由和生命。时隔多年，这些原因也都不存在了。现在我可以继续那段故事了，且看我是如何绝处逢生的。

白天我一直注意着铁路，发现东西两个方向都有2—3列火车经过，估计晚上的情况也应该一样。我决定像前一天夜里一样爬上其中的一列。我观察到，这些火车，特别是长货车，爬陡坡时行速特别慢，有时与步行速度相差无几。如果选择一段既上坡又拐弯的铁路或许方便些，这样我可以爬上火车拐弯时突出的那节车厢，那时机车与押车卫兵的车厢都已拐弯，看不见我。这一计划似乎非常合理。我似乎已经可以看到自己在黄昏时分搭上一列火车，一夜前行了六七十英里，这样离边境只有150英里了。我可以故伎重演，这并没有什么不妥。如此这番只需接连3个晚上，我就能到达葡萄牙人的领地了。我身上有二三块巧克力和一口袋碎饼干，足够维持生命的了，不用冒险去向陌生人求助，以免再被抓住。怀着这种心情，我焦急不安地等待着天黑。

白天终于过去了，晚霞似火，山阴蔽谷，山间小道上，一架布尔人的马车慢慢地朝小路走去，后面跟着长长的一溜人，卡菲尔人也赶着牲口回村庄，天很快暗了下来，我这才开始出发。爬行在山石和杂草间，间或歇下来喝些甘甜的凉水，我匆匆赶往铁路，来到一个火车上坡的地方，不久又找到了铁轨的转弯处，这里符合原定计划中的所有条件。在一处小灌木丛后面，我坐下来满怀希望地等待着。1小时过去了，2小时过去了，3小时过去了，却不见火车的影子。6个小时过去了，肯定有一列火车快过来了。又是1小时，仍不见火车！我的计划落空了，希望也成为泡影。难道这段铁路晚上没有火车经过吗？的确如此。我可能会在此空等到天亮，好在到了半夜我没了耐心，开始顺着的铁

路步行,无论如何先走上10—15英里。可我并没有走上多远。每座桥都有士兵持枪把守,每隔几英里就有棚屋,间或还有村庄包围着的车站。整个草原笼罩在明亮的月色中。为了避开这些危险地带,我不得不绕上很大的圈子,有时甚至还得在地上爬行。离开铁路线后我便遇上了泥沼。穿行在带露水的草丛中,蹚过几座铁路桥下的小溪,不久腰部以下便湿透了。一个月的监狱生活使我得不到锻炼,我很快就又困又饿,精疲力竭了。这时我走近了一个车站,其实只是草原中的一个站台而已,周围有二三处房屋和棚子。铁路侧线上豁然停着3列长长的货车。由此可见这条铁路上的交通没有规律。月光下这3列一动不动的火车证实了自己先前的忧虑:晚上这条铁路上没有火车运行。下午的如意算盘落空了。

我忽然想到现在就可以爬上其中的一列,躲在货物间,第二天白天跟着车走,如果顺利的话,明天夜里还能再搭一截。可问题是他们往哪儿开?在什么地方停靠?在何处卸货?一旦我钻进火车,那么命运就定了。离边界长达200英里的途中,我也许会在威特班克或米德尔巴格或其他车站被卸下来,重做俘虏。行动前,无论如何得先弄清火车的目的地。我得先溜进火车站,查寻车厢或货物上的标签,看看从中能否看出名堂。我蹑手蹑脚地上了平台,来到两列火车当中。我正在找车厢上的标识,一阵叫嚷声传来,让我心惊胆战。好几个卡菲尔人又是笑又是叫,我似乎听出有一个欧洲人的声音在争辩什么或在下命令。不管怎样,这些已经够我受的了。我赶紧从两列火车中间往后退到侧线的尽头,飞快地溜进平川的草地中。

无奈,我只有一步步漫无目的地往前走。望着周围屋子里不时闪烁出的灯光,想象着里面的舒适与温暖,我心里凄楚极了。我明白,这些屋子对自己来说只意味着危险。月光下,远处

七八盏大灯发出耀眼的光亮,那是威特班克或米德尔巴格车站。我的左侧也闪亮着二三点火光,那肯定不是住家的灯火,究竟是什么,离我有多远,我说不清。这时我的脑海中闪过一个念头:这些火光或许是卡菲尔人的村庄。趁现在还有体力,去投奔卡菲尔人也许是最好的办法。听说他们敌视布尔人,但对英国人却很友好。无论如何,他们或许不会将我抓起来,他们也许会给我些吃的,腾出一块干燥的角落让我休息。尽管我不会说他们的语言,但是他们应该知道英镑的价值。或许他们还会为我提供向导和马匹,当然最重要的还是食物和休息。这些念头涌进脑海,促使我朝这些火光走去。

就这样走了约有一英里,我突然意识到这种念头很荒谬,靠不住,于是转身顺着原路又折回。走到半路又停下来,索性往地上一坐,觉得自己已是穷途末路,没了一点主意。猛然间,所有忧虑又都莫名其妙地消失了,我分明觉得自己应该往卡菲尔人的村庄走。记得早些年前,我曾玩过扶乩。现在的情形恰似扶乩,自己完全受意识的支配。

我又朝火光快步走去。开始以为那里离铁路线至多几英里,但不久就发现远不止这么远。走了约一个半小时,这些火光依旧那么遥远,但我坚持着。到凌晨二三点钟,我发现那并非卡菲尔人村庄,那里的建筑物在灯光的映照下被勾勒出轮廓,我意识到自己正走向一个煤矿前的几处房子。矿井口的辘轳能看得很清楚,我这才明白把我引到这里来的火光原来是从提升辘轳的蒸汽锅炉里发出的。矿井旁边有一幢坚实的两层小石楼,周围还有一两座不起眼的小建筑物。

我站在荒野里环顾四周,心里反复考虑着下一步计划。再回头还来得及,不过,如果往回走,除了继续徒劳的游荡,饱尝饥渴和发病之苦,最终被发现抓获外,我看不到任何希望。而我前

方或许是次机会。越狱前我曾听说在威特班克和米德尔堡矿区住着部分英国人,他们为了保持矿区正常运转而留了下来。我现在是不是被带到了其中一户的门前?这幢黑漆漆的神秘小楼里住着什么人?英国人还是布尔人?是朋友还是敌人?并非只有这两种可能。我口袋里还有75英镑,一旦暴露身分,我可以许诺出1000英镑。我也许能遇上一个中立者,他出于善心或看在大笔钞票的份上也许会帮助我。我想趁自己还有点力气,可以为自己辩解,如果情况有变,幸许还能脱身。我犹犹豫豫地走出昏暗的草原,走进炉火的光亮中,朝那栋无声的小楼走去,敲响了大门。

没有声音。又敲了敲,楼上的灯亮了,一扇窗户开了。

“谁?”一个男子的声音,说的不是英语。

我感到一阵失望与恐慌。

“我遇到一起事故,需要帮助。”

楼上传来了咕啾声,紧接着听到下楼的脚步声,门栓被抽去,锁在转动,门突然开了,过道里,一位面色苍白、留着黑胡子的高个男子,披着衣服站在我面前。

“你想干什么?”他问。这次是用英语。

我不得不编些话出来,我不想引起他的警觉,惊动了别人,只希望他能心平气和地与我交涉。

“我是位自由民,遇到了车祸,我准备加入在科马蒂普特的突击队。几个人闹着玩时我翻下了火车,昏迷了几小时,我肩膀脱臼了。”

能编出这样的故事真是让人吃惊。可我脱口而出,像是早已记在心里。其实我根本不知道自己想说什么,也不知道下一句该怎么说。

陌生人仔细打量着我,迟疑了一会儿,终于说道:“好吧,请

进。”他往过道稍稍退了退，放开一扇门，左手指了指一间漆黑的房间。我从他身旁走进房间，担心这房间是否会成为我的囚室。这个人跟着进来，擦着火柴，点亮油灯，将它搁在桌子上远离我的一侧。这个房间不大，显然是餐厅兼作办公室。屋里除了这张大台桌外，还有张活动办公桌，二三把椅子，一台制苏打水的冷饮机，由两个套在铁丝网中的相互叠加的球状玻璃器皿组成。桌子的末端是把手枪，估计刚才一直握在主人手里。

“对于你的这起火车事故，我想多作些了解。”过了好一会儿，他才开口。

“我想我最好告诉你实情。”

“我想也是。”他慢慢地说。

于是我一古脑儿把实情全都说了出来。

“我叫温斯顿·丘吉尔，《晨邮报》战地记者。昨晚从比勒陀利亚越狱，赶往边境。”（赶往边境！）“我有很多钱。能帮帮我吗？”

又过了好长一会儿，此人慢慢站起身，将门关上。他这样做的意图模棱两可，我本以为没有多大希望了，但他走近我，突然伸出了手。

“感谢上帝，你走对地方了，我是附近 20 英里内唯一不会将你交给布尔人的住户。不过这儿住的都是英国人，我们会帮你渡过难关的。”

时隔多年，当时那股袭遍全身的如释重负的感觉现在回想起来比描述还要容易。刚才还以为自己身陷绝境，现在朋友、食物、救援都有了。我恍若一溺水者，被拖上岸后又得知自己在德比赛马中赌赢了。

我的主人作了自我介绍。他叫约翰·霍华德，是德兰士瓦煤矿的经理，几年前已加入南非国籍，成了自由民。考虑到他原本

英国人,加上贿赂了当地治安官<sup>①</sup>,所以这次便没有被征入伍。他得到允许,与其他一二名英国人继续留在矿上维持矿井,以便将来恢复生产。在矿上,除了他秘书以外,还有1名兰开夏郡的司炉以及两名苏格兰矿工。这4个人都是英国臣民,当局要求他们在这段时间内必须严守中立。由于约翰·霍华德先生已是德兰士瓦共和国的自由民,将我窝藏就是犯了叛国罪,如被发觉,会被枪毙。

他说:“不要紧,我们会妥善处理的。”接着他又说道,“地方治安官今天下午还在这里,问是不是看到过你。他们接到了通缉令,马上通知了铁路沿线和整个地区。”

我表示不想连累他,请他给我些食物、一把手枪、一名向导,如果可能再给一匹马,我可以避开铁路和居民区,趁着夜晚赶往海边。

可他不听,他要为我作出安排,不过他十分小心。周围全是敌人耳目,他的两个荷兰女仆就睡在这幢楼里,矿上雇佣了很多卡菲尔人。考虑这些危险时他想得很周到。

“你还没吃饭呢。”

我没说什么。他指着一瓶威士忌和刚刚提到的制苏打水的冷饮机,让我不要客气,自己则匆匆去了厨房。不一会儿,他拿来了一块最好的冷羊腿肉及其他美味菜肴,然后从后门出了房间,留下我一人在房里狼吞虎咽。

1小时后,霍华德先生回来了。在这段时间里,我的体力得到恢复,前景看好,我对自己的成功充满了信心。

“事情办妥了,”他说,“我去找了那几位同胞,他们都表示支

---

<sup>①</sup> 南非开普省农村的地方治安官,是代表政府执行调查和报告犯罪行为的低级官员。

持。我们今晚就得把你藏进矿井,你必须呆在那里等我们想出帮你出境的办法。现在的问题是食品,荷兰女仆每天都亲眼看着我吃饭。厨师肯定会打听羊腿怎么会缺一大块,今晚我还得想出个理由来。你马上下井,我们会把你安排得舒舒服服的。”

天将破晓之际,我跟着霍华德先生穿过一小庭院,来到放着升降机的围墙里。来自奥尔德姆的迪尤斯纳普先生紧紧握住我的手。

“下次奥尔德姆选民一定会投你一票。”他低声对我说。

门开了,我们进了升降车,下到井底。两名苏格兰矿工手提灯笼和一大捆东西等在那里,后来才知那是褥垫和毯子。我们不时左转右拐,弯弯曲曲地像走迷宫似的走了一段时间,终于来到一个洞中,这里很凉爽,空气清新。矿工将那捆东西放下,霍华德先生递给我几支蜡烛,一瓶威士忌和一盒雪茄烟。

“这些东西不成问题,”他说,“这些东西由我自己锁着。现在我们得计划一下明天如何为你送饭。”

“无论发生什么事,你不要离开此地,”离别时,他们叮嘱我,“天亮后矿上会有不少卡菲尔人,不过我们会留心,不让他们走到这边来。目前为止,这些人都还不知道。”

4位朋友留下我,打着灯笼鱼贯而出。透过矿井里的黑暗,生命似乎沐浴在玫瑰色的光环中。经过这番磨难,甚至是绝望,我坚信自己会重获自由。我不再担心自己会被再次抓获,蒙羞受辱,也不再担心自己会被关在普通牢房里苦挨单调乏味的漫长岁月。我想象着自己重返部队,充分利用这次越狱给我带来的荣耀,尽情享受自由,追求年轻人所渴望的冒险生活。这样惬意地想着,再加上过度的劳累,我很快便精疲力竭地进入了甜美的梦乡。

## 越 狱 (二)

不知睡了多久,但我醒来时肯定已是第二天傍晚。伸手去摸蜡烛,怎么也摸不着。由于不了解这些矿井里会有怎样的陷阱,所以我只好躺着等待消息。好几个小时过去了,一束微弱的灯光射来,有人来了。是霍华德先生,他带来一只鸡和一些佳肴,还有几本书。问我为何不点蜡烛,我说找不着。

“没有将它放在褥子下吗?”

“没有。”

“肯定被老鼠拖跑了。”

他告诉我矿井里有成群的老鼠。几年前他引进一种特殊的白鼠,对矿井内的毒气很敏感。这种白鼠繁殖很快。霍华德先生跑了20英里,到一名英国医生家里才弄到这只鸡。他很担心两位荷兰女仆的态度,她们一直在问羊腿肉哪去了,为此我当然得负全部责任。如果第二天他无法弄到熟鸡的话,他将不得不在吃饭时要两份饭菜,趁女仆不在场之际,将一份偷偷倒在袋里给我留着。他说布尔人在这个地区到处追查我的下落,比勒陀利亚政府把我越狱这件事当成大事办。因为米德巴格矿区有一部分英国侨民,所以有可能跑到这里来,这一带每个英国人或或多或少都受到了怀疑。

我再次表示自己愿意骑着马,带上一名卡菲尔向导一起单独行动,但霍华德先生坚决不同意。他说要将我弄出境需要好

好筹划一番，因此我或许得在井下呆上一段时间。

他说：“在这里，你绝对安全。麦克（他是指一名苏格兰矿工）知道这里所有废弃的矿井巷道和别人从来不知道的地方。有一段巷道淹在水里，水离巷顶只有一二英尺。如果布尔人搜矿井，麦克会带你潜入这段水域，去另一端的矿井。我们用鬼怪故事吓唬卡菲尔人，让他们不敢接近，不过我们还在不停地注视着他们的动静。”

我吃饭时，他在这里呆了一会儿，然后告辞，留下些东西，包括半打蜡烛。经他提醒，我把蜡烛塞在枕头和褥子下。

又睡了很久，我突然醒来，感觉周围有动静，似乎有东西在拖我的枕头。我一伸手，只觉得到处有东西乱窜，原来是老鼠在偷蜡烛。我夺下蜡烛，并点亮了一支。好在我并不讨厌老鼠，它们胆战心惊的样子让我很放心，所以我并不觉得有什么特别的不安。尽管如此，这井下的3天并非我记忆里最快乐的时光。小老鼠窸窣窸窣到处乱窜，一刻不停。一次正打着盹儿，有东西在我身上跑来跑去，蜡烛一亮，这些小东西便不见了。

第二天是12月14日，是我从国立示范学校越狱后的第三天。两位苏格兰矿工来看我，聊了很长时间，我感到很轻松。这时我才惊讶地得知矿井只有200英尺深。

麦克说井下有几处可以从废弃的矿井口看到外面的日光，问我是否有兴趣在废坑道周围转转看看。随后的一两小时中我们便在这些地下矿井中忽上忽下转弯儿，又在矿井口下方逗留了一刻钟，看着微弱的光线从上面射进来。这次散心让我邂逅了许多小老鼠。它们十分可爱，浑身雪白，眼睛是黑的，但我相信在阳光下那眼睛肯定是粉红色的。3年后一位在那里任职的英国军官写信给我，他在我的一次讲座中听我描述这种白鼠有粉红色的眼睛，当时认为是弥天大谎。后来他特意拜访了矿井，

亲眼目睹之后,又写信来为自己当初的怀疑表示道歉。

12月15日,霍华德先生说追捕我的风声似乎已经过去了。整个矿井周围没有发现我的踪迹,所以布尔官方认为我目前一定藏在比勒陀利亚某个同情英国人的当地人家,他们不相信我能跑出这座城市。在这种情况下,霍华德先生认为我那天晚上可以出井,到草原上散散步。如果第二天上午平安无事,我可以移居到办公室后面的房间里。霍华德先生对此似乎很有把握;同时也很激动。那天晚上,在皎洁的月光下,我呼吸着清新空气,漫步在草原上。我搬进了办公室壁橱后的房间,比预期计划稍稍提前。在这里又等了3天,每天晚上霍华德先生或其助手都会陪我到一望无际的草原上散散步。

12月16日,我越狱后的第五天,霍华德先生告诉我已经有了送我出境的计划。矿上有一条支线与铁路干线相连。邻近住着位荷兰人,叫伯格纳,19日他将运送羊毛去德拉瓜湾。这位先生对英国人颇有好感。霍华德先生找到他,告知这一秘密后,他表示愿意提供帮助。伯格纳先生的羊毛捆扎成包,将装满二、三节车厢,车厢就停靠在矿区附近的侧线上。这些大包装进车厢,在中间腾出一小块空地,我可以躲在其中。最后这些货物上还要盖上油布。到达边境时,如果固定油布的绳索没有松动,揭开油布检查货物的可能性很小。愿意冒此风险吗?

到目前为止,在这次历险中,没有比这个计划更让我担心的了。当一个人意外获得某种好处并已享受了几天,一旦想到还有失去这种好处的可能简直难以容忍。我本以为自由在握,可一想到又得身陷无援的逆境,无计可施,只能听凭边境哨兵的搜寻摆布,真令我忧心忡忡。我宁愿骑着马,带着向导从草原走,躲开敌人的搜捕,逃出敌境。不过我最终还是接受了救命恩人的建议。于是他们安排起来。

如果当时我看到了英国报纸上刊载的几份电文或铁路沿线及各处张贴的悬赏布告,我肯定会更加心焦:

比勒陀利亚 12 月 13 日电——丘吉尔虽然巧妙越狱,但越过边境的可能性甚小。

比勒陀利亚 12 月 14 日电——据报道,丘吉尔已在边境科马蒂普特火车站被捕。

洛伦索马贵斯 12 月 16 日电——据报道,丘吉尔已在渥特维尔伯文被捕。

伦敦 12 月 16 日电——温斯顿·丘吉尔从比勒陀利亚越狱后,人们担心他不久就会被再次抓获。果真如此的话,他有可能被枪决。

所幸我对此一无所知。

12 月 18 日的下午,时间过得很慢。记得我大部分时间都在看史蒂文森<sup>①</sup>的小说《绑架》,书中描绘的戴维·巴尔夫与艾伦·布雷克在峡谷中逃命的惊险场面使我深有感触。身为受通缉的逃犯,本身便是一种精神考验。战场上的危险及子弹、炮弹的威胁是一回事,受警察追捕则是另一回事。受到追捕时不但要东躲西藏,还需要瞒天过海,因此情绪低落。随时都会有人问你诸如“你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等问题,自己却无法给出满意答复,自信必受挫伤。我惧怕在科马蒂普特车站面临的严峻考验,然而,如果想顺利逃脱,我只得忍受。

---

<sup>①</sup> 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1850—1894),英国作家。早期作品以游记为主,1883 年因小说《金银岛》而一举成名。后又写了一系列以苏格兰为背景的小说,如《黑箭》(1888)、《绑架》(1886)等。

£25.---

(vijf en twintig pond stg.)  
beloening uitgelooft door  
de Sub-Commissie van Wijk V  
voor den Specialem Constabel  
dezer wijk, die den ontvluchte  
Krijgsgevangene  
Churchill  
levens of dood te dezer kantore  
aflevert. —

Naamens de Sub-Comm.  
Wijk V  
W. R. Burton  
Sec.

布告大体内容如下：

悬赏告示①

第五师悬赏 25 英镑捉拿逃跑战俘丘吉尔。无论死活，赏金  
照付。

第五师分委会

① 最初捉拿从比勒陀利亚逃跑的温斯顿·丘吉尔的悬赏告示，被亨利·马塞姆带回英国，现被 W·R·伯顿收藏。——作者原注

我突然被附近零星的枪声惊起，脑海里闪过可怕的念头：布尔人来了！霍华德和其他英国侨民在敌人的领地公然造反了！由于自己被再三叮嘱，无论发生什么情况，不得离开藏身之地，我只得呆在原地，心急如焚。可最糟糕的事并未发生，一阵谈笑声从外传来，很显然说话人正在亲切交谈。我又回到书中与主人公艾伦·布雷克为伴。声音终于消失了，一会儿门开了，霍华德先生那苍白严肃的脸上洋溢着笑容。他关上门，兴致勃勃地向我走来。

“地方治安官刚才在此，”他说，“不是来搜查你的。他说他们昨天已在渥特维尔博文将你抓获。我不愿意他四处瞎撞，便与他比赛击酒瓶。他赢了两镑，高高兴兴地走了。”

“今晚一切安排就绪。”他又补充道。

“我需要做些什么？”

“什么也不用做。到时只需跟我走即可。”

12月19日凌晨两点，我整装待发。门开了，霍华德出现了，冲我示意一下，两人都没说话。我们穿过矿区来到铁轨旁，3节重型车厢横卧在铁轨上。月光下，迪尤斯纳普和两位矿工在不同的方位放着哨，一群卡菲尔人正忙着将一大捆东西抬进最后那节车厢。霍华德踱到第一节车厢前，跨过铁轨到其末端。他边走边用左手指了指。我敏捷地跳上缓冲栏杆，看见车厢后与包裹间留有一小洞，刚好容我钻进去。洞口直通包裹间的一个窄道，到达车厢中央。车厢中间所留的空间足以让我平躺下去或坐起来。于是我便在此安顿下来。

三四小时后，黎明的曙光从车厢地板的夹缝及其他地方的缝隙里射进来，我听见有火车头开了过来，然后便是一阵搭钩的哐当响。过了一会儿，火车轰轰隆隆地开了起来，奔向陌生的地方。

我在新住处安顿下来,理了理事先准备好的武器和食品等东西。首先,有了把手枪,尽管难以预测会如何用它来解决我可能遇上问题,但这是个心理安慰。其次,还有两只烤鸡,几块肉,一条面包,一只瓜和三瓶冷茶。整个行程历时不会超过16小时,可战争时期谁也无法预料普通贸易运输会出现怎样的耽搁。

现在我的隐蔽处有了充足的光线。这节车厢周围及底板有很多裂缝,太阳从这些地方透进来。在窄道里,我发现有条八分之一英寸宽的缝隙,从那里可以看到外面的情景。为了了解火车行程情况,我事先默记了沿途所有的站名。如今我仍能记得不少:威特班克<sup>①</sup>、米德尔堡、伯津德尔、贝尔法斯特、达尔曼纽萨、马沙杜杜、渥特维尔博文、渥特维尔昂德、伊兰茨等等,一直到科马蒂普特。火车现在已经走过了四五站,从这里火车驶上了干线。经过二三个小时的延误和火车调轨,我们挂靠上一列正规火车,不久便以飞快的速度出发了。

整整一天,我们一直在向东朝德兰士瓦方向行驶。夜幕降临时,火车停靠在一个车站,据我估计是渥特维尔博文车站。至此,整个行程已过半。可我们会在此停留多久?也许会等上几天,当然第二天便出发也说不定。在漫长的一天里,我躺在车厢里,脑子里尽情勾画着获得自由的欣喜场面,想象着重返部队的喜悦以及胜利越狱后的激动之情。但同时焦虑也不断困扰着我,我总在担心越来越近的边境搜查。还有一个麻烦摆在面前:自己不可能一直保持清醒,但一睡觉便可能会打呼噜!如果火车歇在寂静的轨道上,呼噜声便会被别人察觉,一旦被察觉……我为谨慎起见,决定不睡觉。可很快自己便进入了甜甜的梦乡,第

---

<sup>①</sup> 南非城镇,位于德兰士瓦省北部,是重要的采煤中心。

二天早晨才被火车与机车连接所发出的撞击声吵醒。

渥特维尔伯文与渥特维尔昂德车站之间有一段很陡的下坡路。火车通过这段铁路时只能慢慢地滑行，我们以一小时三四英里的速度向前磨蹭。这使我肯定下一站便是渥特维尔昂德。这一整天，我们行驶在敌人的领土上，傍晚时分到达了令我恐惧的科马蒂普特站。从缝隙往外瞧，我发现这个车站很大，有好几排铁轨，铁轨上停了好几列火车。行人来来往往，喊声叫声一片。我大体审视一番后，火车也停下来，我便退到车厢最中间，平躺下来，等待着事态的发展，心里蹦蹦直跳。

三四个小时过去了，我不知道列车是否被搜查过了。好几次有人从火车旁走过，讲着荷兰话。但油布一直未被揭开过，似乎车厢不会受到什么特别检查。天开始暗下来，我又开始心神不定了。行驶了几百英里，却最终在这样的险境中耽搁这么久，真是急死人了！离边境只有几百码了，我又开始担心打呼噜，不过最后还是睡着了，什么事也没发生。

醒来时火车还停在原地。也许布尔人对火车进行了彻底检查，所以才耽搁了这么久。或许我们的火车被遗忘在侧线上，要停上十天半月。我迫不及待想往外窥视，可还是忍住了。11点钟，火车终于又挂上机车向前开去。如果刚才的车站是科马蒂普特站的话，那么我现在已经在葡萄牙人控制的地区了。但是也许我估计错了，车站记错了，也许边境前还有个车站，还会面临搜查的危险。可火车到达下一站时，这些疑虑都烟消云散了。从缝隙中往外看，我看到了月台上葡萄牙军官的制服及站牌的地名雷萨那伽西，我强压住心头的狂喜。火车又一次颠簸着上了路，我再也控制不住，将头伸出油布外，高声唱着、欢呼着。我欣喜若狂，难以自禁，忍不住向空中打了两三枪，鸣枪祝贺，这些荒唐行为未引起任何不良后果。

我们于傍晚到达洛伦索马贵斯。火车驶进货场，一群卡菲尔人上来卸货。我在这个藏身之处度过了3天令人不安的日日夜夜，现在该离开了。我已扔掉食物残渣，掩盖了隐蔽地的一切痕迹。我从车厢尾部悄悄溜出来，混在院中卸货的卡菲尔人和闲人中。我蓬头垢面的样子在这群人中并不招眼。我溜到门口，来到洛伦索马贵斯的大街上。

伯格纳正在门外等着我。两人交换了一下眼神，他转身往城里走，我在20码之后跟着。穿过几条街，拐了几个弯，伯格纳终于停了下来，望着对面的一幢房子。我朝那个方向一看，多么振奋人心啊！英国国旗在空中迎风飘扬！英国领事馆到了。

领事馆秘书显然没料到我会来。

“请回，”他说，“领事今天不能见你如果有事明天9点来。”

一听这话，我勃然大怒，吵闹着坚持要即刻见到领事本人。领事从窗里探出头来望望，终于下楼来问我是谁。从我说出自己姓名的那一刻起，我的所有梦想都一一实现了：我洗了热水澡，换了身干净衣服，吃了顿丰盛的晚餐，打了电报。我受到了盛情款待。

我饥不择食地读完了面前所有的报纸。自从我爬墙越狱之日起，发生了很多重大事件。英军那几日处于“黑色的一周”。加塔克将军在斯通姆博格、梅休因勋爵在马格斯方坦、布勒总司令在柯兰索都惨遭失败，英军伤亡无数。克里米亚战争结束后，英国从未遭受如此重大的伤亡。看到这一切，我迫不及待地想重新归队，领事也同样急于把我送出洛伦索马贵斯，因为城里到处是布尔人与布尔人的支持者。所幸当天晚上就有一艘轮船开往德班，正好接上我所搭乘的火车。我决定乘这艘船走。

我到来的消息不胫而走，迅速传遍全城。我们正在用餐，一群陌生人来到领事馆花园吵嚷着要见领事。原来他们是些全副

武装的英国人，是赶来保护我的，以防我再被抓走。在这些爱国人士的护送下，我穿街越巷，安全到达码头，10点钟坐上了“印度纳”号轮船。

到达德班时，我俨然是凯旋而归的英雄，受到人们的热烈欢迎。码头上彩旗飘扬，军乐队鼓号齐鸣，人山人海，海军上将、陆军将领及当地市长都挤上船来与我握手。我几乎被热情的人群撕成了碎片。人们将我高高举起抬入市政厅。一到市政厅，他们一致要求我发表演讲。推辞了一番后，我便答应了。一封封贺电从四面八方雪片般飞来，在胜利的喜庆中我重返部队。

在部队，我同样受到了最友好的欢迎。我住进了铺路工的小屋。一个多月前，正是在距离这小屋不到100码的地方，我被俘了。纳塔尔战役中还有许多恶仗要打，在这种形势下，许多朋友为我设宴洗尘，祝贺我的好运。我们一起度过了圣诞夜。

## 返回军营

在被俘的几个星期里,我的名字在国内已是家喻户晓。我在那次装甲列车突围行动中的表现被安全撤回的铁路工人与伤兵夸大了。云集在埃斯特科特的战地记者绘声绘色地对此大肆渲染,把故事发送回英国,因此各家报纸都对我褒扬有加。我越狱后的9天里,音信皆无,于是便有人放出风声说我又被抓住了。这一切再次激起了公众的颂扬,达到了一个高潮。年轻人喜欢寻求刺激,新闻界则需要广告做宣传,这两样东西我都具备,因此我名噪一时。此时英国上下正因战争中的一系列挫折而垂头丧气,因此有必要宣传类似的事例以激发斗志。我战胜了布尔人的消息无疑大快人心,因此倍受关注。在人们的赞誉声中,也夹杂着一些人的鄙视。举几例为证:

11月23日,《真理报》:“……火车上大乱,据说丘吉尔先生高呼‘拿出男子汉的气概来!拿出男子汉的气概来!’将队伍重新组织起来。那么这支分队的指挥官在做什么?士兵们真的丧失了男子汉的气概了吗?指挥官能允许一名记者‘组织’其手下的士兵吗?”

11月23日,《凤凰报》(现已停刊):“温斯顿·丘吉尔在装甲列车上救下一名伤员是有可能的,说不定他还拿起了

步枪，打中了一名布尔士兵。可问题是他在装甲车里干什么？他根本就无权在场。尽管他曾在第四轻骑兵团任过军职，但此次行动他并非军人，而且我听说他也不再是《邮晨报》记者。因此，不是指挥这辆倒霉的装甲车的军官越权同意丘吉尔上车，就是丘吉尔本人未经允许，擅自上车，加重了指挥官本已是很沉的负担。”

……当时我仍在敌人手中，生死未卜，虽然我是他们的同胞，《凤凰报》仍以冷酷的口气叙述道：

我们当然希望丘吉尔未被敌人枪毙。不过，如果布尔人下令枪毙丘吉尔，那么这也是无可厚非的。非军事人员无权携带武器。在普法战争中所有携带武器的非军事人员一旦被俘，立即被枪毙。与高度文明的法国人和德国人相比，布尔人不可能更心慈手软。……

12月16日，《每日国民日报》（现已停刊）：“丘吉尔越狱之举在军界并不体面。他既然是以参战者的身份被俘，当然享受其他军官战俘一样的优待。可他对此不加理睬，选择了越狱。比勒陀利亚方面如果采取严厉措施防止此类事件再次发生，一点也不奇怪。”……

12月26日，《威斯敏斯特公报》：“温斯顿·丘吉尔重获自由了。他机智过人，成功地从比勒陀利亚越狱，布尔政府现在正忙于查明其越狱何以能成功。我们姑且承认他这么做是对的。他设法越狱完全符合游戏规则，然而他同时又向朱伯特将军声明自己是记者并且‘并未参战’，要求将自

已释放,对此我们难以理解。我们读到关于丘吉尔先生在装甲列车上的英勇事迹的报道时,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朱伯特将军本人肯定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答复说丘吉尔先生之所以被扣留,是因为纳塔尔各家报纸都认为装甲列车的突围归功于他的勇敢努力。不过,既然报道有误,将军也就相信了丘吉尔先生的话,认为他是名非战斗人员,下令将其释放。这则命令在丘吉尔先生逃跑半天后到达战俘营。丘吉尔先生是否为战斗人员是个谜,但有一点很清楚:他不可能既是战斗人员又是非战斗人员,两面沾光。许多记者认为他应该获得维多利亚十字勋章,但他写信给朱伯特这件事表明,他不配。”

读到这些评论,除了认为它们有点偏激外,我无话可说。对铁路工人与伤员所讲的故事,我不能负任何责任,同时这些叙述如何被夸张后传到英国,也与我无关,这些报道引起国人的注意更不是我力所能及的。我当时是战俘,因此只能缄口不言。读者能够明白我为什么随霍尔丹少校执行那次倒霉的侦察任务,也了解我在那次突围中所扮演的角色,因而能判断出我的非战斗人员的声明究竟有多少根据。我不知道朱伯特将军是否真改变了其先前将我视作战俘的决定,蹊跷的是这决定竟会在我逃出国立示范学校后公布于众。至于有人说我不顾布尔人给予我活动自由的事实,得寸进尺,借机脱逃,纯属无稽之谈。战俘根本没有活动自由,我们都处于武装卫兵的严密监视中。不过,谣言一旦产生,就会被政界对手利用。后来至少有4次我在不同场合被迫要求造谣诽谤者赔偿我的名誉损失,并公开道歉。当时我恨透了亲布尔分子。

我从德班发给《晨邮报》的一篇文章也引起英国军方与社会

各界的批评。我写道：

回顾整个战局，我们没能意识到自己面对的是难以战胜的强大敌军，很愚蠢。布尔自由民良好的素质提高了他们打仗的效率。南非政府虽腐败透顶，却在战争上倾注了其全部精力。

我们必须面对事实。布尔骑兵如果占了地利，那么他们一个人抵得上3—5个士兵。他们拥有现代化的步枪，威力无比，我军的正面进攻总被击败。敌人异常灵活机动，使其两翼得到了保护。解决目前困境的唯一方法只有派出在素质和能力上与之相当的英军，如果士兵的个人素质不佳，那就得派出大部队，在数量上压倒敌军。布尔人也许抵抗不了150门大炮掩护下的8万大军的进攻，但用只有15000人的纵队进攻布尔人必败无疑。零星派兵增援的战略十分危险，这是在浪费兵力。

布尔共和国一定会像美国的南部邦联<sup>①</sup>一样因兵力消耗而衰败。我们不能操之过急，应该组织起一支阵容庞大的军队。与其一点点增长，不如一次性派出大量军队。向南非派出25万大军并不为过，这个地区值得我们为之花血本，这里需要很多非正规军。大敌当前，英国的那些绅士们都猎狐玩乐去了吗？为什么不能组建一支轻骑兵？为了我们自己、我们忠实的殖民者和我们阵亡的将士，我们必须坚持到底。

---

<sup>①</sup> 1861—1865年美国南北战争时期，脱离联邦的南方11州所组成的政府。

忠言逆耳遭人恨。“布尔骑兵如果占了地利,那么他们一个人抵得上3—5个士兵”的说法被认为是在贬低英军。需要25万大军也被指责为是荒谬的估计。《向导晨报》说:“我们得到一条未经证实的消息:‘在罗伯茨伯爵<sup>①</sup>到达之前,兰斯多恩侯爵已任命温斯顿·丘吉尔先生为南非英军总司令,雷德沃斯·布勒将军任其参谋长。”字里行间充满了讽刺。军官俱乐部里的老将军们也是怒不可遏,他们中的一些人给我发了份电报说:“这里的朋友希望你不要再出洋相了。”不过我的幼稚观点很快被事件所证实。10000名皇家义勇骑兵和各兵种的志愿军被派来增援在南非的正规军。胜利到来前,这里已汇集了25万英军,相当于布尔军队的5倍。我可以用《圣经》中的话安慰自己:“宁做聪明的穷孩子,不做愚笨的老国王……”

与此同时,“黑色的一周”中的几次灾难唤醒了整个英国,英国政府对此作出了反应。被批评家认为缺少阳刚之气且才疏学浅的贝尔福先生在这危急关头起了主要作用。雷德沃斯·布勒将军12月15日在柯兰索失利,伤亡达1100多人。在当时看来,这个损失相当惨重,他垂头丧气,惊慌失措地发了份电报给战争办公室,同时缩手缩脚地给乔治·怀特将军下了命令,建议他在莱迪史密斯坚持到弹尽粮绝,然后尽最大可能达成投降协议。12月15日他给战争办公室的电文如下:“我认为目前不足以解救怀特将军。”电报周末送达战争办公室,当时只有贝尔福先生一名大臣在伦敦。他的回答很干脆:“如果你无力为莱迪史密斯解围,就将指挥权交给弗朗西斯·克拉里爵士,然后回国。”

---

<sup>①</sup> 罗伯茨(1832—1914),英国陆军元帅,生于印度,1858年在镇压印度兵变中立功获维多利亚十字勋章,1895年晋升为陆军元帅,1899—1900年在布尔战争中任总司令。

怀特也冷冷地表示自己无意投降。当然这些情况我们很久以后才得知。早些时候德国国王友好地派英国驻柏林使馆的一名武官回国,给维多利亚女王捎去口信:“我不敢在安全阀上久坐,我的臣民要求干预,你们一定要打个胜仗。我建议您把罗伯茨和基钦纳勋爵派往南非。”不知女王是否采纳了其建议。12月16日,罗伯茨勋爵被任命为总司令,基钦纳勋爵任总参谋长,他们率领除印度之外的所有大英帝国军队及自愿军组成的增援部队开赴南非。有了强大的增援,布勒将军负责指挥纳塔尔地区战事,奉命竭尽全力解围莱迪史密斯。主力部队则从开普殖民地大规模往北挺进,解救金伯利,攻占布隆方丹<sup>①</sup>。

布勒对自己的任命并不高兴,他了解图盖拉河彼岸高地上的敌人实力。自从在柯兰索吃了败仗以后,他夸大了布尔人的能力。在连续进攻图盖拉失败后,他向我坦露了心迹:“在纳塔尔作战我算是倒了霉,我一直认为我们应避开纳塔尔,可现在我却要沿着对我军最为不利的路线前进。”

现在他一心扑在违背其本意的纳塔尔战争上。毫无疑问,以其年龄,他已不再拥有与其职责相称的军事才能和旺盛精力,不再能够随机应变,也不再那么果断坚决。不过他继续指挥着军队,仍然是英国民众崇拜的偶像。

如果一名军官年轻时因英勇善战而荣获维多利亚十字勋章的话,那么二三十年以后他是否还能率领军队驰骋沙场,对此我表示怀疑。我发现,此类想当然的想法曾不止一次引发过灾难。年龄的增大、体重的增加、和平时期安逸的生活以及多年来官运亨通等因素使战争所需的精锐将才消耗殆尽。在长期的和平年代里,国家应该预备一批40岁以下、具有中级军衔的海军和陆

---

<sup>①</sup> 奥兰治自由邦首府。

军军官,对他们进行特殊训练,让他们经受特别考验,到各支军队指挥锻炼,使他们有机会做重要决策。应该对他们进行多方考核,了解他们的观点。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将被另一批人替代。老骥伏枥的丹多洛<sup>①</sup>式的人物毕竟不多见,罗伯茨勋爵是个例外。

\* \* \* \* \*

雷德沃斯·布勒勋爵详细询问了德兰士瓦目前的局势。我把自己所了解的所有情况,包括在车厢夹缝里的所见所闻都告诉了他。他对我说:

“你干得很好,我们能为你做些什么呢?”

我立即表示愿意加入一支临时组建的非正规部队。自船上一别,我与布勒将军再未见面,但在我4年的军旅生涯中,我们多有接触,此时他面露难色,停顿了很久才说:

“那么老博思威克那边怎么办?”他指的是埃尔加农·博思威克,《晨邮报》业主,也就是后来的格莱内斯克勋爵。我答道,自己是签了约的战地记者,当然不能擅自离职。这样一择,就面临一个很棘手的问题。在前几年的各种小规模战争中,休假中的军官当战地记者,或现役军官身兼双职的现象似乎成了惯例。这种现象被认为是滥用职权,颇受非议。我在印度边境和尼罗河畔的战争中身兼两职,因此我所受到的这类批评比任何人都多。尼罗河战役后,战争办公室明确规定军人不得担任战地记

---

<sup>①</sup> 丹多洛(1107—1205),威尼斯共和国的创始人,执政官,积极组织第四次十字军东征,占领君士坦丁堡。1205年因年迈失明在亚得里亚堡附近战败。

者,记者不能从军。这种规定的出台与我有很大关系,如果为我破了例,岂不是对这一神圣规定的亵渎?布勒爵士担任战争办公室人事行政参谋主任多年,老于世故,但却也恪守军纪,他觉得此事很棘手。他在房间里踱了两三圈,用一种古怪的神情望着我。最后终于说道:

“好吧。你可加入宾上校<sup>①</sup>指挥的兵团,你得两头奔忙。但是,”他补充道,“你不能领军饷。”

对于这一不合常规的安排,我赶紧答应下来。

\* \* \* \* \*

于是,我又返回部队,在南非轻骑兵团任中尉。这个团有6个营,700多名骑兵,还有一个机枪连。朱利安·宾上校在开普殖民地招募组建了 this 团。宾上校原本是第四轻骑兵团的一名上尉,是一个能成大事的军官。他任命我为他的副官,允许我在不打仗时随意行动,这实在是再好不过了。我在卡叽布外套上缝上肩章、军帽上插了一根长羽毛,过上了神仙般的快乐日子。

南非轻骑团是邓德纳德勋爵所指挥的骑兵旅的一部分,指挥这支部队的几名军官在后来的欧洲大战中都出了名。宾、伯德伍德和休伯特·高夫后来都成了军级指挥官;巴内斯、索利·弗勒德、汤姆·布里奇及其他几名军官后来成了师级指挥官。在纳塔尔战役中,我们生活在一起,围着同一堆篝火取暖,挤在同一辆车上休息,成了生死之交。士兵们出身不一,却都是一流的战士。这支队伍里绝大多数是南非人,其中很大一部分是来自四

---

<sup>①</sup> 朱利安·赫德沃恩·乔治·宾勋爵(1862—1935),英国陆军元帅。——作者原注

面八方的铁杆冒险家,其中有一位是美国内战中的南方骑兵。巴内斯率领的皇家骑兵中队都是来自南非兰德金矿的外族人。纳塔尔营和桑尼克罗夫特营的士兵都是纳塔尔省的农场主和殖民者。两个英国骑兵连也都是一流的。殖民者——特别是外族人和纳塔尔人——对敌人恨之入骨,职业军人对这种情绪不屑一顾,但大家都能团结一心,协同作战。

## 斯皮扬山之役

对解救莱迪史密斯的经过无需赘述，我在此只讲个大概。布勒将军放弃了在柯兰索强渡图盖拉河，然后沿铁路进军的计划。待部队增至 19000 名步兵、3000 名骑兵和 60 门大炮时，他避开布尔军队的右翼，在图盖拉河上游距离柯兰索约二十五英里处渡河。1 月 11 日，邓德纳德的骑兵旅快速出击，一举攻下了控制波希特和特里查德渡口的高地。第二天，步兵在骑兵的掩护下，连帐篷也没来得及拔走，在夜色中顺利到达渡口。17 日黎明，骑兵在没有受到多少抵抗的情况下渡过了特里查德渡口，继续向左挺进，击败了约 200 名布尔士兵后，于黄昏时分顺利到达阿克顿霍姆斯附近。先头步兵旅在渡河时遇上了点麻烦，但总算顺利地过了河，在斯皮扬山山脚下安下营地，并着手搭建浮桥。次日上午浮桥建成了，查尔斯·沃伦勋爵指挥的第二师带着一支加强旅以及我军的大部分炮兵于夜晚顺利通过浮桥。18 日上午有近 16000 名士兵安全越过图盖拉河，骑兵离阿克顿霍姆斯另一边的开阔地不远，只需再有两天行军即可到达莱迪史密斯。参战部队——包括有经验的殖民地居民——普遍认为，只要左侧骑兵继续挺进，就可以把战线推进到斯皮扬山以西，接下来只需继续推进，就能解围莱迪史密斯。

然而，布勒及其参谋人员担心交通运输线，这不是没有道理的。他们绕着敌人的右侧前进，把行军路线拉得很长。一个步

兵旅把守柯兰索渡口,另一由利特尔顿指挥的旅驻扎在波希特对面。主力部队集结起来,其右翼驻扎在斯皮扬山山脚下,大部队的左边是分散驻扎的骑兵。不过这条 30 英里长的前线并不连续。二三千布尔士兵随时有可能从两支英军守护旅中间渡过图盖拉河,如果布尔人继续南行,那么他们就有可能切断英军军需品供应的交通线。布勒司令担心部队撤往铁路线上的退路被敌人切断,像莱迪史密斯的怀特将军一样被包围起来,而自己的部队没有壕堑阵地可守,粮草弹药供应也不充足,根本经不起围攻。布勒军队的行动不紧不慢,使这些危险很快便成为现实。我们骑兵急于大幅度向前推进,而布勒觉得有必要缩短战线,以斯皮扬山为中心作战。于是,23、24 日晚上,我军派出一个步兵旅和桑尼克罗夫特骑兵团(下了马)一举攻下斯皮扬山。山顶上为数不多的布尔士兵都逃脱了。次日上午,伍德盖特将军的步兵旅在山顶上驻扎下来,其余部队驻扎在西面的丘陵地带。

整整 6 天,布尔军队注视着英军迟钝的步伐。布勒的部队像是在散步,沃伦的部队则几乎是在爬行。敌人有充足的时间重新部署,挖筑战壕。他们从包围莱迪史密斯的部队中抽调 7000 名骑兵以及十多门大炮和机关炮。当他们发现我军骑兵对阿克顿霍姆斯构成威胁时,布尔人慌了,立即有大批自由民突击队员向北进发。英军大举占领斯皮扬山,使布尔人感到惊奇,然而他们并不惊慌。沙尔克·伯格将军亲自召集 1500 名布尔士兵,其中绝大多数是埃尔默洛和比勒陀利亚地区的突击队员,在晨雾尚未散尽的 1 小时内,向山上发起猛烈反攻,同时指挥他那为数不多的几门大炮从四面八方向山上猛轰。

斯皮扬山海拔 1400 英尺,山顶扁平,面积大小相当于特拉法尔加广场。在这块弹丸之地聚集了 2000 名英兵。山顶无遮无挡,敌人袭击前,英军仅有时间挖些浅壕作掩护。布尔军很快

在枪战中占了上风,榴弹在大群英国士兵中间开了花。实际上,英军与其固守,不如冲锋。这时如能向山下猛冲,加上敌军前面我军主力的配合,我们定能取得胜利。可是,山上的英军并未冲锋,他们在山顶上苦捱了一整天。战斗一开始,伍德盖特将军阵亡,士兵死伤人数也不断增加,损失惨重。在此弹丸之地,英军至少有 1000 名将士暴露在敌人火力下,英军死伤过半,但他们死守山顶,直至黄昏。为解除这一困境,利特尔顿孤注一掷,从波希特渡口派出两个营的部队越过图盖拉河。这两支精锐部队是第六十步枪营和喀麦隆营,他们从另一侧向山上爬,占据了名为“双胞胎”的两个山头,如果布勒果断决策,这两个制高点绝对能成为至关重要的要地。其余部队在一旁观战。夜幕降临,英军受到重创,但却守住了所有要害点。

在向图盖拉河挺进的一个星期中,我走在骑兵队里,整天提心吊胆,担心敌人向我们力量薄弱的前哨阵地发起进攻。17 日上午,我们从特里查德渡过图盖拉河,晚上在阿克顿霍姆斯参加了一次小规模战斗。这次战斗使我们军心大振。布尔军以为自己可以从侧翼包抄我们,并设下埋伏;此时我们的两个骑兵中队正沿着河边的凹地隐蔽前进,从侧翼包围了敌人。布尔军毫无戒备,三三两两地走进一块勺状洼地,我们立刻从三面向其开火,歼灭一半敌军,还抓了 30 名俘虏,我们只损失四五个人。第二天骑兵旅本该继续前进,与敌人交锋,将他们从步兵阵地前引开。可是上面不由分说,命令所有骑兵返回,与左翼步兵保持联系。就这样,3 天以后,即 20 日,我们向文特斯溪以外的高地发起进攻。在炮火中,我们将战马歇在洼地,涉过小溪,徒步爬上陡峭的山坡,将敌军前哨部队赶了回去。我们战术有方,攻上山上的凸角,攻下了娃娃山,到达山脊,伤亡不到二十人。这些山丘都是平顶。布尔人对战争的直觉胜过理论知识,他们在距离

山顶边缘 300 码处筑起一道战壕和狙击坑。只要有人露头，他们就疯狂扫射，我们根本无法越过这块光秃秃的草地，只好被困在山顶边，直到天黑步兵才赶来营救。

第二天没什么事发生，我们休息了一天。24 日清晨醒来后，我们的眼光都投向了斯皮扬山山顶。我们部队在夜里攻下了这座山，山顶连续不断的炮声表明敌人正在反攻。午饭后，我与一名战友骑马来到三树岭观战。我军有 6 个野战炮兵连和 1 个榴弹炮连，在这样的战斗中可称得上阵容强大，但是他们却不知道应向什么方向开炮，敌军分散的大炮一直在不停地轰炸斯皮扬山，可我们发现不了目标。我们决定登山。我们从赖特农场出发，将马停在山脚，翻过一块块巨石向上爬，来到了后山脊。战斗显然十分激烈，山上不断有三三两两的伤员撤下来，有的伤员由四五个人抬着。山脚下迅速出现两排临时帐篷和大篷车作为医院。在山顶上有一预备营仍按兵不动，此外还有一名准将也无事可做。我们得知，伍德盖特将军阵亡后由桑尼克罗夫特上校接替指挥山上所有部队，他们正在拼命抵抗。上面命令准将不得干预桑尼克罗夫特上校的指挥。山上已经竖起过一次白旗，布尔军准备前来接受几个连的投降。桑尼克罗夫特赶到，火冒三丈，将白旗砍倒。双方又在近距离交上了火。我们右边是“双胞胎”，上面不时有些细小的身影出现。起初我们以为是敌人，果真如此的话，他们已经抢占了有利地势，很快便会断了我军退路。但实际上那是我们自己的部队，是从外地赶来的喀麦隆人。我们抄近路向上爬上山顶，但战火太猛，不宜观战，于是我俩决定回指挥部汇报战况。

我们到达第二师指挥部时已是黄昏。查尔斯·沃伦勋爵时

年 59 岁,但看上去比他实际年龄老。16 年前他指挥了贝专纳<sup>①</sup>战役。他曾临时调任伦敦警察局局长,现在又被调回来指挥军队。他已好几个小时未能与山上取得联系,很焦急。我们带来的消息无法使他情绪好转。他的参谋说:“我们一整天都焦急万分,不过最危险的时候已过去了。我们将派队伍上去,连夜挖战壕,明天用少量兵力守住山顶。去把这情况向桑尼克罗夫特上校报告。”我请他把话写下来,他照办了。

我又爬上山,不过这时已是漆黑的夜晚。我经过仍按兵不动的预备营,来到山顶。此时战火已平息,偶尔还有一两声枪响,遍地都是死伤的士兵。我转了好一阵才找到桑尼克罗夫特上校。我向他敬了礼,祝贺他荣升准将,然后递上信条。“日后如有福气再做准将吧,”他说,“一小时前我已下令全部撤退。”“这里面没什么实质性东西,”他看了信条,不耐烦地说:“增兵!这里已有很多人。总计划是什么?”我说:“撤退前,我是否最好通报沃伦将军一下?他肯定希望你坚守山头。”他说:“不用了,我已下了决心,撤退也已开始了。我们已放弃了很多地盘,随时会被敌人断了退路。”然后,他加重了语气:“与其清晨一场血战,不如今晚 6 个营安全下山。”他身边无一名副官和参谋,而且这场激战已使他精疲力竭,心力交瘁,于是我便一直留在他身边。夜幕中,部队络绎往山下撤,一直撤了一个多小时。

四周万籁俱寂,我们几乎是最后一批下山,经过几棵矮树时,眼前出现了几个黑影。“布尔兵,”桑尼克罗夫特低声说,“我知道他们会进行拦截。”我俩同时拔出手枪,结果发现是自己人。

---

<sup>①</sup> 即现在的博茨瓦纳共和国。1885 年英国殖民势力侵入,使之成为“保护地”。1895 年纳入开普殖民地。1966 年宣告独立,定名博茨瓦纳共和国,仍为英联邦成员。

下山走了约 100 码,我们遇到了那个一直未参加战斗的预备营。桑尼克罗夫特盯着这些士兵,似乎又在做权衡。但据我估计整个部队已撤空,敌人重又占据了山头。桑尼克罗夫特终于无奈地摇了摇头,继续往山下撤。半小时后,在接近山脚的地方,我们遇到一长队士兵,手拿锄头和铁锹,打头的军官提着灯笼。“有信要交给桑尼克罗夫特上校,”他说。桑尼克罗夫特对我说,“念。”我撕开信封,信很短,“兹派出 400 名扫雷士兵和 1 个步兵营。明晨务必严加防守。”桑尼克罗夫特听了,挥舞着手杖,命令援兵掉头与我们一起下山。晚上漆黑一片,我走了 1 小时才摸到沃伦将军的司令部。他已睡着了,我拍了拍他肩膀将他叫醒。“长官,桑尼克罗夫特上校来了。”沃伦将军泰然地接受了这一事实。他是位受人喜爱的老人,我为他感到遗憾,也为部队感到惋惜。

桑尼克罗夫特上校违抗军令,从战士们以生命捍卫的阵地上擅自撤离,犯了严重错误。由于他那天表现勇敢,几次阻止了士兵们投降的企图,因而受到宽大处理,未受军法处置。有些人长时间未向他下达任何明确的命令,也没有与他保持任何联系,当然无权把责任加到他的头上。如果我们有一位年纪轻、精力旺盛的师长,那么他可能会制定好营救计划并在天黑时爬上山,亲自作出安排,这样也许就能避免这场不幸的发生了。

在这场战斗中,布尔军损失惨重,他们久攻山头不下,很泄气。博塔从莱迪史密斯赶来时,他们正准备撤退。博塔两个月前还只是名二等兵,但现在已经有了指挥权。他命令布尔士兵调转头,带领他们又上了山头。山上尸体横陈的场面令人震惊。浅壕里堆满了死伤官兵,近 100 名军官阵亡。重占山头后,博塔挂出一面休战旗,让英军上山料理伤员,掩埋死者。25 日那天静静地过去了。25 日和 26 日英军大型货车越过大桥返回,26

日晚战斗部队全部越过图盖拉河。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布尔军不把桥炸掉。我们顺利地渡过河,布勒将军因此可以声称他所指挥的部队在撤退中“未损失一兵一卒和半点粮草。”上述便是16天以来整个部队的作战情况,伤亡约1800人。

接下来布勒沿着斯皮扬山以东的山脊进军,到达多恩峡谷。部队兵力得到了补充,大炮已增至100门,其中包括几门能发射50磅重炮弹的海军远程大炮。作战计划很复杂,不过我可以在此作个概述。我们在波希特搭了一座桥,一个步兵旅在大炮的掩护下准备向布尔军的中心地带发动进攻。当敌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这里时,另外3个旅来到下游2英里处,再搭一座桥。一个旅进攻左面的瓦尔格兰茨山脊,另外两个旅进攻多恩峡谷。届时,正规军骑兵旅与我所在的骑兵旅共两支骑兵,加上一个骑兵炮兵连,经过这些外围战打出的豁口,向克利普山口冲锋。这些部署高度保密,行动的前一天晚上才透露给我们,我们得知情况后有些担心。我们站在斯皮扬山上,从望远镜中看到,这一地区到处都是小山小河,不时可见灌木和巨石。我们估计在骑马冲锋时会遇到敌人的顽强抵抗。不过,我们不能对此妄加评说。

随着在兹瓦特山上的我军重炮的一阵狂轰,进攻拉开了序幕。骑兵从斯皮扬山上鱼贯而下,向图盖拉河进发,场面十分壮观。瓦尔格兰茨山脊上的敌军阵地在我军炮弹的狂轰下,像浓烟滚滚的火山。我在南非轻骑团为只有19岁的弟弟谋得一职。他两天前刚刚到达,我们一起冲下山。利特尔顿的步兵旅越过第二座桥,向左进攻瓦尔格兰茨东端。当无法再向前时他们便潜伏下来。轮到第二个步兵旅出动了,可是他们似乎很不情愿过桥进入阵地。一个营很快便卷入激战,但步兵旅的整体行动却停了下来。大约下午四点,我们接到第二天再行动的命令,于是我们便在山脚下露营,其间除了偶有敌军炮弹的骚扰,平安无

事。当时我们距离运输队只有 5 英里,但我们原本准备从缺口杀进去,因此什么行李也没带。那个晚上很冷,我与宾上校合盖一条毯子。他翻身时我便露在外面,我翻身时他就得受冻,他很不满。他是上校,把我和他安排在一起很是不便。我很高兴终于看到天亮了。

利特尔顿将军与其步兵在山脊上挖沟筑壕,隐蔽得很好。他们预计白天会遭到敌人的猛轰,果然如此。不过他们隐蔽得很好,顶住了一整天的炮击,并击退了好几次敌军步兵的进攻,我军伤亡不到 200 人。我们一直在营地关注着他们的战斗,期待着自己冲锋那一刻的到来,却始终没等到。那个晚上,利特尔顿步兵旅撤过河,浮桥又收起。整个部队在损失了 500 人后,懒洋洋地回了营。一个月前我们就准备从奇福莱和弗里尔营地营救莱迪史密斯,但迄今毫无进展。保卫莱迪史密斯的部队食物匮乏,靠吃战马和骡子维持。乔治·怀特将军称他还能再坚守 6 个星期,不过他已无力配合我们作战,只能坐以待毙。前景不妙。

## 解救莱迪史密斯

尽管战争令人头痛,但解救莱迪史密斯的这两个月却是我记忆里最快乐的时光。虽然我所在的非正规骑兵旅5天中至少有3天得与敌人交锋,但除了在斯皮扬山战役中伤亡人数较多外,其余损失都很小。在一次次小规模战斗中,我们每次损失在6—20人之间。我大饱眼福,每天清晨我们出发打侧翼,与布尔军周旋,有时爬上山岩,看到远处飞奔而过的骑马人。听到几声枪响,仔细瞄准目标发几颗子弹,然后安然回营,享用丰盛的晚餐,与战友欢聚。同时,我源源不断地给《晨邮报》发稿,并得知自己的报道已赢得广大读者,其中包括有一定影响的社会人士。我认识所有的将军及其他头面人物,与他们每个人都打过交道,到处受欢迎。我们在旷野中过着神仙般的日子,夜晚凉爽怡人,白天阳光明媚,肉、鸡和啤酒供应充足。纳塔尔的报纸总是中午便送到前线,等着我们晚上回去阅读。我们都只能顾及眼前,因为随时有可能发生些事情,无暇去考虑其他事情,心中无牵无挂,既无暇对过去感到遗憾,也无暇对未来担心。我们既无需开销,也没人讨债,更没有纠纷,薪水放在家里,一天天增多。在比勒陀利亚作俘虏时,我曾给《晨邮报》写信,要求解除合约,因为他们已无法再从我这里得到任何有价值的报道了,但他们没有同意。不过在得知此消息前,我已自由了。我与他们一直保持着友好关系。这样的雇主真是难得。

我很高兴弟弟杰克能与我在一起，盼着带他四处走走，看看战争的辉煌场面。然而，这种心情很快便被打断了。2月12日，我们在铁路线以东六七英里的地方侦察，并在绿树葱葱的胡萨山停留了几小时，布勒将军及其司令部参谋人员想巡视那里的情况。我们骑兵旅全部出动，赶走了布尔军哨兵和巡逻兵，设立了自己的前哨，将军一行得以如愿以偿。一个上午过去了，枪声逐渐频繁起来。回营时，布尔军尾随而至，骑兵旅在脱身途中有些伤亡。

放弃胡萨山后，我们一溜小跑，把敌人甩后了1英里。这时骑兵旅开始顺着一个长长的平坦草坡缓缓向前。此时的我已经有了作战经验，对将临的危险十分敏感，这种感觉如同微风拂面般细微。比如，临近某处不熟谙的山丘或河道时，如果这种地方在步枪的射程内，我便会感到寒气逼人。这当头，我不时回头望望胡萨山，审视着身后起伏的草原上那一大片缓步回营的骑兵。我对同伴说道：“我们还是离敌军太近。”话音刚落，便传来一声枪响，紧接着二三百支毛瑟步枪同时开火，弹雨在我们队伍中呼啸，一些骑兵落鞍，有些战马被击倒。我们的队伍立刻自动散开队形，朝200码处的制高点跑去。我们跃下战马，将其匆匆掩藏后卧倒在地，向敌军奋力还击。

如果布尔军动作快些，提前四分之一英里向我们发起进攻，我军将付出惨痛代价。不过现在双方相距2000码，我们又是卧在地上，与敌人一样隐蔽，因此损失很小。杰克就趴在我身边，这时他突然跳了起来，歪倒在阵地后一二码处。这是他第一次参加战斗，便被擦肩而过的子弹击中腿肚。我扶着他撤出阵地，将他送进救护车。战斗不久便结束了。我来到战地医院，以确保杰克能得到妥善治疗。那时候的战地医生很看重自己的军衔，我便向外科医生敬个礼，称其为“上校”，并与他聊了聊这次

战斗,然后谈到杰克的伤势。这位医生心情很好,爽快地答应对杰克进行麻醉手术,不会给他带来任何痛苦,并将悉心护理。他说到做到了。

纯属巧合,我在南非战场忙碌的同时,母亲也并未闲在家里。她募集基金,得到一位美国百万富翁的捐助,买了一艘轮船。母亲将其装备成一艘医疗船,配备了护士。经过一番艰辛行程,终于到达德班,准备接待伤员。在这艘“缅因号”医疗船上,她的小儿子是她接待的第一批伤员。我请了几天假去德班看望她,并住在这艘船上,感觉似乎是在游艇上。各自经过半年不同的经历后,我们一家在此终于团聚。珀西·斯科特上校是德班的头面人物,是“恐怖”号装甲巡洋舰的舰长。他盛情接待了我们,并带我们参观了他的战舰,还以我母亲的名字命名了已装上列车的一门4.7英寸大炮,后来还特意安排母亲去前线参观这门大炮的射击情况。总之,南非战争有其令人愉快的得体的一面,这是15年后的欧洲大战所不及的。

布勒将军开始其第四次企图解救莱迪史密斯的行动。莱迪史密斯守军已陷入可怕的困境,此时对于解围者和被围困者,都将是生死存亡之关键。敌人的主要据点分布在图盖拉河沿线的陡崖和高地上,图盖拉河流经柯兰索的断铁路桥,转而伸向莱迪史密斯。河流拐弯处的左面是赫朗韦恩山,南非轻骑兵曾于12月15日攻打过这座山,中间是格林希尔高地,右边是两座林木葱郁的辛戈洛和蒙特克里斯托山。图盖拉河在布尔人右翼部队的前方,在其左翼和中间部队的后方。我军决定采取行动,强占敌军左翼的制高点。成功后,我军两个师的兵力在全部炮火的掩护下将进攻中部高地,然后乘胜追击向右拿下赫朗韦恩山,这样在柯兰索附近的布尔军据点便难以防守,通往图盖拉河的通道即可打开。这个计划切实可行,实际上也是显而易见的,战争

一开始就应该采用这个计划,布勒将军此前未曾想到。在柯兰索时,尽管有人向布勒说赫朗韦恩山与英军在图盖拉河的同侧,可是布勒却不相信,后来才慢慢接受这一事实。情况就是这样。

2月15日,整个部队沿着铁路向胡萨山出发,展开攻势,不过一切都得取决于我们能否攻下辛戈洛和蒙特克里斯托。这项任务交给了宾上校与南非轻骑兵,一支步兵旅作后盾。结果不费吹灰之力。晚上我们沿着偏僻的小路前进,18日黎明爬上辛戈洛南坡。这些要害地段只有为数不多的一些布尔兵把守,我们攻其不备,把敌人打跑了。18、19日两天,我们与步兵协同作战,把敌人全部赶下辛戈洛山,然后越过两山间的山脊,最后完全占领了蒙特克里斯托山。从这居高临下的位置我们可以俯视图盖拉河对岸的所有敌军阵地,莱迪史密斯就在我们脚下6英里外。与此同时,步兵和炮兵主力进攻格林希尔高地上敌军用沙袋堆筑起的防御阵地和战壕,也取得了彻底胜利。受到围攻的敌人,因为身后有大河断了他们的退路,根本无心抵抗。到20日晚上,图盖拉河以南的所有布尔军阵地,包括赫朗韦恩山在内,都被我军控制。布尔军撤出柯兰索,集中到河对岸的主要防御阵地。到目前为止一切顺利。

我军只要坚持向右侧进军战略就能胜利,因为蒙特克里斯托实际上控制了河对岸的巴顿山上的布尔人阵地。如果能拿下巴顿山,其邻近高地便一览无余。但此时久经沙场的布勒将军却犯了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据说这是沃伦将军催促布勒这么干的,部队大受损失。他命令部队在柯兰索附近架起一座浮桥,收缩右翼部队,放弃了制高点,出动左翼部队沿铁路线进发。在接下去的两天里,部队全簇拥在柯兰索以外的丘陵间。面对这些不利环境,布勒没命令部队迂回,却命令部队强攻波希特的

布尔军的坚固阵地，这显然是瞎指挥。22日晚，我与司令部一位高级参谋聊天，此人便是著名的里平顿上校。他直率地说：“我不喜欢这样的局势。部队与所有大炮都从制高点上撤下来，我军将被束缚在图盖拉山谷中，就像是身处罗马大斗兽场<sup>①</sup>，每排座位都向我们开火。”事实正是如此。无法抵抗我军迂回攻势的布尔军已开始向北撤离，他们发现英军再次自投罗网，便又大规模地杀回头。

2月22日至23日两个晚上，两军在图盖拉河附近的丘陵地带发生激烈混战，损伤严重。对波希特的进攻要等到24日晚上才开始。因骑兵未参战，我便穿过河，爬上一座山尖，在这里我发现利特尔顿将军<sup>②</sup>正蹲在一块石头后观战。因他只一人，看到我似乎很高兴。哈特将军指挥的英格兰先头步兵旅沿铁路线展开，在暴露地段伤亡严重，但终于向左展开了攻势。波希特高地包括3个圆顶山头，从右至左容易攻破，但从左至右发动攻击却比登天还难。下午4点，步兵旅艰难地爬上如今被称为因尼斯基林山的陡峭山坡，因尼斯基林团与都柏林燧发枪团发起进攻时已是黄昏。战斗场面悲壮凄怆。从望远镜里可以看到，在暮色掩映下，布尔军头戴阔边帽的细小轮廓在炮弹烟雾中忽隐忽现，在光秃秃的山坡上，爱尔兰士兵的褐色身影，闪亮的刺刀依稀可见。我们耳边响起了密集的枪声。爬山的英军身影减少了，他们停了下来，最后消失在黑魃魃的山坡中。1200名进攻将士死伤2名上校、3名少校、20名军官以及近600名士兵，

---

① 古罗马最重要的遗迹之一。弗拉维王朝皇帝维斯帕西安约于70—80年修建的大斗兽场。椭圆形长轴为188米，短轴为155米，可容纳4800人，可进行上千名角斗士的徒手搏斗或人兽拼斗，甚至可模拟海战。

② 即日后的内维尔·利特尔顿爵士。——作者原注

进攻被彻底击退。

此时的布勒终于听从劝阻，恢复了向右进军，又一次展开大规模进攻。部队花了3天时间才摆脱了与布尔人的纠缠，这本来是可以避免的。几百名受伤战士躺在因尼斯基林山阵地长达两天，无医无水，倍受折磨。他们说不出话来，只能挥动着布条求救，惨不忍睹。26日布勒请求休战，布尔军一口回绝了，但允许医生和担架队员前去抬走伤员，掩埋死者。黄昏时分一切完毕，两军重又交上了火。

2月27日是马久巴战役纪念日。这一天，纳塔尔地区的英军发动了最后攻势。所有大炮又回到高地。图盖拉河上的大桥未受破坏，于是各旅从桥上越过图盖拉河，向右攻击布尔军阵地。我们首先攻占了巴顿山，然后是铁路山，最后攻下了令人怯步的因尼斯基林山，这座山的一部分早就在我军控制之下，我们靠拼刺刀拿下了整个山头。这样，横在英军和莱迪史密斯之间的最后障碍终于被扫平。我们迫不及待骑上马冲向河边，要追赶敌人，总司令在桥上遇见我们，严令我们掉头。“去他妈的，不追了。”据说这就是他在那一重要历史时刻所说的话。就好像是说“去他妈的，都付出这么大的牺牲了，还要奖赏干什么！去他妈的，这笔债拖了这么长时间没还，不要了！去他妈的，管它以后的日子难过不难过，不要这笔奖金了！”

次日上午，我们踏着轻快的步伐，越过河，穿过弹痕累累的高地，走上了通往6英里外莱迪史密斯的开阔平原。布尔军已全线撤退，大炮已从布瓦纳山上撤下来，北去的车辆扬起阵阵尘土。“不准追击”的命令仍然有效。据说总司令说过，“最好别管布尔人，让他们走。”那一天我们都急躁不安，怒火中烧。直到晚上我所在的两个营才被允许冲过崩溃的敌军后卫部队，进入莱迪史密斯，我也一同前往。战马越过灌木丛生的平原，其间只有

几名布尔兵向我们开枪。突然，灌木丛中站出几个憔悴的身影，在向我们挥手致意。我们继续向前，在满目疮痍的街头遇见了骑在马上、穿戴整齐的乔治·怀特勋爵，然后一同进入长期被围困、几乎弹尽粮绝的莱迪史密斯。那一刻真是激动人心。

当天晚上我与司令部的参谋人员共进晚餐。伊恩·汉密尔顿、罗林森、赫德沃恩·拉姆顿都十分热情。几瓶一直被珍藏着的香槟也被打开了。我想尝尝马肉，为了表示庆祝，他们杀了最后一头牛。形容枯槁的莱迪史密斯将士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经过漫长而艰辛的跋涉，我终于到了莱迪史密斯。我欣喜万分。

## 在奥兰治自由邦

罗伯茨伯爵是我父亲的生前好友。1885年伦道夫·丘吉尔勋爵任印度事务大臣时，坚持任命罗伯茨为英军驻印度总司令。罗伯茨伯爵与父亲一直是好朋友，直至10年后父亲去世。我小时候经常见到罗伯茨将军，与他谈过几次话，对此我十分自豪。他对年轻人总是和蔼可亲，能容忍年轻人的少年老成与盛气凌人，具有吸引别人效忠于他的天赋。不管怎样，作为一名年轻军官，我在部队的上层中有了一位值得自己信赖的可亲可敬的朋友。

我们在纳塔尔欢庆来之不易的胜利，罗伯茨将军率领兵马正从开普殖民地向北进入奥兰治自由邦，解救了金伯利，包围了克龙涅<sup>①</sup>指挥的布尔军，在帕尔德伯格一番激战后，迫使布尔人投降。整个战局奇迹般发生了转机，1899年11月英军处于“黑色的一周”，1900年2月，英军则全线告捷。战局的巨变使公众对罗伯茨将军更加信任。人们传说，这位小个子将军在战场上一露面，乌云立刻散去，阳光重又普照在战斗在南非次大陆的英军身上。

由于战争失利，布尔军放弃了对纳塔尔的入侵，以其惯有的

---

<sup>①</sup> 克龙涅(1840—1911)，布尔战争中南非军队将领，在南非战争中屡建战功。

神速穿过德拉肯斯堡，撤回本土。他们拖着沉重的大炮及所有军需物品，在两个星期中便消失无踪，将纳塔尔地区拱手让给了英军。英军行动迟缓，在布勒的指挥下更显得笨拙不堪。如果英军想穿越莱迪史密斯到德兰士瓦边境的150英里土地，必须先修好铁路，保障军需供给，然后才能行动起来，这显然要耽搁很长时间。

我现在急于进入主战区。自我从比勒陀利亚越狱后，纳塔尔地区的部队当局给予我极大的自由。我无需辞去在南非轻骑兵中的军职即可获得长期休假，以记者身分去布隆方丹，采访罗伯茨将军的军队。我背上帆布包，沿纳塔尔铁路而下，然后从德班坐船来到伊丽莎白港，再沿铁路穿过开普殖民地，按期到达开普敦，住在豪华的蒙特纳尔逊饭店。与此同时，《晨邮报》把我看作是该报的骨干记者，因此为我作了必要申请，将我委派到罗伯茨将军所在部队。我估计办完手续需要几天时间，在此期间，我采访了当时在南非首都的南非和荷兰政界人物。这几天过得很愉快。

到目前为止，人们认为我是好战分子，热衷于残酷的战争，因而我受到亲布尔分子的中伤，也同保守党发生了矛盾。布尔军从纳塔尔地区撤离后，所有曾加入、帮助或同情布尔军的人都遭到了报复。开普殖民地民怨沸腾。对此，英国政府的反应是，既然英国已取得胜利，过去的事就既往不咎了。国务次官沃尔弗顿勋爵本着这个精神发表了演说。政府如此宽宏大量，我表示极力拥护。3月24日，我从莱迪史密斯发回电报：

不管为大英帝国英勇作战的殖民者有何看法，我热切希望并呼吁出台一项宽大政策。如果军事镇压过于残酷，持续不断，那么既没必要也没理由给投降者以“教训”。明智的方针是坚决消灭顽固不化分子，从宽对待愿意投降人

士。布尔军中的荷兰籍农民只是法律意义上的叛国者，他们由于血缘关系而加入自己民族的队伍，尽管其行为不当，却情有可原。这种行为比起积极加入布尔军打击自己同胞的南非英裔自由民，在道义上所应受的谴责要小得多。

不过，如果这些英裔自由民的公民权得不到英国法律的保护，他们也应得到一定宽恕。虽然荷兰籍农民与变节的英裔自由民同属一丘之貉，但我们必须看到，他们的行为皆因我们早年在南非犯下的错误所致。区分自愿投降者与打仗被俘者最为关键。我们应该采取一切措施打击敌人士气，使其屈服。英军勇往直前，坚无不摧，与此同时，强大的英国政府应常怀慈悲之心，保护敌人家属的安全。这样的政策在南非共和军士兵的眼里才是最“完善的”，这才是通向“光荣和平”的捷径。

这份电报引起了非议。英国上下群情激愤，这种情绪虽然于事无补，但也很自然。英国政府站在民众一边，国务次官的言论被压制下去了，我成了保守党攻击的目标。就连《晨邮报》在刊登我所撰写的稿件的同时，也表示不能苟同我的观点。纳塔尔地区的报纸也纷纷强烈谴责。对此，我的答复是：胜利的斗士受辱于豪华包厢里的观众并不稀奇。

米尔纳爵士<sup>①</sup>对此十分理解，他向我表示友好。其副官威斯敏斯特公爵组织了一群猎狗供其打猎消遣。我们在桌山脚下

---

<sup>①</sup> 艾尔弗雷德·维斯康特·米尔纳，英国殖民地行政官员，历任埃及行政长官、内地税收委员会主席、驻南非高级专员和开普殖民地总督，因其在1899年布隆方丹会议上对克鲁格所持的顽固态度而引发第二次布尔战争。

尽情打猎,然后坐在灌木丛中午餐。

这位高级行政长官说:“读了你的报道,纳塔尔民众会很不高。不管怎样,他们得与这些荷兰籍农民和英裔自由民生活在一起,相互忍让,共建一个国家。但是由于亲朋好友被杀,家园遭到破坏,他们目前过于冲动,听不进仁义之说,只有等他们情绪稳定下来。我理解你的心情,但此时表达,不合时宜。”他主张高压政策,一贯固执己见,今听到他能这么心平气和地说出这番宽宏大量之言,我深受感动。在处理这个问题时,虽然言词激烈,但英国政府对叛国者与造反者十分宽容。

我必须承认,我这一辈子总是不时与英国的两大政党中的某一党派意见相左。我每每竭力主张战争及其他斗争,直至取得胜利,然后又对战败者伸出友谊之手。因此战争中,我总是与和平主义者为敌,战后又总是与主战派有冲突。布尔战争时过多年,伯肯黑德伯爵有一次向我引用了一句希腊语,形象地表达了我的这种行为,“宽恕被征服者,灭傲者威风”。我似乎是无师自通,基本上达到了这个思想境界。我的很多好的想法总被罗马人捷足先登,抢先表达了出来。我必须承认,这句名言是罗马人的专利。这句话用于南非战场再适合不过了。我们背离了它就要受到惩罚,但若遵从了它,就定能取得胜利。

不仅在南非问题上如此,我认为在其他问题上也应如此。我们应先征服爱尔兰,然后给予地方自治权;先饿乏德国人,再提供粮食;先粉碎总罢工<sup>①</sup>,再倾听煤炭工人的申诉。可是,由

---

<sup>①</sup> 1926年在英国爆发的一次规模巨大的总罢工,涉及英国主要工业,200多万人参加。起自煤炭工业,蔓延至铁路、公路运输、钢铁、建筑和印刷业。总罢工持续9天(5月3—12日),停产近6个月。由于政府积极干预而得到协商解决。

于很少有人有如此想法,所以我总不免身陷困境。在法国,曾有人请我为纪念碑题词。我写道:“战时果断,败时不屈,胜时怀仁,和时亲善。”结果未被采纳。人脑分成左右两叶,而只有其中的一半用来思维,因此我们不是右撇子就是左撇子,实在是个错误。如果我们的大脑结构合理,那么我们就能根据情况熟练使用左手和右手。然而,实际情况是,能打胜仗的人不会媾和,善于媾和的人不会打仗。如果我说我自己能两者兼顾的话,也许太离谱了。

在开普敦轻松地过了几日,我开始担心为什么去布隆方丹的通行证还不下来。一个星期过去了,司令部对我的正式申请仍未给予任何答复,我开始意识到有了麻烦,可想不出会是什么麻烦。在我从纳塔尔发回的报道中,我竭力鼓舞国内读者的信心,报道纳塔尔战事中的许多“令人遗憾的事件”时我总是往好处写。当时的战争规模都很小,战地记者在战场是举足轻重的人物。我是其中的佼佼者,又是在为最有影响的报社效力,我绞尽脑汁也想不出自己会遇到什么障碍。

所幸我在罗伯茨勋爵的司令部有两位颇有权力的好友。莱迪史密斯一解围,罗伯茨勋爵便将其先前的副官伊恩·汉密尔顿召到身边。在远征蒂拉赫时曾在洛克哈特的司令部任参谋的尼科尔森将军也在总司令部身居高位。无论是在战争中还是在和平年代里,两人跟随罗伯茨勋爵多年,用福煦元帅的话说,这两个人是罗伯茨勋爵的“军人家庭”,两人深得罗伯茨勋爵的宠爱,随时有机会接近总司令。尽管我与他们在年龄和级别上存在差异,我却几乎与他们保持着平等的友谊,因此求他们帮忙。他们给我发来电报说,麻烦不是别人,正是罗伯茨本人。《尼罗河上的战争》一书中有几页似乎冒犯了基钦纳将军,罗伯茨勋爵认为,派我作战地记者跟随主力部队会引起参谋长基钦纳的不满。

他们说还有一件事也让罗伯茨耿耿于怀,在我从纳塔尔发给《晨邮报》的一则报道中,我严厉批评了一位英格兰长老会随军牧师在战前对部队所作的极不称职的布道,罗伯茨总司令认为此报道是对那些尽职尽责的随军牧师的不公正评价。两位朋友说,罗伯茨勋爵“非常固执”。不过他们正尽力劝说,相信几天后就能奏效,我别无他法,只有等待。

我清楚地记得那次随军牧师布道的情景以及我对此事的报道。那是在斯皮扬山之战与瓦尔格兰茨之战中间的一个星期天,严阵以待准备第二或第三天投入战斗的整个步兵旅都聚集在图盖拉河附近敌军火力范围之外的一个小山谷里做礼拜。此时,每个士兵都迫切希望接受上帝的慰藉。如果这次布道做得好,肯定会在每个人的心灵上留下永久难忘的印象。然而,我们听到的却是一次荒谬离奇的布道,说的是以色列人如何使耶利哥城城墙倒塌的计谋<sup>①</sup>。对此,我的评论虽言辞尖刻,却绝不失真:“听着这些荒唐话,我不禁想起在恩图曼战役中德高望重的布林德尔神父<sup>②</sup>,不知道罗马人是否又将抓住一次坎特伯雷不屑一顾的机会?”这些苛刻的批评在教会中引起一阵骚乱,他们义愤填膺,马上就行动起来。好几位能言善辩的牧师放弃国内的工作,自愿要求上前线。他们正在赶往南非的路上,前来充

---

① 据《圣经》所载,约书亚率领以色列人攻打自恃坚不可摧的耶利哥城。他利用计谋让以色列人绕着耶利哥城每天走一圈,如此这番持续了6天。到第七天,约书亚决定对耶利哥发起总攻。这回以色列人围城走了7次。前六次与往常一样,他们一声不吭,但到第七次,随着一声号角,以色列人齐声呐喊,喊声震天动地,耶利哥城城墙随之倒塌。以色列人一拥而上,攻占了耶利哥。

② 布林德尔是这一期间英国军队中一名很有声望的神父,后来成为诺丁汉地区的主教。——作者原注

实随军牧师团。虽然结果颇见成效,但这起事件的起因仍不可宽恕。罗伯茨勋爵戎马一生,一直是位虔诚的教徒,他认为军队牧师受到了不应有的诽谤,外界的增援似乎只能加剧诽谤的程度。在这种情况下,几天后就能奏效的希望看来很渺茫。我虽然被蒙特纳尔逊饭店的欢乐氛围所笼罩,却无精打采,郁郁不乐。

不过,我的两位朋友最终劝说成功,通行证签发下来,我可以前往布隆方丹了。不过有个条件,在履行战地记者的职责前,我必须先到总司令的军事秘书面前接受训诫,并不准我再作任何鲁莽的、冷酷无情的批评。这已是够照顾我的了。当天晚上我便开始了长途旅程。我受到两位尊贵朋友的热情欢迎,他们的地位与影响镇住了其部下的异议。我毕恭毕敬地接受了军事秘书的一番训诫,从那时起我便有了彻底自由,想去哪儿便可去哪儿,在服从相当宽松的审查制度的情况下,想写什么便可写什么。但是罗伯茨勋爵仍旧保持一种冷淡态度,尽管他知道我每天都与其最亲密的下属朋友在一起,也了解我晓得自己的一举一动都是他们在餐桌上的讨论话题,但他从不接见我,也不表现出任何承认我的迹象。一天早晨,在布隆方丹集市上,我正与一群军官在一起,突然意外地发现自己离他只有几码远。我向他行了军礼,但他却视我如同陌路人。

我的生活中到处都是令人兴奋的趣事,所以我也就无暇顾及这位尊贵朋友的不满情绪了。《晨邮报》慷慨大度地为我配备了良马以及其他交通工具,哪里有战火,哪里就有我。我从一个纵队赶到另一个纵队,时常孤身一人穿行在危机四伏的旷野上,追上与敌军交叉的我方纵队的后卫部队。如果纵队指挥态度和善,我会呆上三四天,然后再越过暗藏杀机的地带,飞奔回来,为报社源源不断地发送报道。

莱迪史密斯之围被解，布尔军在奥兰治自由邦败北后，很多布尔士兵认为战争已经结束，便匆匆返回自己的家园。布尔共和国觉得英国已经挽回了信誉，便认为有可能通过谈判寻求和平。当然英国根本没有这种想法。英国政府强调，布尔人入侵使英国士兵伤亡惨重，坚决表示必须在比勒陀利亚确定解决南非问题的条件。与此同时，自由邦的几千名布尔人已回到各自家中，宣誓保持中立。如果此时罗伯茨勋爵马不停蹄继续前进，很有可能一举解决布尔人在瓦尔河以南的一切抵抗。但是部队首先得聚集粮草。铁路线上的主要桥梁都已被炸毁，这些桥梁虽然得到了临时整修，但货物运输的数量必须减少。部队的每日供应使交通负荷过重，每天运达的军需品只够消耗4天。很显然，继续前进需得几个星期之后。这期间，布尔军几位坚决抗英的领袖聚在一起开始了第二次努力。尽管他们手中的资源不足，但与第一次相比，持续时间更长，我们为此付出的代价也更大。游击战争开始了，布尔人的第一步是召回那些已经与英国人单独媾和的突击队员与自由民。这几千名突击队员和自由民虽然宣誓中立，但迫于威胁与暴力，只得又拿起武器。英国方面痛斥这种出尔反尔的恶劣行径，尽管未对任何违反誓言者处以死刑，但英国人的心中又埋下了新的怨恨的种子。

我得知，到目前为止布拉巴宗将军不是很顺利，他指挥一支正规骑兵旅，在科莱斯堡战役中与弗伦奇将军闹翻了。弗伦奇比他年轻，比他更有个性，老布拉巴宗觉得不容易适应战争的新环境，他总是回忆“1878年的阿富汗战争和1884年的萨瓦金战役”，那时弗伦奇还只是个陆军中尉。不过弗伦奇现在是他的上司，1878年和1884年的战争经验已经过时了。此外，布拉巴宗说话没遮掩，口气中多有嘲讽，无论是评价弗伦奇的战略，还是说他年轻气盛，布拉巴宗总是十分随便。流言传到司令部，弗伦

奇进行了报复。布拉巴宗不再指挥正规骑兵旅，却成了即将赶来南非的 10000 名义勇骑兵的指挥。乍一看，他是提升了，弗伦奇对布拉巴宗也正是这么说的，但实则明升暗降。10000 名被人瞧不起的非正规骑兵得分散到各个战区，可怜的布拉巴宗只弄到一个旅。现在他就带着这么一点兵战斗在布隆方丹东南地区。我决定去找他。

我把马与马车放在一列车厢里，坐上火车，向南驶往爱登伯格。4 月 17 日上午，火车在大雨中缓慢驶过一个危险区。19 日晚我赶上距离杜韦茨多普 11 英里的一支纵队。这支纵队是第八师，是从大英帝国的各个要塞中搜罗来的正规军中的最后一个师，由莱斯利·朗德尔勋爵指挥。此人后来被人很不客气地起了绰号“磨蹭勋爵”<sup>①</sup>。在尼罗河战役中我便认识了他，他对我很热情。布拉巴宗的部队正在前面侦察。第二天一早我便骑上马赶上了布拉巴宗的部队。他见到我非常高兴，向我大发牢骚，讲了一通有关弗伦奇的事，同时大体介绍了当前的战况。我俩在一起住了一段时间。

很快我们便接近了杜韦茨多普周围的丘陵地带。远处传来的枪声打破了沉寂，巡逻兵匆匆返回。接下来便是我所见过的最滑稽可笑的军事行动。布拉巴宗的义勇骑兵很快占领了附近的丘陵，与布尔军发生了激战。布尔军显然在杂草丛生的山脊间存有一定实力，两三门大炮开始轰击。朗德尔得到消息，于当晚带领两个步兵旅赶到。我被允许参加前敌会议。布拉巴宗全力主战，他已经为次日进攻做好了一切准备。可是第二天一大早，先锋步兵旅旅长赫伯特·彻姆赛德却向布拉巴宗强调了战局

---

<sup>①</sup> 英语中此勋爵名字与其绰号发音相近，含嘲讽意。

的严重性。22年前,也就是1878年,他参加过俄土战争<sup>①</sup>,因此他的话很有权威。他声称目前布尔军阵地与当年的普列文<sup>②</sup>一样难以攻克,进攻会付出几千士兵的代价,不聚集所有兵力就贸然行事是十分轻率的。因此前敌会议决定等巴坎贝尔将军指挥的第三步兵旅到来后再作定夺。这个旅包括两个营的近卫军,已坐火车出发,晚上到达。我们愉快地与布尔人小打小闹了一天。晚上一到,又一支步兵纵队赶到了。现在我们有近11000名士兵和18门大炮,一切就绪,就等第二天开战。可就在当天晚上,40名伯克郡团的士兵摸黑去不远处取水时,不幸迷路闯进布尔军防线。朗德尔勋爵以为不祥,遂给罗伯茨勋爵发去电报,请求指示。当下,所有将领都接到严正警告,不准妄动,以免发生伤亡。禁止从正面进攻敌人,一切行动要小心,要排好阵势。这种指令从理论上说很高明,而实际上贻害无穷。

拂晓时分,整个部队集结完毕,准备出击。骑兵也只等一声令下,包抄敌军左翼。突然一位参谋赶到,宣布战斗起码还得推迟一天。布拉巴宗受不了了,他无可奈何地摇着头,骑着马朝我走来。他脸上带着古怪的表情,在大庭广众之下突然大嚷一声“胡扯淡!”这声吼叫是否激怒了那位参谋,他回去是否作了汇报,就不得而知了。

为了安慰布拉巴宗,同时也找点事情做做,司令部允许骑兵

---

① 17—19世纪俄国为夺取黑海海峡和巴尔干地区与土耳其发生的一系列战争。1695—1696年彼得一世占领了亚述海东北的亚述,取得第一次胜利。1768—1774年俄国占领了克里米亚和黑海,至1792年将克里米亚正式并入俄国。1853—1856年发动克里米亚战争,土耳其在英、法等国的支持下取胜。1856年3月签订《巴黎和约》,1877—1878年最后之战结束了俄土战争,签订了有利于俄国的《圣斯特法诺和约》。

② 保加利亚北部城市,是1877年俄国人和土耳其人交战的战场。

外出侦察,打探所谓“普列文”的敌军左翼的情况。在这里,我经历了一次最为激动人心的冒险。

且允我把当时记录下来情况照抄于此,这才可以避免我的记忆对这段故事添油加醋。

约千余人的一个旅从前哨阵地背面向南运动,大范围快速包抄,逼近敌军左翼……前方出现一个陡深的盆地,盆地中央有一座很特别的山丘,杜韦茨多普被挡在山后。小山周围有布尔军,骑兵、步兵都有,人数约200。

我们快速前进,几乎插进了敌人心脏,使他们惊恐不安,搞不清我们是在侦察还是进攻,最后他们决定包抄在其外围的英军骑兵以探个究竟。我军的远程步枪火力刚刚迫使敌军躲在山后,又一支约200人的布尔军突然冲出来,穿过我前方约2000码处,向右面的白石小山奔去。

蒙莫伦西阵亡后,担任这支侦察部队指挥的是安格斯·麦克尼尔,他跑到布拉巴宗将军面前:“长官,能否将其拦截?我想我们能办到。”侦察兵也都个个竖直了耳朵。将军沉思片刻:“好吧,试试看。”

“战士们,上马!快上马!”麦克尼尔一边跃上战马,一边向士兵喝令道。然后他又转向我,“来,跟我们一道,我让你开开眼界。”

几天前,我答应过哪天要跟随侦察兵一同外出。我一看布尔军,发现他们比我们更接近白石山,不过他们得要爬上山,也许装备不如我们精良。拦截成功是有可能的,如果真成功,那么他们在这一马平川上将付出多大的代价啊!因此,为了《晨邮报》的利益,我骑上马,与麦克尼尔及四五十名侦察兵一道,以最快的速度策马向前。

双方一开始便在抢速度，双方交会时我发现领先的5名布尔人装备得比其他士兵好，跑得也比别人快，正拼命要抢占有利地势。我说了声“我们来不及了”，但无人肯认输，都想与敌方比个高低。接下来发生的事再简单不过了。

我们在离山顶100码——准确地说是120码——处的铁丝网前下了马，开始剪网，准备抢占山头。突然，十几个布尔士兵的头和肩冒了出来，布尔人破坏铁路时我曾见过这些毛茸茸的凶神恶煞般的嘴脸。不知紧跟其后的还会有多少布尔兵？

这时双方都莫名其妙地出现了短暂停歇，当然也许根本没有停息。我似乎记得这期间发生了很多事。两个布尔兵已接近，一名士兵蓄着络腮胡子，身穿咖啡色外衣，另一名围着红围巾。两名侦察兵还在木讷地剪着铁丝网，一名士兵正试图隔着战马瞄准。麦克尼尔此时则沉着地命令道：“迟了，回到另一座山上。快跑！”

接着枪声响了，子弹在空中呼啸。我踩着脚蹬准备上马。可战马被枪声吓坏了，向前狂奔。我想跃上马鞍，可马鞍却滑到了马肚底下。这匹马挣脱缰绳，飞奔而去。大多数侦察兵都已跑出200码开外，只剩下我一人，在敌人的枪口下徒步前行，1英里之内没有任何藏身之处。

让我感到欣慰的是自己带着手枪，不会再像以前那样手无寸铁、束手就擒了，至多是落个残疾。于是我又一次在布尔兵的枪口下向前跑，边跑心里边想：“这下跑不掉了。”这时候我突然发现左面奔来一名侦察兵，高个儿，身上戴着骷髅徽章，胯下一匹奄奄一息的战马，恰似死神显灵，但我绝处逢生了！

当这名侦察兵从我面前奔过之际，我冲他叫声：“带上

我！”他出乎意料地立刻勒住马，很干脆地说：“好，上来。”我奔上前去，敏捷地跃上马，顷刻间便坐上了马鞍。

两人一同向前奔去。我抱住他，手里紧抓马鬃。我的手沾满了血，原来这匹马受了重伤，却依旧奋勇向前。真了不起！我们距敌人越来越远，飞来的子弹从我们头上呼啸而过。

“别怕，”我的救命恩人说，“他们伤不着你。”未等我回答，他又道：“可怜的马，噢，好可怜的马！被爆炸子弹击中了。这些恶魔！他们的末日就要到了！噢，我的马！”

我说道：“不要紧，你救了我的命。”“噢，”他答道，“可我想的是这匹马。”以上便是我们的全部对话<sup>①</sup>。

根据我所听到的敌军打出的子弹数量，我估计跑出500码之后便不会被击中。因为奔驰的战马是难以瞄准的目标，再加上布尔兵已爬得气喘吁吁，兴奋不已，所以危险不大。不过，等转过另一个山角，我才长舒一口气，庆幸自己又一次死里逃生。

回到营地后我们得知罗伯茨勋爵以为朗德尔被强大的布尔军拦住了去路，便从布隆方丹调集另一步兵师，同时弗伦奇率领的3个骑兵旅也从西北面向杜韦茨多普大举进发。两天之内两支部队会师了。把兵力至少是其10倍的英军折腾了近十天后，2500名布尔士兵带着战俘，悄悄地向北转移了。游击战显然给英军带来了新问题。

现在我加入了弗伦奇的骑兵师，跟随他们向北行进。我发

---

<sup>①</sup> 这位名叫罗伯茨的骑兵因为这次表现而荣获特等军功章。——作者原注

现这里的气氛很不友好,与其他许多指挥官一样,弗伦奇似乎很讨厌我。像我这样带中尉衔的战地记者混在部队里自然让人感觉不快,不过除这些偏见以外,还有人际关系的因素,我被认为是老布拉巴宗的同党与密友,因此卷进了被敌视的圈子。弗伦奇的副官杰克·米尔班克获得了维多利亚勋章,他伤愈归队后也无法缓和这种对抗气氛。尽管我经常跟随弗伦奇的部队行军打仗,但他完全忽视我的存在,对我未表现出一丝礼貌与半点友好,对此我深表遗憾。我对他在科莱斯堡前线所布下的出色防御非常敬佩,也十分佩服其策马冲破布尔人防线解救金伯利的壮举,他的军人本色使我为之倾倒,当时也正是他声誉鹊起的时刻。后来我俩成了挚友,在和平年代和战争时期一起共事多年,共商大计,但在南非战争期间却没与他说上一句话。

## 约翰内斯堡与比勒陀利亚

5月初,罗伯茨勋爵养精蓄锐之后,开始出征约翰内斯堡与比勒陀利亚。这时,战争局势恶化,战争在短期内不会结束。总司令部驻扎在布隆方丹两个月,当时在罗伯茨手下当参谋的有诺福克那公爵、威斯敏斯特公爵以及马尔伯勒公爵,激进派的报纸对此大肆嘲讽。出于其对舆论敏感的天性,罗伯茨伯爵决定首先精简掉马尔伯勒公爵。我的堂兄眼看自己就要被大部队甩掉,心里沮丧万分。幸运的是,伊恩·汉密尔顿被提拔为将军,带领一支至少有4000名骑兵在内的约16000名士兵的分遣队,距离主力部队的右翼四五十英里,与大部队平行前进。我决定加入其部队,在那里自己会受到欢迎,也不会有任何约束。于是我发了份电报给汉密尔顿,建议他请马尔伯勒公爵当参谋,他同意了。一向公平待人的罗伯茨勋爵也欣然应允。我套上自己的4匹马拉的马车,我们一起疾行了40英里,赶上了右翼部队,我们毫无防备却安然穿过布尔军出没的乡村,在温布尔格城郊赶上了部队,以后一切顺利。

接下来便是长途跋涉,走走歇歇近六星期,穿越了四五百英里。南非清新的空气、宜人的气候、壮丽的景色以及不断行军打仗的生活给我留下很深的记忆,事隔25年再回想起来仍为之振奋。每天我们都能见到新景色,晚上没有帐篷,露宿在溪边,我们赶着绵羊做口粮,在无人居住的农庄上捉鸡吃。我的马车里

有一层夹板，下面藏着从伦敦带来的最好的罐装食品 and 美酒，足有两英尺深。生活舒适惬意，每天精神抖擞地外出巡逻，寻求冒险。天一破晓，大队人马便开始出发，枪声从四面八方传过来，使军旅生活充满了刺激。有时大部队逼近某些丘陵和山脊，山上有灵活机动的布尔人把守着，于是，每隔几天总有二十来个英兵被分割包围或遭到埋伏，陷入圈套，我们意识到布尔骑兵强大的作战能力，他们犹如敏捷的猎犬，死死咬住英军不放。

罗伯茨勋爵不听情报部门的建议，相信敌人会往德兰士瓦西部而不是东部撤退。于是在我们接近德兰士瓦边境时，伊恩·汉密尔顿的部队从主力部队右侧被调至左侧，穿过铁路中心线，往瓦尔河渡口进军。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所处的位置正对约翰内斯堡西侧，所以无需大部队发起正面进攻，就可迫使敌人从约翰内斯堡撤退。布尔人对英军此次调遣的意图十分敏感，尽管他们打算撤离约翰内斯堡，但他们还是派出一支精兵在约翰内斯堡至波切夫斯特鲁姆<sup>①</sup> 一线上的一个名为佛罗里达的地方狙击汉密尔顿部队。

1900年7月1日，就在4年前詹姆森大夫的部队投降处发生了当时被认为是很激烈的一场战斗。布尔士兵躲在山岭间凸凹不平的岩石背后，炮兵轰不着，我们只好用刺刀往上冲。执行这项艰巨任务的戈登苏格兰部队，损失近100人。与此同时，弗伦奇的骑兵试图击退敌军右翼和后卫部队，但见效甚微，我在这场战斗中又一次侥幸保住了生命。英军占领山脊后，伊恩·汉密尔顿手下的一个旅长史密斯·多林希望立刻把大炮架在山上，由于时间紧迫，他决定亲自上山去选地方。他邀请我一同前往，我

---

<sup>①</sup> 位于德兰士瓦南部，是德兰士瓦省最古老的城市，经济上以开采金矿和农业为主。

们一同向山上爬去。布尔兵按照他们的惯例,从四面八方用火烧山,山上一条条烟雾挡住了视线。在让人辨不清方位的烟雾中,我们错过了山上的苏格兰部队的左翼,走出烟雾时才发现撞上了敌人。我们距离敌人只有几十码,他们的步枪随即开火,周围到处是近距离射来的子弹的呼啸声。我俩立刻调转马头,一头扎进烟雾中。一匹马被子弹擦伤,我们则安然无恙。

激战结束,伊恩·汉密尔顿的纵队横亘在通往约翰内斯堡的大路上,向南20英里处应是罗伯茨勋爵目前的司令部所在地,两支部队无法取得联系。约翰内斯堡仍在敌人手中。沿着我们来的道路往南行意味着要在高低不平的山间行走近八十英里,我们已派出骑兵沿着这条路线去与司令部联系,但在此节骨眼上,找到一种与总司令部取得联系的更快捷的途径是非常必要的。从城里出来的居民对城里的情况说法不一,布尔军正在撤离这座城,但他们还在那里。有名年轻的法国人似乎消息非常灵通,他向我保证说,穿着便服骑上自行车穿过城市是件轻而易举的事,在敌人撤离的最后关头,老百姓被他们拦住盘问的可能性很小。这位年轻人愿意借给我一辆自行车,同时他本人愿意做向导,我决定试一试。伊恩·汉密尔顿将急件交给我,我自己也带上了准备发给《晨邮报》的报道。我俩下午出发,骑车沿着大路直奔城区。通过我军的边哨时,我明显体会到一种冒险感觉。我俩很快来到约翰内斯堡大街上。天开始黑下来,不过大街上还有不少人,其中有全副武装的布尔骑兵,他们仍然控制着这座城市,我俩已进入了他们的防线。按照军事法律,我如果在这种情况下被捕会很麻烦。我在南非轻骑兵旅任中尉,却乔装打扮潜入敌人阵地,欧洲的任何军事法庭在处理这类事件上都不会手软,我对此十分清楚。

我们推着自行车上了一条很陡的街道,听到身后传来马蹄

声,这时倘若改变速度便会有致命的危险,我俩继续向前慢慢推着,装出一副不经意的样子,时不时还用法语搭话。过了一会,那个骑马人赶了上来,他勒马慢行,仔仔细细地审视着我们。我抬头一看,我俩的目光相遇了。他斜挎一支步枪,手枪装在枪套里,身背3个子弹带,马背上沉沉地驮着他的家当。我们3人并行了很长时间,然后这位讨厌的同伴才策马而去,将我们落在后面。我们还不能高兴得太早,如果敌人布了哨,我们还随时可能遇上敌人的哨兵。我俩只想沿着马路骑车,不打算东躲西藏。不过,我们没发现布尔哨兵,遗憾的是我们也没有看到英国哨兵。在约翰内斯堡的近郊,我们遇上了罗伯茨勋爵部队中的士兵,他们没带武器,想蹑跹进城去寻些吃的和喝的。我们问部队在哪里,他们说就在附近。我们建议他们不要再往城里走,否则会被俘虏,甚至会被打死。

“怎么回事,先生?”有名士兵问道,他突然对这个奇怪的可能性产生了兴趣。

当我告诉他们说我们在1英里外刚遇到过武装布尔兵时,这些士兵打消了进城抢劫的念头,转身搜寻附近的几间房屋。我与同伴沿大路继续向前,找到了罗伯茨先锋师的指挥部,他们说总司令部在往南约十英里外。我们到达总司令部时天已黑了。我认识的一名副官来到门口。

“你是从哪儿蹦出来的?”

“我们从伊恩·汉密尔顿部队来,有急件呈交总司令。”

“太好了!”他说,“我们一直在等待消息。”

说完他走开了。我想与新闻审查官取得联系,我身上带着一大堆稿子,全是最早的独家新闻。可没等我找到这位官员,副官就回来了。

“罗伯茨勋爵要你立刻进去。”

总司令正与十几位参谋一起共进晚餐,我一进去他便从座位上跳起,亲切地朝我走来,并伸手欢迎。

“怎么过来的?”

“我们是沿着大路穿过城市过来的,长官。”

“穿过约翰内斯堡?我们得到消息说城里仍驻有敌军。”

“是有一些,长官,”我说,“但他们正在撤离。”

“你看见啦?”

“是的,见到好几个,长官。”

他眨了眨眼睛。罗伯茨勋爵有一双特别明亮的眼睛,当时我对此很有印象。

“你昨天看到汉密尔顿的行动没有?”他接着问。

“看到了,长官。”

“把所有情况都告诉我。”

于是,我一边享受其盛情款待,一边不厌其烦地将汉密尔顿部队的行动讲给我父亲生前的这位老朋友听。他现在又成了我自己的朋友。

\* \* \* \* \*

4天后,比勒陀利亚有条件地投降了。本来,一大群牛拖着两门9.5英寸的榴弹炮,从几百英里外赶来,准备轰炸城外的堡垒,现在用不着了。我重返布尔首都时十分激动。5日上午,我和马尔伯勒公爵一同骑马出发,很快就赶上了已在城郊的步兵纵队前锋。现在已经没有必要再提心吊胆了。我们一大批英军军官来到铁路道口已关闭的门前,由两个机车牵引的火车满载着武装的布尔士兵从我们眼前缓缓驶过,车厢里密密麻麻,到处都是布尔人的步枪。双方相隔仅3码之遥,却都无动于衷地

相互对视着,此时只要一颗子弹,便可引发一场可怕的残杀。眼看着敌人的军列从眼皮底下逃跑了,我们觉得很遗憾,但看到敌人最后一列军列从面前开过,心里真正是如释重负。

我和马尔伯勒公爵慢慢策马进了城。我们得知英军军官战俘们已从国立示范学校转移,便打听新的关押点位置,希望他们还被囚禁在那里,我们担心他们也许已经被最后一列火车带走了。转过一街角,眼前出现了战俘营,这是一个用马口铁搭成的长方形建筑,四周密密地围着铁丝网。我举起帽子一声高呼,里面立刻传来了呼应声。接下来的场面恰似传奇剧的结尾,我们只有两人,而站在我们面前的则是全副武装、严阵以待的布尔卫兵。佩戴着闪亮的红色参谋肩章的马尔伯勒公爵命令卫兵指挥官立刻投降,还答应为收缴到的步枪打收条。战俘们纷纷从监狱里冲到院内,有的穿着军服,有的穿着法兰绒便服,有的没戴帽子,也有的没穿外套,但个个手舞足蹈,欣喜若狂。卫兵们丢下手中的步枪,大门被推开,52名布尔卫兵站在那里不知所措。长期被押的战俘军官们将他们包围起来,缴了他们的武器。有个人拿出了一面英国国旗,德兰士瓦旗被扯了下来,在一片欢呼声中,他们将第一面英国国旗升起在比勒陀利亚上空。6月5日上午8:47。定格!

\* \* \* \* \*

在南非还经历过一次冒险。半个月后,我参加了钻石山战斗,把布尔兵从比勒陀利亚赶出更远。战斗结束后,我决定回国。战争已接近尾声,接下去将是遥遥无期的游击战。国内大选不会拖延很久。经上级批准,我退役了,坐上了前往开普敦的火车。

火车走到约翰内斯堡以南 100 英里,科普杰斯车站以外,此前一切顺利。天刚亮,我正与威斯敏斯特公爵一起用餐,他受命于罗伯茨勋爵,有公务在身。突然,火车猛地一震,停了下来。我们刚下车,布尔兵的一门小炮便向我们开了火,炮弹几乎就落在我们脚下,路基上尘土四起,前面 100 码处的一座临时木桥也起了火。我们乘坐的火车很长,坐满了来自一二十个团的士兵,他们因为各种不同的原因被派往南部或回国。车上没人指挥,士兵们惊慌失措,开始爬出车厢。车上看不到一名军官,科普杰斯车站有一处工事,备有两门能发射 5 英寸炮弹的大炮,可距离此地 3 英里。那次装甲列车留给我的记忆使我对撤退的线路异常敏感。我不愿再重复去年 11 月 15 日的经历,于是我沿着铁路跑到机车室,爬进去命令司机鸣笛让士兵上车,然后立即开回科普杰斯车站,他服从了。我站在踏脚板上,看看是否所有士兵都回到了车厢里。这时,我看到在 100 码之内的那座燃着的木桥下面,有一群黑影站在干涸的河道上,他们是我看到的最后一批仍与我们为敌的布尔人。我把毛瑟手枪装上枪柄,朝他们开了六七枪,他们散开了,没有还击。火车启动,我们很快便安全地回到科普杰斯车站。在这里,我们得知下一站正发生激烈战斗,我们前面一列火车被拦截,受到一支相当强大并携带大炮的布尔军的袭击。前方的铁路遭到破坏,敌人无疑是想阻止我军增援部队的救援。不过,我军只损失六七十人,他们设法坚持到第二天,南面的救兵赶到后,布尔军便撤退了。修复铁路需要好几天,于是我们便借了战马,与一支澳大利亚长矛轻骑兵一起,连夜从科普杰斯车站出发,一路平安。多少年来,我一直认为,那枚击中路基在我们附近爆炸的炮弹应该是我看到的最后一发炸弹。不过事实证明,这种设想是毫无根据的。

## 卡吼大选<sup>①</sup>

比勒陀利亚被英军占领,特别是马弗京解围后,英国民众认为战争已经结束。罗伯茨勋爵的讲话更是让他们深受鼓舞,因此他们沉浸在欢乐中。不过英国政府对此却有清醒认识,战争的连续胜利将他们推至非常的危险境地。英国与布尔共和国没有任何谈判的余地,布尔共和国只能被消灭。如果布尔士兵个人或由指挥官带队前来投降,他们会受到宽大处理。当被征服的领土上有足够数量的英国移民,足以保证被征服领地的安全时,这一地区会像其他英国殖民地一样得到自治权,否则他们必定要被斩尽杀绝。正如米尔纳勋爵后来所说:“从某种意义上说,战争永远不会结束。”战争只会慢慢消亡。游击队由正规军队解决,其后的山林里和边远草原上的强盗由武装警察来镇压。

这个错误让我们付出了惨痛的代价。许许多多勇猛无畏的布尔人在博塔、史末资、德韦特<sup>②</sup>及赫尔佐格<sup>③</sup>等人领导下,在

---

① 1900年布尔战争后英执政党为摆脱国内不利局势而举行的下院议员的突击大选。

② 德韦特(1854—1922),南非布尔人将军,因在1899年布尔战争中屡建战功而升任奥兰治自由邦军队总司令。

③ 赫尔佐格(1866—1942),南非政治家,南非联邦总理(1924—1939),第二次布尔战争期间任奥兰治自由邦军队长官。

自己辽阔的国土上战斗。他们不是为了胜利而战,而是为荣誉而战。在英军背后、在战乱业已平息的战区,战火一次又一次地燃起。开普殖民地的战火被史末资重新点燃,持续了两年,最后通过正式谈判才得以平息。这场持久战带来的灾难令人震惊。神出鬼没的敌人不穿制服,他们与老百姓融为一体,受到宣誓保持中立的农场主的收留和保护。他们不时窜出来对毫无戒备的英军和孤立的哨所进行残酷袭击。为了应付这一局面,英国军事当局认为有必要迁出整个地区的所有居民,将其全部集中在几个集中营里。由于铁路常遭破坏,这些集中营不能及时得到日常生活必需品,于是疾病蔓延,使成千上万的妇女儿童丧生。烧毁不守誓言者的农庄的政策非但没有平息布尔人的斗志,反而逼迫他们铤而走险。英国方面则极端仇恨造反者、不守誓言者以及身穿缴获的英军军服的布尔人(主要是因为他们无其他衣服可穿,当然有时也是为了伪装)。不过,没有几个布尔人被处以死刑。反倒是基钦纳将军铁面无私,事隔很久之后还把曾经枪杀布尔战俘的1名英国军官以及几名殖民地骑兵枪毙了。自始至终,布尔游击队都会毫不犹豫地把自己的伤员送到英军战地医院。人性与文明并未彻底消失。两年的战争给双方都带来了极大的伤亡,在人力物力上都造成了严重的浪费和破坏,但在这两年中,双方一直保持一定程度的相互尊重。不过,这些都是后话。

回国时我受到了最热烈的欢迎。奥尔德姆人不分党派都来庆贺我的凯旋。在10辆马车的簇拥下,我进了城,街道两旁站满了热情的工人和女工。在皇家剧院,面对无数观众,我讲述了自己的越狱经过。由于英军已占领威特班克矿区,那些帮助过我的人已安然处在英国政府的保护之下,因而我第一次放心大胆地讲述了全过程。当我提及领我下矿井的奥尔德姆工程师迪

尤斯纳普先生的名字时,台下观众说道:“他老婆就在剧院里。”全场一片沸腾。

然而这种融洽气氛注定要遭破坏。在胜利的热情消失之前,保守党领袖们决定吁请全国人民支持。他们已执政5年,18个月内必须重新进行一次大选,这个时机绝对不能错过。实际上,除非他们能以新的多数席位控制新一届下院,否则,他们所制定的不要谈判而只靠武力镇压一切反动势力的政策就难以执行。9月初下院被解散。这次选举与1918年12月的大战后所进行的选举相同,不过这次选举不那么激烈。所有自由党人,包括那些支持战争和在战争中失去了儿子的自由党人,统统被谴责成“亲布尔分子”。张伯伦先生提出口号,“政府在下院失去的每个席位,都将是输给布尔人的席位”,保守党成员大多跟随其后响应。自由党与激进派分子则相信战争已经结束,因此顽强团结在其组织周围。选举在全国上下激烈展开。那时候的保守党在英国的选民中总是拥有绝对多数的支持者,公众舆论普遍站在他们一边,因而索尔兹伯里勋爵及其同事再次回到下院,所有对手在下院拥有席位的总和——包括爱尔兰民族主义者的80个席位在内——比保守党的席位还要少134个。保守党的多数席位占绝对优势。

我站在胜利者之列。当年我们的法律规定大选可持续近六周时间,这是很明智的,选民无需在一天里盲目投票,到第二天上午才得知结果。当时,国家大事是真正由斗争决定的。两党领袖人物都得参加一场艰苦而又彻底的全国性论战。选区的选民人数是有限的,候选人可以对所有愿意聆听其发言的支持者发表演说。一场成功演讲往往可以赢得一个选区甚至是一个城市的支持。练达的知名政治家的发言会在各大报纸上全文登载,被各政治团体广泛研究。如此这番,经过唇枪舌战之后,选

举议员这件国家大事才能定夺下来。

在当时的政治争斗中，人们都怀着极大的热情等候着最初的选举结果。奥尔德姆几乎是第一个投票的选区。我站在讲台上，竭力表示战争是公正的，且势在必行；自由党反对战争是错误的，他们在很多方面阻碍了战争的进程；我们必须奋战到底，战后则须以宽容的态度处理善后问题。我目前的新搭档是C·B·克里斯普先生，一位伦敦商人。早先的搭档莫德斯雷先生已去世，他在瓷澡盆中洗澡时，因身体肥胖，澡盆被压破，他受伤而亡。我的对手埃莫特先生和朗西曼先生在对战争的态度上一致采纳了罗斯伯里勋爵的主张。他们支持国家作战，但声称保守党在战争中极端无能。看来自由党似乎会犯另一种错误。作为第二大党，他们认为自由党能够通过外交手段避免战争，所有目标，诸如让克留格尔总统作出让步等等，均可通过和平手段实现。当然这一切都只是纸上谈兵。我反驳道，不管谈判进行得如何，总之谈判破裂了，因为布尔人入侵了英国领土，不管战争如何残酷，我们已挫败了敌军并占领了其首都。全国各地的保守党也声明，这次选举的中心问题是布尔战争是否正当，目的是获得战争的最终胜利；爱国人士应把阶级、宗派和党派之间的差别抛开不管，这正是我当时的信念。

张伯伦先生本人也赶来为我助威。公众此时对他的热情要比大战后对劳合·乔治先生与道格拉斯·黑格勋爵的热情还高。当然同时也存在一股很强的反动势力，不过反对者对张伯伦先生并非没有敬佩之心。我俩一起乘坐一辆敞篷马车去参加大会。剧院里坐满了支持者，反对者也簇拥在入口处。在剧院门口，我们的马车被无数反对分子团团包围，他们高声抗议，发出阵阵嘘声。看到这样一位自己有权利、有义务去抗议的著名人物，他们非常激动。我留心观察自己的尊贵客人，他喜欢公众的

叫嚷声,他与我父亲总喜欢说:“我从不畏惧英国的民主。”他满面红光,眼睛里闪烁着兴奋之情。在此,我必须说明,当时我们在一批政治家的带领下享有真正的民主,而不受被报纸所迷惑的随心所欲的大众所左右。在当时的政治体制中,政治家、选民与报界各司其职。在会上,我们对张伯伦先生的克制力感到吃惊。他那柔和的声调和犀利中肯的言词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事前仔细地准备了讲稿。他发言长达1小时,如果他所说的事实或所引用的数据有点出入,伤害到了反对党的利益,那么他会回过头来加以纠正。他始终遵守公平原则,很得人心。不过,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大不列颠的政治体制还没有渗进过多的水分之前。

我们计算30000张选票时,发现自由党和工党在奥尔德姆比较强大,埃莫特先生得票最多。不过,出于个人的意愿与对战争的看法,近200名投他票的自由党人把他们的第二票投给了我。所以,我在选举中以区区230张票的优势击败了自由党的另一名候选人朗西曼先生,名列第二,当选为下院议员。我与朋友们穿过喧嚣的人群前往保守党俱乐部。为了向我祝贺,索尔兹伯里勋爵已在俱乐部恭候多时。这位老首相肯定一直在电话机旁等候选举结果。紧接着,热情洋溢的贺信从四面八方向我涌来,我成了这次选举中“最善于扭转乾坤”的人物。全国各地都向我发出邀请,我不得不在第二天晚上赶到伦敦发表演说;张伯伦先生又要求我在接下去的两个晚上去伯明翰地区。我正要如期赴约,一位信使赶上火车,带来了贝尔福先生的口信,他希望我取消伦敦之约,并于当天下午赶往曼彻斯特与他共同演讲,然后去斯托克波特<sup>①</sup>结束那里的竞选活动。我听从安排。

<sup>①</sup> 英国英格兰西北部城市,在曼彻斯特东南。

我到达目的地时,贝尔福先生正对一大群人讲话。整个会场的人都站起来,为我的到来而欢呼。这位下院领袖郑重其事地将我介绍给选民。从此,我只在重要的大会上演讲。大厅里簇拥着五六千名兴致勃勃的男性选民,他们对竞选宗旨早已滚瓜烂熟;德高望重的政界要人与资深议员一起作为支持者坐在讲台上!此后二三十年里我在选举中所经历的场面一直如此。在海伯里,我与张伯伦先生呆了两天,他躺在床上整整休息了1天,我则坐专列去英格兰中部参加了3个集会,回来后,他满面春风地在晚餐上拿出1瓶1834年的波尔图葡萄酒招待我。3个星期中,我在国内频频告捷。保守党负责人挑选了一些关键席位请我前去助选,一个个胜利在我离开选区后接踵而来。那年我26岁,想到自己已实现目标怎么可能不高兴?好在生活并非一帆风顺,否则我们的生活也就太平淡了。

不过,我似乎还有两件事要做。第一是挣到足够的钱,这样一来我便可集中精力从政,不用去做其他事情。《尼罗河上的战争》以及我的两本战地通讯结集出版后,加上《晨邮报》付给我的10个月工资2500英镑,我现在有了4000多英镑。现在有一个赚钱机会。我打算秋冬两季在国内和美国作讲座,选举一结束,国内之行就开始。我每晚作报告,连续作了5个星期,随后还得如此辛苦两个半月,中间只隔着1个星期的越洋过海的时间可供休息。我在英格兰地区的讲座十分成功,沃尔斯利勋爵主持了第一次讲座。随后我每到一地作讲座时,英伦三岛上的两党名流轮流为我做主持人。宽敞的大厅里挤满了热情的听众,我利用幻灯向他们介绍了我在南非战争中的冒险经历与越狱过程。几乎每个晚上我都能挣到100英镑或更多。在利物浦的交响乐大厅,我赚了300多英镑。11月份这1个月中,我稳稳当当存了4500多英镑,而且这才走了大不列颠的一半。

下院定于12月初开会,我热切地期待着在下院就职。不过为了践约,我还是越过大西洋去了美国,那里的气氛截然不同,我吃惊地发现,与我们说着相同的语言、看起来与英国人十分相像的热情好客的美国人对南非战争并不热心,而且他们中有许多人认为布尔人是对的,爱尔兰人则公然表露出敌意。不同地区的美国听众反应不一,在巴尔的摩,能容纳5000人的大厅里只坐了几百名听众;在波士顿,亲英的美国人举行了一次规模庞大的示威游行,甚至特莱蒙特会堂的入口处都挤满了示威者。在讲台上就座的是300名美国人,他们身穿盎格鲁—美利坚协会的红色制服,场面恢宏;在芝加哥,我遇上了反对者的高声抗议。不过,在我开了些玩笑,自我解嘲,并对布尔人的勇气与仁义进行一番真挚的赞誉后,他们的情绪便缓和了下来。总之,我发现与美国听众交朋友很容易,他们头脑冷静,比较挑剔,但他们举止文雅,质朴敦厚。

在美国之行中,我得到了美国许多知名人士的帮助,伯克·科克兰先生、昌西·迪普先生及其他美国政界领袖为我主持讲座。为我在纽约的首次讲座做主持的不是别人,正是马克·吐温先生。我能与这位名人在一起,心里激动万分。他此时已年迈,头发雪白,谈吐高雅,语气轻松诙谐。我俩就南非战争展开了争论,几个回合后,我就发现自己败下阵来,只得拿国家做挡箭牌,我说:“无论国家是对是错,我都得支持。”“噢,”这位老人说,“如果一个小国为生存而战,我赞成,但你们国家并非如此。”不过我认为自己没有令他不愉快,因为他爽快地应邀在其30卷著作上为我一一签名。在第一卷中,他向我委婉地提出了忠告。他题赠如下:“行善高尚,教人行善更高尚,且易如反掌。”

我们到达加拿大境内,情况又有不同。这里处处是充满激情的人群,我顿时有种宾至如归的感觉,可惜我只能在此停留

10天。1月中旬我返回英国,又开始在国内一个个城市间奔波。在乌尔斯特大厅演说时,尊敬的达弗林勋爵为我作了介绍,他对我的褒扬简直无以复加。我现在仍能记得他当时说话时的情形。他说话时带着老式的发音:“在其同龄人还未完成学业时,这位年轻人已经久经沙场,比欧洲的大部分‘官爷’的战斗经验丰富。”以前我倒是从没想到过这一点,太好了。

2月中旬旅行结束时,我已精疲力竭。在过去的五个多月里,除了星期天,我几乎每晚都得演讲1小时或者更长,有时1天要讲两次。在晚上我通常得马不停蹄地赶路,几乎没有在同一张床上睡过两夜。在此之前是一年紧张的行军打仗,那时休息时根本没有床也没有屋。这次巡回演讲虽然辛苦,但收获颇丰,我已有了近10000英镑,彻底自立了,不用再为未来担心,可以专心从政多年了。我将10000英镑交给父亲的老朋友欧内斯特·卡斯尔爵士,请他替我“喂羊”,他一丝不苟地照料着我的羊群。羊群虽没有迅速成倍繁殖,但个个膘肥体壮,没有一头羊死去,我的羊群每年还能生出几头小羊羔,只是并不足以维持我的生计。我每年要吃掉一二头大羊,因此渐渐地羊群越来越小,几年后,羊群基本上被我吃光了,不过,只要羊群还在,我便不用操心。

## 进入下院

2月底,下院重新集会,并很快陷入激烈的辩论中。当时的报纸详细报道了下院的各个议项,选举人对此也十分关注。重大问题通常要经过3天辩论。此间,所有主要演说家都据理力争。辩论结束后便是两党实力的较量了。当时下院开会一直持续到午夜,9:30以后下院几乎坐满了人。作为领袖,贝尔福先生得在每一个重大辩论后作总结发言。10—11点,反对派各主要领袖作详细总结,11—12点他们便能得到综合性答复。领袖们发言过后,任何想再发表演说的人都会被人们的喧哗所淹没。

几个世纪以来,下院通过辩论引导大英帝国渡过了一道又一道难关,人们都以能够参加下院辩论为荣。几个月来,虽然我一直在大庭广众下作演讲,但我仍然把在议会中演讲看成是最大的考验,心中充满了敬畏之情和急切的期望。我未能参加冬季会议,所以我进入下院仅4天后便向下院发表了演说。准备演讲稿是十分痛苦的,在发言时还要努力掩盖演讲稿中苦心经营的种种迹象,在此我无意重叙往日的这番经历。这次辩论的问题是战争问题,我觉得自己有资格就此辩论或提出建议。我从四面八方听到许多善意的忠告。有的说:“不要操之过急,等几个月后你了解了下院再说。”有的则认为:“这是你熟悉的话题,勿失良机。”也有人警告我不要在人们相互间表示友善的场合过于咄咄逼人,这样会冒犯下院。还有人劝我少用陈词滥调。

不过,我所得到的最好建议是来自亨利·卓别林先生,他说:“不要着急,如果你有话要说,下院就得听你讲。”

有一位崭露头角的威尔士人,名叫劳合·乔治,此人是个亲布尔分子,是最令我们头痛的人物之一。他总是从下院后座站起来,向自由党领袖发难。我得知他将在九点左右发言。他手中有一个措辞适度的修正案,但他是否会就此提出动议就说不准了。我想如果我愿意的话,可以跟在他后面发言。当年,在发言时我如果不把自己打算说的话写下来背熟的话,那么我除了应付一两句以外根本无法开口,这种状况一直持续了好几年。上过大学的年轻人都在辩论社里锻炼过各种各样的即兴演讲,而我却没有这种经历,因此我不得不预先想好辩论情景,为可能问及的问题准备好各种答案。就仿佛事先准备了多种型号的利箭,以期有几支能命中目标。由于无法确定劳合·乔治先生会说什么,因此我心存疑虑,希望自己准备的内容能接上他的话题。

这一时刻终于到了。我坐在前座边上,紧靠在大臣们座位的后面。父亲当年就是在这个座位上发表了辞职演讲。我左边坐着经验丰富的议员托马斯·吉布森·鲍尔斯先生,他是我的顾问。接近九点,下院坐满了人。劳合·乔治先生在反对派就座的后座第三排开始发言,他周围聚集了几个威尔士人和激进分子,并得到了爱尔兰民族主义者的支持。他宣布只谈主要问题,不打算就自己适度的修正案提出动议。在凯尔特外缘<sup>①</sup>分子的鼓动下,他兴奋起来,言辞颇为激烈。在他发言时,我在一句一句为自己的演讲打腹稿,准备在他发言结束后马上接着他的话题往下讲。可我打算说的话都被他一句接一句地抢先说了出

---

<sup>①</sup> 指苏格兰高地、爱尔兰、威尔士与康沃尔人或他们所居住的地方,因这些地方属英国外缘地区,故有此说。

来,于是我恐慌起来,甚至有点绝望了,我强忍住这种感觉。这时鲍尔斯悄悄对我说:“你可以这样说,‘他与其作这番言辞激烈的发言,而不就他那适度的修正案作出动议,倒不如就他那适度的修正案作出动议而不要作这番言辞激烈的发言。’”荒野中的吗哪<sup>①</sup>也没有这句话宝贵,来的正是时候。令我吃惊的是,我听到对手说道,他“将缩短自己的发言,他认为下院可能希望听听一位新议员的发言”。摆出这番高姿态之后,他便立刻回到其座位上。

不知不觉中,我已走上讲台,并背起了鲍尔斯先生的那句话,这句话为我赢得了一片欢呼。我又恢复了勇气,顺利地完成了自己的演讲。虽然从小别人就教我讨厌爱尔兰人,但事实上他们是很好的听众,他们对我的发言表示了适度的反对,反倒助了我一臂之力,但并没有使我为难。当我拿他们开玩笑时,他们也似乎一点不恼怒。不过当我说到“在战场作战的布尔人——如果我是布尔人,也希望自己能拼杀在沙场……”,我看见下面坐在国务大臣席上的议员们骚乱起来,张伯伦先生对其邻座不知说了些什么。后来乔治·温德姆先生告诉我原话,“下院的席位就这样浪费了!”不过我已看见了不远处胜利的彼岸,于是奋力游上岸,虽气喘吁吁,水汗直淌,但总算安然无恙。大家都很有客气,对我鼓励一番,于是我昏昏沉沉、舒舒服服地一直坐到自己恢复了元气才回家。对我的演说,总的评价是肯定的,尽管许多人猜到了我是事先背下来的,但鉴于我吃了不少苦头,他们便宽恕了我。下院尽管变化很大,却依旧是个威严的整体,对那些以能为之效力为荣的人一向宽大为怀。

---

<sup>①</sup> 吗哪,《圣经》故事中所说古以色列人经过荒野时所得的天赐食物。

这次辩论后,我结识了劳合·乔治先生。在下院的酒吧里,我俩被人引见相识,相互致意后,他说:“依你的观点判断,你站在领袖们的对立面。”我回答:“你对大英帝国的态度相当超脱。”就这样,我俩开始了交往,经过几十年风风雨雨,友谊始终如一。

作为保守党议员,在这届议会里,我后来又作了两次成功的演说,而且都是在头几个月里。战争办公室任命一位名叫科尔维尔的将军指挥驻扎在直布罗陀的一个旅。任命刚下达,他们便对这位将军在一年前南非战场的表现表示不满。事实上他们也才刚刚了解到,于是免去了他的职务。反对党支持这位将军,指责保守党秋后算账。在演说结束后的提问时间里发生了争吵,于是下院决定在下一周两党对此进行辩论。我对这种问题十分熟悉,有足够的时间选择最佳论点。辩论刚开始执政党便出师不利,受到各方的批评。当时,政府在辩论中败北是十分严重的事,即使执政党掌握了绝对多数席也是如此,这会损害到执政党的声誉。如果大臣们觉得哈考特、阿斯奎斯、莫利或格雷<sup>①</sup>冲破了他们的防线,他们将坐立不安。我不失时机地参加了这场辩论,每个人都认为我的发言是次辩论演说,但事实上这只不过是辩论过程被我侥幸猜中而已。我用反对党所赞成的论点为政府辩护,结果保守党满意,自由党也称心。乔治·温德姆先生现任爱尔兰事务大臣,现在我们的交往十分密切,当时他说政府各部门的大臣对我评价都不错。我似乎已在下院立住了脚。

不过,我也意识到自己与保守党中的主流观点意见相左,我完全拥护将布尔战争打到底。此时战火再一次星星点点地燃起了。为了将布尔战争进行到底,我赞成动用更多士兵,组织一支素质更高的军队,还可动用印度军队。同时,我也佩服布尔人不

---

<sup>①</sup> 这些人是当时的反对党、自由党的领袖。

不屈不挠的抵抗精神,对其遭受的凌辱感到愤慨,希望以体面的和平方式把这些勇士及其领导人与我们团结起来。我认为焚毁布尔人的农庄是愚蠢行为,令人深恶痛绝。我反对处死布尔人的指挥官谢珀斯。在推翻对布尔人的另一位指挥官克鲁特津格的死刑判决一事上,我可能有一份功劳。我与保守党的分歧越来越大。战争事务大臣说:“我们国家卷入这场战争纯属偶然,但既然已经卷入战争,我们就必须把战争进行到底。”对此我很是气愤。我认为应该软硬兼施来结束这场战争,然后迅速回到和平、削减军费和改革的轨道上来。尽管我有幸能接触到大多数保守党领袖,总受到贝尔福先生格外亲切的关怀,还经常见到张伯伦先生,聆听他们对国家大事的高见,可我还是逐渐背离了他们。罗斯伯里、阿斯奎斯和格雷,特别是约翰·莫利,似乎比保守党领袖更能理解我,我也被他们的智慧所吸引,他们对待公众事务的观点不受现实的羁绊,十分豁达。

诸位一定记得我没上过大学。上过大学的年轻人有机会通过辩论不断支持或反驳各种观点而无须负任何责任,我却没有这样的锻炼机会。我已是众人皆知的角色,对自己所说的每一句话都十分谨慎,而且我说的话常常会得到广泛的报道。我一心想使保守党走自由党的路线,我反对穷兵黩武,同情布尔人。我发现自己的观点与两个政党都不相容。我太幼稚了,竟以为只要自己认为正确的观点就可以毫无顾忌地说出来。我认为在这方面,诚实比其他一切都更重要。我不懂政党纪律和团结的重要性,也不知道在工作中为了党的事业而牺牲自己见解的重要性。

我的第三次演说事关重大。战争事务大臣布罗德里克先生宣布了一项计划,他准备重新组织一支更大规模的军队。他建议将包括正规军、民兵和志愿兵在内的所有武装力量划分成 6

个军团。我决定在讨论军队预算时对此提出反对。我为此花了6个星期准备这次演讲,将讲稿倒背如流,这样无论从讲稿中的哪一部分讲起都没有问题。讨论会计划持续两天。由于运气好,加上议长对我的偏爱,我被安排在第一天晚上11点做演讲,有1个小时的发言时间。12点后下院要进行其他议项的讨论。下院里人山人海,听众们自始至终全神贯注。实际上,我不仅对政府政策,而且对保守党的政治思想倾向都做了全面抨击,同时极力主张和平、节约和裁军。保守党对此十分惊愕,反对党则放声欢呼。作为演讲,这次当然很成功,但也标志着我从此与所有坐在自己周围的保守党议员在思想上产生了明显分歧。我已事先将演讲稿寄给《晨邮报》,并已印刷了。如果我没有这次演说机会或者演说失败,我真不敢想象结果会如何,把这样的一篇文章大量印行发表使我十分担心,因此,演讲一结束,我便大大松了口气。让整个下院都听我演讲对我来说确实是件大事,我的努力得到了回报,同时我必须承担这次演说所带来的后果。

与此同时,我们形成了自己的议会小团体,绰号“胡里干”<sup>①</sup>,成员包括珀西勋爵、休·塞西尔勋爵、伊恩·麦克科姆勋爵、阿瑟·斯坦利先生和我本人。每周四我们都在议会共进晚餐,并总要邀请一位贵客。我们请过两党的所有领袖人物。有时我们还能请到像W·J·布赖恩先生<sup>②</sup>这样的稀客。我们甚至也向索尔兹伯里首相发出邀请,但他让我们到阿林顿街与之共进晚餐。首相兴致很高,对我们所提出的每一话题都侃侃而谈。晚餐结束走在街上,珀西对我说:“做了20年首相后,行将就木

<sup>①</sup> 胡里干为英语“hooligan”的音译,意指“流氓、恶少”。

<sup>②</sup> W·J·布赖恩(1860—1925),美国民主党领袖,他虽然数次竞选总统失利,但他在20世纪初的美国政坛上有很大影响。

了,会是怎样的感觉呢?”与索尔兹伯里勋爵一同逝去的东西很多,他的退休和去世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大英帝国正面临着一个动荡不安的新纪元。

索尔兹伯里勋爵所统治的社会、本书所描述的时代和事件,保守党的结构与特点,以及英国统治阶层的基础等等,所有这一切很快与我们被一条鸿沟所隔开,时间之短、速度之快,实属罕见。历史潮流滚滚向前,我们难以预料其力量会有多么强大,更想不到会有什么样可怕的灾难将把19世纪的社会结构震得四分五裂,但珀西对此有一种预感,可他却未能亲眼看到这种巨变。秋季的一天,我与他走在邓劳比市的大街上,他向我解释伊尔文派宗教。根据这个教派的说法,大概是有12名使徒被派来警告人类,可无人理会。他们中的最后一名使徒与维多利亚女王同一天去世,人类的安全从此一去不复返。珀西预测,一个可怕的战争时代即将到来,恐怖难以名状。不知为什么,他对此十分肯定。他用了“哈米吉尔顿”<sup>①</sup>这个词,这个词我以前只听说在《圣经》中提及过。当时,德国王储恰好住在邓劳比市,这位与我们打打闹闹一起玩弹子游戏的年轻人和蔼可亲,他是否会在珀西所预言的事件中扮演某个角色呢?我不禁感到疑惑。

1902年4月,有一位名叫卡特赖特的先生在下院引起了一场风波。此人是一报社编辑,大胆发表了一封信,批评英国人虐待集中营中的布尔妇女和儿童,因而被判犯有煽动罪,在南非监禁了1年。服刑期满后他希望回到英国,但南非军事当局一口回绝。下院就此向大臣们提出质询,战争事务次官对质询的答复是:“我们不希望增加在英国作反英宣传的人数。”就这样,他

---

<sup>①</sup> 《圣经》中出现的单词,特指世界末日善恶的决战场,比喻国家间大规模的战争。

们用最糟糕的理由为其滥用职权的行为辩护。实际上,这时候在什么地方作反英宣传所带来的危害会比在英国更小呢?约翰·莫利提议休会。当时这样的提议会立刻提交讨论,所有反对党领袖慷慨陈辞,对此义愤填膺,我与我们小团体的另一成员则在保守党的议席里支持反对党。此事虽小,反响却很大。

当天晚上,我们邀请张伯伦先生共进晚餐。“我正在与一伙坏蛋共进晚餐。”他边说边用挑衅的眼光审视着我们。我们解释道:“政府的行为实在太愚蠢傲慢,怎么能够期望我们去支持它呢?”他说:“如果政府完全正确,要你们支持干什么呢?只有当政府身处这类困境时,才需要你们的帮助。”不过,当他情绪好转后,他开始变得眉飞色舞,十分可爱,他的谈话极为精彩。起身告辞时,他在门口犹豫了一会,然后转过身来,故意卖关子:“你们年轻人盛情款待了我,作为回报,我要告诉你们一个无价的秘密——关税!这在不远的将来将是政治中的大事。你们要仔细研究,彻底掌握。你们不会因殷勤地招待我而感到遗憾的。”

果然,不久财政领域便发生了一系列大事,我也因此集中精力卷入了新的战斗,一直到1908年。1908年9月我结了婚,从此一直生活得很幸福。

Images have been losslessly embedded. Information about the original file can be found in PDF attachments. Some stats (more in the PDF attachments):

```
{
  "filename": "XzEwMTYzNDUzLnppcA==",
  "filename_decoded": "_10163453.zip",
  "filesize": 20615704,
  "md5": "1f2aa4273e727fb4218c89646e40b55a",
  "header_md5": "8f09b5d3ef203d9470cc4c2ed7cba055",
  "sha1": "1db6913dde1277292b092eae884b55317ca5cca",
  "sha256": "31b265e64db22e18194d0d4f25c8043f2e54677653a88661fde0956078c682a8",
  "crc32": 1679059996,
  "zip_password": "wcpfxk&^TDwcpfxk",
  "uncompressed_size": 21209676,
  "pdg_dir_name": "",
  "pdg_main_pages_found": 309,
  "pdg_main_pages_max": 309,
  "total_pages": 317,
  "total_pixels": 1237740752,
  "pdf_generation_missing_pages": false
}
```